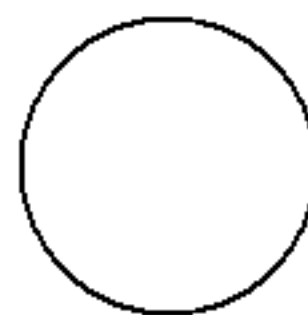


红 旗

H O N G Q I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一九六五年

8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八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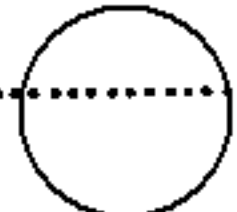
目 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贺 龙 (1)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陶 铸 (16)

诗词十首 郭沫若 (31)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  毛况生 (34)

教练工作杂记 傅其芳 (42)

☆ 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贺 龙

在军队中是否实行民主，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领导的反革命军队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一个根本区别。人们知道，一切军队都是专政的工具。反动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军队，是对人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对反革命实行专政的工具。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反革命军队，因为它是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为敌的，所以它在内部决不敢实行民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则不同，因为它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利益的军队，即保卫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利益的人民军队，所以它除了对反革命实行专政以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主的；在军队内部是可能和应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办事的。也就是说，是可能和应该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并且在民主基础上实现高度统一集中的领导的。

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特色之一，就在于这支军队在自己内部实行了群众路线，实行了有领导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军队建设上的伟大创造，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伟大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贡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人间奇迹？创造出那么多军事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量，使我军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挡住，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队是一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的人民军队，就在于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为了人民的解放的正义战争，是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来进行的真正的人民战争。由此出发，我们同一切旧的军队旧的军事传统彻底决裂，不但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了革命的政治工作，而且完全打破了那种认为军队要



打仗要服从命令，就不能有民主的陈腐观念，創造了历史上第一支真正讲民主的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同志在创建我军之初，就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①的光辉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在长期的建军和作战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以三大民主为内容的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民主传统。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总结了我军民主运动的经验，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②。按照毛泽东同志这些教导，我们在军队中实行了最广泛的民主，实行了群众路线，处处相信群众，事事依靠群众，这就使我们获得了一切反动军队所无法获得的伟大力量。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都是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势力。这种军队的反人民的阶级性反映在军民关系上，是军民对立；反映在军队内部关系上，便是官兵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它不能不实行愚兵政策和压迫政策，决定了它在上下、官兵之间的关系上，只能提倡不准过问是非曲直的所谓绝对服从，决定了它不仅不会有民主，不敢有民主，也不允许有民主，而且还动辄用打骂枪毙等等野蛮办法来维持军队的纪律。因此，从根本上说，军民对立、官兵对立，在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中，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

在无产阶级的军队诞生之前，某些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军队，虽然也实行过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措施或制度，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他们的阶级局限性，这些措施或制度也只能是自发的、零碎的、不彻底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反动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的勤务员，人民自己求解放的工具。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它不因为手里有枪而欺压人民，不因为作战有功而以人民的恩人自居。所以，我军能够到处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人民和军队的这种高度的团结一致，形成了一道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扫清了一切旧军队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对立关系，在军队中造成了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

①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页。

②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5页。



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集中领导下，用民主的方法办事，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已经成了我們根深蒂固的光荣传统和制度，已经成了我們全軍上下普遍的生活习惯。无论是在連队、在机关、在学校，也无无论是工作、訓練还是打仗，都是讲民主的。大至方针政策、作战计划，小至日常事务、批評表揚，通常都是經過充分酝酿討論，然后作出决定、采取行动的。在我們部队中，可以说，上上下下，时时处处，都充滿着民主。由于民主的广泛发揚，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人人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翁，军队中的事情，“人人自觉管，事事有人管”，“好事人人夸，坏事人人揭”。大家都自觉自願遵守紀律，服从命令，真正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战斗集体。这样，我軍就能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苦，不怕死，英勇杀敌，成为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军队。

毛泽东同志的建軍思想的贯彻执行，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和和乎乎的。在中国要建設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不能不遇到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阻撓，不能不遇到各种各样旧的成見和习惯势力的抵制。事实上，从我軍建軍一开始，那些沾染有旧式军队习气的人，抱有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成見的人，就頑固地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軍路綫。他们在反对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同时，还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来反对民主运动，抵制群众路綫。显然，如果不反复地破除这种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不反复地破除这种成見和习惯势力的阻力，就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所特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要民主还是不要民主，要群众路綫还是不要群众路綫，历来是我們贯彻毛泽东同志的建軍思想，反对资产阶级的建軍思想的两条路綫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民主传统，就是在不断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作斗争中才确立起来，巩固起来，并且一步步地发展、完备起来的。

三十八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行民主制度、发揚群众路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靠人民，靠士兵，靠发揚民主，靠群众路綫，这是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伟大思想的精髓，这是我們军队几十年来由小到大，以弱胜强，打败一个又一个强敌，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传家宝。总结我們在这方面的基本經驗，更好地繼續保持和发揚这个传家宝，我們就会是无敌于天下的。

在三十八年的历史过程中日益发展和完备起来的我軍的民主传统，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最基本的經驗，可以概括为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军队要不要实行民主，絕不是一个方法問題，而是一个立場問題、根本态度問題，归根結蒂，是一个尊重不尊重群众，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的問題。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八年总结工农红军和八路军在这方面的经验时就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这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直到今天，对我们还是十分亲切。他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的指示中，又一次强调了这一个思想。他教导我们，没有坚强的群众观念，没有良好的民主作风，是不够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条件的。事实上，尊重不尊重人民群众，相信不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不依靠人民群众，正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

说这是根本态度，首先因为这是怎样认识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第一国际的时候，就明确地规定了一个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② 国际歌里也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个观点于革命战争，明确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③ “兵民是胜利之本”^④。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战争史，就是一部人民战争史，一部群众的革命战争史。军队的政治工作，根本的就是教育和发动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工作。一个革命者，要是离开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士兵群众，就算是三头六臂，也不过是一个孤家寡人，在斗争中是必败无疑的。显然，谁如果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上，把自己当做英雄、老爷，把人民群众、士兵群众看作阿斗、“群氓”，那他就必然脱离群众，瞧不起群众，不可能平等地对待群众，当然也就害怕民主，不愿意实行民主。

说这是根本态度，还因为这是怎样认识和对待知识的来源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群众是实践者，一切知识无不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

①④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01、498页。

②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9页。

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实践活动。“必須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①。打仗也是一样。广大的上兵群众和基层指揮員，是战斗第一綫的亲身实践者，真正了解一部分实际情况，因此他們往往能够比較切合实际地設想到每个具体战斗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并且容易找到解决这些問題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不过是一个加工厂，其任务就是要深入实际，把群众的意見和經驗集中起来，經過加工制造，然后再拿到群众中去贯彻去推广。这就是群众路綫。这样就可以做好工作打好仗。这是我們在几十年战争中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显然，誰如果不懂得或者不願意看到这一点，不相信群众的智慧，不相信群众的本事，抱着“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那他就根本談不上会有什么民主作风。

說这是根本态度，还因为这是用什么样的階級感情来对待群众的問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們，革命干部必須滿腔热情地对待人民群众和士兵群众，把他們当作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亲近他們，熟識他們，从心底里热爱他們，才能同他們真正打成一片，获得共同的語言，贏得他們的信任。也只有这种出于階級感情上的一致，才能使我軍上上下下紧密地联結在一起，使我軍的民主生活活跃起来、发展起来。对于放下武器的敵軍士兵，也只有把他們当作被压迫、被欺騙的階級兄弟来看待，才有可能真正执行好党的俘虏政策，做好对俘虏兵的团結教育工作。显然，誰如果缺乏这种无产階級的思想感情，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对士兵、对人民、对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虏的人格尊重，当然也就談不上什么民主作风。

第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把人民軍隊严格的紀律建立在軍隊对于人民的民主关系基础之上，是我軍团結內部、团結人民、瓦解敵軍的强大武器。

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們，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紀律；他們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狹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为着民族的解放，为着人类的解放而結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軍隊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同志在我軍初創时期，就手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把无产階級革命軍隊的建军宗旨，在处理軍隊內外关系中最經常遇到的具体問題上体现了出来，把最常見的“小事情”提高到政治原則上来。这样，就在紅軍中彻底破除了旧軍隊欺压人民、虐待俘虏等等的軍閥

^①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頁。

* 三大紀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揮；（二）不拿群众一針一錢；（三）一切繳获要归公。八項注意是：（一）說話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調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主义影响，确立了人民军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革命的民主传统，以及争取敌军官兵和宽待俘虏的正确政策。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使人民群众从日常的军民关系中，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完全改变了对军队的旧观念，从怕兵到爱兵，从把当兵的看做“最可怕的人”，变到把当兵的看做“最可爱的人”，从害怕当兵、拒绝当兵，变到争先恐后地抢着参军，从“好男不当兵”，变到“好汉要当兵”。我军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认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军队就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还创造了瓦解敌军改造俘虏的最大效果。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和我军内部的民主生活，同一切反动军队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是最有说服力的活生生的现实。任何反动军队的基层军官和广大士兵，只要一接触这个实际，他们原来所受的反共欺骗宣传就立刻被揭穿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的阶级意识就很快被唤醒了。由于我们的正确政策和民主主义的影响，以及对俘虏的教育工作，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使成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掉转枪口打蒋介石，并且在这些解放战士中出现了许多战斗英雄，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也曾经促使成批的敌军放下武器，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训练出来的敌军官兵反过来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力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共只有六十一个字。讲的又多是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这样一些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这在那些满脑子旧军队思想的人看来，固然根本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在那些满脑子洋教条的人看来，这种“从山沟沟里出来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就是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規定里，却真正闪烁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却真正把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思想具体化了。有些人把这六十一个字看得很简单，以为做起来还不容易？其实，他们那里懂得，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一个彻底革命的世界观，还硬是做不到呢！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军队，任何一个没有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军队，都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开展广泛的政治民主，是全部民主生活、民主运动的前提和基础。

我军的民主运动，历来是从建立官长和士兵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民主关系做起的。这种平等地位和民主关系，就表现在我军官兵只有职务上的区分，没有人格上的贵贱，大家都是阶级兄弟，都是来干革命的，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为了革命的利益，人人都有学习研究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权利，都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提出积极建



議的權利，都有同違反黨的方針政策的思想行為作鬥爭的權利。為了人民的利益，幹部戰士可以互相監督，互相批評。幹部只有為了工作多費腦筋、多出主意、多負責任的義務，而沒有任何特權，對於士兵群眾的正當批評，只有歡迎的義務，絕無拒絕的權利，更不允許壓制和打擊報復。這樣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群眾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才能使大家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發揮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才能達到提高廣大指戰員的積極性，增強軍隊的戰鬥力的目的。

提高廣大官兵的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是實現三大民主的思想基礎。毛澤東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為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就強調以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從教育上提高政治水平，充分發揚民主，建立正確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生活，來反對和糾正一切不良傾向。他在總結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時更進一步指出：“由於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在這個基礎上，部队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群眾性的練兵運動開展了，完全有領導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民主發揚了。”^①三大民主必須也只能建立在以階級教育為核心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治民主的基礎之上，在這裡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經驗一再證明，離開了階級教育和政治民主的這個基礎，整個民主生活是不可能健全開展的。試想，假如在官兵之間沒有政治上的共同目標，沒有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共同的階級感情，經濟民主、軍事民主又怎麼能夠搞得起來呢？還能談得上什麼士兵參加管理伙食、監督經濟開支？還能談得到什麼在訓練中實行官兵互教、評教評學？至於打仗時民主討論作戰方案，提困難想辦法，打完仗評指揮評戰術等等，就更不用說了。

我們的政治民主，是由我軍的階級本質決定的。我軍內部沒有階級的對抗，官兵都是階級兄弟。而一切反革命軍隊反動的階級性質，決定了它們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更不可能實行無產階級軍隊所獨有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和戰略戰術。請看，蔣介石過去不是早就十分認真地研究過我們的十大軍事原則嗎？不是早就下令採取過我們的立功運動的辦法嗎？去年以來，不是又在研究和“推行”我們的郭興福教學法嗎？美帝國主義不是也早就在研究我們的游擊戰術嗎？在越南南方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不是也在反復提倡要學習我們的“三大紀律、

^① 《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2頁。



八項注意”嗎？但是，所有这一切，又帮了他們什么忙呢？

軍事离不开政治。无产阶级的軍事只能产生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尽管我們的这一套完全公开，毫不保密，尽管蔣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可以对这些材料加以充分的研究，但是他們却永远不可能理解其精髓，更不可能运用到他們的部队中去。这是他們军队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的。因此，他們企图从这里找到一种窍门，来提高他們的士气与战斗力，实际上只能一次次地可怜地落空，一次次地成为人們的笑柄！

第四、实行經濟民主，关心士兵生活，官兵同甘共苦，是官兵一致这个政治原則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团结群众发挥群众积极性的起点。

在一切旧军队中，士兵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經濟上也受剥削。克扣軍餉，“喝兵血”，是旧军队普遍的现象、公开的秘密。在我軍初創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确立官兵一致、废除打罵制度的同时，就确立了实行經濟公开、士兵管理伙食等經濟民主的原則，并且历来十分重视士兵生活的改善，历来強調官兵同甘共苦的重要，历来反对一切不爱护士兵、不关心士兵的官僚主义倾向。早在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同志就強調地指出了这种和政治民主相结合的經濟民主，对于当时艰苦奋战的幼年紅軍的重要意义。他写道：“紅軍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維持不敵，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內的民主主义。”^①几十年来，这些传统，一直在团结自己，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些沾染了旧军队軍閥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气的人，是不願意也不屑于去搞經濟民主这样的“小事情”的。在他們看来，什么經濟公开，什么改善伙食，还不是鸡毛蒜皮？他們根本不懂得，只有关心群众才能团结群众、领导群众。毛泽东同志曾經反复地闡明过这一点。他說，“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战綫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謀利益……”^②。只要我們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們，把革命当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們无上光荣的旗帜。”^③ 我軍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和平建設时期，都始終坚持了干部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的传统，这就保证了我軍官兵之間充滿了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忘我地奋斗。

实行經濟民主，关心群众生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士兵群众往往是从直接关系自己切身

^① 《井崗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頁。

^{②③}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133—134頁。



利益的一些“生活小事”上，最具体、最实际地体会到革命军队的本质，体会到为谁革命为谁打仗等等革命的大道理。一个领导干部尽管道理讲得再好，如果自己在生活上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在士兵眼里就不过是革命的空谈家，不过是站在群众头上的官僚。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去带兵打仗，是很难不跌跤子的。

第五、实行军事民主，是提高战术技术，打胜仗，出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开“诸葛亮会”提困难想办法，是实行军事民主的基本方法。

我军的经验早就证明，革命军队不但可以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而且可以实行军事民主，不但平时训练可以实行军事民主，而且打仗也可以实行军事民主。远在工农红军时代，这种军事民主就已经有了。红军打仗前要进行战斗动员，打仗后要开会做战斗检查和战斗总结，这实际上就是军事民主。年轻的红军，所以能够很快就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所以能够很快就从农民出身的士兵中、从没有进过任何军事学校的“土包子”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智勇双全的军事指挥员来，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实行军事民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红军时代的这种军事民主，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练兵到作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民主的方法。在训练中实行官兵互教，教学相长，评教评学；组织练兵互助组，以老带新，以强带弱，取长补短，开展互教互学、包教保学活动。在作战中，只要条件许可，就发动干部和战士讨论战斗任务和作战方案，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技术、战术上的困难；战后就组织“战斗评论”，评勇敢、评技术、评战术、评纪律、评指挥，总结实战经验，打一仗进一步。这样，在练兵和作战中碰到的各种难题，一经发动群众大搞军事民主，无不迎刃而解。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实行军事民主，对提高我军的战斗力，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战胜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起了极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了这种进一步发展了的军事民主的经验。他指出：“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①实行这种军事民主，就能够集中群众智慧，激励士气，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使军事民主在全军得到了更加广泛更加自觉的开展。部队越打越有办法，士兵越打越聪明，干部越打越能干。许多外国人乃至一些中国人，总是不能懂得解放

^①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軍的手榴彈怎么会制服了坦克？木船为什么会打败了軍艦？沒有大炮，怎么会炸开了坚固的城牆和鋼骨水泥的碉堡？如此等等，一連串的解不开的“謎”。其实，这一切奇迹之所以能够創造出来，除了靠我們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軍事民主。这就是我們的“秘密”。

第六、軍队的民主运动，应当达到巩固紀律和增强战斗力的目的。既放手发动群众，又加强集中指导，是正确开展民主运动的关键。

軍队中的民主，应当是为着巩固紀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紀律和战斗力。事实上，凡是正确地、有领导地开展了三大民主的地方，也都获得了这样的效果。經驗证明，一切担心民主开展起来，特别是軍事民主开展起来，会削弱紀律呀，会妨碍指揮呀，会影响下部的威信呀，会耽擱時間貽誤战机呀，等等的顾虑，都是毫无根据的。

打仗，是敌我之間的生死搏斗，最需要統一的行动，最需要严格的紀律，最需要权威的指揮，最需要当机立断。一句話，就是要高度的集中。既然要高度的集中，又怎么能够开展广泛的民主呢？的确，这在資產階級軍事家來說，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在反动的軍队里，也是根本办不到的，但是在我們的軍队里，却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革命軍队中实行軍事民主，不但和打仗的这一切要求并不冲突，相反，民主的开展，正是加强了这一切。

經驗证明，民主开展得越是充分，上下級之間、官兵之間就越是能够增强互相的了解与信賴，消除彼此的顾虑与怀疑，领导正确、有錯即改的指揮員的威信就越是得到巩固，他就越加能够放手指揮，而下級和士兵也越加能够自觉地遵守紀律、执行命令听指揮。同时，越是民主地討論和修訂了作战方案，使每个成員都清楚地了解自己在整个战斗中所占的地位与应起的作用，就越加能够提高他們的作战积极性，就越加能够加强他們在战斗中自觉的团結与协同。也正因为經過战前的軍事民主，参战人員对作战方案都有了一定范围的了解，战斗中即使在指揮員甚至預定的代理人連續伤亡的情况下，也才不至于使指揮中断，在党团员挺身而出繼續指揮的时候，也就不仅有了政治責任心的保证，而且有了具体办法上的保证。民主究竟是妨碍集中，还是加强集中，难道还不清楚嗎？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完全能够說明这一点。我們的干部战士在要安排或者执行什么任务的时候，总是要“商量商量”、“酝酿酝酿”、“征求征求意见”；在发生了不同意見的时候，又总是采取把不同意見“摆一摆”、“議一議”，对持有錯誤意見的人“打通打通思想”、“做做說服工作”；在做完一件事之后又总是要“提提意見”、“检查检查”、“总结总结”。所有这一切，从总体上說来，都不仅沒有引起什么麻煩，耽誤什么事情，增加什么分歧，相反，这一切正是使我們上上下下更好地增进了解，加强团結，集中意志，統一行动，更好地完成



了每一个任务。

对民主运动抱着无穷的忧虑，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或者给民主运动加上种种清规戒律，当然是错误的。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缺乏民主作风，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光是走民主的过场，实际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也是错误的。但是假如认为只要开展了民主运动，干部的责任便减轻了，一切只要按大家的意见照办就是，放弃必要的领导和集中，充当群众的尾巴，那也同样是错误的。应当说，这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对民主的十足的歪曲。照此办理，只能把事情办坏，把仗打坏，只能助长歪风邪气，挫伤群众正当的积极性。

那么，怎样才能对开展三大民主实行正确的领导呢？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经根据红军当时的经验，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回答。他指出，为了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①。显然，那种认为既然要讲民主，领导上就可以不负责任，可以毫无主见，可以随波逐流，可以不分析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不区别可以行得通的和暂时还行不通的意见，只要跟着群众跑就行了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为了有领导地开展民主，遇事能有正确的主见，能拿出切实的办法，就必须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可见，要正确开展民主运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除了必须具备坚强的群众观念，正确的民主态度之外，还必须具备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领导艺术，而不是相反。

几十年来，我军的三大民主从形式到内容虽然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有领导地实行民主的基本经验、基本方法，却仍然离不开毛泽东同志所概括过的这一些。经验证明，凡是按照这些规定去做的，凡是自己首先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心中有数，又引导群众都来重视调查研究，弄清实际情况的，民主就一定能够得到健全的开展，无论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无论是提困难想办法，也才都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收到最好的效果。

第七、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在军队内部贯彻民主制度、实行群众路线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同志在建军之初，就为建立、健全和巩固军队中的党委制而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使党委制日臻完善，逐渐发展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一切重大问题，除了在紧急情况下，由首长机断处置以外，都必须由党委会讨论决定。在讨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論問題時，要充分發揚民主，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力求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作出決定。經驗證明，這個制度，既能廣泛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集中群眾的經驗與智慧，防止個人包辦、個人決定重大問題，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又能充分發揮首長個人的作用，在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之下機斷專行地行使首長的職權，獨立負責地完成任务。這是一個經過考驗的、最為優越的根本領導制度。

我軍幾十年的歷史證明，任何部隊任何時候，破壞了或者削弱了黨委制，就必然發展個人專權的軍閥主義傾向，就必然破壞軍隊黨內的民主生活和黨對部隊的領導，就必然瓦解部隊內部的團結和統一，就必然削弱部隊的戰鬥力。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時期，取消了紅軍中的黨委制，對當時紅軍的作戰和建設造成了很大的惡果。而在抗日戰爭時期以軍政委員會的形式實際上恢復了黨委制以後，特別是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完全恢復並且進一步健全了軍隊中的各級黨委制以後，就大大增強了全軍在黨的領導下的團結，大大活躍了部隊內部的民主生活，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了民主運動和新式整軍運動，從而極大地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保證了戰爭的最後勝利。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黨對軍隊的領導，應該是各級黨委統一的集體的領導，決不應該是任何黨員、首長的個人專權。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建立軍隊各級的黨委制，在黨委內部實行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就是這樣一種把兵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的根本制度。同時，也只有按照這個制度首先在領導成員中建立起優良的民主作風，才能搞好部隊的民主生活。因此，堅持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就成為在軍隊內部貫徹民主制度，實行群眾路線，防止任何個人專權的軍閥主義傾向的根本保證。

第八、在“小米加步槍”的條件下，需要實行三大民主，有了現代化裝備，進行現代化戰爭，仍然需要、更加需要也完全能夠實行三大民主。

三大民主產生於我軍“小米加步槍”的時期，這使一些抱有資產階級軍事觀點的人找到了一種“理由”，似乎什麼三大民主呀，群眾路線呀，都不過是由於我軍裝備處於劣勢、我軍軍官缺乏軍事素養而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都不過是一些“土辦法”。在他們看來，這些“土辦法”，是很低級的，是不科學的。一有現代化裝備，一搞正規化訓練，一打現代化戰爭，這些“土辦法”就完全不中用了，就只能依靠經過所謂科班出身的指揮員和技術專家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新的歷史時期，個別死抱著資產階級軍事思想不放的人，在一個短時間內曾經再一次跑出來興風作浪。他們借着建設現代化正規化軍隊的名義，主張取消軍隊中的黨委制，實質上即是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削弱政治工作，否定我軍的民主傳統和群眾路線，妄圖把人民解放軍拉到資產階級的建軍道路上去。要不要繼續保持和發揚我軍的民主傳



統和群眾路綫，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两条軍事路綫斗争的一个重要內容。

十五年来的事实，完全粉碎了这种荒謬的論調。朝鮮战争可以算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規模最大的一次現代化战争吧！中国人民志願軍和英雄的朝鮮人民軍一起，战胜了具有强大的海、空、炮优势的美国侵略軍，并不是因为我們当时拥有比美国更現代化的軍事装备和軍事技术，主要地是因为我們战争的正义性，是因为我們有朝中人民的全力支持，是因为我們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針，是因为我們广大指战員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很好地发揚了民主传统和群眾路綫，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举世聞名的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工事和坑道攻守战术，在敌机連續轰炸下保持暢通的鋼铁运输綫，把美国飞机的“空中优势”打成“空中劣势”的群众性对空射击运动，使美国兵在三八綫上坐立不安的狙击战等等，难道不都是广泛发揚民主，依靠群众、依靠广大干部战士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創造出来的嗎？

說什么現代化装备，科学得很，复杂得很，士兵群众不懂得，因此根本不能搞民主，这种說法如果不是迷信和无知，就是存心唬人，完全是一种騙局。空軍、海軍的技术装备，可算得現代化吧！原子弹、导弹等新式尖端武器的研究、試驗和制造，可算得是高度現代化了吧！但是，我們年輕的空軍和海軍是怎样迅速地掌握了現代化技术的呢？我們年輕的工农出身的駕駛員，是怎样打掉了美国的王牌飛行員的呢？近年来我們的防空部队又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打掉了美蔣各种型号的間諜飞机的呢？难道不正是在很大程度上靠了大家出主意、大家想办法的民主运动，靠了领导和群众相結合的这个传家宝嗎？我們的国防工业又是怎样打破资产阶级的常規，克服現代修正主义者給我們造成的种种困难，在极短的时间內成功地爆炸了我国自己設計自己制造的两顆原子弹的呢？难道不正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靠了大家出主意、大家想办法的民主运动，靠了领导、专家、工人三結合的群众路綫这个传家宝嗎？

一切經驗都证明，技术装备越是現代化，越是使用現代化装备进行战争，越是对付具有現代化装备的敌人，我軍的民主传统和群眾路綫的工作方法，就越是不能削弱，相反，倒是更加需要加以坚持和发揚。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发明武器的是人，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是人。消灭武器的还是人。沒有人，不但任何現代化的技术装备都不过是一堆死东西，而且就根本生产不出来。人的能动性是任何先进的技术装备都不能代替的，人的因素永远第一。而在人的因素中，任何首长和技术专家的个人智慧和個人經驗，总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此，只有在党委集体领导下，充分发揚民主，充分發揮群众的集体智慧，充分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現代技术装备的作用，才能确有把握地胜利地进行极其复杂的現代化战争。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这方面仍然是我們最好的反面教員。他們对于我軍在革命胜利以后



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十分欣赏，高兴得不得了。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人民解放军尽管在技术装备上比过去加强了，但是它的革命传统，例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三大民主为核心的群众路线等等，就会被削弱甚至被抛弃了，这支革命队伍就会变质，就会变成同资产阶级军队一样的“职业军队”，因而就比较容易对付，就有可能被打败了。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很快就使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胜利以后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军委和林彪同志领导下，不但坚持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包括三大民主在内的、由毛泽东同志手创的我军革命传统这件事，引起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极大恐惧和仇视。他们大肆诬蔑我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运动，说什么这就是要取消民主，要人民毫无怨言地服从啦；说什么这就是要中国人民进一步牺牲个人利益啦；说什么这就是要把军队的组织和方法强加于工厂和公社，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一座兵营啦；如此等等。他们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这样起劲地攻击和诬蔑我们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感觉到，我们坚持和发展这种传统，对于他们是极为不利的。他们那种以为我们有朝一日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装备的改善，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丢掉自己的老传统、逐渐脱离群众的妄想，就完全落空了。

这丝毫也不奇怪。他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这样一事实：中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根本内容，恰恰就是要学习解放军是怎样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同时也就是要学习怎样坚持、发扬我党的民主传统。大家知道，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①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它的种种优良的传统，常常首先在军队中得到贯彻，这正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长期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我们党的民主作风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也是这样。在几十年的战争过程中，整个解放军就是一所民主的学校，一个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播种机。在同国内外反动派艰苦战斗的年代里，解放军到哪里，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哪里，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就传播到那里；那里的人民就学会了开会、选举、讨论、批评等等运用民主的方法，就懂得了怎样使用民主的权利和怎样在民主基础上达到意志的集中和行动的统。至今，中国人民总是把那些最具有民主作风，最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干部，亲热地称为“我们的老红军”、“老八路”，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我们军队一切制度和优良传统的树立，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领导为前提的，是以全心全意为保卫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前提的。军队的一切任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1页。



务，都是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的。我们的人民向军队学习，我们的军队向人民、向地方工作学习，军民是一家，军队地方是一家。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脱离人民、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来说，又怎么可以理解呢？他们是不愿意也永远不可能理解这一点的。在他们看来，绝对服从，没有民主，是一切军队的共同特点，不管是资产阶级军队还是无产阶级军队都一样。因此，中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当然就是要取消民主，当然就是意味着要对人民进行军事控制。这就是他们的可怜而又可笑的逻辑。他们的这种攻击和诬蔑，除了暴露出他们的极端无知，暴露出他们对一切革命事业的极端仇恨而外，又能有什么作用呢？这不但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而且恰恰是给我们充当了最好的反面教员，证明了我們这样做是做对了而不是做错了。这又一次说明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害怕的，并不是你的现代技术。现代技术，你有他也有，他的现代技术，甚至还比你多，比你好。他们对这一方面并不害怕，他们真正害怕的，恰恰是我们所独有的广大指战员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恰恰是能够把这种政治觉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的群众路线，恰恰是我们的民主传统。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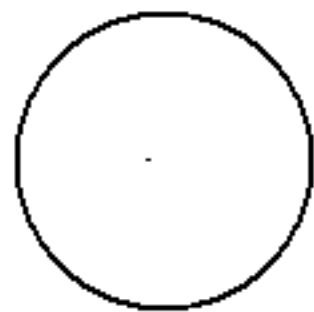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事工作也应当实行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军队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开展三大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的新发展。它既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是在战争中、在军队中首先推行起来的，又是同样适用于一切人民革命事业的。我国人民在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的比学赶帮运动中，把我军的民主传统具体运用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广泛地开展了政治、生产、财务和军事的四大民主运动，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得到了提高觉悟、推动生产、发展科学的巨大效果。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手创的我军民主传统，是我们的革命传家宝，是用到那里那里灵，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军队和广大人民，在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时，依靠这个革命的传家宝，赢得了历次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后，继续依靠这个革命的传家宝，把它在全国各个战线进一步运用发扬起来，我国人民就一定可以更快地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我们人民解放军应当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军的民主传统，虚心地向地方上在这方面的一切新成就、新经验，为进一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更出色地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



陶 铸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都已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古人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全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特别是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的解决农业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适时地解决了我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接着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农业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不仅为农业大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又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极为牢固的基础。回顾十年来的历史事实，环视当前农村和城市的大好形势，展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前景，人们更加坚信，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原是一个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里，迅速地把五亿多个体农民组织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来，走上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件。

我国十年来的实践，无情地驳倒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关于农业问题的谬论，彻底粉碎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恶毒攻击。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所作的理论概括，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和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农业集体化是一个伟大的深刻的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的整个过程，贯串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況下出现的”^②。事情正是这样，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出世，不经过阶级大搏斗是不可能的。这个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合作化运动。全党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著作，就是对这个斗争所作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紧接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所有制，推翻了地主阶级，削弱了富农经济，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贫农群众的经济地位有了改善，很多贫农上升为中农。但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村中存在的是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生命力毕竟是有限的，不用多久的时间，它就从生产力的推进者变为严重的障碍。同时，因我国人口众多，已耕地不足，农业经营方法又很落后，所以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虽然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仍然有困难，或者不富裕。特别严重的是，土地改革以后不久，农村中又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另一方面，许多贫农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又将分得的土地出卖了或者出租。如果让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发展下去，农村中必将出现资本主义泛滥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党是领导农民继续前进，把他们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停步不前，抛开农民，让他们跟资产阶级和富农走呢？这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课题。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告诉全党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坚决领导农民继续前进，必须相信群众，必须相信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在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6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特别是他们中间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而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国农村中出现的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就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集中表现。

但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却坚决反对合作化运动。大约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他们对社会主义是动摇的，有些人还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富裕中农的后面，还有地主和富农的支持。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总是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为了抵抗社会主义改造，他们必然要从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代言人。果然，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代言人，这就是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处心积虑地寻找种种借口，反对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右倾机会主义者被我国农村涌现出来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吓昏了头脑，他们借口所谓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反对当时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对蓬勃发展着的合作化运动，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提出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对于这种人，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①可见，对待农民的合作化运动，究竟是发展还是“砍掉”，是奋勇前进还是“坚决收缩”，是热情领导还是指手划脚，归根到底，这是如何对待五亿多农民，特别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是要不要积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空前高涨的伟大一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出来声嘶力竭地反对合作化呢？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他们“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②。我们知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资产阶级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挖掉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老根，并且使城市资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些人在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影响下，出来反对合作化运动，就不足为怪了，就是完全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了。这些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对待农民问题上，仍然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页。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25、19页。



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这说明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洞察了事物的本质，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关头，再一次向全党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及时地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合作化运动。

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出现，大大地加快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按照党中央原来的设想，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即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一九六七年止完成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提前完成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在一九五六年就基本完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致在一九五七年就完成了。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又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就是说，我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包括实现人民公社化，总共只花了九年的时间，比原计划正好提前一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使农村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底描绘过这个变化。他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①

实际生活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论断。十年来，在农业问题上的斗争还是时起时伏的。在这十年间曾经发生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复。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又有人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单干风”、“自由化”，等等。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所以，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像一根红绳一样，贯穿着过去的整个十年。尽管在某些时候，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领会不深，在实际工作中曾经发生过某些步子过急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右倾机会主义。正因为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才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使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个伟大著作，是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引导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730页。



二

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国，农民问题在中国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了民主革命，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民问题上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这种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概括，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问题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农民问题。早在我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初期，他就不止一次地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可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根本不把广大农民放在眼里，认为民主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则从另一个方面忽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强调城市工作是中心，并把中间力量作为主要打击方向，硬要把农民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彻底批判了这些错误的观点，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充分地发扬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党的工作重点移到农村，放手发展农民游击战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使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终于在六亿多人口的中国取得了伟大的人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仍然把农民问题放在极端重要的地位。他说：“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and 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①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就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针来解决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同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认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链条中的主要环节。因为对农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割断了资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系，消灭了大量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使城市资本主义势力处于孤立的地位。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特别显得突出。毛泽东同志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否定了那种认为合作化只能慢慢来的主张，而强调必须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样做，不但可以较快地解决农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可以极大地推动城市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更加顺利、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一九五六年个体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正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处理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有人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业这一点上就足够了。毛泽东同志驳斥了这种有害的观点。他说：“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①工业和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内部联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发展工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必须首先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粮食和其他食品来自农业；为人民提供穿、用物品的轻工业，其原料也多数来自农业。同时，建立重工业的资金，主要由农业和轻工业来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要由农村来提供；而且只有以农村为主要市场，工业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只有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把迅速发展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有了稳固而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总结我国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在制订计划时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执行这样的方针，就可以使农业迅速地发展起来，实现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把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建立在强大的农业基础上，实现整个国民经济持久的、高速度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伟大成就，正是在这个总方针的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同志制定的这个方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新的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指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一贯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指导我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农民运动。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不仅为了实现民主主义的任务，而且为了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这是性质上不同的、要由革命的两个阶段来分别解决的任务。但是，我们绝不能在革命的两个阶段之间筑起一座万里长城，而必须把两个阶段紧密地衔接起来。在前一阶段要尽可能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前一阶段的任务一旦完成，就应当不停顿地立即开展下一阶段的斗争。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24页。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把革命的两个阶段截然对立起来。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主张在农村实行雇工、信贷、贸易、土地买卖和出租的“四大自由”，确保私有财产，巩固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些同志只不过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希望中国革命在民主主义阶段停顿下来。

毛泽东同志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树立贫农的优势；在彻底消灭地主封建经济的同时，必须在政治上孤立富农，在经济上削弱富农经济；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必须积极地组织农民，建立包含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和合作社。所有这些，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当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基本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不应该让革命停顿下来，让群众革命热情冷却下来，而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把土地改革同农业合作化紧密衔接起来，不停顿地引导农民继续前进，由个体经济转向集体经济。

毛泽东同志为我国农业集体化所拟定的各种完善的逐步过渡的农业组织形式，是创造性地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原理的又一个光辉范例。在合作化过程中，我们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采取了三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步骤：第一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后，在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又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领导农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们这样一步一步地改造小农经济，既有利于逐步启发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较快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又避免了因生产关系变革的剧烈震动而可能引起的对生产的消极影响，保证了农业生产逐年上升。

在农村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是就宣告结束了呢？有些人以为，是结束了。在他们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革命，至少是最后一次带阶级斗争性质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种见解，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固然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次伟大变革，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远没有最后完成。

事情很清楚，只要农村还存在着私有经济的残余，农民就仍然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某些固有的特点，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也就难以完全避免。而且，从长远来看，仅仅实现目前这样的农业集体所有制，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将来，我们还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地把规模较小、公有化程度较低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规模较大、公有化程度较高的集体所有制，以至最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很显然，



要实现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以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结合的思想，继续把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地向前推进。

三、关于正确处理农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

正确处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系问题，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在农业生产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使用机器，而国家工业又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能不能实现农业合作化呢？有些同志曾经认为，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要想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些同志，看不见农村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看不见个体农业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死抱住小农经济的落后生产关系不放，这就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这些同志，有的是由于一时没有弄清楚事情，当他们把事情弄清楚以后，就拥护党的农业合作化方针。但是，也有少数同志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错误观点。

同上述的错误观点完全相反，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①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领导下，在农村先进行合作化，再实现机械化，或者说，在一个时期内以社会改革为主，以技术改革为辅，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国工业比较落后，这是一个事实，可是正因为工业比较落后，就必须首先实现农业合作化。只有实现合作化，才能够为农业的技术改革开辟广阔的道路，也只有农业生产迅速提高了，才能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更快地为农业提供大量的机器设备。因此，在当时必须毫不迟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劳动，集体经营。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即使仍然使用原来的生产工具，也能够创造出比个体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加速我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理论。早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然是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出现的，但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又起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们看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我们及时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改变了农村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充分地发扬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扬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是又相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23页。



适应，又相矛盾的。“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①正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以前有许多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已经不再有矛盾。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辩证法就不适用了，矛盾的运动就终止了，社会的发展也就停顿下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只会使自己在现实的矛盾面前处于被动的地位，对于我们变革世界的实践是十分有害的，因而是极为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仍然存在着矛盾的论点，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我们能够自觉地主动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完善和革新生产关系，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四、关于农村阶级斗争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就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和革命的观点武装全党的同志，要我们牢记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土地改革以后，是听任资本主义滋长和泛滥呢，还是前进到社会主义呢？在合作化以后，是继续不断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满足于已有的一切，半途停顿下来，甚至向资本主义倒退呢？这就是整个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力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严重警惕，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粉碎阶级敌人的“和平演变”阴谋。

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了我国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对我国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作出了创造性的科学分析，使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在农业合作化大规模展开的时期，我国农村中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变为新中农，中农（包括新老中农）在农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加。毛泽东同志对中农的各个不同阶层进行了具体的阶级分析，这是关系到如何制定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的重要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从农村日益中农化这一事实出发，认为不应当再提依靠贫农的口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他指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2页。



大的貧农群众，才能比較順利地办到，否則將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階級，是比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們。他們中間的大部分現在已經变为新中农，但是他們同老中农比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較高的觉悟，他們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他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比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①

富裕中农虽然大多数对于合作化是可以贊同的，但他們有着較多的資本主义傾向，常常企图走資本主义的老路。同他們的資本主义傾向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中国富农經濟很弱，而富裕中农的力量却相当大，所以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同那些受到地主和富农支持的富裕中农的斗争。

根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在农村必須依靠貧农和下中农的口号。在我国，貧农和下中农約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这样广大的劳动农民作为工人階級在农村的依靠，我們农村的集体經濟就找到了可靠的力量，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就有了强大的社会支柱，社会主义道路在农村的胜利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对农村各階級、各阶层的分析，为工人階級解决了如何对待中农这样一个重要的策略問題，为我們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制定了一条依靠貧农和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階級路綫。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問題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的基础、内容和所采取的形式究竟怎样，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問題。毛泽东同志說：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階級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階級的联盟”^②。問題在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农联盟應該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个联盟應該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巩固。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强工农联盟的过程，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农民、按社会主义原則改造农业的过程，就是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就是使工业和农业密切結合、并使工农差別和城乡差別日益縮小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期，还必须根据工农关系中出現的問題，及时地具体地加以解决，才能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

当农民的个体經濟同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已經不再适应的时候，实行合作化就成了巩固工农联盟的中心問題。毛泽东同志坚决駁斥了那种认为如果合作化不赶快“下馬”，就有破坏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858 頁。

②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83 頁。



工农联盟的危險的机会主义論調，他說：“我們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險。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馬，一个要上馬，却是表現了两条路綫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給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經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灭了。”現在只有在新的基础上工农联盟才能够繼續巩固下去。“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們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們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險。”^①

当然，为着巩固工农联盟，只是解决个体农业經濟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間的矛盾，还是不够的。在合作化以后，还必须正确地处理集体經濟內部的各种矛盾（如生产与分配、积累与消費、领导与群众等等），以及集体經濟与集体經濟之間的矛盾；正确地处理农业的集体所有制与工业的全民所有制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农业技术落后与工业技术相对先进的矛盾，等等。

在整个过渡时期，农村中始終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站在最广大的劳动农民方面，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势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最重要的保证。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綱，抓紧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工农联盟才能够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六、关于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問題

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把他們当作历史的主人，还是把他們当作一群浑浑噩噩的“群氓”，这从来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历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我們党所领导的任何伟大的革命运动，必须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或者别的什么人的施舍和恩賜。同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任何时候都要满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任何时候都不能向群众头上泼冷水。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經指出，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面前，“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决定取舍。站在他們的前头领导他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評他們呢？还是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第30—31、32頁。

^② 《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頁。



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①那时，毛泽东同志坚决地反对把群众运动看成“糟得很”，而热烈地歌颂群众运动是“好得很”。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毛泽东同志一贯地用最高的热情对待群众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在我国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在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方面再一次为全党作出了榜样。他反复指出，农业集体化是农村中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这是五亿多农民的伟大事业，是誰也无法恩赐和包办代替得了的。“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②。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对革命人民的高度信任的表现。

在如何对待革命群众运动这一个最基本的問題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也违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他們对五亿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抱着贵族老爷式的态度，不相信广大农民願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相信广大农民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排除一切困难，办好合作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陣地。所以，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到来时，他們就吓昏了头脑，惊慌失措，害怕得要死，甚至胡乱地“砍掉”已經組織起来的合作社。他們重复了“叶公好龙”的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我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所出現的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又一次說明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始終是我們工人階級政党应当注意的一个根本問題，就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我們同样不能对此有絲毫的忽視。絕不可以认为，有了政权，就可以用行政命令来代替群众的革命斗争，就可以不尊重群众的革命創造性，不爱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用諸如“砍掉”合作社这样的錯誤行为来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要知道，我們无产階級夺取政权，正是为了运用它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調动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彻底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最后消灭階級；为了动員和組織亿万劳动群众的力量，發揮他們的聪明才智，最有力地战胜大自然，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如果我們不运用政权的有利条件，更坚决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帶領群众前进，而把政权变成脱离群众、束縛群众手脚的官僚主义机构，我們就将一事无成，甚至招致革命的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屁股坐在資产階級、富农或者具有資本主义自发傾向的富裕中农的一边，他們听不到也不願意听五亿多农民的呼声，不願意細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經驗，这样他們就远远落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后头，成了障碍群众前进的絆脚石。

毛泽东同志又經常教育全党，要保证革命群众运动健康发展，不能坐着等待群众起来，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頁。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第2、1、2、34頁。



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依据每一阶段的革命目标，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充分教育和发动群众，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斗争。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党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认真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正是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纠正了曾经成为合作化的严重阻力的“小脚女人”的爬行思想，放手发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群众，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迅速地掀起了伟大的革命浪潮，奔腾澎湃，势不可挡。同时，正是由于我国的农业集体化是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产物，是群众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得来的，而不是由旁人所恩赐的，所以它是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雷打不散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作的贡献是极为伟大的。中国五亿多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是一条解决农业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受到了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热烈赞扬，它为一切争取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人民提供了范例，在国际上日益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却竭力攻击我们解决农业问题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奉行的乃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不论是赫鲁晓夫本人或者是其衣钵的继承者，他们都是挖空心思地在农业中推行资本主义的方针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一个取得了政权、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不断地进行如列宁所说的“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①的工作，以创造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倒行逆施，背弃了由列宁所确定的农村工作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上实行倒退，千方百计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苏联人民的意志，必将遭到彻底破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妄图抹煞我国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除了更加暴露出他们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目以外，绝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

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年来，我国农村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积极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安于小农经济现状——早已解决了。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实现，几千年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

^①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



所有制所代替，这是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发生的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飞跃。这次革命飞跃，对于推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农村的胜利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固的基础。当前，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都是一片大好形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正在继续胜利前进。无数的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比优越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坚信，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使我国在经济、文化、科学、国防各方面迎头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了使我国的农业能够获得更迅速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现在摆在我们农村工作面前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系统地解决农业集体化巩固和发展中的新问题，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更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农村又一次出现新的面貌。

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国内外的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由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作用，在我国农村中（城市也一样），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阴谋复辟，有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也向社会主义阵地实行猖狂进攻。同时，我们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还不很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我们农村中在集体化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在有些方面也还不够完善。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利于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不利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更迅速发展。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集中地着重地解决这些问题。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中进行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各个方面带有根本性的基本建设。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动力。这次运动，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一起搞好，坚定不移地使运动达到预定的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胜利地开展这个运动，并且把这项工作长久地坚持下去，可以大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这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了搞好这个运动，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要使得广大贫农下中农更加敢于当家作主；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要逐步地做到使贫农下中农群众、基层干部和由上面派到基层去指导运动的干部三方面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要学会正确地处理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而不愿接受改造的分子，则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进行严肃的斗争。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既要把党的领导核心搞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还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农村打下坚固的基础，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更大的进步。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凡是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充满了更为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社队已经出现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大大促进了当前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

这些地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效果，最根本之点，就是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胜利地开展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作了必要的适当的调整。这里包括：认真教育农村基层干部，提高农村基层干部觉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调整和健全基层领导核心；进一步开展农村文化革命，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毒害，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阵地；建立和健全农村政治工作制度，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力发扬大寨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进一步推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和农田基本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充实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改进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等等。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保证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地巩固，社会主义的正气不断地上升，可以进一步鼓起人们的干劲，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所以，在所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都掀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当前，在全国农村中，一个波澜壮阔的农业生产高潮正在形成和发展。这是全国人民革命精神高度发扬的表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在伟大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最根本之点，就是要从中吸取彻底革命的精神，认真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群众的高度信任和热情支持，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全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巨大的跃进。



诗 词 十 首

郭沫若

訪 瑞 金 (二首)

一、叶 坪

弹样丰碑如巨笔 ^① ，	以天为纸急书空：
无产阶级须专政，	世界人民要大同。
蘸血淋漓终古在，	献身慷慨万夫雄。
尔来无数接班者，	高举红旗毛泽东。

二、大 柏 地

马子坳头鏖战处，	关山云树郁苍苍。
岩肤曾染英雄血，	峡腹新栽初稻秧。
弹洞杏坑留旧壁，	诗碑柏地立当场 ^② 。
长虹深幸如相识，	彩练横空舞夕阳。

① 叶坪有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但亦仿佛如大笔。

② 大柏地有碑，刻毛主席《菩萨蛮》词。词中有句云“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鏖战处地名为马子坳，“前村”名杏坑。访大柏地时，适逢其会亦有彩虹出现。



訪 井 岡 山 (七首)

一、桐 木 岭

风来桐木岭，	人上井冈山。
千曲萦公路，	群峰卷巨澜。
翻身根据地，	专政母胎盘。
阳光灑六合，	红星万古丹。

二、在茨坪迎“七一” (調寄《念奴嬌》)

紅旗高舉，井冈山，天下名山第一。挺立罗霄山脉上，纵跨贛湘六邑。领导工农，坚持战斗，一年零四月^①。燎原星火，烧遍天南地北。

梭标血話当年，刺折鋒尖，刻字銘农协。五寸竹釘埋哨口，頑敌魂飞胆裂。桐木岭头，黄洋界上，五哨拱震极^②。全球共仰，万岁欢呼主席。

三、黄 洋 界

海拔一千六百米，	汪洋万岭望黄洋。
雄关如铁旌旗壮，	小徑挑粮領袖忙。
五里横排遺榭树 ^③ ，	千秋蔽蒂胜甘棠。
杜鵑今已花时过，	百战壕边草木香。

四、龙 潭

井冈山上有龙潭，	瀑布奔流迭作三。
樵徑断殘成絕境，	軍工开拓免垂毡。
三潭交响千峰靜，	一井蒼穹万木酣。
土地归农思雨露，	潜龙焉肯鎖深嵐!

① 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下山，向东南开拓新根据地。

② 井冈山根据地以茨坪为中心，为工农政府所在地。四围有哨口五处，曰桐木岭、黄洋界、八面山、双馬石、殊砂冲，均极险要。

③ 黄洋界上旧有小路，曰五里横排。路旁有榭树一株，当年主席与其他同志由宁岡挑粮上山时，曾在此树下歇肩。



五、訪茅坪毛主席故居

解衣推食話當年，	主席恩情涌泪泉。
池里鯢魚階級喻，	案頭石硯斗爭篇 ^① 。
發揚馬列爭民主，	領導工农奪政權。
茅茨二坪星二點，	神州賴以換坤乾。

六、紅軍會師橋

革命風雲怒，	會師有大橋 ^② 。
龍江流碧血，	鵝石卷驚濤。
五井金鑾殿 ^③ ，	萬山鄉士寮。
工农須作主，	主席入羅霄。

七、宿永新

領袖親征三度來，	前驅人物費栽培。
長征逾萬參加者，	烈士八千磊落才。
已換九州新日月，	還教四海激風雷。
永新無數佳兒女，	更大光榮爭取哉！

訪南昌(一首)

洪都三十八年前，	革命風雷震九天。
爭取工农新領導，	掀翻日月旧山川。
井岡直比峴岡峻，	綿水竟同延水連 ^④ 。
八一大橋八一路 ^⑤ ，	東風萬里贛江邊。

① 茅坪在寧岡。訪茅坪時，謝氏老人為談當年主席生活頗詳。言主席對彼解衣推食，關懷備至。談時，眼中含着泪光。又指小池中鯢魚相告：主席曾說“鯢魚是大魚，大魚是吃小魚的”，以喻階級鬥爭。樓上居室中，案頭有一圓形辟塵式大石硯，謝老云主席《井岡山的鬥爭》一文即起草于此。

② 紅軍會師橋在寧岡龍市。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朱德同志率領部分南昌起義軍，與毛主席會師于此。橋下為龍江，附近有小村，名鵝石。

③ 茨坪有五井，即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所謂井者乃四山之中有平坦的田地。民間諺語云：“行洲府，茨坪縣，大小五井金鑾殿。”行洲在遂川縣境內。

④ 綿水指瑞金綿河，延水在延安。

⑤ 贛江上解放後新建大橋名八一大橋。又南昌拆城後，城址已拓為馬路，名八一路。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

毛 况 生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叛徒行徑，同工人运动史上的一切叛徒的行徑一样，是有一套叛徒哲学来为之服务的。他們的叛徒哲学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矛盾恐惧症。他們最害怕階級斗争，最害怕革命，因此，在哲学上也就最害怕談論矛盾。他們用尽各种詭辯和欺騙的伎倆，企图掩盖、抹煞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苏联社会的階級矛盾，从而否认解决这些矛盾必須通过革命、通过階級斗争。他們的哲学家大肆宣揚融合矛盾、調和矛盾的观点，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辯证法相对抗，妄图从理論上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路綫辯护，为他們背叛人民、背叛革命、对美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叛徒行徑开脱。因此，揭露和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对于剖析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是十分必要的。

事物的矛盾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这个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法，正是立足于

科学地观察和分析矛盾的基础上的。

我們党运用唯物辯证法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世界命运的工具，指出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陣营同帝国主义陣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資本集团同垄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在这些基本矛盾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是目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目前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我們党对这些矛盾的性质和它所引起的斗争，进行了全面的具体的階級分析，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条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綫。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中，将这条总路綫概括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陣营，逐步实现无产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沒有



帝国主义、沒有資本主义、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完全抛弃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辯证法，特别是作为辯证法的核心矛盾学說。他們无視当代世界客观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竭力反对由这些矛盾所引起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否认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不承认这个矛盾是目前世界的主要矛盾。他們竭力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散布“殖民主义消失論”。他們說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完成阶段”^①，現在“为經濟独立、为社会进步而斗争成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絕大多数人民的中心問題”；“为裁軍而斗争，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切身事业”^②，等等。他們还竭力美化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說它“最有預見”，会在挨打之前五分钟“退出殖民地”^③，而且还可能把裁軍节省下来的錢“援助”落后国家，“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經濟发展开创一个嶄新的紀元”^④。这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不再成为剝削者和侵略者了，它不但願意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平共处”，而且变成援助殖民地人民翻身的“救世主”了。哪里还談得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呢？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还有什么必要呢？无怪乎他們恶毒地咒罵民族解放运动了。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否认資本主义国家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間的矛盾。他們借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力量的强大，向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散布“和平过渡”的幻想，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們硬說“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前景”^⑤，那就是“現在在一系列国家中可以形成压倒反动派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反动阶级了解到反抗是毫无希望的，他們除了向革命的人民投降而外，再沒有任何别的出路”^⑥。这就是說，資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已經改变了，用不着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他們就会把政权双手捧献给无产阶级而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这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把資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垄断資本主义和其他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任务，一笔勾銷了。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垄断資本集团同垄断資本集团之間的矛盾。他們硬說社会

-
- ① 赫魯曉夫 1961 年 10 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
 - ② 赫魯曉夫 1963 年 12 月 21 日回答阿尔及利亚等国报纸編輯部有关当前民族解放运动問題。
 - ③ 赫魯曉夫 1961 年 10 月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 ④ 赫魯曉夫 1959 年 9 月 18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 ⑤ 赫魯曉夫 1956 年 2 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 ⑥ 庫西宁主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603 頁。



主义体系威力的增长，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大肆宣扬帝国主义的“一体化”。他们还说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联合起来的趋势大大加强了”。如果过去帝国主义者们在争夺市场、原料和投资场所方面从事战争冒险的话，那末，现在已“采取共同行动”了。这就是说，帝国主义阵营本身所固有的、必然引起它们内部尖锐斗争的矛盾，已根本不存在了。这就等于否认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否认革命的人民有必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这就是吹嘘帝国主义力量的统一和强大，吓唬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他们的投降路线制造根据。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也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但应该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狡猾性和危害性，也正表现在这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企图主观地、简单地用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去代替当代世界的其他基本矛盾，否定其他基本矛盾及其所引起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抽掉这一矛盾本身所包含的全部阶级内容，竭力鼓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长期和平共处”^①，可以“通过和平竞赛，首先是通过经济竞赛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②。他们并且蓄意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进一步归结为美苏“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全面合作”。无论过去和现在，他们都是不遗余力地大肆宣扬美苏两国的“强大”，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对世界和平所承担

的“特别责任”。说什么美苏两国“在许多方面决定着世界关系的总的状况”^③，只要它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末就不会有战争”^④，就没有谁“能使国际局势复杂化”^⑤。他们甚至认为，只要美苏两个大国的首脑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⑥。

可见，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眼里，只有“美苏合作”来主宰世界，决定人类命运，什么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等等，统统是没有意义的。“美苏合作”就是一切，其他都微不足道。这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贯标榜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在谈到苏联社会情况的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抹煞苏联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剥削阶级“早就消灭了”，苏联社会形成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的“新的历史共同体”，无产阶级专政

- ① 赫鲁晓夫 1954 年 6 月 12 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② 赫鲁晓夫 1958 年 2 月 21 日答墨西哥《至上报》记者问。
- ③ 赫鲁晓夫 1962 年 12 月 31 日答英国《每日快报》问。
- ④ 赫鲁晓夫 1961 年 9 月 5 日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 ⑤ 赫鲁晓夫 1961 年 9 月 8 日在苏联印度友好大会上的讲话。
- ⑥ 葛罗米柯 1962 年 12 月 13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



已經不必要了，苏維埃国家变成了“全民国家”，无产阶级的党也就不必要了，苏联共产党变成了“全民党”，等等。

但是，紙是包不住火的，謊言即使再动听也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铁的事实是：在苏联社会里，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今天的苏联，已經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在所謂“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謂“全民党”的幌子下，把苏联共产党引上了开始蜕化变质的危险道路。他們的所謂“通过和平經濟竞赛战胜资本主义”，所謂“赶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拆穿了，也就是企图把苏联变成以美国为蓝本的资本主义社会。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路綫，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对革命的路綫。他們推行这一条路綫的目的，就是要在世界上维护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統治，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条路綫完全排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斗争；这条路綫实际上就是妄图把世界各国的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在内，都“融合”于、“統一”于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摆布之下。

二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既然在政治上彻头彻尾地实行了背叛人民、反对革命，背叛社会主义的投降路綫，他們在哲学上，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也就是必然的了。他們的哲学家为了替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路綫提供“理論”根据，連篇累牘地写了許多哲学著作和文章，竭力歪曲和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特别是集中篡改关于矛盾規律的学說，大肆宣揚矛盾融合論。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哲学家，硬把現阶段人类社会里客观存在着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說成是非对抗性的。他們說：“社会发展的对抗性矛盾不仅不再是人类社会矛盾的主要的或普遍的形式，而且也不再是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矛盾的矛盾形式。新的、真正合乎人性形式的矛盾即非对抗性矛盾现在愈来愈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进入人类社会的生活中心去了。”^①

他們自己又解釋說：“如果对抗性統一的形式更替意味着对立面愈来愈分离、两者的联系削弱、两者的对抗性加深，并以这个統一的分裂和崩潰而完成，那末，非对抗性統一的形式更替則表现为对立面的接近、两者联系的巩固、两者之間差别的逐渐消失”、“逐渐失去对立面的性质”^②。

妙极了！他們嘴里的所謂“非对抗性矛盾”，說来說去，仍然复归为对立面的“融合”，是“对立面发展趋势的一致結果”^③。当然，解决这些“矛盾”，就只需“通过对立面的結合（融合）去克服对立面”^④，而对立面的斗争也就完全是多余的了。他們就是这样把馬

① 見《莫斯科大学学报》1960年第4期。

② 《論对立面統一的定义問題》。苏联《哲学科学》1963年第5期。

③ 《社会发展中的辩证統一形式》。苏联《哲学問題》1961年第7期。

④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領域內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苏联《哲学問題》1962年第3期。



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核心——矛盾规律，篡改成为对立面的融合论。

其实，他们主观臆造的所谓对立面的融合论，是根本站不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矛盾的同一性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一切矛盾都必须通过斗争才能够解决。如果否认矛盾的斗争性，或者否认斗争的绝对性，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发展为革命和战争。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①。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者，大讲什么对立面的“融合”，把这个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装扮成为可以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合作的和平天使；另一方面，却百般辱骂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特别是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胡说什么他们主张“通过发动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想使“美苏冲突”，把人类推向“热核灾难”，等等。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心目中，世界上的“侵略者”，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

主义，而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的人民。这样，他们不是恰恰把自己放到了与全世界革命人民完全对立的地位上吗？全世界人民从这里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了他们宣扬矛盾融合论的反动本质。原来他们嘴里的所谓“非对抗性矛盾”，只不过是抹煞敌我矛盾，替他们认敌为友的叛徒行径作辩解而已。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哲学家，大肆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公式已经过时了”。他们硬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正在熄灭的矛盾”，会“逐渐地化为乌有”。因此，不能说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统一”、“一致”才是“最重要的动力”^②。在这里，不仅是对立面的“融合”，而且对立面本身也不存在了。他们对坚持用矛盾规律来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胡说什么这是不懂得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形而上学地对待矛盾”^③，认为“大肆宣扬这种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是荒谬可笑的”，是“对矛盾的无根据的崇拜”^④，是“小资产阶级把矛盾神化了”^⑤，等等。可见，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及其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22页。

② 《社会发展中的辩证统一形式》。苏联《哲学问题》1961年第7期。

④ 《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问题》。苏联《共产党人》1960年第13期。

③⑤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哲学领域内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苏联《哲学问题》1962年第3期。



学家們的眼里，“矛盾”是个多么不吉利、多么可怕的怪物啊！

总之，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总是幻想繞开矛盾，幻想如果世界上的一切矛盾都沒有了，一切矛盾都調和起來了，那該是多么美妙啊！那他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同美帝国主义者拥抱、亲吻，大做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好梦了！

但是，不管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主观願望如何，人类社会总是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法所揭示的客观規律前进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证法认为，不論是資本主义社会，或者是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将来无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永远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条件下矛盾的性質有所不同罢了。沒有矛盾和矛盾双方的斗争就沒有发展，人类社会就要停止前进，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社会主义社会比起資本主义社会来，无疑地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这并不像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已經沒有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了。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在我們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还告訴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內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挑撥离間，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們的阴谋。”^①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处于执政地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地認識和处理这两类

性質不同的矛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不断推向前进，并保证胜利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借口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其目的就是要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階級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路。

三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有着深刻的階級根源和历史根源。

害怕矛盾，从来就是历史上一切反动統治階級所固有的頑症。任何反动統治者都是幻想永久保持他們的統治地位，最怕被人民群众推翻，因此他們最害怕从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中得出革命的政治結論。他們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否认矛盾，掩盖矛盾，把矛盾說成是最不正常的“病态”，而把他們所統治的黑暗社会，描繪为最正常最合理的社会。他們把敢于揭露矛盾的一切科学思想，都斥之为“异端”，把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对他們的剝削和統治所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視为“大逆不道”。他們越是走向腐朽、沒落，矛盾恐惧症就发作得越厉害，对人民、对革命所采取的鎮压手段也就越殘酷，因而就越需要从思想上、理論上制造各种各样的詭辯和邪說来掩盖矛盾，掩盖階級斗争的事实和实质。

大家知道，反动的資產階級是掩盖矛盾、欺騙人民、打击革命的老手，因为他們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頁。



的阶级利益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即使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总是企图以各种方法来掩盖和抹煞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思想家在当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空洞的口号，大力宣扬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贴上了“无矛盾”的标签，企图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矛盾，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但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毕竟是心劳日拙的。不管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如何，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为自己造就掘墓人，这一事实无论如何是抹煞不了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激化了，这就造成了世界革命风暴的源泉。在世界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面前，特别是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广泛传播开来、日益深入人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说教，资本主义“福音”的宣传，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者为了瓦解和扑灭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不得不寻找帮手。他们从工人运动队伍内部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在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伟大时代，适应着美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而产生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国内代表苏联社会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这个特权阶层实际上只占苏联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

侵占着全体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同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共党员和干部都是根本对立的。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因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害怕得要命，对真理的声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声音害怕得要命。让人们“在和平、统一中生活”，而不要“在矛盾中生活”^①！这就是他们的格言。

在国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了保持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并且进一步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需要掩盖和抹煞苏联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欺骗与麻痹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他们除了运用资产阶级武库里那套“全民的”、“超阶级的”虚伪理论来愚弄苏联人民之外，还特别挂起了“共产主义”这块招牌，在国内许多重要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蛊惑人心的言词，提出了许多骗人的口号，许下了一堆又一堆的、从来没有实现也根本不打算实现的诺言。

在国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霸世界的阴谋，他们不仅自己背叛革命，还要压迫和控制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不准他们起来革命。为了反对和扑灭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同帝国主义一样，感到需要寻找帮手。于是，他们同美帝国主义者就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越胜利、越发

^① 《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相互关系》，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力量越强大、越发展，就越使得他們心神不安，坐臥不宁。他們也就越需要掩盖矛盾，欺騙人民，以便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結，絞杀和反对世界人民的革命。在刚果問題上是这样，在越南問題上也是这样。最近，当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在南越的失敗，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时候，当全世界人民都同声譴責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野蛮侵略罪行，并且积极支援南越人民的武装斗争的时候，赫魯曉夫的继承者却施展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作一些“支持越南”的小动作，一面却配合美帝国主义玩弄“和平談判”的阴谋，把越南問題納入他們所謂“和平共处”和“美苏合作解决世界問題”的总路綫的軌道，企图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們还积极支持美国利用联合国的所謂“維持和平行动特別委员会”，建立一支常設的联合国武装部队，来替美帝国主义镇压和扑灭各国人民革命服务。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恐惧症出現于当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害怕核武器。

他們被核武器吓破了胆，完全屈服于美帝国主义的核詭詐政策，不仅自己放弃斗争，背叛革命，还要詭詐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放弃斗争，放弃革命。他們到处宣揚核战争的恐怖，說什么“原子弹不遵循階級原則”，“不会辨別帝国主义者在哪里，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①。“它将毁灭一切生物”，毁灭我們自己的“諾亞方舟”——地球。核武器出現以后，人类是生活在“一个装满热核武器的火药庫里”^②，“就好像一个被处死刑的人头上悬着断头台的鋸刀的情形，这个人只

好躺在那里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这把鋸刀会落下来把他的头砍掉。”^③在他們看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革命原則都失去“时代”的意义了。

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人类的命运是掌握在人民群众自己的手里。不管核武器或其他的新式武器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归根到底总是制約于人，制約于階級斗争，服从于階級斗争的規律，而决不可能消除或改变階級斗争的規律。所以，尽管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在“蘑菇云的怪影”面前吓得魂不附体，完全抛弃了階級分析和階級斗争的原則，但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絕不会因此而停止战斗，停止革命。

让現代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 and 一切反动派都在矛盾規律面前发抖吧！俗話說得好，魔鬼害怕太阳，太阳决不会因为魔鬼的詛咒而不从东方升起。尽管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老爷們”，都害着严重的矛盾恐惧症，但是矛盾作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永远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着。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克服，就是宇宙間万古常新的辯证过程。在不断地揭露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将更好地成长壮大起来，加速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定将在全世界实现！

① 苏共中央 1963 年 7 月 14 日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② 赫魯曉夫 1962 年 12 月 12 日在苏联最高苏維埃會議上的报告。

③ 赫魯曉夫 1958 年 1 月 22 日在白俄罗斯农业先进工作者會議上的讲话。



教 练 工 作 杂 记

· 傅 其 芳 ·

我从事国家乒乓球代表队的教练工作好几年了，参加世界锦标赛也已经好几届了。在工作中，有一些经验，也有许多教训，都还没有系统地加以总结。这里记下的，有的是我的直接感受，有的是从别的教练员那里得到的启发；有的是已经实践过的，有的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

依 靠 运 动 员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目标是一致的：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在比赛中取得胜利，为集体争光，为祖国争光。但球是靠运动员去打的，如果他们的积极因素没有调动和发挥，任凭指挥有多大本事，也要输球。在教练工作中，我深深感到，必须相信运动员，依靠运动员，工作要从运动员出发，又要落实到运动员身上。

教练员的职责是指导训练和比赛。教练员虽然有一定的训练和指挥的经验，但我们国家队教练员的技术水平，一般是不如运动员的。我们的队员有一些已经是世界冠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实战经验很丰富。如果教练员光强调“你听我的”，凭自己想出的一套去发号施令，是行不通的。首先应该

放下架子，虚心向运动员学习，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

我认为，教练员在指导训练中，不应当要求运动员一切按照自己说的去做，而主要是引导运动员自觉地把领导的指示和运动训练的方针、原则，在训练和比赛中具体体现出来。无论训练计划或作战方案，都让运动员根据总的要求，结合各人的特点，自己来制订。正确的，就加以肯定；有问题，就提出来共同研究，加以补充或修改。这样，运动员感到计划是自己的东西，执行起来就特别坚决。有时候，运动员与教练员在某些问题上发生分歧，经过耐心说服也没有得到统一，就可以同群众一起讨论，研究解决。如果运动员还不通，也不要急于下命令，假使时间允许，不妨让他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试验一番，实际教训更为可贵。何况有时错的倒可能是教练员自己呢！教练员还应和运动员一起大胆试验新技术，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促使大家开动脑筋。训练中，教练员切忌包办代替，要善于启发运动员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当好引路人。

教练员对运动员的思想和技术，都应当有严格的要求，这才是对他们最大的爱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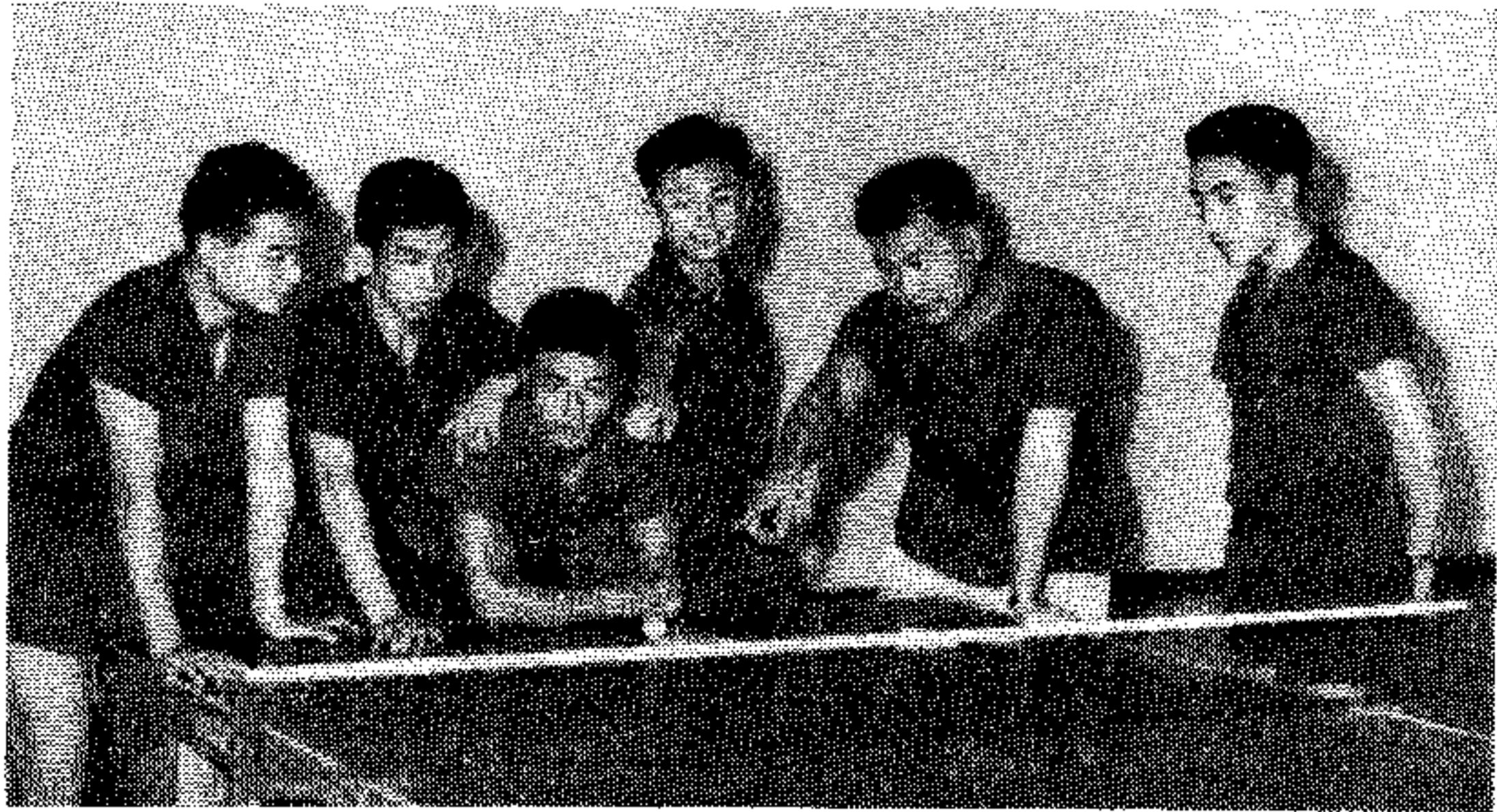


特别是当他们的技术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的时候，应当抓得更紧，要求更高更严。因为，这时运动员容易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出现苦练劲头不足的现象，而技术水平越接近尖端，提高越困难，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因此，教练员必须要求运动员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坚持严格训练，进一步掌握高难度的技术，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要抓好技术，必须抓思想。只有抓了思想，才能抓到技术的根。一九六二年，我们从日本访问回来，感到李富荣的左方推挡必须加强。我几次与他研究，找出许多训练方法，帮助他提高。可是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仍不见有多大的改进。有一次和他谈心，他才告诉我：有人说他一上场比赛就必须左右奔跑，拚命侧身，打得满头大汗才能胜球，缺乏“大将风度”；一个著名运动员应该能很轻松、很随便地来几下就将对方打败，才显

出自己的本领。由于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他想改变自己原来靠右边攻的打法，改成两面开弓，对加强左方推挡就不积极了。了解到他的思想后，帮助他正确认识自己打法的优越性，珍惜已有的基础，坚定了他的信心，促使他努力加强左方推挡，使自己的风格更鲜明，在技术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件事使我深刻认识到，我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他的思想根源，光从表面现象去抓技术，那是隔靴搔痒，根本不能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而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技术问题才能很快地得到解决。

教练员必须又红又专，认真改造思想，这是做好思想工作的先决条件。教练员先要明确为谁工作，才能帮助运动员明确为谁打球。教练员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精通业务，才能够看得远，看得准，正确地帮助运动员提高。



教练员与运动员一道研究技术



我和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是亲密的同志。我有什么问题，敢于向他们暴露，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也尽量帮助他们分析，找到解决的办法。通过做思想工作，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经常交心，相互之间更信任了，即使在关键时刻，也能大胆暴露思想。周兰蓀在二十八届单打中迎战木村，开头打得很好，连胜两局，可是第三、第四局被木村追了上来。这时他跟我说：“我有点手软。”在这样的时刻，一般人是很怕人家说手软的，更不用说自己承认了。但他信任教练员，老老实实地说了心里话，我们场外指导就能对症下药。当时就不跟他谈技术了，而是给他做政治鼓动工作，帮助他在关键时刻敢打敢拼，终于淘汰了木村。当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缺点，有时思想工作做得不透彻，使个别运动员不愿把思想活动及时说出来，以求得解决，因而造成失败。

教练员参加训练，获得实际经验，做到身教言传，可以鼓励运动员积极锻炼，同时会使运动员对教练员感到亲切。

群众路线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方法，在教学训练中也不例外。相信运动员，依靠运动员，启发和引导运动员的自觉性，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去争取胜利，这就是群众路线的训练方法。

练为战 不为看

比赛是平时训练的检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比赛中取得胜利。无论技术训练或

战术训练，都必须坚持“练为战”的原则。

基本技术是战术的基础，要下苦功练。但练基本技术必须结合实战，要在走动中练，才能练活。练定点时应有全面观念，练左方时要想到右方，练手法时应结合步法。更重要的是不要把技术和思想分割开。

练习时，既要考虑前一板，又要想到下一板，不要孤立地练一板球。既想自己，也要想到对方。

训练中不要单纯追求球的来回次数，贪图练得称手、舒服、好看，而造成假象。应从不舒服练到舒服，然后再找不舒服，这样不断加大难度，不断突破难度，技术才会不断进步。有些运动员往往练成“花枪”，中看不中打。

训练中必须狠抓特长和有助于发挥特长的技术。特长过硬，是取胜的一个基本条件。特长提高了，相对地会弥补薄弱环节。例如，主动进攻加强了，必然会使被动防守的情况减少。补短板也是为了促使特长能够更好地发挥。徐寅生攻斜线是特长，但在比赛中，只有一条线，容易被对方盯死，后来，他再练一些直线进攻，对方就不能集中防一点，斜线球的威力也就更能够充分发挥了。

在有限的时间内，要突出主要技术的训练，不能贪多。这个放不下，那个也想要，反而什么也抓不深，抓不透。乒乓球训练中，也应该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练战术也是这样。单个战术应针对“敌情”，一个一个地练。练综合战术时，必须在



全面运用的基础上，突出一个主要战术。也可以說，一切战术练习，都是为了发挥自己最有利的技术。

运用战术，就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力争主动，以夺取胜利。守球运动员以落点、旋转控制对方，争取主动。张燮林，从表面看来，老是在被对方进攻，但他把球削得又稳又低，又用旋转变化送两角，逼使对方左右奔跑，实际上主动权却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有机会便立即反攻。攻球手相遇，在双方水平相当的情况下，谁能先发制人，抢攻在先，谁就能占优势。有的攻球手觉得抢攻冒险，稳一些好，或想等好机会再攻，往往被对方先攻了，受到压制而遭失败。因此，有没有勇气抢攻，经常成为比赛胜败的关键。这和作战一样，只有发扬火力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如庄则栋三次败给高桥，都因为没有攻在对方之前。在第四次交锋前，庄则栋总结了这一点，大胆进攻，将高桥的火力压住而连胜三局。

战术变化总的要求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设法调动对方。但有时需要以特长对特长，或特短对特短。后一种打法，在对方准备不足，或恰好克制了对方的优点的情况下，也可能打得通。因为特长与特短的关系是相对的，当某个运动员的特长与对方特长相比，对方比他好，可是他的短处却比对方强的时候，教练员就应当果断地让他试用短处。例如，在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孙梅英对关正子，开始运用自己的特长与对方打快攻，却并不占上风，形成相持局面。后来

她改用搓攻，将速度慢下来。搓攻虽非她所擅长，但使对方快攻不能发挥。最后，以三比二淘汰了关正子。

战术要多样化，要根据当场情况，该变则变，不该变就不乱变，也不要让对方摸到自己的规律。对方盯住自己的缺点连续进攻时，应集中力量顶住，然后再变化战术，进攻对方的缺点，以摆脱自己的被动。

守球运动员平时练稳削，就是准备比赛时对付稳拉。有人一比赛就怕攻球运动员稳拉，这是多余的顾虑。试想，为什么对方拉得稳？这是自己削得稳了，才显出对方拉得稳。如一方守不住，另一方也显不出拉得稳不稳了。打攻球的人只能稳拉你，说明他已失去猛扣的能力了。因此，应坚定地相信自己削球稳健的特长，思想上首先稳住，然后伺机反攻。何况，对方又何尝不怕你稳削呢？林慧卿、郑敏之在二十八届团体赛中，能用稳削战胜深津尚子和关正子的稳拉，原因就在于思想上先顶得住。

战术的运用和变化，必须在日常训练中根据实战需要，反复练习，才能在比赛中运用自如。在制订训练计划时，不能仅仅针对目前所了解的外国强手的情况，还要把他们今后可能有的发展估计在内。

用兵排陣

团体赛中，一张比较理想的出场名单，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能起不小的作用。有时比赛双方排阵名单一揭晓，大局便已定三分。



比赛同打仗一样，“兵力”的部署，必须建筑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对双方实力都要有正确的估计。这就需要教练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不仅要对自己队员的思想风格、技术特点了如指掌，还要多方面了解对手的情况。掌握了材料，才可能分析研究，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下决心。教练员在考虑出人时，不要因某个选手一场比赛的得失，而动摇对他的全面估价，也不要只看他过去的成绩，而忽视临场的精神面貌和竞技状态。

在估计对方水平时，特别是对那些接触不多的外国青年选手，应估计到他们的变化比老将们更大。不仅要了解对方的技术，而且要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精神状态，连教练员的风格也要尽可能地了解，例如，他比较老谋深算，还是比较大胆泼辣？这在排名单时颇有参考价值。

二十五届世界锦标赛男子团体复赛中，我队输给匈牙利，丧失了与日本争冠军的决赛权。当时匈牙利的别尔切克一个人独得了三分。二十六届时，别尔切克的技术仍是匈队中最好的，因此，在这届团体复赛中，中匈两队相遇时，我们对双方排阵作了如下的估计和考虑。

根据男子乒乓球团体赛排阵的规则，主队三人所打的场次是：第一主力打二、四、七场，第二主力打一、五、九场，第三主力打三、六、八场。客队：第一主力打三、五、七场，第二主力打一、四、八场，第三主力打二、六、九场。这是一般规律，有时由于

双方实力的相尅相成，会引起主队的第二、三主力，客队的第一、二主力位置的变化。一般总是让技术最好的运动员打二四七或三五七位置，这样可以在第三轮打在最前面，争取在前七分中就取胜。因此，我们估计，别尔切克会排在这个位置。我们还考虑，主队二四七位置比客队三五七位置更重要，因为前者在前两轮比后者打得更早一些。如对方猜到优先权，他们会挑选主队，我们猜到优先权，我们就挑选客队，也把主队让给对方。那么，别尔切克打二四七位置会更肯定了。别尔切克的特点是第一分打顺了，以后两分会越打越好，反之，则易泄气。因此，要考虑如何先把别尔切克的气挫下去。当时我队出场的是徐寅生、容国团和庄则栋，实力比对方均匀，三人中对付削球最有办法的是徐寅生，照正常的安排，应让徐寅生打第一主力，至少应排第二主力。但我们为了打好对别尔切克的第一场关键性的战斗，将徐寅生排在第三主力的位置，打二六九场，争取让别尔切克一上来就碰最硬的对手。果然两人相碰，徐寅生以二比〇取胜。别尔切克出师不利，在对庄则栋与容国团时也很快输了。

由此可见，在排名单时要经过分析，估计对方谁出场和可能的排阵。在这方面，既有一般的规律，也有为了针对第一个强手或弱手，而将位置改变的情况。既然你猜对方，当然对方也同样在猜你，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错综复杂的变化了。

二十七届中日男子团体决赛，当时获村



是日本队的核心人物。在我们访问日本时，他先后打败徐寅生和李富荣，而负于庄则栋。因此，我们挑主队后，他们会估计庄则栋打第一主力的位置，因而获村打三五七的第一主力位置可能性就很大。这样他就可以先对张燮林和徐寅生，在最后一轮时才对庄则栋。我们根据这样的分析，将张燮林排二四七位置，这样，可以先对三木，再对木村（当时木村情况比三木好，估计木村会排一四八位置），在第三轮才对获村，因为获村对付削球比木村和三木的办法多一些。后来实际情况符合我们的估计，这场决战以五比一取胜。

至于二十八届男子团体决赛时，由于我们五名队员实力均匀，确定出场的阵容坚强，因此根据自己的实力，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去排阵，就不是很大的难题了。

当然，用兵排阵是双方斗智的一个内容，但比赛终究要靠运动员去打，所以更重要的是运动员具有过硬的思想和技术。否则，再好的布阵，也只是空中楼阁。

临 场 指 挥

乒乓球比赛往往瞬息万变，教练员应在了解双方思想、技术状况的基础上，善于抓住关键，当机立断，帮助运动员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教练员应当像打仗时的指挥员一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指挥者，而不要成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局变化发展的能力。

比赛局势的变化，无非出现三种情况：领先、相持、落后。应该帮助运动员正确对待这几种不同的情况。

领先，本来是好事，说明我们的技术不比对方差，可是有些运动员对自己缺乏信心，怕对方追，反而觉得“领先球难打”。有人在十七比十一时，由于求稳输了几分，就好像大祸临头，慌张焦急，怕对方会追上来。其实，这时还领先好几分呢！怕什么！给对方追平了，也是双方相等，毫不吃亏。即使被对方超过几分，也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他领先以后，也可能想稳住，变软了。这时，只要你大胆进攻，仍然可能夺回胜利。何况从领先到落后，正好总结对方的战术，有利于自己改变战术。所以，在领先时，应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一鼓作气干到底。怎么赢的，就怎么打，决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除非对方改变战术，一般自己不宜主动变，不到二十一分，决不罢休。应主动地力争胜利，不要依靠对方的失误而等待胜利。因为对方一落后，往往会孤注一掷，拼命搏杀。所以千万不能求稳，思想一稳就变成保守，打法自然就变软了，对方就有机可乘，会进行反攻。周兰蓀对木村，一上去猛冲猛打，连胜两局，第三局，认为胜利在望，心中想稳些，手就软了，被对方连追两局。决胜局坚决进攻，才夺回胜利。

在比分紧紧咬住的相持关头，有人因为心里紧张，就不问时机，拼命打，看起来很凶，实际上是虚弱的表现。乱打不等于敢打。这样，一度相持的局面会很快变为落



后，最后輸掉。所以，在自己紧张时，要想到对方也在紧张，如果你不紧张，对方就可能更紧张。相反，对方看到你紧张了，他可能会不紧张。也有人一到相持，个人杂念就冒头，考虑各种问题，怕輸了以后会怎样怎样。这么一来，就变得縮手縮脚，不敢放手打，老想等更好的机会，因而該打也不打。在这时候，应该不考虑个人得失，更加勇猛頑强，不放过任何机会，搶攻在前，但也要避免胡乱起板。运动员一般在相持阶段手軟的多，誰能搶在前头打，力爭主动，誰就能获胜。

落后时不要气馁，要克制“不要了”的想法，也不要为前一局或前一分該胜未胜而惋惜、后悔。必須高度集中精力，打好眼前的一分，狠狠咬牢对方，才能轉败为胜。即使追不回来，也可以使对方感到害怕，挫伤他的銳气，为下一局或下一場創造有利条件。同时，要冷靜地找原因，是风格沒有發揮还是战术錯誤？找到原因后立即改变，不要从头至尾用一套战术。

判断战术是否正确，不能光看勝負几分球，正确的战术有时会由于运动员打得不果断，偶然的失誤，以及对方在无意中打回来等等情况而輸球。这时，应鼓励运动员大胆坚持原訂战术，不要輕易动摇。但有时虽然只輸了一两个球，却是战术錯誤，那就要立即糾正。有时也会在无意中胜了一两个球，是事先沒有估計到的，可是恰巧打中了对方的要害，这时就应告訴运动员，立即向这方面突破。

临場指揮必須十分沉着，善抓关键，迅速发现对方意图所在。教练员的情緒往往直

接影响运动员，赢了一局或两局，不要过早高兴而放松警惕，要帮助运动员从胜利中找缺点。因为一般不会胜二十一比〇，可以从輸的几分中找原因，并准备下一局对方改变战术。輸了一局或两局，教练员切勿丧失信心。要使运动员不服輸，首先教练员要不服輸。这时，应帮助运动员找优点，因为一般不会輸〇比二十一，可以从赢的几分去分析，告訴运动员怎样变。不要只讲“这不好，那不对”，应从鼓励士气出发，指出具体怎么办，切忌訓一頓。一局下来，跟运动员談一两点最要紧的，不能繁瑣，因为時間很短，說多了等于沒說，运动员記不住。而且要根据不同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有时提醒运动员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往往几句政治鼓动的話更为有效。

教练员不要怕运动员上場后不听话。如果在赛前和运动员一起充分估計各种情况，定好多套战术，作好各种对策，临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在場上，不宜強調运动员必須絕對服从場外指导。你对他有信心，他才对你有信心，最后落实到他对自己有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信心的产生是建立在平时工作的基础上的，你能把运动员的思想和技术问题都解决好，信心才是真正落实了。如果場上出現意外的变化，运动员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因为球是运动员在打，教练员无法代替。

球賽如果輸了，不要互相埋怨，更不应責怪运动员。賀龙副总理指示我們，教人先教好自己，教练员能过硬，运动员才会过硬。运动员打不好，教练员应当首先檢查自己沒教好。当然，这并不是一下子包攬在自己身



上了事，而是負責和運動員一起把這場球失敗的原因找出來，記取教訓，並在今後的訓練和比賽中注意糾正。這樣，雖然失敗了，但這是勝利的開始。如果贏了，更不能歸功於自己的指揮，應該明確這是運動員打得好。教練員在這時候特別需要冷靜，不能沾沾自喜，要認真尋找不足之處，幫助運動員繼續前進。如果認為已經沒有問題了，這場球雖然贏了，但已埋下輸球的種子。驕傲自滿、停滯不前的人，肯定要遭到失敗。

集 體 的 力 量

一位外國乒乓球專家曾經說：“中國乒乓球運動進步很快，但是他們還缺少有經驗的指導人材，因此他們還不足以奪取世界冠軍。”這是多年前說的，但我還常常想起這段話。現在，我們已連續幾屆獲得了世界冠軍，是不是說我們每個教練員的水平已經很高了呢？不能這樣看。

說我們缺乏經驗，仍然是事實。孫梅英、容國團等同志放下球拍還不久，其他幾位教練員和我自己做教練工作的時間也不長，對這項運動的知識還是有限的。至於指揮藝術，還開始摸索。從這一點看，應該說，由於我們有時指揮不當，即使最好的運動員，也會遭到失敗。但這只能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還有另一方面，這就是個人指揮與集體指揮問題，個人智慧與集體智慧問題，個人經驗與集體經驗問題。因為我們依靠的不是個人，而是依靠黨的領導和集體的力。我們不僅有教練員們合作共事的集體，還有與領導、運動員的三結合。

我們在黨的教育下，明確了為革命而工作，能團結一心，集思廣益，為共同的目标奮鬥。重大的計劃或方案，都是在領導同志的親自指導下，發動廣大運動員和教練員充分討論，集中群眾的智慧，制訂出來的。最後還經過組織審核批准。這樣產生的計劃和方案，會比任何個人所設想的優越得多。

在教練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尽管在具体业务上，我們作教練員的會比一些領導同志了解得稍多一些，但這並不等於在訓練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我們比領導同志更高明。而是恰恰相反，訓練中的方針、原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制訂的，訓練中的重大問題，也往往是領導上及時提出的。領導同志看問題更全面更深刻，抓得更准更有力。這樣的例子隨手就可舉出很多。例如，為了對付“弧圈球”，我們曾一度讓一些隊員過多地去適應這種球，結果影響了我們快狠的風格，領導上及時指出了這個問題，作了糾正。又如，二十七屆男子團體決賽名單，排張燮林打二四七的位置時，我曾擔心他體力是不是吃得消。領導上認為這樣排最有利，讓我去問他本人的意見，如果他认为可以，就堅決這樣排。後來問張燮林，他回答：“你敢排，我就敢打！”這就不僅促進我下決心，而且增強了信心。這種集體的力，是有些專家不可能了解的。因為在他們的實踐中，缺乏或者沒有這一方面的經歷。

作為個人來講，我們確實不能說指揮水平很高了，但是，有了黨的領導，有了教練員和運動員的通力合作，集中了群眾的智慧，我們就能够比較好地進行指揮。



红旗

HONGQI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

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

飞夺泸定桥

改

一九六五年

9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九期 目录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 (1)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产朱洪元 (21)

在不断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高崇寿 (25)

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分子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徐光宪 (28)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龔育之 (31)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艾思奇 (36)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研究方法于光远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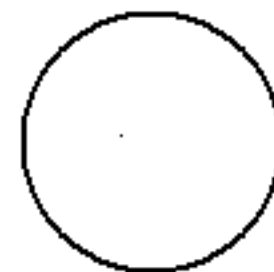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

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李哲 (42)

飞夺泸定桥杨成武 (48)

大石塔农村的变革徐雅 (55)

☆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八年五月)

毛 泽 东

编者按：今年九月三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本刊这一期特别刊印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所阐明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了伟大的指导作用。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如下的注释：“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同志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許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非常清楚，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在今天，对于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合作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合作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碰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



略問題頗有許多特殊的東西；抗日戰爭的一般戰略問題中的東西，決不能照樣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擊戰爭。

第二章 戰爭的基本原則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

在具体地說到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之先，還要說一說戰爭的基本問題。

一切軍事行動的指導原則，都根據于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這個原則，在革命戰爭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則聯繫着的。例如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政治原則即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軍事上實行起來，就是以軍事力量保衛祖國，驅逐日寇。為達到這個目的，在軍隊本身的行動上，就表現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滅敵人的力量。何以解釋戰爭中提倡勇敢犧牲呢？每一戰爭都須支付代價，有時是極大的代價，豈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實一點也不矛盾，正確點說，是相反相成的。因為這種犧牲，不但是為了消滅敵人的必要，也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一部分的暫時的“不保存”（犧牲或支付），是為了全體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這個基本的原則上，發生了指導整個軍事行動的一系列的所謂原則，從射擊原則（隱蔽身體，發揚火力，前者為了保存自己，後者為了消滅敵人）起，到戰略原則止，都貫徹這個基本原則的精神。一切技術的、戰術的、戰役的、戰略的原則，都是執行這個基本原則時的條件。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原則，是一切軍事原則的根據。

第三章 抗日游擊戰爭的六個具體戰略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行動，應該採取些什麼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呢？因為抗日戰爭中（乃至一切革命戰爭中）的游擊隊一般是从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還須加上一個發展自己。所以問題是：應該採取些什麼方針或原則才能達到保存或發展自己和消滅敵人的目的呢？

總的說來，主要的方針有下列各項：（一）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行防禦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和內綫作戰中的外綫作戰；（二）和正規戰爭相配合；（三）建立根據地；（四）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五）向運動戰發展；（六）正確的指揮關係。這六項，是全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綱領，是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配合正規戰爭，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途徑。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箝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箝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共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



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必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



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箝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



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箝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



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杨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箝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①、五台山^②、太行山^③、泰山^④、燕山^⑤、茅山^⑥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①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九一八事变后，长白山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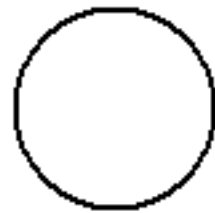
② 五台山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始以五台山区为中心，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③ 太行山是山西、河北、平原边境的山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以太行山区为中心，开创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④ 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一九三七年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开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建立鲁中根据地。

⑤ 燕山是河北、热河边境的山脉。一九三八年夏，八路军以燕山山区为中心，开创冀东抗日根据地。

⑥ 茅山在江苏南部。一九三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开创苏南抗日根据地。



平地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①。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

^① 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而得到的。毛泽东同志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



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



生选择经济条件的問題。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問題，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



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①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态势和处于进攻态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說，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① 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此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仍保有必要的空格（“眼”），那末这群子就可不被“吃”掉，仍是“活”的。



敌人为了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箝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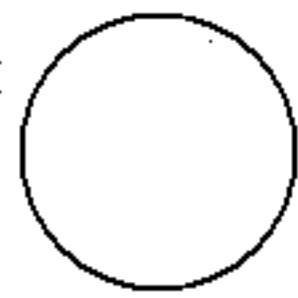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充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箝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①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

^① 公元前三五三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齐国王命令田忌、孙臆率军救赵。孙臆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在赵，内部空虚，乃引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桂陵（今平原省菏泽县东北）一战，大败魏军，赵国之围遂解。以后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一切类似的战法。



爭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当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问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



也逐漸整理，恢復元氣。敵占地區內的民眾亦十分高興，到處都傳播游擊隊的聲威。敵人及其走狗漢奸的內部，則一方面發展着恐慌情緒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對於游擊隊和根據地的仇恨，加緊地準備着對付游擊戰爭。因此，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不可在自己的戰略進攻中得意忘形，輕視敵人，忘記了團結內部、鞏固根據地和鞏固部隊的工作。在這種時候，須善於觀看敵人的風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進攻的朕兆，以便一遇進攻，就能適當地結束我之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再從戰略防禦中粉碎敵人的進攻。

第八章 向運動戰發展

抗日游擊戰爭戰略問題的第五個問題，是向運動戰發展的問題，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於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而來的。如果中國能迅速地戰勝日寇，並迅速地收復失地，沒有什麼持久戰，也不是什麼殘酷的戰爭，那末，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戰爭是長期而且殘酷，游擊戰只有向運動戰發展才能適應這樣的戰爭。戰爭既是長期的和殘酷的，就能夠使游擊隊受到必要的鍛煉，逐漸地變成正規的部隊，因而其作戰方式也將逐漸地正規化，游擊戰就變成運動戰了。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必須明確地認識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堅持向運動戰發展的方針，並有計劃地執行之。

現在許多地方的游擊戰爭，例如五台山等處，是由正規軍派出強大的支隊去發展的。那裡的作戰雖然一般是游擊戰，但開始即包含了運動戰的成份。隨着戰爭的持久，這種成份將逐漸地增加。這是今天抗日游擊戰爭的長處，不但使游擊戰爭迅速地發展，並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較之東三省的游擊戰爭，條件優越得多了。

由執行游擊戰的游擊部隊化為執行運動戰的正規部隊，須具備數量擴大和質量提高兩個條件。前者除直接動員人民加入部隊外，可採取集中小部隊的辦法；后者則依靠戰爭中的鍛煉和提高武器的質量。

集中小部隊，一方面，須防止只顧地方利益因而妨礙集中的地方主義；另一方面，也須防止不顧地方利益的單純軍事主義。

地方主義是存在於地方游擊隊和地方政府中間的，他們往往只顧地方的利益，忘記全局的利益，或貪圖分散活動，不慣集團生活。主力游擊部隊或游擊兵團的領導者們，必須注意到這種情形，採取逐漸地和部分地集中的辦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夠繼續地發展游擊戰爭；採取首先協同行動然後實行合編以及不破壞共建制不撤換其幹部的辦法，使小集團能夠融合於大集團。

單純軍事主義和地方主義相反，乃是主力部隊裡頭的人們只圖擴充自己不顧扶助地方武



装的一种錯誤观点。他們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漸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錯誤，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須在政治、組織、装备、技术、战术、紀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漸地仿照正規軍的規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須使指揮員、战斗員們認識从游击队到正規軍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組織上須逐漸地具备为一个正規兵团所必需的軍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軍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員，軍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給卫生等的經常制度。装备方面，須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訊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規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紀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現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須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現。这种目的，在有正規軍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較順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規軍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規部队发展的責任。

第九章 指揮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問題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揮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順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揮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級的武装組織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許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規战争的指揮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規战争的指揮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縛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揮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揮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揮就能够順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規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規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揮，这就是国家參謀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統一指揮。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



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本文原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最近，北京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座谈了关于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下面是座谈会上的几篇发言。希望大家讨论。本刊准备继续发表关于这类问题的文章。

——编者

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 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破产

朱洪元

《红旗》刊登的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是一篇很有启发性的文章。

日本的理论物理学是后起之秀。在本世纪的最初三十年，相对论的产生以及量子力学的形成和发展，使理论物理学产生飞跃的变化，但是其中并没有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很大的贡献。今天，以坂田昌一这个学派为代表的日本的“基本粒子”理论，已经站在世界的前列。论基本粒子物理的实验条件，日本比某些欧美国家差。日本只有一些关于宇宙线的实验研究工作，此外就只有一架能量

为十亿电子伏特的电子加速器。但是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了核子力的介子论，量子场的超多时理论和重正化理论，二种介子和二种中微子的假说，西岛——盖尔曼法则，SU₃群的基本粒子分类法等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贡献，超过某些实验条件好的欧美国家。

为什么以坂田昌一这个学派为代表的日本的基本粒子理论发展得这样快，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呢？

在去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我从坂田



昌一教授的谈话知道，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就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以后逐渐努力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他和他的同事们着重研究了理论物理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当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风靡理论物理界的时候，他们能顶得住，不盲目跟着西方跑，敢于闯出自己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他们能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要在科学工作中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力争在理论思维上的主动，打破框框，敢于闯出自己的道路。只是盲目地跟着外国走，是永远赶不上国际先进水平的。

考察一下近代物理学发展史，就可以发现，在物理学研究中弯路是走得很多的。因为前人走弯路，所以后来者可能居上。但是有一个条件，后来者必须少走弯路，走正确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假使前人走弯路，后来者也跟着重复走前人的弯路，后来者还是赶不上前人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理论发展的阻碍作用很大。

经典物理学在解释宏观物理现象时取得的成就，使牛顿力学、麦克斯韦——法拉第电磁理论被看成是绝对不变的真理，是关于物理世界的最终的理论。在牛顿力学能基本

上说明太阳系中行星绕日运动现象之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甚至使得拉普拉斯得出了如此荒谬的意见，他认为只要把宇宙中一切粒子的初始坐标和动量都测量出来，就可以推算出整个宇宙未来的历程。

但是，在物理学的实验研究深入微观物理现象以后，经典物理学的局限性终于暴露出来，在一系列的新的实验事实和经典物理理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对于辩证唯物论者来说，实验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应该伸出双臂欢迎。但是，对将经典物理理论奉为最终真理的形而上学者来说，这种实验和理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理解的怪物，必须将它掩盖和埋葬。然而，矛盾是掩盖和埋葬不了的。所有一切掩盖和埋葬矛盾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在客观上起了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

粒子-波动二重性是微观世界区别于宏观世界的根本特点，也是微观世界的一个基本矛盾。物理学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使他们长期无法接受这一辩证的思想。

在今天，瑞利-金斯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工作被描绘成为量子论产生的催生婆，说它突出了新的实验事实和经典物理理论之间的矛盾。但是历史并不是这样的。瑞利和金斯本人力图在经典物理学范围内解释黑体辐射能量的频率分布。他们在发现了经典物理理论所给出的黑体辐射的能量密度公式随着频



率趋于无穷大，和实验结果尖锐地相矛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揭露矛盾的想法。与此相反，他们提出一些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力图将经典物理学和新的实验结果之间的矛盾掩盖过去。

普朗克在一九〇〇年提出的关于黑体辐射的量子论，是试图突破经典物理概念的一声春雷，但是在这以后整整五年，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一革命性的理论。令人深思的是，在这以后整整十五年，普朗克却力图抹杀他自己所提出来的革命性的量子概念，企图将一切纳入到经典物理学的框框中去。

爱因斯坦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光子的假说，揭露了光的粒子-波动二重性。然而不仅量子论的创始人普朗克认为这一假说太极端了，甚至到一九二二年，原子结构的量子理论的奠基者玻尔还认为光子假说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情况使得物理学界在一个长时期里很少有人继续爱因斯坦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德布罗意才将波、粒二重性的思想推广到所有的微观客体。在德布罗意工作的基础上，薛定谔很快就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基本方程——薛定谔方程。可否设想，物理学家有可能在一九〇五年之后不太久就提出所有微观客体都具有粒子-波动二重性的假说。这一假说之所以推迟到一九二四年才出现，看来物理学家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是主要原因之一。

量子力学建立的过程说明，物理学家自发地走出形而上学的框框、到达辩证法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诚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复归（指由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复归——引者）能够由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它可以仅仅经过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而自然而然地达到，因为这些发现再也不能让自己束缚在旧形而上学的枷锁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期、比较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克服非常多的多余的阻碍。”^①

科学家自发地走出形而上学的框框，不仅得走很多弯路，而且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很容易又走进唯心论的怀抱。早在一九〇八年，列宁就说：“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对它的片面的‘机械性’，可是同时把小孩子和水一起从浴盆里泼出去了。”^②哥本哈根学派的经历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分析这一学派建立矩阵力学时所用的方法，可以发现，起主要作用的有下面两点：

(1) 将经典物理学所根本不能解释的、关于微观世界的新的实验结果，当作客观事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5 页。

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76 页。



实接受下来，并把它们作为建立新理论的基础。

(2) 应用对应原理去处理经典物理学，抛弃经典物理学中不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的部分，吸收其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的部分，并根据微观世界的基本特点对经典物理学中这一适合于描述微观世界的部分进行深刻的改造，以之作为到达新的理论的跳板。

不论新的实验事实怎样尖锐地和经典物理学相矛盾，还是将它们接受下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理论，从而反映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在本质上的差别。在建立反映微观世界的特殊规律的新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将经典物理学全部抛掉。一方面考虑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差别，考虑了微观世界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考虑了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的联系，考虑了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科学方法，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

但是，正因为哥本哈根学派当时这样做不是自觉的，没有唯物辩证法的强有力的指导，所以他们在从自己的科学成就中总结哲学上的经验和教训时，形而上学方法又在那里作祟了。他们片面地强调了否定经典物理概念这一方法所起的作用，将这一方法绝对化，一直发展到否定一切不能或没有为仪器所直接探测到的物理概念。在科学研究中认为仪器所直接测量的结果就是一切的观点，

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哲学中的“感觉就是一切”的观点。这是实证主义的观点。

将现象绝对化，否认现象背后的本质，就从根本上堵塞了认识发展的道路。哥本哈根学派的实证主义在最近四十年来在理论物理界中有广泛的影响，给理论物理学带来混乱，使理论物理学在发展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玻尔在三十年代初认为在 β 衰变中能量不守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们认为，一切没有为当时的实验技术直接探测到的东西，尽管在实验上有很强的间接的证据表明共存在，都是主观上的虚构。在这种气氛的压力下，甚至到了一九三七年，费米还不敢认真地看待自己所提出的以中微子的假说为基础的 β 衰变理论。由于同样的原因，坂田昌一教授的 π 介子的假说被埋没了五年，他的 θ 介子的假说被埋没了二十年。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海森堡在一九四二年所提出的关于基本粒子的S矩阵理论。这一理论否定了除在实验中可以直接测定的能级、衰变寿命和碰撞截面之外的所有微观物理概念。否定了现象背后的本质，理论当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为了给这一空架子填补内容，邱(G. Chew)乞灵于某种关于理论的数学形式上的假说——所谓理论的数学形式具有最大解析性的假说。近年来有许多理论物理学家钻进了这一死胡同，走了许多冤



枉路而很少收获。

坂田昌一教授在《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中指出：哥本哈根学派的实证主义在理论物理学界形成这样一种气氛：把基本粒子看作有内部结构的东西似乎就是罪过。基本粒子是物质的始原这一形而上学思想之所以长期地、广泛地在物理学界流行，从而阻碍物理学家探索基本粒子的结构，是和哥本哈根学派实证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

这些历史教训一再地提醒我们，科学家必须努力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指导自己的工作。

在每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中，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都要深入一个层次，都要发掘

出来一些更深的层次所特有的矛盾，也就是先前的层次所不能包括的新的矛盾。我们革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的无限性，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像恩格斯所教导的那样，把每一次的新发现，当作物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①。这样，我们就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永不满足，永远感到有一种动力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世界的未知的真理，从而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0页。

在不断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

高 崇 寿

从近代物理学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这是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期。十九世纪末以来，实验不断发现一系列新的现象，不断地冲击传统观念。相当长时期以来被许多人认为是最理论的经典物理学，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迫使人們从根本上修改了许多重要的

概念。相对论建立了，量子力学建立了，在这基础上近代物理学的各分支都取得了很迅速的发展，丰富了人们对物质结构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也对先进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这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出现许多的曲折，不少曾经对物理学发展有过重要贡献的物理学家，在



后来的研究中，走着走着就走上了斜路，不再前进了。而且往往前人犯了錯誤，后人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这样的例子，屡見不鮮，确实值得我們深思。

列宁在本世紀初就指出，近代物理学以它所取得的进展，不断地证实着辯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是西方許多資產階級学者从他們的世界观出发，难以接受这一点。他們往往是在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中轉来轉去，終究轉不出这个圈子。回顾历史，考察現况，可以看出，这是现代物理学发展中所以常常重复以往錯誤和不断出現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对待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論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难以理解这一点，从而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只看到現有理論所存在的問題，对它抱过分否定的态度；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理論所取得的成績，很少去考虑它可能存在的問題。这两种傾向都妨碍着科学理論的进一步发展。推进現有理論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往往是由一批新的敢于打破框框又善于继承的人来实现的。常常出現这样的現象，随着理論的一次次更新，科学闖将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更新。量子力学的几个創始人代替了旧量子論的权威，而他們在以后量子場論的发展中又退居次要地位。这样的現象在近代物理学发展的几十年历史

中頻繁地出現，許多理論物理学家在对理論的发展作出貢獻之后，往往就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作为框框，把自己圈起来，再也走不出去。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縛。

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科学理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理論和实践的矛盾所推动的。許多西方理論物理学家却非常害怕矛盾。当大量的新的实验事实显示出和旧有理論之間存在尖銳的矛盾时，总有一批人想尽办法来迴避和掩盖矛盾，維護旧的理論。从經典力学的观点来看，正在开行的火車上的观察者观察到的力学規律和地面上的一样，可是对于电磁学規律就不同了。这个基本观点上的內在矛盾，显示出理論需要发展。十九世紀末期对光的传播进行的一系列实验，得到的結果和經典力学的传统观念发生严重冲突，使矛盾尖銳起来了。人們曾作过种种尝试，企图通过光的传播媒介具有許多奇怪的性质的假定来調和这个矛盾，但总是解决不了問題。直到实验上发现了真空中光速不变（对各慣性系相同）之后，才以此为起点突破了經典力学的观念的框框，建立了新的理論——狹义相对論，从而解决了这个矛盾。

有一些人在新的实验事实和旧有理論的尖銳矛盾充分暴露以后，也自发地采取了承认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态度，从而对理論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当他们解决了这些矛盾、取得了理论上的进展之后，就往往把自己设想的情景当作物质世界的全部规律性，再也不去考虑客观世界中还会有更内在更深刻的矛盾，不再去自觉地注意实验所揭示的新的矛盾，而沉溺于对现有理论进行修补雕琢，企图使它成为包罗万象的、无矛盾的最终的理论。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在初期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以后就再未能作出新的重要贡献，其原因往往就在于此。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海森堡，就企图建立一个统一描述“基本粒子”的最终理论，结果工作了许多年也没取得什么重要成就。近十年来，在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中发展起来了色散关系理论，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它克服了原有理论中的某些困难，使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前进了一步。但是又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色散关系理论是最终理论的苗头，甚至有人宣称自己不需很长时间就能突破了。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真理的标准。基本粒子物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目前实验资料还相当不完全。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善于充分利用这些不够完全的实验资料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实验不断发现的一系列新现象，经常对旧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冲击。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包括运用相当抽象的数学工具，提出相当抽

象的新概念和假设，通过实践检验使之成为新的理论。

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物理学家中有一些人，却热中于完全不顾实验依据地进行大量的所谓理论探索。这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潮，似乎他们提出的“理论”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是否内部自相协调，是否有完整系统。至于这些“理论”将来是否能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则抱着摸头彩的心理。

这种思潮反映了对待理论和实验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它使理论的探索走上斜路。这样的工作，难以对基本粒子理论的进展作出重要贡献，但是却会造成假象，起了转移视线的作用。

从上面所讲的几点就可以看到：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严重地阻碍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家如果不能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工作中可能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取得若干重大的成果，但是很容易又走上斜路。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难以跳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是由他们的世界观所决定的。为了使我国的科学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起来，学会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我们的科学工作。



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指导

分子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些看法

· 徐 光 宪 ·

《红旗》刊登坂田昌一的文章，给我们很多启发。坂田昌一在“基本粒子”研究中自觉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我们有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良好条件，如果能自觉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一下我们所从事的科学领域的发展道路，记取有益的经验和走过的弯路的教训，摆脱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这样一定能使我国的自然科学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这里，准备对现代分子结构理论发展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和前景，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讨论。

现代分子结构理论共有三大学派，即价键理论、分子轨道理论与配位体场理论，都是在量子力学提出后不久创立起来的。价键理论强调两个原子之间电子配对成键的原理，与化学家熟知的价键概念相一致，发展较快。但是，根据电子配对形成单键、双键、三键的概念，不能解释苯和其他共轭分子的结构，这是一个重大的、根本性的矛盾。

在科学上，每当发现重要的实验结果与现有理论相矛盾时，往往是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种时候，方法论的指导有很大的作用。科学家在处理这类矛盾时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会直接影响到理论上能否取得成就。

当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之间发生的不是根本性的矛盾时，科学家常常借助于某些合理而且有根据的假定，对现有理论作一些补充或修正，把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统一起来，使现有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但是，如果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发生带根本性的矛盾，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这时，科学家可能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

(1) 借助于某些往往是缺乏根据的、有时甚至是显然不合理的假定，把实验结果与现有理论的矛盾调和起来，弥补起来，纳入到现有理论的框框中去。有些科学家在这样做了之后，由于维护了已经深入人心的旧理论而得到莫大欣慰，至于这些假定是否可靠，



就认为不那么重要了。

(2) 完全抛弃旧理论，另起炉灶建立新理论，或发展原先已有但由于某些原因被人忽视的另一派理论。这样做的结果，由于把旧理论中正确的合理的东西也统统抛弃了，就往往又形成具有另一方面严重缺陷的理论派别。

(3) 一分为二地对待现有理论。仔细审查现有理论的全部内容，有意识地安排实验或搜集资料，来尽可能充分地揭露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之间的矛盾，然后在克服实验结果和现有理论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辩证地否定（按列宁的说法，这是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现有理论，批判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另创符合或接近于客观规律的新理论。这时候如果有另一派理论存在，也应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仔细分析它的优缺点，反复在实验中考察，以便抛弃其中错误的东西，吸取其中合理的内容，使新创造的理论更加完善。

上述第一、第二两种方法都是片面性的，采用它们来处理理论和实验之间带根本性的矛盾，都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现代分子结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处理价键理论与像苯这一类的共轭分子结构的矛盾，鲍林在三十年代初提出了“共振论”。几年前，科学界对于“共振论”的评价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我认为，这一理论对

于处理这个矛盾，采取的是上述第一种方法，它的特点，是保守经典结构理论关于四种基本键型（单键、双键、三重键和离子键）的框框，而用这种键型的“结构共振”这个人造的假定，来弥补旧有理论不能描述共轭分子结构的缺陷。

采用第二种方法处理矛盾的是分子轨道理论，这一理论强调分子的整体性，认为分子中的电子为整个分子所有，而不注意分子内部有关原子间电子配对成键的情况。它虽然克服了价键理论特别是共振论的许多缺点，但却没有把价键理论的优点吸收进来，未能成为大家一致公认的理论。

随着科学的发展，尔后又出现了一类新的矛盾，即无论价键理论或分子轨道理论都不能定量地解释络合物的许多特性，所以近十年来特别迅速地发展了分子结构理论的另一学派，即配位场理论。这一理论在络合物光谱和磁性的定量计算方面得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也有不少缺点和局限性。

价键理论、共振论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比起分子轨道和配位场理论来，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那末，价键理论的发展是不是没有前途了？不，我认为，价键理论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作为价键理论重要支柱的经典结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还是适用的。但是，针对经典的基本键型不能反映某些分子结构



的矛盾，應該採用上述的第三種對待矛盾的方法，盡量揭露這些矛盾，在總結大量新的實驗材料的基礎上，不斷發掘新的化學鍵類型，從理論上來分析這些新型鍵的本質，把分子軌道和配位場理論中成功的方法和有益的概念吸收進來，並盡量借用理論物理中已有成效的方法（如群論分析和近代計算技術），來闡明這些新型鍵的成鍵原理和特性。

分子和其他任何客觀存在著的事物一樣，是包含着內在矛盾的統一整體，它的結構的各方面的特性也必然是統一的。現有的分子結構理論既然還不能統一解釋已發現的有關分子結構的各種現象，就說明它還沒能全面地如實地反映分子結構的實際情況。因此，我的想法是，使用一架靈活的“照相機”，既可以从較高的角度，較遠的距離來觀察分子的整体（分子軌道理論），又可以从較近的角度來分析分子內部有關原子之間成鍵的情況（價鍵理論），還可以利用多種剖面 and 投影（例如配位體場理論等），並且以唯物辯證法作為思想武器，把從各個角度攝取下來的圖片和從大量的科學實驗和生產實踐中搜集來的資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工作，提出更合適的模型，較全面的較切合實際的數學處理的方法，並回到實驗中反復驗證，根據實驗的結果不斷地加以修改，逐步綜合成為一套比較完整的新的分子結構理論。

下面，試對這幅圖景的輪廓作粗略的描述。

應該把電子屬於分子整體的觀點和價電子觀點結合起來。認為分子是由原子核骨架和核外電子組成的整體，這一觀點是從分子軌道理論吸取過來的，而且也是正確的。但在分子形成的過程中，有些電子起了主要的作用，有些電子只起次要的作用，如果不區別開來分別加以研究，則對分子結合力的規律還是不易摸清楚的。在原子形成分子的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電子特稱為價電子。那些不起主要作用的內部電子則稱為內層電子。價電子的概念是從價鍵理論來的，但其意義不但包括成鍵電子在內，而且包括反鍵電子、非鍵電子、孤對電子以及絡合物中的d電子和在某些化合物中的f電子在內，所以要比價鍵理論中所指的價電子廣泛得多。分子軌道理論不重視價鍵概念，這是它的缺點之一。價鍵理論把價電子的範圍定得太狹，所以許多事實無法解釋。區分價電子和內層電子，總結價電子的各種類型及其屬性，將是新的分子結構理論的重要內容。

我國唐敖慶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提出雙電子鍵函數理論和計算方法^①，彭桓武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提出多電子鍵函數理論^②。我認為，用它們來代替單電子狀態函數即分子軌

① 《化學學報》第20卷，第2期。

② 《物理學報》第11卷，第2期。



道，为价键理论的新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新的方法综合了原来的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的优点，可以克服分子轨道理论中不考虑电子间的“瞬时关联”的缺点。

价键理论中表述的成键原理主要是电子配对原理。这一原理用处很大，但局限性也很大。新理论中的成键原理则将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它应包括各种新键型的形成条件和性质以及旧键型中新的成键因素等。

新的分子结构理论还可以尝试把配位势场理论与价键理论结合起来。

新理论的发展还应注意联系实际，对萃

取化学、络合物化学、催化作用、半导体、受激发射和分子生物学等重要科学领域中的化学键问题予以优先考虑。这样，一方面借以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些领域中研究工作特别活跃，新的矛盾和新的键型比较丰富，重点研究这些领域，对化学键理论的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

这一些设想，因限于水平，不一定提得对，或不一定行得通。提出来的目的，只是引起大家的讨论，共同研究如何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化学键理论的研究中，开创出我们自己的道路。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 龔 育 之 ·

讲讲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问题的一些想法。

(一) 《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坂田文章的按语，特别强调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思想。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辩证法讲“分”，就是指的“一分为二”，指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指的对立面的统一和

斗争。

形而上学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认为“一”就是“一”，是不可分的。辩证法也讲“一”。但是，辩证法认为，“一”是对立的统一，是可分的；宇宙间不存在任何最后的、绝对的、不可分的“一”。毛泽东同志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



同，形式不同罢了。”^①

社会的发展，永远是一分为二的，不会出现绝对的不可分的“一”。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在实践上和理論上都已經破产了。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仅如此，就是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人們还是会划分为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它們之間还是会有矛盾和斗争。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的“分”，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罢了。

在自然界，物质的分割，也永远不会出现绝对的不可分的“一”。那种认为原子是绝对的不可分的观点（原子这个词就其希腊字源来说，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我国最初曾經把它譯为“莫破尘”），早已破产了。形而上学把它的障地从原子后退到“基本”粒子。现在，它在“基本”粒子那里的障地也根本动摇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日益表明：物质分割的系列，是无限的，是没有终点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结构层次上，物质的“分”，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罢了。

否定“分”的普遍性、绝对性、无限性，就否定了自然界和社会的无限发展，就否定了認識的无限发展，就使辩证法为之中断，就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停滞、死亡。

（二）有些同志对于物质的无限可分

性表示怀疑。他們觉得，“分”这个概念未必可以无限地运用。这个问题，我看可以討論一下。

承认不承认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哲学史上古老的爭論。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記載着“辯者”的这样一个說法：“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我认为，这个說法，是以朴素的形式，从量这一个侧面，說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光辉的思想。

有許多人不能接受这个思想，不能理解一个有限物何以能够分解为无限个組成部分。其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懂得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不懂得无限由有限构成，而有限中又包含着无限。

从純粹的量的方面来分析，“一尺之棰”这样一个有限量，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对分，的确展开为一个无穷系列：

$$\frac{1}{2}, \frac{1}{4}, \frac{1}{8}, \frac{1}{16}, \frac{1}{32}, \dots$$

这个数的系列有无限个項，但是，它的总和是一个有限数——1。

近代微积分学建立起来以后，从量的方面很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有限和无限的辩证

^①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講話》。《毛泽东著作选讀》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3頁。



关系。

当然，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不能只是从量这一个侧面来考察，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无限多样的质的内容。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黑格尔的话：“有限性只不过是对自身的超出；因此，在有限性中包含着无限性即有限性自身的他者”。列宁在这些话旁边批道：“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①。

如果不限于抽象的量的侧面的考察，而深入到具体的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那么，“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个说法，就不能充分说明“物质的深远的无限性”了。

“半”，是个量的概念。“一”分为两“半”，事物在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量上小了一半。

辩证法不能把“分”理解为只是量的分割。

辩证法讲量变转化为质变。量的分割，到一定的阶段，引起质的变化。

且不說棰失去一定的长度，就丧失了棰之为棰的性质。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进一步“分”，就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原子不是半个分子，而是同分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

东西。

原子进一步“分”，就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电子和原子核都不是半个原子，而是同原子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东西。

如此类推。

恩格斯早就从哲学上深刻地指出：分子、原子，不是“可分性的极限”，而是“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各个关节点，它们“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②，它们“决定着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③。

原子论在科学史上的重大功绩，在于它实际上指出了物质分割过程中的质变，引导人们去研究物质的一种极重要的质的存在形式。旧原子论的错误，则是在于它把物质分割过程中的质变绝对化，当成了物质可分性的极限。

只讲量变，否认质变，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

(三) 有些同志提出问题：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不是意味着，如同原子像一个小太阳系那样分为原子核（中心“太阳”）和电子（周围“行星”）一样，电子和其他“基本”粒子也将像一个更小的太阳系那样再分为白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4—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200页。

^③ 《自然辩证法》，第248页。



己的“太阳”和“行星”，如此类推，而形成一个个比一个更小的“太阳系”的无限排比？

玩具店里有一种套娃娃。打开外面的大娃娃，肚子里套着个一模一样的小娃娃，打开这个小娃娃，肚子里还套着个一模一样的更小的娃娃……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是不是就像这样的呢？不，不能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物质的结构和分割。

物质的无限可分，并不是无限地、单调地重复某一种特定的“分”的形式。

恩格斯，以及黑格尔，都批评过所谓消极的无限，这种无限的特征之一，乃是同一事物的无穷的重演。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无限观。

辩证法所理解的无限，它包含着层出不穷的新质的内容。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是矛盾的普遍性问题；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结构层次的物质的“分”的具体形式，这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①

在物质分割的每一个新的关节点上，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去探究前所未有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自然科学不断

地有新的发展，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辩证法根本不容许把某种已知的刻板的公式，强加于自然界、强加于自然科学。

其实，说原子像一个小太阳系，这只是一种粗浅的比喻。它们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完全不同的规律。研究原子的“分”的新性质、新形式、新规律，使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

“基本”粒子的“分”，虽然现代物理学还没有把它研究得很清楚，无疑却预示着将会出现崭新的性质、形式和规律，研究它们，将会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的新发展，又将进一步丰富唯物辩证法关于“分”、关于对立统一、关于整体和部分这些概念，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

如果否认“分”在质上的无限多样性，而把它理解为同一模型的无穷重演，那么，自然界就成了一个贫乏的世界，研究自然的工作就成了一件无聊的工作，自然科学家就没有什么可以发现、可以创造，自然科学就不能前进，而寿终正寝了。

总之，要坚持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的辩证法思想，反对那种认为存在着最后的、绝对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8—299页。



的、不可分的“一”的形而上学思想；要坚持“分”的辩证观，反对“分”的形而上学观。

(四)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关于物质的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一分为二。有科学的学说，就一定有反科学的学说同它对立；有正确的学说，就一定有错误的学说同它对立；有唯物论、有辩证法，就一定有唯心论、有形而上学同它对立。旧的对立解决了，新的对立又在前头，如此层出不穷，永远不会完结。

这个真理发展的规律，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史所证明了。关于原子和“基本”粒子的学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着那种长期在科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把原子看作可分性的极限的观点，后来为科学实践的发展明显地证明其为错误而被科学界普遍地抛弃的时候，当着原子是可分的这个思想，由于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被科学界普遍地接受为真理的时候，关于“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这个辩证观点，又在同把“基本”粒子（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种类）看作可分性的极限的错误意见作斗争。

当着那些曾经喧赫一时的否认原子的客观存在，声称原子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创造”、一种便于心灵用来再演某类事实的“数学模型”的唯心主义者（马赫之流），后来被关于原子的科学研究的光辉成果弄得声名狼籍，以致他们之中的有些代表人物也不能

不公开承认错误的时候，新的斗争——反对那种否认“基本”粒子的客观存在，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为了从逻辑上推算测量仪器上标线的度数而创造的概念（弗兰克）、认为它们“最后也还是一种数学形式”（海森堡）的新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斗争，又摆到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家们的面前。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反复不断的艰苦斗争中前进的。

必须注意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必须从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的丰富材料中，去掌握认识的辩证法，去总结认识的历史经验，用以指导现在的科学研究工作。

可惜，不少自然科学家很少注意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而且，有些书籍往往把自然科学史片面地描绘为似乎只是正确的认识不断堆积的历史。对自然、对物质的认识过程，似乎只是从正确到新的正确，没有谬误，没有对立，没有斗争。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真理、限制过人们的思想、阻碍过科学前进的错误的东西，一旦被普遍地认识其为错误以后，人们就觉得，似乎在自然科学史上也不值得再提起它们了。这样，它们就逐渐完全被淡忘了。后来的人们，就逐渐不大知道他们学习的那些科学的真理，是怎样不断地同错误的东西斗争而建立起来的了。

这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待自然科学史。



这样的自然科学史，不能使人真正从中得到历史的教益。

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析自然科学的历史，分析真理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总结认识的历史经验；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分

析自然科学的现状，揭露当前各种对立的学说、观点和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树立起敢于批判、敢于创新的学风。这样，就能够在思想境界上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能够比较自觉，少走一些弯路，就能够在自然科学发展中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武器

· 艾 思 奇 ·

我对自然科学没有专门研究，但很愿意向自然科学界的同志们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必须密切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也要重视自然科学的成就。自然科学家们把自己专业方面的新发现、新理论介绍出来，可以帮助各方面工作的干部和群众增长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对研究哲学的同志也会给与很多助益，使他們有可能依据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来加深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解。

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的文章，从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粒子”理论方面，阐发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很有价值的思想。

唯物辩证法不但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也是探索自然界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自然科学的每一次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都使唯物辩证法获得新的证明或发展。形而上学思维总是力图把科学上的现有成就解释成最后的东西，而科学上的每一新的进步都使这种企图宣告破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的可分性是无限的，宇宙的发展和人的认识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由原子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比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粉碎了与此相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坂田等理论物理学家的成就向我们证



明，自然科学家们如果能够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将有可能加快他们工作的进展。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家研究基本粒子的历史本来是比較短的，但他们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成就。坂田等几位科学家能够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不能不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事实，有说服力地駁倒了那种反对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研究的观点。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是，正确的思想指导，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曾經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到了现代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的腐朽，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受到阻碍，表现出畸形化的状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过程，还常常受到主观方面的思想条件的障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界，也像在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居于統治的地位。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广泛地影响着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理論自然科学研究。主张哲学无用論的人们，不承认自然科学家的思維活动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到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或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实际上，不受任何一种世界观的影响的人是没有的。主张哲学无用論的人，他们自己的

观点，往往就是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同“实证論”的观点密切联系着的。“实证論”的观点实质上是披着“科学”外衣的不可知論和主观唯心主义，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的哲学观点，它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

像坂田昌一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打破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传统的束縛，和流行欧美的“实证論”断然决裂，和资产阶级哲学观点断然决裂，自觉地拿起唯物辩证法这个真正科学的武器，这是十分可貴的。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比资本主义社会远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其他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都应该出现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比拟的巨大的跃进速度。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提出多快好省的要求，是有充分的根据的。中国十几年来来的历史证明，一个原来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一旦有了无产阶级专政，认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路綫，就会以惊人的步伐迅速走向先进的地位，就会給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极为广阔的天地。

但是，有了优越的社会条件，还必须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指导，科学技术工作才能更加順利地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



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仍然存在着激烈的鬥爭，科學工作者如果不能自覺地接受無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也完全有可能受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各種反辯證法思潮的影響，從而阻礙科學工作的進步。

我們的黨和毛澤東同志曾經不斷地號召各方面的工作幹部，努力在實際工作中應用辯證唯物主義，要把哲學從書齋里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廣大革命群眾手中的武器。這個號召在國內正在越來越廣泛地深入人心。近幾年來，我國各個方面的科學技術工作者，積極地響應黨的號召，在各種科學領域包括一些尖端科學領域中，取得了許多成就。這

些成就，都是同他們日益自覺地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證法分不開的。尤其值得高興的是，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直接從事生產活動的技術人員和普通工農群眾，通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哲學著作，啟發了自己的智慧，能夠分析和解決工作中的各種矛盾，突破生產技術方面的許多舊框框，不斷地有所創造、有所發明，自力更生地解決了許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也就變成越來越強大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毫無疑問，只要循着這個方向努力前進，不要很長的時間，我們一定能夠攀登上科學的高峰，把我國科學技術提高到現代的先進水平。

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改進科學研究方法

· 于 光 遠 ·

《紅旗》雜誌編輯部在發表坂田昌一的文章時所寫的按語中，強調指出：要在科學研究中自覺地運用唯物辯證法，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這正是給我們科學技術工作者提出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為指導，改進我們的科學研究方法。

科學研究是探索未知的工作。它是在社會實踐（包括科學實驗）基礎上所進行的的一種特別複雜的認識活動。要掌握這種認識活動

的藝術，除了學習哲學發展的最高成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又有什麼別的途徑呢？

如果科學工作者能夠自覺地學習和運用唯物辯證法，自覺地把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運用到研究工作中來，那就可能在紛繁複雜的自然現象中洞察事物的本質，找到解決問題的最好途徑。否則，就難免在探索的過程中走上斜路或者多走彎路，使研究工作遭受損失。



早在上世紀的七十年代，恩格斯就已經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經成为不可能的了”^①，“摆脱了神秘主义的辩证法，逐渐变成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②；恩格斯还指出：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懂得运用辩证法，“纷扰和混乱如何厉害地統治着他們”^③，如果他們能够接受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就“可以免除他們經過无穷尽的歧途以及在錯誤方向下浪费无限的时间和劳力”^④。

从恩格斯讲了上面这样一些話以来，自然科学又经历了飞跃的进步，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成就，迫使人們更加无法否认自然界的极其明显的辩证性质。但是，由于自然科学突进到嶄新的領域，远远超出了人們的日常經驗的范围，抽象程度越来越高，理論、概念不断地經歷着急剧的变革，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哲学上的一些新的紛扰和混乱。今天，許多自然科学家仍然为资产阶级偏見所囿，作着“最坏的哲学的奴隶”^⑤。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坂田昌一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还是不多見的。在那里，仍然像恩格斯当年所說的：“学会用辩证法去思維的自然科学家，还是屈指可数”^⑥。

在我国，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是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伟大成就的結果，这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革命和建設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思想的結果，这是党对科学技术工作者长期进行教育的結果。虽然人們的認識和觉悟程度有所不同，

虽然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改进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取得的經驗和成果还是初步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現象，它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自然科学領域中开始取得胜利。

当然，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間也还存在一些思想認識問題，需要解决。

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以为，学习哲学、研究哲学，这只是少数搞理論自然科学的人的事情，甚至只是那些有特殊的哲学兴趣的科学家个人的事情，“普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用不着关心。他們以为，学习和研究哲学，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外的事情，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額外工作，而不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中的事情，不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本分工作。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因襲了资产阶级知識界对于哲学的流行看法。革命的知識分子，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根本不能这样看待的。

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哲学的大革命。它根本不同于为少数精神贵族所垄断的那种资产阶级哲学。它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的精神武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广大人民群众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了科学文化的主人的时候，更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和普及，开辟了广闊的道路。

^{①②③④⑤} 《自然辩证法》，第1、168、25、9、173頁。

^⑥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頁。



毛泽东同志号召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課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銳武器。

在我国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干部中，現在正蓬勃地开展着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唯物辯证法的伟大的思想运动。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普及的运动，是我国人民群众思想認識大提高的运动。这个运动，使我們在階級斗争和对自然界的斗争面前的主动性、自觉性大大增强。我們革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怎么能够为资产阶级知識界的因襲观点所束縛，而落到这个运动的后面呢？怎么能够把学习和研究唯物辯证法看作分外的事情，而不看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呢？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外，而不貫串在研究工作之中呢？

还应该看到，我們的任务是要进行一个伟大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我們要把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统统吸取过来。但是，我們不能只是跟着外国资产阶级的脚印，亦步亦趋，作他們的尾随者。我們要走自己的道路。我們要使科学技术工作者用先进的哲学思想武装起来。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經实现了一个科学技术的革命，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陈旧的生产技术抛到历史的后面。同这个科学技术革命相适应，资产阶级还实现了一个哲学革命——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在当时是进

步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培根到狄德罗)，代替了沒落的封建阶级的、衰朽的、令人窒息的經院哲学。虽然他們的唯物主义还只限在形而上学的范围内，但終究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沒有这个哲学革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走向沒落，它的哲学也走向全面的沒落，由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轉向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沒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哲学，同发展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矛盾，說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当前科学思想的危机。

我們要在现代实现一个新的、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就必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实现一个新的、比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更加伟大的哲学思想的革命——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辯证法思想代替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使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自觉地走向唯物辯证法这个“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①。

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把学习和运用唯物辯证法看得很难，怕用得不好。我們认为，在解决“用得好不好”的問題之前，首先要解决“用不用”的問題。只要願意用，經過努力，是一定能够学会用的。努力的办法无非是，带着問題学，从实践中学，从錯誤中学；在学习中不断总结經驗、解决問題。一个人解决不了的問題，几个人来集体研究；一时解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30頁。



决不了的问题，长期坚持研究。经过这样的学习，必定会有成效。

有些科学技术工作者觉得各种工作很忙，无暇顾及唯物辩证法的学习。我们觉得，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无论怎样忙，决不应该使自己忙得连考虑改进科学研究方法的时间都没有。越忙越要寻求正确的方法论的指导，越忙越要挤时间学习。

其实，所谓“难”和“忙”，只不过是表面的理由，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对在研究工作中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有没有足够的认识。如果能够认识到学习唯物辩证法是工作革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了做好自己工作绝对必需的东西，是每一个革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尽的责任，那么，“难”和“忙”也就不成其为理由了。

现在，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用歪曲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来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和修正主义思想泛滥的国家里，正喧嚣得很热闹。彻底批判这种反动思潮，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了过去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经验，为这种批判提供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新经验，给披上现代科学外衣的时髦的资产阶级哲学以致命的打击，来捍卫、宣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现这个任务，不仅需要哲学工作者的努

力，而且需要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参与，需要双方结成战斗的联盟。

各个科学部门有它自己的带有一定特点的研究方法。它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论在某一个科学部门的具体化。研究各个科学部门的研究方法，是学会在解决各个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项必要的工作。

现在，科学技术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相互之间合作的需要也越来越多。如果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注意专业间的相互学习，不注意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不能从自然界的整体上、从自然界发展的历史上形成科学的自然观，那就很难避免由于专业分工所带来的狭隘眼界而陷入形而上学。

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在我们的国家里，不是科学技术工作者私人的事情。因此，需要很好地组织和领导这件事情。这是党在科学技术工作者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是把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的一条大路。这里，要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和鼓励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这种讨论，通过争辩，通过实践，来判明不同观点的是非，而不是用武断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推行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要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不尚空谈，不搞形式主义，努力把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同科学实验密切结合起来。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变成了 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

李 哲

近几年来，在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一股歪曲和修正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逆流，大肆宣扬“矛盾融合论”，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统一规律“已经过时了”，“不能把矛盾描述成社会主义的推动力量”，“协调和绝对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等等。在三十年代曾经是德波林学派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一些批判者，今天却大肆宣扬矛盾融合论，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一个所谓“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①的公式。这个公式集中地表达了矛盾融合论的实质。

过去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曾经参加过反对德波林学派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点的斗争的一些人，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逐渐充当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辩护士，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投降了德波林。

过去，这些人在批判德波林时，曾经说过：“孟什维主义的唯心论者，脱离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他们描绘一个完全机械的表式，依据这个表式，我们首先遇到简单的差异，然后发现对立，再后才见到矛盾。他们不了解，在每一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他们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地限制矛盾发展规律之普遍的性质。可是列宁却相反，他着重地指出对立的统一，统一和相互贯通之有条件性，暂时性和相对性，而它们的互相否定，互相排斥，它们的斗争——成为发展之动力的斗争，却具有绝对性。”^②

现在，这些人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解释，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过去说：“物质……在它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阶段上，它始终是内部包含着矛盾的。”^③“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

①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任务》。苏联《哲学问题》1962年第4期。

②③ 米丁：《辩证法唯物论》，生活书店1948年第4版，第261、515页。



現在却說：“辯證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

過去說：“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都由於諸對立面的鬥爭而發生變化，不論這些對立面自身的性質如何。”^①

現在却說：“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是通過內部的一致加強、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相互適應的途徑來完成的。”^②

過去說：“矛盾，決定社會之運動和發展的內在矛盾，即在社會主義時代也還是有的。”^③

現在却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新的現象、新的過程在社會生活中發展起來。例如，辯證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差別融合為統一。”^④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他們在三十年代曾經宣傳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關於對立統一規律的學說，到了六十年代就忽然失去作用了嗎？

不，事物的矛盾規律，即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適用於過去、現在和將來。它既適用於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和將來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只是在不同的社會中，矛盾的性質和情況有所不同。對立統一規律是永遠不會失去作用的。問題是，當年的一些德波林學派的批判者，現在

成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宣傳工具，他們背叛了革命的唯物辯證法，拾起了曾經被他們批判過的德波林的破爛的哲學衣鉢。

二

現在這些德波林學派的繼承者所提出的“對立面、矛盾，轉變為差別，差別融合為統一”的公式，從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德波林的所謂“從單純的等同，經過差異和對立而達到極端的矛盾”^⑤的公式相反，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就會明白兩者在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

在否認矛盾的普遍性方面，他們和德波林的說法雖然不同，但其實質是完全一致的。德波林說：“無區別的同—是一種純樸狀態，一切存在物都應當從‘純樸’狀態中，即從無區別的抽象的同—中擺脫出來。同—轉化為差別，差別又轉化為對立，而後又轉化為矛盾。”^⑥德波林認為，矛盾不是過程一開始就產生的，矛盾產生在出現差別之後，差別並不是矛盾。現在這些德波林學派的繼承者則認為，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轉變為差別，矛盾不存在了。這裡，說法不同，只是簡單的

①③ 米丁：《辯證法唯物論》，第262、486頁。

②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衰退》。蘇聯《共產黨人》1962年第10期。

④ 《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領域內的科學工作任務》。蘇聯《哲學問題》1962年第4期。

⑤ 轉引自米丁：《辯證法唯物論》，第516頁。

⑥ 德波林：《哲學與政治》，1961年俄文版。



邏輯换位，并无什么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都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并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运动，矛盾不是普遍的、绝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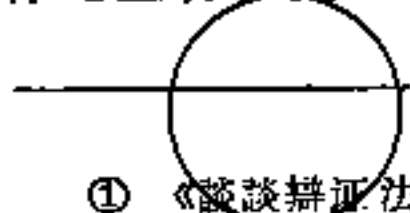
德波林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而是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就是说，矛盾不是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事物的发展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所说的矛盾转变为差别，其实质是说矛盾在过程开始时是有的，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没有了，就转变为差别。他们和德波林一样，也不承认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的动力就不再是事物的内部矛盾，事物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可见，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也同德波林一样，完全陷入了形而上学外因论和机械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运动和发展。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

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① 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过去也承认德波林的哲学观点是同列宁的观点根本对立的。可是，现在却背叛了自己曾经赞成过的真理，走上德波林否认矛盾、取消矛盾的老路，公然与列宁的观点相对抗。

在处理矛盾的问题上，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和德波林也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采取了调和矛盾的方法。德波林说，事物的发展是：“当一切必然的发展阶段——从单纯的等同，经过差异和对立而达到极端的矛盾——都过去了的时候，‘解决矛盾’的时期就来到了。”^② 可是怎样来解决矛盾呢？在德波林看来，矛盾的解决并不是经过矛盾的斗争，而是经过矛盾的互相调和。他说：“积极的辩证法认为，正题和反题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而是互相调和的对立面。”^③

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过去曾对德波林的调和矛盾的观点进行了正确的批判。他们说：“孟什维主义的唯心论者违背了列宁对这一对立统一规律之典型的解说，……他们不把它解作斗争的规律，不解作发展的规律，而解作‘综合’的规律，调和对立面的规律。”“德波林提出了他对这一规律之孟什维克式的解说去对抗列宁关于这规



-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7—408页。
② 转引自米丁：《辩证法唯物论》，第516页。
③ 德波林：《论康德的辩证法》。



律之最完滿、最周密地表現世界發展之本质、社會鬥爭之本质的公式。这种唯物辯證法的規律的解說，是一般修正主义者所特有的，实际上是他們在工人运动队伍中所进行的叛逆路綫之理論的表現。”^①

可是，按照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提出的公式，对立面、矛盾要轉变为差別，并且互相調和，合二而一。就是說，矛盾的解决不是經過对立面的斗争，而是經過对立面的融合、調和。这不正是同德波林的观点一脉相承嗎？他們現在借口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現象、新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了，以此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可以融合的理由。但是，他們过去曾經說过，“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都由于諸对立面的斗争而发生变化”。“矛盾，决定社会之运动和发展的内在矛盾，即在社会主义时代也还是有的。”在这里他們正好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列宁曾經明确指出：“对立面的統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暫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則是絕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絕对的一样。”^②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看来，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的斗争是絕对的，而統一是对应的。一切矛盾只有經過斗争才能解决，否认斗争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矛盾，否认了事物的发展。矛盾只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之分，

沒有可以調和与不可調和之分；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过去也承认德波林的哲学观点与列宁的这一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可是，他們現在和德波林一样，公然同列宁相对抗。

按照他們現在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再是社会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統一、又斗争，而是“内部的一致的加强”。这岂不同样是“违背了列宁对这个对立統一規律之典型的解說”嗎！岂不同样是不把矛盾看成是“斗争的規律”、“发展的規律”，而看成是“綜合的規律”、“調和对立面的規律”嗎！这岂不是用主观杜撰的公式去对抗列宁的公式嗎！他們过去說德波林的观点“是一般修正主义者所特有的，实际上是他們在工人运动队伍中所进行的叛逆路綫之理論的表現”，这些话，今天不是完全适用于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自己嗎！

德波林和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公式，都不是什么新的“发明”，而是对黑格尔哲学保守方面的拙劣的摹仿。

我們知道，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即辯证发展的思想。但是，这个“合理的内核”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

^① 米丁：《辯证法唯物論》，第 522 頁。

^② 《談談辯证法問題》。《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08 頁。



系基础上的。因此，决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而必须对其保守的、反动的方面，给予全面彻底的批判；对其辩证发展思想的“合理的内核”，要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救出来，并进行彻底的革命改造。这个伟大的任务，早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地解决了。

但是，德波林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批判黑格尔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吸取其“合理的内核”；相反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抄袭了黑格尔的糟粕。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的“逻辑阶段”，是按同一、差别、对立而达到矛盾，最后又回复到“绝对精神”的这样一个公式进行的。这个公式显然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唯心主义的糟粕。而且，即使是黑格尔，当他谈到同一的时候，也不认为同一是抽象的绝对地同一。在黑格尔看来，同一本身是包含着差别的。他说：“勿把同一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异’的‘同’。”^①也就是说，矛盾并不是一下子就以最终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而首先是采取差别、对立的形式。当然，黑格尔是唯心辩证论者，这里是说概念的发展，这些说法本身是含糊的、神秘的。而德波林则说：“在绝对同一的环境中，当其中由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对立面没有形成之前，就不可能有发展。”^②这就是说，德波林把同一看作是不包含任何差异

的抽象的同一。

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在过去曾经尖锐地指出，德波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黑格尔式的修正，企图用黑格尔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现在同德波林一样，吸收了黑格尔哲学的糟粕。黑格尔认为，矛盾只在一定阶段进行，“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一切矛盾都要调和起来，运动发展也停止了。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辩证的对立面、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的公式，正是抄袭黑格尔调和矛盾、融合矛盾的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进行了恶毒的修正。

三

德波林和现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公式，虽然是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提出的，但其目的都是为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辩护。

德波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修正和歪曲，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德波林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进行恶毒歪曲和攻击的时候，正是苏联人民在联共（布）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实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58页。

②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1961年俄文版。



現列宁关于全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总路綫而斗争的时期。随着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富农阶级和资产阶级势力拚命反抗，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这种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同样是十分尖锐的。社会上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这时在联共党内先后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他们为了维护资本家、富农阶级的利益，都疯狂地反对党和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抹煞阶级斗争。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提出了臭名远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論”和国民经济发展“平衡論”，主张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同资本主义成分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应当处于斗争状态，而应当是平衡状态，主张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德波林派公然站出来攻击革命辩证法，提出了他們的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反革命集团提供“理論”武器。

按照德波林的观点，在苏联当时的条件下，富农和劳动农民之间只有差别，并无矛盾，这就完全同意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否认阶级对立的反动論調。既然在苏联社会里，只有差别，并无矛盾，那么，什么阶级斗争、什

么社会主义革命，统统是多余的了。德波林派对于对立统一規律的歪曲和攻击，正是为了适应布哈林等反党集团反对革命、反对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綫的需要，帮助他們宣扬阶级調和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融合論。

現在，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所杜撰的矛盾融合論，正是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以阴谋手段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路綫的时期提出的，其目的是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制造哲学根据。

德波林的哲学早已彻底破产了。現在这些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的哲学，也必然要随着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路綫的破产而破产。

* * *

曾經批判过修正主义的人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是有先例的。考茨基曾經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作过一些批判(虽然这种批判是无力的、敷衍了事的)，后来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义，投降了伯恩斯坦，成为伯恩斯坦的拥护者。普列汉諾夫也对伯恩斯坦以及孟什维克的某些观点作过斗争，但最后也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变成了孟什维克。

三十年代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現在成为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成为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辯护士，这又一次給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重大的教訓。



飞夺泸定桥

楊成武

光荣的任务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紅一师第一团在安顺場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但是这里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又只有几只小船，往返一次需要数十分钟，数万大軍如果只靠这几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同时，蔣介石正在命令四川軍閥楊森等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潭元部銜尾猛追。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場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蔣介石也梦想着把紅軍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很多爱国进步的人们也都在忧虑：紅軍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須火速夺下泸定桥。我們左路軍前卫紅四团，就是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接受了林彪軍团长的命令——坚决迅速夺取泸定桥。紅一师为右路軍，渡过大渡河后沿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胜利的第一天

二十三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場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規定三天赶到。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腸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終年不化的积雪，銀光耀眼，寒氣襲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濤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險。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險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泸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敵軍便开始向我們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謂伤亡，只得繞路爬山，繞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約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連忽然和敌人一个連遭遇，勇士們好像猛虎見了群羊，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是一条小



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不能过去。一营营长季光顺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我们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坳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击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我们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夹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我们前进，但我们发起猛追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一天二百四十里

第二天，我们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時間提前一小时吃饭，五点钟就出发了。才走了几里地，从我们来路方向，一匹大黑马像旋风一样飞来，直奔团部的行军位置。我定眼一看，是军团部的骑兵通信员。他从马上交给我们一份命令，我和团长并辔而行，凝神细读。命令上写道：“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二十五日夺下泸定桥。你们要以最高速度的行军和机断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在此次战斗中，要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取鸭溪一天走一百六十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着庆祝你们的胜利。”后面是军团长林彪同志刚劲有力的签字。看完命令后，我和团长面对面地凝视了一会，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一个十分光荣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哪！”

“二十五号！”二十五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是命令，这是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



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我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传达军团首长的命令，进行政治鼓动。队伍像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像一阵风一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

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同志们把这样的开会法，叫做“飞行会议”。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我们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我们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濘，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须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像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熾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濘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个问题像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

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籬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敌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也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题。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谁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像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



得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两岸及两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二百四十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要桥不要枪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

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門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門，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接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



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直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

“一渡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像座小铁塔，嘴巴像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须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

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地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門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門口漫天大火，似乎楞了一下，站在我 and 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



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狽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十时，尖兵排打响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

六十里竹林坪地区还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聶荣臻政委进入泸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聶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人文件中，翻出了一份紧急通报。这份通报说，共军已面临石达开第二的危境；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敌人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彻底破灭了。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复辙。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武装。

第三天，林彪军团长带着军团的主力来到了。他热烈地祝贺我们完成了任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接着毛主席也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大石塔农村的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问题的材料)

徐 稚

编者按：这是一九四七年徐稚同志在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以后所写的一篇材料。原来准备继续写下去，叙述一九四七年春天这个村子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的各项经过，但因为有别的事，没有完全整理出来。现在发表这一部分，供同志们做调查研究的参考。

大石塔——是山西静乐县潘家庄行政村的自然村之一。这个行政村包括有潘家庄、张家庄、大石塔(也叫大圣堂)、城东沟四个自然村，以潘家庄为主村。

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是接近游击区的解放区。

一九三六年春天，红军东征，经过这个地方，群众初步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军队。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由红军编成的八路军于这一年十一月开到这里。一九四〇年六月间，八路军在这里附近十五里的米峪镇，消灭了五百来个日寇，是晋西北有名的战斗之一。这一年十月间，日寇从这里过路，烧房子，烧粮食，没有住下来。又过了一个月，日寇来“扫荡”，住了几天，继续烧房子、杀人、奸淫。此后每年日寇最少来两三

次，见人杀人，见妇女奸淫，见东西拿东西，不能拿走的就烧。日寇使人民受尽了严重的灾难，但人民也就在这种残酷的战斗中，在毛主席的旗帜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导之下，步步地锻炼了自己，获得了觉醒，赶走了日寇，并变迁了农村旧日封建制度的面貌。

原来这个行政村的地主，以大石塔的高家地主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单由高时成算起，已经历了四代。高时成在离这里四十里的娄烦镇开生意，贱买粮食，在荒年时贵卖，并利用了荒年集中土地。例如：潘家庄的二百来亩好平地，就是高家在光绪四年闹荒年时以一亩两三升米的贱价收买的。该家集中土地最盛时，在本村及外村约有二千来亩好平地，除本村外，外村租户也很多，每年收



过一千担粮食。支出的粮银达八十来两，所收下的粮食，都等粮贵时才卖。当閻錫山統治时代，本村有五十戶，三百五十人，其中有由高时成这个血統分家下来的四家地主，在全自然村的九百三十八亩平地当中，还占有五百六十五亩。即占戶数百分之八的地主（按人口約为全村的百分之十二），占有百分之六十的平地——且都是最好的平地。这四家地主当中的高登汗一家，为高时成的长房孙，占有二百四十五亩，为全村平地的百分之二十六，其在外村也曾經有二百四十亩左右的平地，一共是四百八十多亩。这高家地主原来也是这整个行政村政治上的統治者，高登汗当过十三年长时期的閻錫山的編村村长，結合了封建的土地剝削与政治剝削。

在閻錫山統治时代，除了高家地主外，又有一家张姓經營地主，有好平地六十六亩。合这一家，地主戶数占全村百分之十（按人口为百分之十四），占本村平地約为百分之六十七强（六百三十一亩）。

本村原来有富农三家，为全村戶数的百分之六（按人口为百分之七），其中两家各有平地五十四亩，一家为三十九亩（曾經又买过高家地主的地，合之为六十六亩），共有平地一百四十七亩，为本村平地的百分之十五强，也都是好平地，但其中一家在抗战前已經完全破落。

有平地的中农原来只有七家，为全村戶数的百分之十四（按人口为百分之十一），共有平地一百四十三亩，为本村平地的百分之十五，但都是下平地。

全村的好平地是集中在戶数占百分之十六或人口占百分之二十一的地主富农手里，全村百分之七十的戶数或百分之六十八的人口却完全没有平地，而在这里基本的土地問題却就是平地的問題。

在抗日战争之前，高家地主的外村土地早已大部卖出，本村的土地也已有一部分卖出。四家已分裂为六家，但合起来的人口却变少了。高家地主的全盛时代算已是过去的了。但高家地主土地的大量轉移，乃是八路军在这里創造解放区而带来共产党的合理負担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之后。

在六家高姓地主的五百六十五亩平地中，除了抗战前卖出的为一百零五亩之外，在抗战中陸續以买卖形式轉移到农民手里的为三百零三亩，减租清算出的为六十九亩，其他关系轉移的为十八亩，共为三百九十亩，合战前卖出的，共为四百九十五亩，占高家地主原来平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在这轉移当中，以买卖的形式占大多数。在实施合理負担的政策之后，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的献金运动开始了这种土地一批一批地出卖的潮流，而以一九四三年减租运动真正发动后的次年——一九四四年，达到了最高潮。

这种卖出和抗战前的卖出有根本的差别：一方面，抗战前个别地主出卖土地，仅为的是它私自家庭或这样或那样的财政原因，而在这里成为解放区之后，一般地主的出卖土地，乃是由于共产党反封建和扶助农民的政策，由于有广泛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抗战前卖出的价格都是很高的，例如：前述



高家賤买潘家庄二百来亩平地，在一九二九年却以一亩四十元的高价卖出。如果在抗战前普通平地一亩折十元来说，这时就只要三元，四元或五元，特别在一九四四年很多是一斗米便可以买到一亩。也有较高价的，但究竟是少数的情况。一般看来，到了一九四四年，即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这里的封建剥削制度已根本被群众的威力压垮了。

一九四七年春，土地改革的工作团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土地的占有情况，大体上就是一九四四年大转移之后的情况：这时全部高家地主的土地已只有七十亩，即由原来占全村平地的百分之六十已变到百分之七点五。张姓那家经营地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减租与转移及分散给自己亲属的结果，已由六十六亩的平地减为十亩。两家富农也因为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而转移出若干平地。

抗战之前，大石塔的租地户，有二十七户，占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四；没有平地的户数，有三十五户，为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但在成为解放区之后，除了两三户以外，已都有或多或少的平地。多数农民几多世代梦想不到平地，但在共产党的政策下面，几年之间，却能够轻松地取得。这是新旧社会根本的变迁。这是这里农民群众积极支持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而进行的解放战争的主要经济基础，是他们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拥护毛主席的主要经济基础。忽视这种土地的转化，就不能了解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之无限力量的泉源，就不能了解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说“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

这种土地的大转移，是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这里的老百姓众口同声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好的，民主政府的法令是对的。那末，民主革命中的土地问题，这时是否已经完全解决了呢？

这时还存在的问题，大体上看来，是：

第一，在减租清算当中，斗争的果实本来应该按照农民群众的家庭经济状况，实行公平的分配，但因为运动初期的情况，是“谁算归谁”，所以，就只有租佃关系或债务关系的，才能够取得土地，而没有租佃关系或债务关系的若干穷苦农民却就不容易取得，或者取得较少。

第二，经过买卖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的地主土地，卖价较低，本来也可以经过有组织的调节和人民政权对于极端贫苦农民的财政援助，使土地达到更合理的分配，而还没有这样做，所以，有一定购买能力的，就能购得或多购，缺乏购买能力的，就购得很少，有的就不能购得。

这两点都是由于还缺乏一个更有系统的自觉的群众运动所产生的。

这样，就使我们党提出了一个必须进一步地、充分地、全面地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来彻底消灭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土改工作团正是带着党中央提出的这个任务，来到大石塔，从事试点的工作。



红旗

H O N G Q I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在技术革新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天体是不断发展的

一九六五年 10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十期 目录 ★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林彪 (1)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路线 (2)

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 (5)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 (9)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11)

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13)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15)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論的国际意义 (17)

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22)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人民战争的叛徒 (24)

在技术革新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程朝有 (29)

天体是不断发展的 戴文赛 (35)

回忆武装宣传队的一次演出 刘一雁 (43)

☆ 九月三日出版 ☆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

林彪

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终于打败了企图灭亡中国、吞并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世界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一百年来无数次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历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万人，武器和装备都很差，而且长期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但是，他们越战越强，成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军。

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总结了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夺取全国政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六年，当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全国内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思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人民战争，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促进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从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重复着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做的事情。掌握和运用人民战争这个武器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人民的迫切需要。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正在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扑灭人民战争的革命烈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也像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人民战争，诬蔑人民战争。他们互相勾结起来，阻挠和破坏人民战争。在这种情况下，重温中国人民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经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和党的路线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首先在于制订和执行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日本帝国主



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动，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制定抗日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提供了科学的根据。

很久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这就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之间，进行了十年的国内战争。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东北，随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以后，又步步深入，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极度地尖锐化，使国内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就是最好的说明。

怎样认识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一九三一年以后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否认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各阶层的抗日要求，而强调中国所有反革命派别和中间派、所有帝国主义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坚持关门主义的路线，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新形势。

毛泽东同志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如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依然存在，但是，这些矛盾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面前，都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全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等一小撮卖国贼以外，产生了共同的要求，这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由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同英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下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它一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
- 西安事变。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受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就在西安把蒋介石拘禁起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加以调停，使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



这就使中国有可能利用这种矛盾，来孤立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是继续进行国内战争和土地革命呢？还是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反对日本侵略者呢？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新形势的分析，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我们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提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经过我们党和全国爱国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停止了内战，出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一九三七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日战争能不能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

失败主义者跑出来讲：中国打不过日本，非亡国不可。盲目乐观主义者跑出来讲：中国很快就能胜利，无需乎费很大力气。

毛泽东同志对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亡国论”是错误的，“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双方，在战争中有以下这些互相矛盾着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是处在垂死没落的时代，它所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的、退步的和野蛮的；它的人力、物力不足，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方面，它失道寡助。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然而，中国是处在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它所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进步的和正义的；中国拥有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在国际方面，它得到广大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这些要素将在战争的进程中发生作用。日本的长处是暂时的，会由于我们的努力逐渐削弱。日本的短处是基本的，是不能克服的，会在战争中逐渐扩大。中国的短处是暂时的，会逐渐被克服。中国的长处是基本的，会在战争中逐渐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日本的长处和中国的短处，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长处和日本的短处，决定了日本必败，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样的分析，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说，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逐步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使敌人变强为弱，使自己变弱为强，积聚起足以最后打败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抗日战争将会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持久战的过程，也就是动员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的过程。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我们党坚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不仅是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是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奠定基础。只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①

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地解决具体矛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具体地分析了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顺利地解决了怎样认识和对待各种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样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确地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发展了建设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实行人民战争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必须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且要有一系列的既能最充分地发动基本群众、又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了所有抗日的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有着抗日的共同利益，这是团结的基础。但是，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抗日坚定性各有不同，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不同的利害冲突。这就使得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

在制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这样分析我国社会各阶级的：

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坚决要求抗战到底的，他们是抗日的主力，也是要求团结和进步的基本群众。

资产阶级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分。资产阶级里头，人数比较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比较软弱，经常动摇，同工人也有矛盾，但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反帝积极性，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66页。



在抗日戰爭中是我們的同盟軍。買辦資產階級就是官僚資產階級，他們人數很少，但在中国占據着統治地位。他們分別依附于不同的帝國主義，有親日派，有親英美派。親日的買辦資產階級是投降派，是公開的或隱蔽的漢奸。親英美的買辦資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贊成抗日，但是他們抗日是不堅決的，很想同日本妥協，他們本質上是反共、反人民的。

地主有大中小之分。一部分大地主成了漢奸。另一部分大地主贊成抗日，但非常動搖。許多中小地主有抗日的要求，但是他們同農民存在着矛盾。

面對着這樣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我們黨在統一戰綫內部的工作方針是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這就是說，團結一切抗日的階級和階層，那怕是動搖的暫時的同盟者也要爭取，採取適當的政策來調整各抗日階級和階層之間的相互關係，使之適應抗日的總任務。同時，堅持我們黨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放手發動群眾和壯大人民力量上面，同一切不利於抗戰、團結、進步的行為進行必要的鬥爭。

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方針，既不同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方針，也不同於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的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方針。我們黨總結了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教訓，形成了又聯合又鬥爭的方針。

為了聯合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一切抗日黨派和階層一致抗日，我們黨作了一系列的政策上的調整。我們宣布為徹底實現孫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義而鬥爭。我們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陝甘寧特區政府。我們的軍隊，由工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我們的土地政策，由沒收地主的土地，改為減租減息。我們在根據地內，實行了三三制的政權*，吸收那些主張抗日而又不反共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的代表和國民黨員參加。其他關於經濟、稅收、勞動工資、鋤奸、人民權利、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也都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原則，做了必要的和適當的改變。

在進行這些政策上的調整的同時，我們堅持了共產黨、人民軍隊和根據地的獨立性。我們還堅持要求國民黨必須實行全國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開放民主，改善人民生活，武裝民眾，實現全面抗戰。對於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壓制人民抗日運動，以及妥協投降的陰謀活動，我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我們黨糾正了右的錯誤以後，容易產生“左”的錯誤；當我們黨糾正了“左”的錯誤以後，容易產生右的錯誤。當我們同國民黨統治集團決裂的時候，容易產生“左”的錯誤；當我們同國民黨統治集團聯合的時候，容易產生右的錯誤。

* 三三制政權，就是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原則，在政權組織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



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投降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作为“左”倾机会主义代表的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走向另一极端，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的代表。王明用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一系列极右的政策，来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把这个领导权自愿送给国民党。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他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实行民主改革，反对改善工农生活，破坏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他不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根据地，要使人民革命力量变成断了线的风筝。他不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把人民的武装，也就是人民的一切，都交给蒋介石。他不要党的领导，主张国共两党青年结成联盟，以适应蒋介石溶化共产党的企图。他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指望能够封上一官半职。王明的这一套完全是修正主义的。如果按照他的这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办事，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有后来的全国胜利。

王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抗日战争的一段时间内，曾经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害。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已经在党中央确立起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这才使得王明的错误路线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间内危害党的事业。

对于我们纠正王明的错误，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帮了忙。蒋介石用大炮和机关枪多次给我们上课。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驻在皖南的新四军，由于个别领导人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执行王明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的面前遭到惨痛的损失，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血的教训，使得我们的许多同志头脑清醒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了。

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总结了全党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及时地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

第一，一切抗日的人民（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第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第四，在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第五，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第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第七，对于反共顽固派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勉强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

第八，对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要加以分析，加以区别。根据这些区别，来建立我们各项不同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之目的。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各项政策，经过抗日战争的考验，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必须高高举起民族旗帜，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反帝的人们，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如果丢掉民族旗帜，采取关门主义路线，使自己孤立起来，那就谈不到领导权，谈不到发展人民革命事业，那就在客观上帮助敌人，使自己陷于失败。

历史证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领导权。由于参加统一战线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差别，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发展进步势力，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和加强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①这是我们在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的主要经验。

历史证明，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必须包括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第二个联盟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一切城乡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盟，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不是能够掌握领导权，关键在于能不能领导农民起来斗争，把广大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工人阶级只有取得对农民的领导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结成第二个联盟，才有可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人民战争。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一切都是不可靠的。

^①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0页。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整个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人民战争要取得胜利，必须主要地依靠农民。

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这个问题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反对发动农民和武装农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也是没有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不认识在农民中进行长期艰苦的工作和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而幻想迅速夺取大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和最广大的同盟者，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队的来源主要是农民。进行长期战争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主要地也是来自农民。抗日战争必须主要地依靠农民，必须最广泛地发动农民参加。

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我们党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战胜任何强大敌人的最雄厚的力量。

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胜利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共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共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办事，革命力量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



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立了一片又一片的红色根据地。相反的，违背了毛泽东同志这个战略思想，实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那一套，革命力量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城市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在农村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它的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广大农村。农村仍然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当日本军队向中国内地蜂涌前进，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分成许多支队，勇敢地向敌人的后方挺进，在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我们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十九个抗日根据地。除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外，敌后的广大地区都是人民的天下。

在抗日根据地中，我们实行民主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各个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人民群众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同时，实行了削弱封建剥削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合理负担”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照顾和团结了各抗日阶层。我们在制定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时，还考虑到有利于在敌占区开展工作。

对敌人占领的城市和乡村，我们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团结那里的基本群众和一切爱国人士，分化和瓦解敌伪政权，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里应外合地打击敌人。

我们党所建立的根据地，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依托这些根据地，我们党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坚持了长期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种革命根据地是对敌人的巨大威胁，敌人是一定要来进攻的。根据地的发展，不能不是一个扩大、缩小、再扩大的曲折的反复的过程。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抗日根据地曾经发展到拥有一亿人口。可是，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调动它侵华兵力的大部分，疯狂地进攻和残酷地摧毁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国民党也对我们的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以至军事进攻。到一九四二年，抗日根据地缩小到只有五千万以下的人口。我们党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坚决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坚持下来。经过这种曲折，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从一九四三年起，我们的根据地又逐步地恢复和扩大起来，到了一九四五年已经发展到一亿六千万人口。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更是经历了许多次的起伏，经受住了许多次的考验，才由小块的被分割的根据地逐步发展为大块的联成一片的根据地，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也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演习的过程。在根据地里，我们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为一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事业。我们的根据地，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雏型。随着根据地建设事业的逐步发展，我们党锻炼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培养了从事各方面工作的干部，积累了各方面工作的经验，积蓄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这就为全国胜利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抗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出发点。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仍然沿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①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党领导的其他一切组织和斗争，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同志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武装斗争。但是，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是沒有认识清楚的。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国民党背叛革命，杀死了大批共产党人，摧残了所有革命群众组织之后，我们党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组织革命武装和研究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创建了工农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创建的工农红军曾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达到了三十万人。但是，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实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损失了十分之九。

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有四万多人。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削弱和消灭这支人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坚持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大大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74页。



毛泽东同志还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不爭个人的兵权，但要爭党的兵权，要爭人民的兵权。

在党的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从战争一开始，就迅速奔赴抗日最前线。我们把人民武装的火种撒到广大的敌后地区，到处燃起了游击战争的烽火。我们的人民军队，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成了百万大军，并且还有二百多万民兵。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我们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粉碎他们挑起的无数次“磨擦”。

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能够在抗日战争中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取得伟大的胜利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八路军、新四军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这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的人民军队。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我们的军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它无比忠诚地执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它有高度自觉的纪律，有压倒一切敌人、不怕任何困难的英雄气概。在军队内部，干部和战士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各工作部门之间、各兄弟部队之间，完全团结一致。在军队外部，军队和人民之间、军队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完全团结一致。

我们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打仗、做群众工作和进行生产的三大任务，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也是生产队。他们到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到处给群众办好事。我军还利用一切可能，自己动手进行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减轻人民负担。我军就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被广大人民群众亲热地称作“我们的子弟兵”。

我们的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我们的军队还有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但争取了大批的伪军投诚起义，而且还把不少深受法西斯思想毒害的日军俘虏教育过来。他们在提高觉悟以后，组织了日本人解放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组织，配合我们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工作中，当时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同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军队的建设要突出政治，要首先和着重地



从政治上建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人民军队固然也要重视不断改进武器装备和提高军事技术，但是，人民军队打仗不是单纯地凭武器、技术，而更重要的是凭政治，凭指战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勇敢精神，凭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由于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这支军队就能够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提得高高的，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士气鼓得足足的，把团结搞得好好的，把对敌人的仇恨搞得深深的，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打起仗来不怕苦，不怕死，要冲就冲得上，要守就守得住。一个人顶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用，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所有这些，就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区别于一切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少数人所驱使和利用的旧军队。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

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个伟大预言。我们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创造了一套能够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各方面情况的分析，确定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②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这是因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革命的武装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应当同敌人硬拼，否则必将使自己遭受严重的损失，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只有实行游击战争，才能充分动员和高度发挥全民的力量，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才能在战争中壮大发展自己，消耗和削弱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最后完全战胜敌人。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是游击战的基本战术。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敌后根据地的军民，不分男女老幼，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创造了麻雀战*、地雷战、地道

①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62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1页。

* 麻雀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和民兵创造的一种群众性战法。叫做麻雀战这个名字，一是形容其广泛性，像麻雀满天飞，到处皆是；一是形容其灵活性，用三五成群、出没无常的行动，杀伤、消耗和疲惫敌人。



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

到了抗日战争末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的战略方针从以游击战为主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特别是后期，我们的作战已经发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并且还包括对大城市的攻坚战了。

歼灭战，是我们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不论以运动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都应当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在游击战争中，固然要执行许多破坏和袭扰等任务，但是仍然需要积极提倡并且努力实行在一切有利条件下的歼灭性作战。在运动战中，要求每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同志说：“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只有歼灭战，才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使敌人被歼一旅少一旅，被歼一团少一团，使敌军士气沮丧，内部瓦解。实行歼灭战，我军每战有所俘获，士气越打越高，部队越打越大，武器越打越好，战斗力越打越强。

毛泽东同志在他提出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②同时还指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战斗中要发扬我军特长和优良的战斗作风。这些都是打歼灭战的主要原则。

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逼着敌人分散兵力，逼着敌人背起包袱，逼着敌人犯错误，也就是让敌人兴高采烈，让敌人的十个指头都伸开，让敌人的两只脚都陷在泥坑里。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后保住或夺取城市和地方。那种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罐罐罐，而分兵把口、处处抵御的办法，既不能消灭敌人，也不能守住城市和地方，这种办法是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我們坚决反对的。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四句话加以高度的概括，叫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这就是说，你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让你吃掉我。打得赢不打是机会主义，打不赢硬打是冒险主义。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着最后彻底消灭敌人。这种战略战术，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行。而实行这样的战略战术，就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越性。不管敌人在技术装备上有什么优势，不管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们，它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主动权就始终在我们手里。

由于实行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我们终于从小到大，从弱变强，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赢得了伟大人民革命的胜利。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战斗的结果。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方面，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的苏联军队最后参战起了重要的作用。朝鲜人民、越南人民、蒙古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缅甸人民、印度人民、巴基斯坦人民、马来亚人民、菲律宾人民、泰国人民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人民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人民也作出了贡献。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革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对打败日本法西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相互鼓舞，赢得了共同的胜利。而每个国家的解放，首先还是靠本国人民的努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随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得到了各国人民的支持，但



主要是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有些人竟然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說成完全是由于外国的援助。这种荒謬的說法，同日本軍国主义者的腔調一模一样。

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一个国家的革命，一个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

在抗日战争中，我們党主张，中国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尽可能争取外援。我們坚决反对国民党統治集团一切依賴外援的方針。照国民党蔣介石看来，中国什么都不行，工业不行，农业不行，武器装备也不行，要打败日本，就非依靠外国、特别是非依靠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我們的方針和国民党完全相反。我們党认为，美英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但决不能依靠它們。事实上，美英帝国主义曾經一再进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活动，企图牺牲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还向日本侵略者提供战争物資。美帝国主义在抗战期間給中国的援助，也包含阴險用心，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毛泽东同志說，“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①“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軍民的創造力。”^②

对于我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說来，自力更生格外重要。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还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一点餉，后来一分钱也不給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殘酷扫蕩，国民党的軍事包围和經濟封鎖，自然灾害的侵襲，使解放区遭到严重的困难。特别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几乎沒有衣穿，沒有飯吃。

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說，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們这些人类子孙連这点聪明都沒有呢？为什么我們不能自己动手呢？

解放区的軍民，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規模的生产运动。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国民党反动派以为不給我們发餉，实行經濟封鎖，就可以困死我們，其实倒是帮了我們的忙，促使我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我們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厉行精兵簡政，節約人力物力，这就不仅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胜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減輕了人民的負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解决武器装备方面，我們自己也制造一些武器，但是主要依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来装备

① 《和中央社、扫蕩报、新民报三記者的談話》。《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8頁。

② 《必須学会做經濟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5頁。



自己。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一个个都当过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帝国主义的兵工厂，总是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提供武器的。

不论在八年多的抗日战争中，还是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直是在没有外来物质援助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并且取得了伟大胜利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根本方针是要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

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总是相互支援的。已经胜利了的国家，有义务支持和援助还没有胜利的人民。但是，无论如何，外援只能起辅助的作用。

要革命，要进行人民战争，并且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准备在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都被切断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如果自己不努力，不独立自主地思考和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不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一味依赖外国援助，即使是依赖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即使胜利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論的国际意义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人民革命的共同道路。中国革命同十月革命在以下的基本点是共同的：第一，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第二，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第三，都是经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四，都在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五，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特点。十月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的俄国，中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是经过城市武装起义，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的；中国革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且根据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加以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論，经过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的检验，证明是符合人民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是无往而不胜的。它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是对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



迫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历时二十二年之久，这是当今世界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时间最长、斗争最复杂、经验最丰富的人民战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归根到底，就是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的学说，用人民战争反对反人民战争的学说。马克思说得好：“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产婆。”^①

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中国人民战争的经验，用最通俗最鲜明的语言，概括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②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③

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产物。列宁说过，“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④只要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存在着剥削制度，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依靠武装力量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要把战争强加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身上。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今天的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毫无例外地都在加强它们的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美帝国主义更是到处进行武装侵略，到处进行武装镇压。

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战争和武装镇压面前，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怎么办？是屈膝投降，永做奴隶呢？还是奋起反抗，争取解放呢？

毛泽东同志生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⑤以共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归根到底，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侵略和武装镇压面前，敢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敢不敢进行人民战争，这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测定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真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灵验的试金石。

针对着有些人存在着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怯懦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版，第828页。

②③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529页。

④ 《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1页。

⑤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6—1127页。



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

中国人民战争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战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人民革命力量从弱到强，从小到大，是阶级斗争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民战争发展的普遍规律。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尽管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许多困难、曲折和失败，但是，人民战争一定胜利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这是对一个革命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没有藐视敌人、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那就根本谈不上革命，谈不上进行人民战争，更谈不上胜利。

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对于革命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每个国家的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研究具体情况，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人民战争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那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因为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似乎弱小的新生力量总是能够战胜貌似强大的腐朽力量呢？因为真理在他们一边，人民群众在他们一边。而反动阶级总是脱离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对立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一切革命的历史，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者极端害怕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修正主义者极端仇恨这个理论。他们都反对和攻击这个理论。一些庸人们也跟着嘲笑这个理论。但是，这些都丝毫不能贬低这个理论的价值。真理的光辉是任何人无法掩盖的。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不但解决了敢于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如何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善于按照战争规律指导战争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政策，战略和战术，引导中国人民，在极端复杂、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绕过前进航程上的一切暗礁，把人民战争的大船驶达胜利的彼岸。

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

^①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3页。



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人民，正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严重侵略和奴役。不少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同旧中国有许多共同点。那里的农民问题，同中国一样具有极端重要性。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在侵略这些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侵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广大农村却是它所无法完全控制的。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后胜利进军的革命基地。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将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十月革命开辟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革命解决了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政党充当领导者。

这就是说，参加这个革命的，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反帝爱国民主人士。

这就是说，这个革命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阶段论，又是马克思



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論。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区别开来，同时又正确地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民族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这两个革命阶段之間，絕不是横亘着一条万里长城。但是，只有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后，才談得上社会主义革命。民族民主革命完成得越彻底，就越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創造前提。

中国革命的經驗表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經過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完成。在这个革命阶段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最主要的敌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必須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反帝爱国力量，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人士。所有参加反帝斗争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中的爱国人士，都在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为帝国主义所不容，而为无产阶级所欢迎。

把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混淆起来，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所謂“毕其功于一役”的錯誤观点，指出这种空想只能削弱当时最迫切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他們雇佣的托洛茨基派，更是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宣揚所謂“一次革命論”，要实行所謂沒有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他們企图用这种謬論来吞掉共产党，根本消灭任何革命，阻撓民族民主革命的前进，并且以此作为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投降帝国主义的口实。这种反动論調，早就被中国革命的历史埋葬了。

現在，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大肆宣揚所謂沒有无产阶级、沒有以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革命政党就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論調，他們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散布这种論調的目的，无非是要轉移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破坏民族民主革命，为帝国主义效劳。

中国革命，提供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成功經驗，提供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及时地把民族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經驗。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針。毛泽东思想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庫中增添了新的武器。

我們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論，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产物，而且帶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經驗不断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国际意义。



用人民战争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企图把全世界都置于它的奴役和控制之下，建立一个美利坚大帝国。它积极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作为它发动世界战争的主要帮手。它恶狼一般地欺负和奴役各国人民，掠夺各国人民的财富，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狂妄的侵略者，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最凶恶的敌人。全世界一切要革命、要独立、要和平的人民和国家，都不能不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美帝国主义。

正像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样，现在，美帝国主义企图独霸世界的政策，同样使得全世界人民有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集中反对美帝国主义。

现在，以全世界人民为一方，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另一方，所进行的激烈搏斗的主要战场，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地区，既是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深重的地区，也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战后在这些地区出现的越来越高涨的革命风暴，成为当前直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革命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发展，推动着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人民战争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古巴人民、印度尼西亚人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都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战争，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人民战争，虽然领导的阶级各不相同，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各不相同，取得胜利的程度各不相同，但是，这些人民战争的胜利，大大削弱和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

今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革命人民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战争的条件，比起过去更加有利得多了。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战后的革命高涨年代，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各国人民相互支援的力量已经大大增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大大衰弱，处在越来越加剧的震荡和瓦解过程中。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已经无法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但还能在它们统治的世界里把一些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实现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不仅无法阻止一



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在它们统治的世界里再也无法阻挡人民革命运动的汹涌潮流了。

美帝国主义比历史上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更加强大，但是也更加脆弱。它同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处于敌对的地位。美帝国主义的人力、军力、物力和财力，同它独霸全球的野心比较起来，都是远远不足的。它在世界上霸占的地方那么多，手伸得那么长，十个指头摊得那么开，力量分得那么散，后方离得那么远，运输线拉得那么长，这就更加削弱了它自己。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①

美帝国主义在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只能用它的一部分力量，远离本土去打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士气低落，困难重重。被侵略的人民，不是到华盛顿和纽约去同美帝国主义较量，也不是到檀香山和佛罗里达去同美帝国主义较量，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独立、自由而战。他们一经广泛动员起来，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样，优势就不在美国方面，而是在被侵略的人民方面。看起来弱小的被侵略的人民，实际上比美帝国主义强大得多。

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相互支持的。这些斗争，汇成了一股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洪流。一个地方的人民战争越是胜利地发展，就越是牵制和消耗美帝国主义更多的力量。美国侵略者在一个地方吃紧，对其他地方就不能不放松。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就有更加有利的条件来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美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也是可以分割的，是可以分割开来打败它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人民，你打它的头，我打它的脚，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它。美帝国主义所以最害怕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所以把人民战争看作是对它的致命威胁，道理就在这里。

美帝国主义借以吓人的，无非是它的核武器。但是，核武器救不了它的命。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东西。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滔天罪行，一直受着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它要是再使用核武器，就将使得它自己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而且，核武器的垄断地位早已被打破。它有，别人也有。它要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它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这样，它就不仅要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必然遭到它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美帝国主义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

^① 《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1964年11月28日）。载196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



不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怎么发展，不管现代战争的打法怎么复杂，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是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决定于战场上的近距离搏斗，决定于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在这里，美帝国主义的弱点就极大地暴露出来，而革命人民的优势就极大地发挥出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军队是不可能具有革命人民那样的勇敢和牺牲精神的。革命人民的精神的原子弹，要比物质的原子弹强大得多，有用得多。

被侵略的人民用人民战争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当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越南。美国把越南南方作为镇压人民战争的试验场。美国进行这场试验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谁都可以看到，美国侵略者找不到任何办法来对付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却在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美国侵略者在越南人民战争中正面临着灭顶之灾。它十分担心，它在越南的失败要引起连锁反应。它正在扩大战争，企图挽救败局。但是，战争越是扩大，它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也就越大；战争越是升级，它摔得也就越重，失败得也就越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将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做到的事情，他们也是能够做到的。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将学会用人民战争来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将从没有武器到拿起武器，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不善于进行人民战争到善于进行人民战争。美帝国主义这只到处乱闯的野牛，终将在它自己点燃起来的人民战争的烈火中被烧成灰烬。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是人民战争的叛徒

正当美帝国主义最害怕、最无法对付人民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出来给美帝国主义帮忙。他们密切配合美帝国主义，拼命散布各种反对人民战争的论调，到处明里暗里进行破坏人民战争的阴谋勾当。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害怕美帝国主义，害怕战争，害怕革命。他们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他们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担心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或者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就会触怒美帝国主义，就会连累到他们自己，就会妨碍他们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

从列宁领导伟大的十月革命到现在，无数的革命战争经验，都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开始是赤手空拳的革命人民，最后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统治阶级。武器差的战胜了武器好的。



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步枪、手榴弹的人民军队，最后战胜了拥有现代化的飞机、坦克、大炮、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军队。游击队最后战胜了正规军。没有进过军事学校的“土包子”，最后战胜了军官学校毕业的“洋包子”。如此等等。事情偏偏不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发展，偏偏要打修正主义者的耳光。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管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都不能战胜拥有核武器的敌人。这就等于说，谁没有核武器，谁就活该倒霉，活该被欺侮，活该被消灭，要么在敌人的核武器面前投降，要么依靠别的核大国的“保护”而随人俯仰。这岂不是典型的弱肉强食主义吗？岂不是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核讹诈吗？岂不是公开地不许别人革命吗？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核武器、火箭军决定一切，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不过是一堆肉。他们用这样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动员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准备用人民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把国家命运完全押在核武器这个赌注上，来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核赌博，进行政治买卖。他们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唯核武器论。他们的建军路线是只见物、不见人，只要技术、不要政治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地球上任何星星之火都会引起世界核大战，会毁灭人类。按照他们这种论调，我们的地球早就不知道该毁灭多少次了。但是，战后二十年来，民族解放战争接连不断，究竟有那一次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呢？难道不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战争，打乱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吗？相反地，那些千方百计地要扑灭人民战争“星星之火”的人，倒是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气焰。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硬说，只要实行他们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路线，被压迫者就可以获得解放，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无情的现实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在狂热地加强战争机器，天天在血腥镇压革命人民，天天在武装侵犯和威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一套已经在一些国家弄得大批人头落地，这样血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够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不是别的，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下武器，要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放下武器，而在全副武装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面前听任宰割。

帝国主义、反动派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接受了帝国主义这种哲学，他们对站在保卫世界和平最前列的中国人民说：“你们好战！”先生们，你们的这种辱骂，正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这种“好战”，正是有利于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人民的这种“好战”，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逼出来的，也是它们教会的。我们不过是以革命的“好战”，对付反革命的好战罢了。难道只许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到处杀人，



不許人民还手自卫和相互支援嗎？世界上那里有这样的道理呢？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把肯尼迪和約翰遜这些帝国主义者叫做“明智派”，把我們和一切敢于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实行武装自卫的人叫做“好战派”，这彻底暴露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帮凶。

我們懂得，战争会給人民带来破坏、牺牲和痛苦。但是，如果不抵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甘心作亡国奴，那么，遭受的破坏、牺牲和痛苦将会更加大得多。在革命战争中，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安全；一时的痛苦，可以换来长期的以至永久的和平与幸福。战争可以锻炼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是伟大的学校。

列宁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说过：“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①“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②按照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说法，列宁岂不是最大的“好战分子”嗎？

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从来不用伤感的观点来看待战争。对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我们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誰进攻我們，我們就消灭誰。对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我們不仅不反对，而且从来都坚决支持，积极援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在将来，随着我們力量的发展，这种支持和援助还要越来越加强。誰要是以为我們也会因为革命的胜利，建設的发展，家业的壮大，生活的改善，而丧失革命斗志，放弃世界革命事业，丢掉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那是白日做梦！当然，任何革命都是出于本国人民的要求。只有本国人民觉醒了，动员起来了，組織起来了，武装起来了，才能通过战斗，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統治，而不能由任何外国人来代替和包办。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輸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們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們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反对人民战争的宣传，失败主义的宣传，投降主义的宣传，在全世界革命人民中，起着败坏士气的作用，起着从精神上解除武装的作用。他們干了美帝国主义自己所干不了的事情，帮了美帝国主义的大忙。他們大大鼓励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冒险。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完全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革命学說，成了人民战争的

① 《为了面包与和平》。《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5頁。

② 《当前的主要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8頁。



叛徒。

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了胜利地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现在，在世界革命人民中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市場是越来越小了。那里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侵略和武装镇压，那里就有反抗侵略和反抗压迫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必将蓬勃发展，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既不以美帝国主义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世界革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是能够横扫一切的。赫鲁晓夫已经完蛋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继承者也不会有好下场。反对人民战争的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通通要被革命人民的铁扫帚从历史舞台上扫除干净。

* * *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二十年里，中国大变了，世界大变了，变得更加有利于世界革命人民，而更加不利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民只有一支很小的人民军队和很小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而面对着的是一个东方的军事霸王。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战争是可以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今天，世界人民的革命根据地空前壮大，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帝国主义空前衰弱，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帝国主义接连遭到了失败。我们更加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各国的人民战争是能够胜利的，美帝国主义是能够打倒的。

世界人民有了十月革命的經驗，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經驗，有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經驗，有了朝鲜人民抗美战争的經驗，有了越南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战争的經驗，还有了其他许多国家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經驗。只要善于研究这些經驗，并且创造性地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那么，各国革命人民必将在各自国家的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更加威武壮丽的史剧，最后把各国人民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通通埋葬掉。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当前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焦点。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扩大战争冒险，中国人民都要尽自己的力量支持越南人民，直到把美国侵略者一个不剩地赶出越南去。

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叫嚷着要同中国人民再来一次较量，在亚洲大陆上再打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如果他们一定要走日本法西斯的老路，那么，好吧，随他们的便吧。中国人民自有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办法。我们的办法并不是什么秘密，最重要的还是那么一条，就是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实行全民皆兵，进行人民战争。



我們可以再一次奉告美帝国主义者，几亿拿起武器的中国人民所形成的汪洋大海，是足够容得下你們的几百万侵略軍队的。要是你們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們头上，那就給了我們行动的自由。到那个时候，战争怎么个打法，就由不得你們了。怎样有利于歼灭敌人，我們就怎样打。那里好歼灭敌人，我們就在那里打。既然中国人民在二十年前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今天，中国人民更加有把握把美国侵略者置于死地。你們炫耀海空优势，吓不倒中国人民。你們揮舞原子彈，也吓不倒中国人民。你們要派軍队来，那就来吧，越多越好。你們来多少，我們就給你們报銷多少，还可以給你們开个收条。中国人民是有伟大气魄的人民。我們敢于肩負起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重担，在最后战胜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必須严正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已經归还中国。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是毫无道理的。台湾省是中国領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必須从台湾滚出去。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紀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們还必须严正指出，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日本軍国主义者，如果不顾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定要重溫旧梦，走上侵略亚洲的老路，那就必将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

美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一場世界战争。但是，这能救得了美帝国主义的命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出了許多民族独立国家。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言，其結果必定又有多少亿人口轉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也有可能全部崩潰了。

我們对世界前途是乐观的。我們坚信，人类生活中的战争时代将由人民之手加以結束。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战争这个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終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①

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掠夺的人民，团結起来，高举人民战争的正义旗帜，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胜利一定属于全世界人民！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7頁。



在技术革新中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

程 朝 有

我是哈尔滨机联机械厂的钳工，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几年来，边学边用，和同志们一起革新技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回过头来看看这几年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感到，搞技术革新必须首先实行人的思想革命，要带着技术革新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技术革新的过程中，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也要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下面就谈谈我是怎样在搞技术革新中学着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小 和 大

以前，我总看不起“小革新”，一心想搞大的，不愿意搞小的。心里想，干大的“过瘾”，搞几十项小的，也不如搞一项大的。这样，有一个时期搞大的不成，搞小的不积极，没搞出什么成绩。后来学习了《矛盾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才懂得小和大都不是绝对的，小能变大，大能变小。如

果孤立地静止地看大和小，认为小就是绝对的小，大就是绝对的大，这就是形而上学观点。

我们厂革新冲孔机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公私合营以前，冲孔是用手搬压力，公私合营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小革新，把手搬压力改成机动压力。一九五九年，又把冲孔机改成了多头冲，由冲一个孔变为冲多个孔，由冲圆孔变为冲各种形状的孔。一九六〇年，又根据多头冲的原理和前几次小革新的经验，搞成了三十头冲孔机，大大地提高了工效。可见，一件小革新，有时也能起到大作用。小和大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小能转化为大，大也能转化为小。积很多个小革新，就可能产生出大成就，制造出大机器。现在看来是大的，将来搞出更大的、更复杂的，现在的大，就会转化为小了。所以，不论是大革新还是小革新，我们都应当脚踏实地认真去搞。

一九六一年末，我和十一名工人接受攻



克一种大型设备冲孔关的任务。当时，这种设备的绝大部分部件都已投入生产，只有冲孔的问题没有解决。这道关过不去，这个产品就出不来。如果用我们厂仅有的两台摇臂钻床钻孔，得干好几年才能完成。看来，不在技术上闹革命，这道关是过不去的。工厂领导和技术人员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自己设计和制造一台大型多头专用冲孔机。

这种多头专用冲孔机，像我这样的人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们这里的工程师也拿不出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大家赤手空拳，面对这个“大家伙”，有点怕起来，不敢干了。有的说：“让我们搞些小革新、小改进还行，搞这种‘大家伙’，这不是硬叫人作难吗？”也有的说：“我们干活出几身汗没问题，要设计出这么个大设备，可干不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也没底了。后来冷静下来，仔细地想了想，大设备无非是由很多个小部件构成的。一台大设备，要是把它分割成很多小的部分，它就不那么大了。一台大设备，要想一口“吃掉”，那是办不到的，但要是把它分开，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去研究试验，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吃掉”，就是再大也能搞成。

按照这个道理，我同大家具体地分析研究了这台大设备。它的作用是要在一个工件上冲出很多个孔来。它的构造不外是由三部分组成，而每一部分又是由许多小部件组

成。比如传动部分，不外是由齿轮、凸轮、丝杠等构成，这些部件都是我们搞一般革新时常用的东西。这么一分析，大家心里有了底，信心也足了，对这个“大家伙”由怕转为不怕，决心把它制造出来。于是，我们十二个人按照设备的三个组成部分，划分成三个小组，分头搞设计。为了便于研究，我们把行李搬到车间办公室，边研究，边试验，边设计。在试验中，我们运用了过去搞小革新的经验，比如从冲床中吸取了凸轮传动的经验，从积木式机床上吸取了可拆可拼的特点，从搞小冲孔机上吸取了制造冲头的经验等等。这样奋战了三个多月，经过七十多次的试验，终于设计和制造出了一台龙门式多头半自动化冲孔机。这台冲孔机投入生产，大大地提高了工效，使原来需要好几年才能干完的活，现在用几十天就完成了。

制成了这台设备后，有人说：“你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这么好、这么复杂的设备，可真不简单。”其实，说它好，只是和过去我们制造的设备比较来说的。从一九六三年以后，这台设备又有了许多改进，比原来更先进了。

通过这项革新的发展过程，使我们进一步明白了：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死眼光看小和大，对大革新不要怕，要有信心和勇气去认真地对待它；而对小革新也不能小看它，要用对待大革新的态度去对待它，这样，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没有搞不成的道理。



不懂和懂

一九六三年十月份，我們承担了一项电镀的任务。这项任务，产品质量要求高，但我們厂沒有合适的設備。为了攻下这一关，領導上让我和几个人去搞試驗。我們这几个人中，有的是鉗工，有的是鑄工，有的是工人出身的技术員，对电镀全是外行，根本不懂这門技术。但我們想，只要认真向有关的兄弟厂学习，是可以变不懂为懂的。于是，我就和大家一起，白天到兄弟厂电镀車間跟班劳动，老老实实地向他們学习；晚上回来刻苦钻研书上的知識。同时，为了真正把技术学到手，取得实践經驗，我們又在工厂搞試驗。試驗不成功，就带着問題去学习，回来再試驗。在三个月中，我們到兄弟厂学习达五十多次，有时一天要去三次。由于我們老老实实地学，他們热情地帮，基本上懂得了电镀技术的道理。这时，由原来的不懂，轉为懂了一些。

接着，我們就按工件的技术要求，进行試驗。但是，由于我們的工件形状和材质不同，质量要求又高，我們把从兄弟厂学来的經驗，和从书本上学来的十几种配方工艺都用完了，还是沒門，达不到技术要求。这样一来，原来是懂了一些，在新的情况下，对新的事物又不懂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泄气了，认为我們虛心向人家学了，把人家的技术也学来

了，人家的方法我們都用絕了，实在沒招了。我想，难道真的就沒招了嗎？我們学到的技术已經到頂了嗎？不对！任何技术都不会到頂的，只是我們沒有認識它，还不懂得它的規律性罢了。我和大家一起討論，有的同志說：“我們为什么悶在屋里？为什么不推開門走出去，闖它一条新路？”这話进一步启发了大家：我們不懂的东西，虛心向人家学是对的，但不能死学，老是踩着人家的脚印子走路，而要敢于創造，敢于走新路。兄弟厂是我們的老师，老师懂得的我們要懂，老师不懂得の我們也应该去探索。

于是，我們在总結了过去五十多次試驗失败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試驗研究。在試驗中，我們打破了原来的框框，跳出了旧圈子，配制了各种不同成分的新溶液，进行反复試驗。有人看到我們这么干，說我們是在“瞎胡鬧”。其实，我們一点也不“胡鬧”，而是在严肃认真地、有計劃地进行試驗。我們每搞一次試驗，都經過了集体討論，定出具体試驗計劃；每一次溶液配方、操作方法、怎么下活、多少時間工件晃动一次，甚至连最微小的細节，都作了詳細記錄；每試驗完一次，就分析研究一次，总結一次經驗教訓。就这样，不停地試驗、研究、探索，前后經過三个月零五天的時間，七十三次的試驗，終于取得了成功，搞出了一套新工艺。鍍出来的工件，质量达到了技术标准。

取得这一成功，使我認識到：一門新技



术摆在面前，我们对它不懂，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我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經驗教训，就能由不懂轉化为懂。我們取得这项电镀的成功，由不大会使用溶液，到基本上掌握使用溶液的规律，就是通过实践，由不懂轉化为懂的过程，就是認識不断深化的过程。

难 和 易

在技术革新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些看来是很难解决的技术問題，往往容易攻破；而被人們认为容易解决的問題，却变成了难题。

去年八月份，领导上交給我們三个高精度試件，都要在比較复杂的內壁上电镀，镀层有很高的质量要求，而且还要內壁抛光。

接到这项任务后，經過集体研究，大家认为三个試件中有一个是最难搞的，必須高度重视，集中力量去对付它，絲毫不能馬虎。我們在这个試件上下了很大功夫，先做了两个模型件作試驗，镀上不行再磨去，磨去再镀，再不行再磨再镀，一絲不苟。这样，很快就过了电镀关。接着，就进行抛光。这又是一个难关，磨重了吧，工件上的镀层就磨透了；磨輕了，又达不到光洁度的要求。后来适当地加厚了镀层，留出了磨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新問題又出現了。抛光出来的工件，表面看光洁度很好，像鏡面一样，可

是，用光学仪器一检查，还是不行，因为按习惯的磨法是順着內圓橫磨的，里面有一些用肉眼看不見的細紋。怎么办呢？我想，如果我們能在里面再直磨一下，这些細紋就可能去掉。当时，有些人說我的想法不现实，认为这个試件一头大一头小，沒法直磨。我想，难道真的不能直磨嗎？这个心思在我脑子里总也放不下，上班想，下班想，吃着飯也想。我看到一个饅头是个半圓，两个饅头对起来就成了一个整圓，受到启发，反复琢磨，要是搞两个像饅头式的東西对起来放在里面滚动，不就是直磨嗎？我馬上画出了草图，在同志們的帮助下，制成了直磨工具，用这种工具橫直交叉着磨，终于达到了光洁度的要求。

这时，我們松了一口气，心想：最难的試件已經过关，剩下那两个試件是容易干的了，沒啥了不起的。于是，我們就直接用正式件作試驗，結果几次試驗都达不到质量要求，返了多次工，差点沒报废。这个看来是容易干的事，却变成了难关。后来，又經過十余次試驗，才算过了关。

这样，我懂得了对“难”和“易”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难”，当然不好解决，然而正由于难度大，它能引人重視，大家筹謀划策，一絲不苟地对待它，倒可能容易解决，轉“难”为“易”；“易”，不被人看在眼里，思想上不重視，馬馬虎虎地对待它，反倒不容易解决，轉“易”为“难”。



失敗和成功

今年一月份，國家安排給我廠一種新產品試制任務。這種產品有一道工序是要在工件的內腔里面灌上漆，質量要求高。這道工序，就成了完成這項任務的關鍵。當時，聽說外地有個工廠搞過這項試驗，領導上就派我同四名工人去學習，要我們一定把經驗學回來。我們感到任務很重。但又想，不管任務多么重，事情多么難，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就會無往而不利。在臨走前，我們都帶上《毛澤東選集》，以便隨時向毛主席請教。

我們抱着很大希望到了這個工廠。當我們說明來意時，這個工廠的同志說：“這項試驗我們搞了一年多，技術上沒過關，沒啥經驗可學的。”聽了這個話，我們都泄氣了。有的同志說：“完了，白來了。”我們失望地離開了這個工廠。

坐在回旅館的汽車上，我反來復去地想，怎麼辦呢？就這樣回去行嗎？又一想，還是向毛主席著作請教吧。回到旅館，我就帶着這個問題翻開《實踐論》。毛主席說：“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①讀了這段話，心裡像打開了兩扇窗戶，一下子亮堂了。我想：他們的試驗所以失敗，是因為思想還不大合乎外界的規律性。要是能從他們一

年多來的試驗過程中找出失敗的原因，吸取教訓，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外界的規律性，不是就可以使失敗轉化為勝利嗎？這麼看，失敗的教訓和成功的經驗就一樣重要了。這麼想，就不是“沒啥可學”，而是大有可學了。

想到這裡，我就同大家說：“今天咱們別出去溜躑了，都來好好學學《實踐論》。”我們學到前面提到的那段話，就七嘴八舌地聯系自己搞革新的事實，議論起來，都說：搞技術革新一定要經得起失敗，我們過去搞技術革新，都是在總結了失敗的教訓後，糾正了不正確的認識，才搞成功的。他們失敗的經驗，我們也一定要學，而且要从他們第一次失敗的第一手材料學起。為了全面、具體地了解他們的經驗教訓，我們決定把五個人分成三伙：一伙負責了解他們的試驗工藝；一伙去學工件旋轉；一伙去學調料。

第二天，我們早早地就到了工廠。他們看到我們又來了，有些奇怪，以為我們有別的事。一聽我們還是來學灌漆經驗的，就很客氣地說：“我們實在沒啥經驗可學，試驗的產品都廢了。”我說：“你們失敗的經驗和成功的經驗一樣重要，我們一定要向你們學習，還請你們大力幫助。”他們看我們態度誠懇，學習的決心很大，就不再推辭，馬上找來技術人員，向我們詳細介紹了試驗的過程，又到現場找工人實際比划給我們看。對他們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3頁。



介紹的經驗，我們都作了詳細記錄，還抄了試驗的原始記錄。我們聽說，有一個研究所的技術人員，曾經幫助他們搞過這項試驗。聽到這個消息，我們覺得不能馬虎過去，一定得去登門請教，不然就不能了解事物的全貌。於是，我們又到這個研究所去作了詳細了解。

這樣，一連學了五天，我們基本上掌握了試驗過程中的情況。這時，好像是可以回去了，但我又想：我們回去怎麼試驗呢？到底應該從他們的失敗中吸取哪些教訓呢？現在還不知道。這樣就不能轉失敗為成功。我們應當在這裡把他們失敗的經驗教訓總結一下，和他們一起研究，听听他們的意見。經過反復研究後，我們發覺他們試驗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灌漆前工件處理得不乾淨。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提出了改進方案，準備把他們灌漆前用灌溶液處理工件的工藝方法，改成用水泵加壓打進去的方法，這樣就可以把工件刷洗乾淨，使灌漆均勻、牢固。我們拿了這個方案，又一次到工廠和研究所，請他們提意見。他們听了以後，有幾處幫助我們作了修改，並說這個方案有道理，對他們有啟發，也準備照這個方法再試試。

我們愉快地回到了哈爾濱。回廠後，在全廠職工的幫助下，很快就開始了試驗。當我們搞出了第二個小試件時，使用單位派技術人員來了解情況，我們把試件拿給他們

看，經過鑑定，認為達到了技術要求，可以投入生產了。這件產品灌漆是成功了。但是我想：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件產品難道就十全十美了嗎？大家進一步研究，又找出上面還有流痕，個別地方還有堆漆等毛病。使用單位說：“這些缺點不影響使用，如果能解決更好。”既然解決了更好，那就應該好上求好。針對這個問題，又做了改進，解決了流痕和堆漆問題。

這時，我們接到了兩封信。一封是我們去學習的那個工廠寄來的，說他們也試驗成功了。另一封是第一機械工業部對我廠試制成功這種新產品的鼓勵信。領導上把這兩封信念給我們听，我和同志們激動得差點流下熱淚。這項試驗的成功，應當感謝那個兄弟廠對我們的热情幫助。他們跑完了一段很長的路程，我們只不過是跑了很短的一段接力賽。而且，這項試驗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比如效率低、機械化程度低，我們正在繼續從成功中找缺點，為即將大批投入生產作好準備。

在這幾年的技術革新的過程中，如果說我作了一點工作，取得了一點成績，主要應當歸功於黨，歸功於毛主席的教導，歸功於集体的努力。今後我要繼續虛心向群眾學習，好好讀毛主席的書，听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不斷改造思想，不斷克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樹立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在技術革新上貢獻自己的力量。



天体是不断发展的

· 戴文赛 ·

毛泽东同志说过：“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事实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自然界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天文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天体和天体组成的各种体系是在不断发展的。

古时候，人们夜晚里仰首观看美丽的星空，有时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天地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由于当时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还

很低，对许多自然现象还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对于像天地起源这样的问题，只能凭主观猜测或幻想给予某种回答，有些看法演变为流传很广的神话。

在我国古代，在民间出现过流传最广、时间最长的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三国时代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里有下面这段话：“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淮南子》和其他一些古书里，曾经提到古人对天地形成的一种猜测：最初存在的“元气”逐渐分化，阳、清、轻者上升形成天，阴、浊、重者下凝形成地。

在西方流传最广的神话，是上帝于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星。这个神话被包括在基督教的教条里。公元一六五八年，英国的一个教授甚至荒谬地“考据”出：上帝于公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天上午完成了创造天地的工作。

上述的一些看法，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东方和西方都未提出和它们基本上不同



的天地形成学說，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天和地的关系、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问题，还未搞清楚。

最初，人们根据直接的感觉认为，天像一个大盘覆盖在平平的大地上。我国古时候的“盖天說”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住在地中海东岸的古代人们，看到了汪洋大海，便认为，大地边区都是海洋，天穹覆盖大地上，太阳每天清早从水里升起，黄昏又落到水底下。更荒谬的是，有些地方的人认为，整个大地和覆盖于其上的天穹是由四只大象背着；有些地方的人则认为，由一只巨大的乌龟背着；至于大象或乌龟又是站在什么东西上面则未指明。

比较进步的看法是：地是一个圆球，居中央，天是个大圆球壳，包在外面。我国古代的“浑天說”认为：“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西方人们认为，天有好多层，像空心的水晶球那样，月亮嵌在第一层天上，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和其他许多恒星分别嵌在第二到第八层天上，各层天都在不断地转动着。公元二世纪托勒玫总结了以往的看法，建立了宇宙的“地球中心說”，认为不存在什么水晶球，各个天体只是按一定轨道运动着，而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

十六世纪，哥白尼推翻了地球中心說，建立了“太阳中心說”，确定了地球仅仅是太

阳系的一个行星。这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飞跃。“从此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便大踏步地迈进”^①。

十七世纪，望远镜的发明，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和数学分析方法（微积分）的发明，使人们对天体的认识，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航海、测量、制图等社会实践的需要，也大大促进了天文科学的发展。

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了有关太阳系形成的学說，认为太阳和绕它转动的行星，是由一团质点靠万有引力作用而逐渐凝聚成的。这个学說，是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然界随着时间发展的概念。十八世纪末，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提出了一个较详细全面的学說，被称为“星云假說”。

虽然天体是在时间进程中形成的概念提出来了，但十九世纪的许多学者，仍然保持陈旧的僵硬的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是在不断发展的。恩格斯在对康德学說进行评价时，就提到了当时的一个天文家梅特勒所写的一段话：“我们的太阳系的整个安排，就我们所能理解的，是以保持存在着的东西及其继续不变的存在为目的的。……同时并存的天体的多样性也并不容许我们假定这些形式仅仅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倒是宁肯說一切創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9页。



造出来的东西本来就都是同样完备的。”^①

十九世纪后期，照相术、分光术、测光术开始大量应用于天体的观测，特别是，制造大型望远镜的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研究天体所必需的资料便以高速度累积起来。

二十世纪开始以来，物理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原子物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物理的发展，使天体观测资料得到了理论分析和地面上实验的印证。近年来许多新技术都被运用于天体的观测上，除大型光学望远镜以外，还有各种类型的射电望远镜；火箭和人造卫星也常用于天体的观测。这样，就使得天体发展史的研究，进展更加迅速，关于天体都在不断发展、都有其起源和演化的历史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明。

通过一百年来的观测和研究，地球在宇宙中的地位也更清楚了。太阳仅仅是银河系这个庞大的天体系统（称为“星系”）里大约一千亿个恒星中的一个。由于地球处在太阳近旁，所以由地上的人们看来，太阳比其他的恒星大得多。太阳也不位于银河系的中心，而是比较靠近边缘，离中心约三万光年，离边缘约二万光年。银河系以外，用大望远镜可以看到数以亿计的其他星系，称为“河外星系”。银河系在目前观测所及的千千万万个星系中，也并不占有任何特殊地位。天和地是相对的，当星际火箭把人们带上月球或火星、金星上的时候，从那上面回过头来

看地球，地球便是在天上，成为一个天体了。在讨论太阳系的结构、形成和发展时，地球的确被当做一个天体。

回顾三千年来人们对天地形成和天体发展的看法的演变，从荒谬可笑的迷信、神话、以直观为根据的猜测，到以观测事实为根据的天体演化学说，这样巨大的转变完全证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过程。

二

一切天体都是不断发展的。作为无限广大的星空中的重要天体的恒星，就是如此。

研究恒星发展史的方法，同研究生物进化史的方法有点相似，就是先进行分类，从每一类中抽出一些典型来进行尽可能详尽的研究，然后找出各类型之间在发展上的关系。生物可以拿来解剖，可以用显微镜研究其结构，可以通过化石看到它的发展过程；而恒星只能用望远镜远远地观测。生物按形态、生理、生活史分类。恒星按照光谱类型和一些物理参数分类。

借物理理论之助得知，恒星光谱型的差别主要反映了表面温度的差别，温度高的（一万多度以上）具有蓝的颜色，温度较低的

^① 参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9页注①。



依次呈现白色、黄色、红色，红星的表面温度是两三千度。另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是“光度”（每秒钟由整个星面外出的辐射能量）。光度较小的恒星称为“矮星”，较大的称为“巨星”，更大的称为“超巨星”。有一部分恒星的光度不固定，称为“变星”。有的恒星显得很不稳定，光度变化得很不规则，光谱较特殊，而且有较显著的变化，有的间断地或比较连续地抛射出大量物质。很大一部分恒星不是单独地存在，而是组成了大大小小的集团——双星、聚星（从三个到十来个恒星）、星团（几十个到几万个恒星）等。

太阳和其他恒星的能源问题，到了距今二十多年前才解决，主要能源就是在它们内部高温、高密、高压条件下不断进行着的核反应。有了这个发现，恒星发展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较快的进展。

银河系里除了恒星、行星等天体以外，还有很多星云，其密度比恒星低很多。此外，星际空间里还充满着密度更低的星际物质。星云、星际物质的气体部分（另外有由小固体质点组成的尘埃部分），跟许多恒星（包括太阳）的大气具有大致相同的化学组成，最丰富的元素是氢，其次是氦，再次是氧、氮、碳等。人们又注意到蓝色巨星、超巨星和红色超巨星常和星云在一起，在河外星系里也是这样。恒星的能源，主要是氢核聚变成氦核的热核反应，聚变时质量

亏损，放出巨大能量。光度大的恒星，质量消减快，若光度保持不变，则寿命不会太长。因此，蓝色巨星超巨星是比较年轻的，年龄只有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它们又常和星云在一起。所以，有许多人认为，星云和星际物质（合称“弥漫物质”）就是恒星的前身。有一种变星称为“金牛座T型变星”（其典型为金牛座T星）。它们很不稳定，被普遍认为是年轻的恒星，它们也常和星云在一起。还发现了一些似星非星、似云非云的天体，它们被看作是正在形成中的恒星。

二十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恒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星云由于万有引力作用（各个部分互相吸引）而收缩，收缩时由于星云各部分密度原来不同，或由于出现了涡流，或由于其他原因，而碎裂为许多块，每块若太大还可能再碎裂，最后的每一块收缩成为一个恒星。收缩时，引力位能转化为热能和辐射能，光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便被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恒星就出现了。收缩过程中体积越来越小，内部温度和密度越来越高，到了一定程度，量变转化为质变，内部出现了热核反应，气体压力和辐射压力顶住了重力，星体便不再收缩，氢核聚变为氦核的过程代替了引力收缩，成为恒星能量的主要源泉。引力收缩阶段中，恒星的表面温度逐渐升高，光度则改变不大。内部热核反应开始以后，表面温度和光度在较长的一



个阶段里大体保持不变，一直到内部的氢差不多都聚变为氦。这个阶段称为“主星序”阶段。太阳目前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对于恒星的发展，最重要的物理参数是质量（物质的量），质量越大的，发展的速度也越大，即收缩得越快，停留在主星序的时间越短。蓝色超巨星停留在主星序的时间只有三百万年左右，像太阳这样一个质量小得多的恒星，则可以在主星序阶段停留一百亿年。

当恒星内部的氢快消耗完，绝大部分都变成了氦的时候，能量的释放大为减少，核心部分顶不住外层的重力便又收缩，收缩放出的能量则使得外层膨胀。这样恒星便大为改观，体积迅速增大，光度也逐渐地增大，表面温度则降低，恒星从原来黄色、白色或蓝色的变成了红色的巨星或超巨星。后来核心部分的温度和密度继续升高，氢核聚变为更重的原子核，也出现了其他许多种类的热核反应，形成了碳、氮、氧、氦、钙、钠、镁、硅、铁等元素。

红巨星阶段以后，恒星如何进一步发展，目前还不太清楚。

许多人认为，恒星在其发展中早晚会达到整个星的平均密度（内部密度总比外部大）非常大的阶段。目前能观测到的几百个“白矮星”（表面温度相当高，但光度很小）就处于这样的阶段，密度从水的几万倍到一亿

倍以上。从红巨星转变为白矮星的过程中要经过爆发阶段，爆发时抛出大量物质，光度大为增加。有人认为，通过这样的爆炸，已在恒星内部形成的重元素便分散于星际空间里，成为形成第二代第三代恒星的材料，这些恒星，不像第一代星那样一开始只有氢，而是一开始就有氢、氦和其他许多种化学元素。太阳今天就含有六十种以上的元素，因此不是第一代的恒星。

少数研究恒星的人不同意恒星是由星云形成的。他们认为恒星和星云都是由一种密度极大的“超密物质”形成的，这种物质很可能就是密度极大的一团基本粒子，包括中子和各种超子。提出这种看法的根据包括下列三件事实：（一）金牛座 T 型星和其他一些类型的不稳定变星发亮时，光谱中某些波段出现了奇怪的连续发射，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残存于这类变星内部的超密物质跑到外部来，在恒星表面释放能量。“太阳活动”也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但规模小得多。（二）发现有一种称为“星协”的恒星集团在膨胀着，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组成星协的恒星应当都位于很小的体积里，因此认为它们是由一大块超密物质爆炸分裂形成的。（三）发现一些星系核心发生了巨大的爆炸现象，抛出了极大量的物质，因此认为星系核心也是由超密物质形成的。

有关恒星形成过程的这两种不同看法到



底哪一种正确，或者各有正确的部分和错误的部分，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每一个恒星都在不断发展着，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了。

三

几十亿个直到千亿个以上的恒星组成了星系。星系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

和恒星一样，星系也是多种多样的，也可以分为一些类型，对于每种类型可以选出几个代表来详细研究其结构。一种较简单的分类法是把星系分为三大类：球形、椭球形或扁得像盘子那样的称为“椭圆星系”；球形或椭圆形的核心部分，加上两条或更多的或长或短的螺旋形尾巴（称为“旋臂”）的，称为“旋涡星系”；形状很不规则的称为“不规则星系”。前两大类又按照形状、结构而再分为几个小类。

近年来，又提出了一些较细致的分类法。星系也如恒星那样组成大大小小的集团，有双重星系、多重星系（包括三个到十个星系）、星系团（几十个到一万个以上的星系）等。

不同类型的星系，在天体演化上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有人认为，星系的发展是由椭圆星系到旋涡星系再到不规则星系，有人则认为正好相反，是从不规则星系到旋涡星系再到椭圆星系。对于星系发展史的研究，一

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旋臂的如何产生。有人认为，旋臂是由星系核心抛出的物质形成的，有人则认为，形成旋臂的物质原来就在星系的外围部分，通过磁场作用或某种动力学作用而形成旋臂。

银河系是一个旋涡星系，可能有三条旋臂或更多，太阳位于两条旋臂之间。整个银河系在转动着，对于三十多个河外星系也已证明在自转着。可能每一个星系都在自转着，但速度有大有小，同一星系的各个部分也按离中心远近而具有不同的转动角速度。

有人认为，星系也是由弥漫物质凝聚形成的。凝聚过程中一个很大的云碎裂为较小的，每一个小云又碎裂为更小的云，这样凝聚和碎裂，最后形成了组成星系的恒星、双星、聚星、星团、星云等等。一部分物质集中于中心部分，形成了密度大的星系核心。

在恒星起源方面，主张超密物质起重要作用的人，对于星系的形成和发展，也持有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星系的核心就是巨大的一块超密物质，星系其余部分的所有东西，都是由星系爆炸出来的超密物质块形成的。近年来发现，好几个星系的核心发生了规模极大的爆炸，有的朝四面八方抛出大量物质，有的朝一两个方向抛出大块物质，每块的质量和一个小星系一样大。另外，又发现一些多重星系的成员正在向外散开，像组成星协的恒星那样。



最近，发现了一种对星系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新型天体，称为“类星射电源”。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四年中自然科学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现在已经发现了二十几个类星射电源。它们都发出光线和无线电辐射；离我们都很远，从十几亿到上百亿光年；质量比恒星大得多，等于太阳的几万倍到几亿倍，但又不是星系，不是由许多恒星组成，而是很大的一个整体。类星射电源比星系小，而光度则比一般的星系大十倍百倍。有人认为，类星射电源巨大的能量是由于“引力坍塌”，物质急速地向中心陷落，释放出的巨大引力能转化为物质点的动能，出现了大规模的爆炸现象。它们是否是一般星系的前身，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四

现在来谈谈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系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最关心，因为它同地球早期发展史有密切关系，它的研究进展可以为地球科学中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线索。太阳是一个恒星，太阳系的历史同恒星史以及星系史有必然联系，因此把它放在恒星和星系后面来谈。

今天，我们对太阳系的结构和其中各个天体的运动情况，已经了解得很透了，但对于各个天体（包括地球）内部的结构和化学组成、月球和行星上面的物理情况，则还了解

得很不够。关于太阳系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虽然康德于二百年前就提出一个有一定根据的学说，后来拉普拉斯又提出一个学说，本世纪开始以来又提出了十几个学说，但问题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解答。

地球的年龄已证明为五十亿年左右，太阳系的形成过程当然也发生在几十亿年前。要写下几十亿年前自然史的一页，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近年来人们对太阳系历史的认识已有很大的提高。

九个大行星大致在同一个平面上朝同一方向绕太阳公转，大部分行星的自转也是朝同一方向，太阳的自转也是这样。这些事实，使得绝大多数研究太阳系的人都认为，行星和卫星是从围绕太阳的一团弥漫物质形成的，这团物质被称为“原行星云”。

关于原行星云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形成太阳和行星、卫星的物质是同一团物质，它的中心部分形成了太阳，居外的部分形成了行星、卫星，换句话说，原行星云是形成太阳的物质的残余。康德和拉普拉斯也是这样看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形成行星、卫星的物质是太阳在银河系里运动时和一个星际物质云相遇，以不太大的速度穿过这个云或从它旁边经过，俘获了那个云的一部分物质，成为原行星云。又一种看法认为，形成行星、卫星



的物质全部是从太阳抛射出来的，过去太阳的质量、光度和自轉速度都比今天大好多；或者原行星云的一部分是从太阳抛射出来的，它是形成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的主要材料，其余部分则是形成太阳的物质的残余，从它产生了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本世紀初期，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过去有一个恒星从太阳近旁走过去，接近太阳的时候，由于潮汐作用，使得大量物质被从太阳中拉出来，以后形成了行星。后来理論分析結果表明，这种看法与实际观测现象不符，不能成立，应当抛弃。目前，在原行星云的来源問題上，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行星和太阳由同一团物质形成的看法。

还有一个问题是：原行星云如何演变为行星和卫星，太阳系在结构和运动方面的规律性如何說明。关于这个问题，二三十年来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有一种看法认为，原行星云开始主要为气体质点，但也有一些尘粒。气体质点多带电，即主要为离子和电子。太阳一形成即具有磁場，而且在自轉着，太阳周围的磁力綫随着太阳轉动着。带电质点不能跨过磁力綫，只能沿着磁力綫走螺旋形軌道，这么一来，形成行星的物质被迫往前轉动，增加了轉动速度，太阳則减小了自轉速度，这样就可以解决拉普拉斯学說所未能說明的所謂“角动量分布”問題*。气体质点逐渐凝聚成小固体质点，一成为固体质点就在橢圓軌道上繞太阳公轉。軌道的形状和空間位置多种多样，因此质点常会相

碰，但碰得不厉害，因为总的运动方向是相同的。逐渐地，小质点团聚成較大的质点，然后聚成固体块，最后聚成行星。在团聚过程中，軌道平均化了，这样就說明了今天行星軌道几乎是正圓形，几乎在同一平面上。各个行星在质量、大小、密度和化学組成方面的差别，也大致可以得到說明，卫星的形成和运动情况，也可以得到說明。

数十年来的研究結果进一步表明，太阳系是逐渐形成的，組成太阳系的每一个天体都在不断发展着，整个体系也在不断地、虽然是緩慢地发展着。

* * *

天体一般离我們很远，不能拿到实验室里来解剖研究，只能远远地观测，通过对它所发出的各种辐射的分析来認識它。天体的发展阶段、年龄、寿命多以百万、千万、亿年計算，而人們能利用望远鏡較准确地研究天体的运动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研究天体的物理性质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通过分类比較，找出各种方法測定年龄，运用微观物理学的研究成果等等，今天已能大致描繪出天体的发展过程。这是人类認識自然界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项成就有說服力地证明了，辯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是永远按照客观的辯证法規律不断发展着的物质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 主要指下述现象如何說明的问题：太阳的质量占整个太阳系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以上，但它的角动量只占不到百分之一。



回忆武装宣传队的一次演出

· 刘 一 雁 ·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人据点前的一次演出。这次演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虽然是当时文艺活动中的一件小事，是适应当时斗争情况的一种文艺活动形式，却使我从这里想起抗日时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优良传统。在不同时期，不同斗争条件下，文艺活动可以也应该采取多样的形式，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优良传统，却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那是一九四三年，胶东抗日根据地仍处在十分困难的岁月里。

那年夏天，青纱帐起来了，日寇大规模的“扫荡”暂时停止了，可是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蚕食”政策仍在加紧推行。为了粉碎日寇“蚕食”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胶东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向敌人展开了夏季政治攻势。我们五支队前线剧团的同志们，也分头到地方武装的连队中，通过文艺形式开展工作。

我和两位男同志一起被分配到蓬莱县独立营。独立营的干部和战士像欢迎亲人一样接待我们。当晚，领导上要我住在一个伪军

家属的家中。我听了有些犹豫，因为这里是游击区，八路军正规部队来的不太多，我又是个女同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住在伪军家属家里？我正在纳闷的时候，独立营的政委开了口：“她的丈夫在伪军中当一名班长，就住在离此四十多里的据点里。虽然是班长，也是我们瓦解的对象。如果工作做得好，也许能取得胜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让我去做工作的。

我愉快地去了。进门就看到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正在院子里玩，他一见我就大声向正屋喊：“妈妈，来了个女八路！”一个妇女应声而出，她站在正屋门口说：“同志，家里坐吧！”我说：“我是独立营的，今晚想在你家住一宿，你愿意吗？”她惊喜地说道：“同志你住吧，别说一宿，就是个月二十天的，只要你愿意，我……”从她的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惭愧的神色。说着我们进了正屋。此时天色已晚，她拿出一盏带罩的煤油灯，擦了擦灯罩，点着，室内顿时通明。

我们一块上了炕，她便向我诉说一切：原来她名叫张玉英，娘家是个贫农，只有姊妹二人，她是老大。上过三年学，在二十岁上



結了婚，一年后生了一个男孩。日寇占领了蓬萊县城以后，她丈夫被一个坏人拉着参加了伪軍。从此之后，孩子上街，她出門，邻居們常常指着脊梁骨議論她們。今天能有个女八路住在她家里，当然是她万万想不到的。經過这一夜的談話，我了解到可以用来爭取她丈夫反正的材料，同时也向她宣传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当鸡叫头遍时，我們才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向领导汇报了这一夜談話的内容。领导认为可以根据这个材料編成演唱节目，到敌人据点前演出。还說这是进行政治攻势，瓦解敌軍的有力武器。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但是到敌人据点前进行演唱，到底是一种什么情景，我完全是陌生的。过去在战斗中，虽然也参加些战勤工作，但像这种演出我确实心中无数。

两天之后，《张大嫂劝夫反正》的演唱节目写好了，也练熟了。我首先唱給张大嫂听。她一边听一边叹气，当我快唱完的时候，她一头扑在我的怀里，哭泣着說：“刘同志，你說的全是我心里的話，我要是能碰見孩子的爹，一定叫他脫掉那张黄皮。”

一天傍晚，一支十二个人的武装宣传队組成了。由独立营政委帶領八名战士，外加我們三个人。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作了周密的准备，向我提出的要求只有一条，就是要大胆沉着，听到枪声不要忘掉唱詞，一定要坚持把节目演完。我們十二个人走出了

村子，晚风拂面，稍有凉意。当我们出了山口进入平原时，夜色慢慢降了下来。不能走村中大路，只能在田間小道上行走。两、三个小时，一直在青紗帳中穿行，大概走了三十里，到了敌占区，已經听到敌人統治的“爱护村”的梆子声和犬吠声。我們更加放輕了脚步，加快速度，沿着一条弯曲的小河走去。不多时，我們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政委叫班长带上半个班到前边先偵察一下，把警戒放好，再来帶我們。

这时候，天边出現了閃电，天气闷热得很，好像就要下雨了。忽然传来了两声枪响。我顿时紧张起来，是不是被敌人发现了？任务怎么办？政委在黑影里风趣地說：“伪軍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一到晚上，看不見人，就放枪壮胆，你們听，还吆喝呢！”我一听，果然有人在喊，但听不清喊的什么。半个小时过去了，班长一个人回来說：“走吧，一切都布置好了！”大家站起来，跟着班长順着河边向前走去。

不多时来到一个村庄前面，周围什么都沒有，沒有树木，沒有庄稼，只是在围墙外边好似有一条河。政委小声告訴我：“这就是濠沟。”炮楼就像怪物似的蹲在那里。从枪眼里，偶而閃出一点灯光。班长把我們領到一个坑边停下来，政委問道：“这里安全嗎？”班长回答：“死角，射击和投弹都不会有問題。”政委說：“好吧，有情况你要迅速来报告。”班长带着另外四个战士应声而去，我們



四个人留在这里。

政委对着炮楼开始喊话：“我们是八路军……”话音未落，敌人就朝我们的方向打来一排子弹。大家不约而同地蹲了下来，一看，是刚刚挖好的掩体。原来战士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政委继续对着炮楼喊道：“你们如果再打枪，我们就把炮楼炸掉。”枪声停止了，忽然听到炮楼内一个公鸭嗓子的人在喊：“不要听共军的宣传，打！”又是一阵枪声。政委命令道：“打！”班长出现了，他带着一个机枪射手，架起机枪瞄准炮楼的枪眼就是一梭子子弹。可也真听话，敌人马上鸦雀无声了。

政委接着喊道：“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不长久了，你们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的当‘铁杆汉奸’，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要做好事。政府有个登记簿，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总有一天要和你们算账的！”炮楼里没有声音，政委又喊道：“你们好好听着，下边给你们演出两个小节目，你们听了以后，要好好琢磨琢磨。”

接着，我就演唱起来。炮楼里的敌人也来凑热闹，放了几声冷枪，也有人喊：“女八路，大点声，我们听不见！”我心想：我是抗日战士，决不能在敌人面前表现怯懦！这一来我的声音更加响亮了。我好像看见了伪军班长的儿子，看到了张大嫂那对忧愁的眼睛，我的感情更充沛了，我的声音更大了。

当我一口气唱完了之后，忽然一个伪军喊道：“女八路，再来一个吧！”公鸭嗓子的人骂道：“你倒听上瘾来啦！”接着我们一位男同志说了一段大鼓，宣传最近一次战斗的胜利。大鼓还没有说完，班长急匆匆地从黑影里跑来，向政委报告说：“有情况，咱们要马上撤！”演唱的同志很快就结束了大鼓，最后还喊了声“再见！”我们便跟随着政委，顺着来路撤退了。当我们刚刚离开河边时，在我们身后就响起了枪声，还夹杂着喊声：“抓呀，抓女八路！”可是声音越来越远了，枪声越来越稀了。因为敌人在一片青纱帐的夜晚，是不敢远离据点的，所以追了不远就夹着尾巴回炮楼里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中暗想，这次宣传的效果不知怎么样。

事情真凑巧，一年之后我又来到了这个地区，这里已变成新解放区了，我又见到张大嫂。她一见我的面就拉着我的手亲热地告诉我：“孩子的爹现在是个正南八北的农会会员了。就在你们那次到炮楼前演出以后不久，他拉着一个班出来反正了！”

我听了之后，不禁为她丈夫的改邪归正，为我们那次宣传工作所起的一点作用而感到高兴！

从这次演出中，我体会到文艺工作者必须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政治服务，同时也锻炼、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革命的艺术战士。



红旗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创造我们的新世界

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

诗词二十六首

11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创造我们的新世界（社论）……………（1）

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

——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陶鲁笳（4）

毛泽东思想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唐敖庆（15）

统筹方法试点工作散记……………华罗庚（22）

一所为农民服务的医院……………安宣红（29）

诗词二十六首……………胡乔木（35）

☆ 十月一日出版 ☆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创造我们的新世界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年了。这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十六年。这是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更广泛地更深入地，继续用无产阶级宇宙观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十六年。

无产阶级是在批判旧事物中创造新事物，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的。这个批判的武器，就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①。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宇宙观的指导下，对旧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唤起了人民的觉醒，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

历史上，当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制度的时候，他们的先进分子对于封建主义曾经进行过无情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来，或者辩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②

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当然远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所能比拟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意味着革命的结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创造新社会制度的开始。因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②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4页。



此，无产阶级必须更高地举起批判的旗帜，彻底地同各种陈腐的思想、观念、习惯、传统决裂，才能有保证地使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巩固起来。

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向前发展一步，必然要求这种思想批判也随着深入一步。

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旧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覆灭。人们的思想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尖锐。反映旧制度的各种旧思想、旧观念，是不会轻易地退出舞台的。封建主义思想的阴魂，资本主义思想的阴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传统，以及其他各种旧的习惯势力，等等，还或轻或重地纠缠着许多人的头脑。

目前的问题在于：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旧思想往往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它们总是企图借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字、口号，作为自己的外衣，争取自己的生存，散布自己的影响。

新思想可以利用旧形式，这是大家知道的。旧思想也会利用新形式，我们许多人却是警惕不够的。旧思想往往改头换面地渗入新事物之中，逐渐地侵蚀人们的头脑，改变新事物的颜色，为旧制度的复辟开辟道路，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严重的注意。

旧的思想、观念、习惯、传统等是异常顽固的。我们同这些东西的斗争是长期的。今天批判了的东西，过些日子还会出现，斗争还会反复。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要求革命的人们牢固地掌握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掌握无产阶级的意识，经常不断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要善于识别和清除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旧思想。对于一切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旧东西，要毫不姑息地加以清除。

目前，我国城乡各地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主要的，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上深刻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运动。这是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运动，正在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①毛泽东同志也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②事实证明，正是这样。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②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在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业中，凡是敢于突破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縛，能够运用无产階級宇宙观、毛泽东思想来观察和处理問題的人，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創造、有所前进。

大庆油田的职工們，就是由于他們能够运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新事物，勇敢地破除对旧权威的迷信，提出新观念、新理論，敢于革命，敢于創造，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大寨生产大队，他們所以能够成为农业上稳产高产的先进典型，主要也是由于他們能够向社員群众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小生产者的旧意識，使群众具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精神和气概。

当然，用无产階級的宇宙观批判地对待一切，并不是不要继承，否定一切。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身就包含着继承。而馬克思主义的继承，則是批判的继承。列宁說：馬克思的学說，“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馬克思主义对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吸收和改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是“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②。

新社会制度否定旧社会制度，同时也消化了旧社会的遺產。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对旧社会的遺產进行最深刻的批判，保存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推陈出新。

我們批判旧事物，是为了創立新事物。不批判旧事物，就不能創立新事物。不創立新事物，也不能彻底批判旧事物。我們的一切批判，是为了确立无产階級的宇宙观，扩大和巩固无产階級思想的陣地。一切批判，最后都要落实到建設上来。

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批判，要正确地进行，要采用民主的方法，充分說理的方法。真理要經過辯論，才能够越来越明，才能够不断地发展。

用无产階級的宇宙观創造我們的新世界，就必須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深入开展思想革命，繼續批判資产階級宇宙观。这是我們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

讓我們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学好辯证唯物主义，学好历史唯物主义，为創造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世界而努力奋进！

^① 《論无产階級文化》。《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3頁。

^② 《新民主主义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00頁。



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

——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

陶 魯 笳

自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学大寨、一带二运动在全省农村是怎样开展起来的，有什么经验值得总结呢？

在两年半的运动实践中，最大的收获是，全省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在农业生产上都有了像大寨那样稳产高产的先进典型，特别是有了在一个县范围内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成绩经验，也就是有了由点到面地推广先进经验的办法。现在，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只要把学大寨、一带二运动认真地坚持下去，全省农村的面貌，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一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

大寨，是昔阳县委和晋中地委十多年前就开始发现并且一直培养的一个先进典型。早在一九五九年，晋中地委为了在全专区推广大寨党支部工作的先进经验，就在大寨开过现场会议。一九六二年，晋中地委为了推广大寨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经验，又向全专区农村提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经验引起省委的重视，最早是在一九六〇年。这一年的二月，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指示，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同志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但是，这个号召并没有引起各地同志普遍重视。直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陈永贵同志生动地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才给了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并且又一次引起了省委的重视。

大寨的自然条件很不好，但是，由于党支部自从一九五二年冬实现了合作化以来，一直



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特别是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高举总路线红旗，因而集体经济越办越好。到一九六二年，就提前实现了一九五三年秋制订的“十年造地规划”，粮食单位亩产量由一九五二年的二百三十七斤逐步跃进到七百七十四斤。这就使人们看到了实现稳产高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道路，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榜样。

在大寨的经验中，还有一点特别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们发扬共产主义的风格，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政治、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帮助它南面的井沟大队追赶自己。到一九六二年，井沟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一九五九年的二百七十多斤提高到五百零五斤，成了省的先进集体单位。起初，大寨有些社员对于帮助井沟思想不通。陈永贵同志和党支部就教育社员说：“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更要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足，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所以，我们诚心诚意希望各兄弟队，都能赶上大寨，都能超过大寨，赶得越快越好，超得越多越好。”“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果然不错，井沟大队社员的革命干劲，一天天高涨起来，他们的革命干劲，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寨人先进更先进的鞭策力量。

陈永贵同志说得好：“一个先进大队，在周围的大队都比你落后的情况下，就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屁股后边没人赶嘛！”他还说：“一个先进单位要能带自己周围的一两个后进单位，别人能先进，自己就能更先进。”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不树立榜样，不能说服人；单有榜样，不能带动后进单位赶先进、超先进，先进单位就不能巩固提高。所以，在这次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我们总结了大寨的经验，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了学大寨的口号；也总结了大寨带井沟的经验，提出了一带二的口号；要求所有的先进单位，都来学大寨、一带二。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总之，要把自己周围的队带动起来，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一九六三年八月，大寨大队遭到了特大洪灾，百分之七十的房窑塌了，庄稼都倒伏了，百分之二十三的耕地连土层都冲光了。灾后，他们提出了不要国家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口号。秋收后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疾风知劲草。事实一再证明，大寨是一株社会主义的劲草。当年十一月省委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同时，我们又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了大寨十多年来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经验。这样，大寨就成为令人更加信服的一面旗帜，全省的学大寨运动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大寨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学大寨的经验，就得看一看大寨的历史，看一看大寨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只有对大寨的经验作历史的了解，才能了解它的本质。

解放前，在大寨，全村七十五户，八百亩土地。百分之五十的耕地为四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农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

解放后，在这里，土地改革很彻底，群众发动很充分，党的基础很牢靠，社会主义革命关也过得很好。他们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各个时期，从来没有放松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在刚办初级社的时候，阶级敌人讥笑他们，不是说办不起来，就是煽动说“家有十五口，七嘴八舌头，那里能办好呢？”“农业社生产点东西，也养活不起这么多干部呀！”阶级敌人的破坏，使陈永贵、贾进才等大寨干部的革命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横着一条心，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坚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决当为群众服务的“长工”，不当靠群众养活的老爷，勤勤恳恳地工作，用穷棒子的革命精神把合作社越办越好。敌人又三番四复地用软化的办法来收买干部，大寨的干部不仅没有被软化，相反地把敌人每次耍的花招都拿到群众中去批判，揭穿敌人的阴谋，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一九五三年冬季的粮食统购统销大辩论，一九五七年冬季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在大寨都有着激烈的斗争。党支部在这些有决定意义的斗争中，善于抓住典型事例，发动群众，批判了少数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思想，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

特别是一九五八这一年，大寨人在党的总路线红旗的指引下，思想大解放，产量大跃进，粮食的单位亩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三百四十九斤一下跳跃到五百四十三斤。从此以后，总路线红旗越举越高，社员的革命干劲越来越大，任何歪风邪气在大寨都成不了势。同时，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每年都有新发现、新创造。用陈永贵同志的话来说，就是“集体生产每年都要有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变产量。”正因为如此，他们一直保持了连续大跃进的局面，集体经济越办越巩固。一九六四年粮食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八百斤，并且自一九六三年遭灾以来，新建了大批房窑。在大寨，如果有人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坏话，就会立刻遭到广大群众，甚至少年儿童有力的驳斥。

当然，大寨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是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或者副业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掘出来；特别是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比较缓慢。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农林牧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作用。他们认识到，为了克服和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最好的办法是虚心学习本省和外省的先进兄弟队的长处，针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生产中的潜力，



及时地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现在，他们正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全面发展农林牧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十年远景规划而奋斗。

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大寨党支部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一个真正的坚强的战斗堡垒。现在的十九个党员，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密切联系群众，都能在一切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陈永贵同志等七个支部委员，都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群众拥护的坚强骨干。在最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广大群众对他们的一致评论是：全心全意搞社会主义，时时为群众为集体为国家打算；一贯依靠贫农下中农，敌我界限分得很清楚；一贯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个个都是劳动能手；大公无私，办事公道。

大寨的贫农、下中农，土改以来，有着强烈的改变一穷二白的愿望。他们要干，要革命。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形成了强大的阶级队伍。这个队伍中的积极分子，紧紧地团结在党的领导核心的周围，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突击队。这就是陈永贵同志所说的那七十条好汉。

大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有这样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又有这样一支有觉悟的阶级队伍，就有了改天换地的保证。

大寨党支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一贯重视做人的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他们学习了解放军的“四个第一”，政治工作做得更好更活跃了。他们不是只依靠少数党员干部做政治工作，而是注意依靠大家，时时、事事、处处做政治工作。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很认真的，用活人活事活思想来向干部、党员、群众进行活的教育，也是比较及时的、经常的。

在他们的政治工作经验中，值得着重提出的有以下三点：

一、他们一贯重视党支部的建设，对每个党员特别是对党员干部要求很严格。他们在党内经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注意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他们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在学习、劳动以及其他一切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个党员都要联系几户社员群众，经常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们要求每个党支部委员，真正是党员中最优秀的分子，不仅会做政治工作，而且是生产劳动的行家。陈永贵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好榜样。

二、他们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且一直坚持在劳动中做思想政治工作。陈永贵同志说得好，“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见人，见人就得下地劳动。”“干部离开了集体劳动，就和群众隔了一层皮，眼睛和鼻子也就不灵了，不通了。”“越是刮风下雨，或者发生意外灾害的紧急关头，干部越要往地里跑，越要到最艰苦的第一线去。因为牛鬼蛇神要活动，就瞅这个时机；每个社员的觉悟程度，这个时候也看得最清楚。”他还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像一条红线，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串连在一起了。”



三、他们遵循着毛泽东同志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教导，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革命化，由只顾个人利益到热爱集体，由只爱自己的集体到热爱别人的集体，由热爱集体到热爱祖国，由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例如，党支部花了十多年的功夫，对贫农出身的社员赵小和，耐心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终于把赵小和由一个自私自利思想比较严重的人改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风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一九六四年，赵小和同志为集体事业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赵小和的革命精神已成为全体社员学习的榜样。陈永贵同志说得好，“人是可以改变的。思想落后的人可能变好，思想先进的人，也可能变坏。在我们人民内部，对于思想落后的人只能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变成先进；对于思想先进的人，也要抓紧教育，使他先进更先进。”正因为他们能这样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人，所以他们的政治工作能够做得又深又细。

由于他们政治工作抓得紧，做得好，所以广大社员的觉悟一年比一年高，干劲一年比一年大，生产建设一年比一年好。生产建设的巨大成就，又促进了社员觉悟的提高。大寨十多年来，就是这样由物质变精神、由精神变物质的反复的过程。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这样逐步地成长起来的。

那末，什么是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条红线、五个要点。

一条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总路线挂帅。

五个要点，就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爱憎分明、一心向党的坚定立场；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顽强意志；有大胆踏实、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有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的高尚风格。

“一颗红心为革命，两只铁手换天地。”大寨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光去大寨走一走，看一看，而不研究大寨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不研究大寨党支部是怎样做政治工作的，那就不可能有深刻的体会。不能把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学到手，学大寨就必定学不好。两年半的实践证明，学大寨的运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有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才能又好又快地推广大寨的先进经验。

学大寨必须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

从一九六三年以来，全省有组织地到大寨参观学习的县、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已经近二十万人了。这对于推广大寨经验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人们经过实地参观，就对大寨有了感性知识，就便于找到自己和大寨之间的差距，就能够更有说服力地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学大寨的运动。但是两年半的实践表明，有的县、社、队学大寨学得很好，有的县、社、



队就学得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结果呢？事实证明，不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学大寨是不可能学好的。

阻碍学大寨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借口条件特殊，不承认大寨经验的普遍意义；一种是缺乏雄心壮志，自甘落后，不敢学大寨的革命精神。

借口条件特殊的人，他们到大寨看了之后，不是说大寨的条件特殊，就是说自己那里的条件特殊，总觉得大寨的经验对自己那个地方是不适用的。他们的所谓条件特殊，无非指的是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农作物种植条件等等。应当承认，这些条件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是有所不同的。在这里，承认条件的不同，也就是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①。所以，不顾这些不同的条件，机械搬川大寨在生产斗争方面的具体经验，是一定会碰壁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除了有不同的特殊性的条件外，还有相同的普遍性的条件。我们学大寨，就是要学大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他们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②，“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③。他们心目中的大寨经验，无非是治山治沟、修梯田、筑坝等等具体经验，而看不到最有普遍意义的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即使在生产斗争方面，大寨的经验也有不少是有普遍意义的。例如，在耕作过程中，采取一整套种地养地的办法，增厚活土层，增强土壤团粒结构，不断提高地力，建设稳产高产田，也就是人们所称颂的“大寨田”。借口条件特殊的人，对于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是看不到的。总之，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一种经验主义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思想实质是骄傲自满，故步自封。

李顺达同志所领导的金星公社西沟大队的干部所采取的态度和观点完全相反。他们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曾经到大寨参观过。在参观之前，组织干部、党员、社员学习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检查了盲目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大破“生产到顶”和“条件不好”的论调。在参观之后，又开展了一次大讨论，促进了干部、社员思想革命化，提出了“革命精神学大寨，粮食产量赶大寨”的战斗口号。实践的结果，一九六四年粮食单位亩产量达到了六百斤，改变了一九五六年以来单位亩产量一直在四百五十斤左右打圈子的停滞不前的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97、306、297页。



状态。

缺乏雄心壮志、自甘落后的人，他们到大寨看了之后，总觉得自己那个地方，和大寨比起来差距太大了。“大寨太好了，就是高不可攀。”这就是他们的结论。他们认为大寨的经验在自己那里用不上。他们不承认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变化，并且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也就是不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的集体经济单位会变为先进的集体经济单位。他们也不承认，由落后变为先进的条件，主要的要在集体经济内部去寻找，而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支援等外部条件。他们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因而他们不能从大寨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样板中，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威力，看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无比优越性，看到觉悟了的群众的无比创造力。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寨人有那样冲天的革命干劲，为什么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能取得那样改天换地的大变化。由此可见，这种观点是懒汉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也是一种缺乏革命精神的右倾保守的观点。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雁北专区平鲁县有个小庄窰大队，在一九六三年以前的四年时间内，共向国家要了十万斤供应粮、两万多元贷款，还欠了一年农业税。一九六四年春，这个大队的干部在参观大寨之后，用大寨的革命精神，发动群众，大破悲观论调，大立雄心壮志，大鼓革命干劲，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革。果然，一九六四年来了一个大跃进，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破天荒地交售了余粮四万一千斤，归还了国家贷款二千四百元，补交了一年的农业税。

把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摆在首要地位

有了大寨人，才能有大寨田，才能有大寨式的新农村。这是许多地方在学大寨运动中得到的共同结论。这也就是说，要像大寨那样建设稳产高产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把学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摆在首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学大寨的具体实践中收到预期的效果，才能在生产建设的具体经验上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孟县学大寨的过程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孟县县委一九六二年就响应晋中地委的号召，在全县开展了学大寨运动。这一年，由于从上到下只注意学习大寨治山治水的具体经验，结果并没有学出什么名堂来。直到一九六三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290、291页。



年，他們根据省委的指示，強調了学大寨先学大寨精神，情况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他們从总结孟县的历史經驗教訓入手，用大寨的历史經驗对比孟县的历史經驗。他們认为，大寨經驗可貴之处，就在于能够以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藐視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換地。大寨也經歷过曲折和失敗，但是沒有被困难吓倒，沒有迷失了方向，而是不断从失敗中找到教訓，繼續高举总路綫紅旗大踏步地前进。而孟县在一九五六、一九五八两年也搞过大規模的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都沒有成功。由于沒有及时地总结經驗教訓，分清正确与錯誤的界限，以致在困难面前缺乏革命的坚定性，迷失了方向。由此他們認識到，大寨是貫徹执行总路綫的活样板，学不学大寨，是敢不敢更高地举起总路綫紅旗的大問題。

孟县县委找到了这条根本的經驗教訓，思想豁然开朗了。于是，他們重整旗鼓，先后組織了县、社、队干部和社員群众八千多人到大寨参观学习。同时，从上到下，結合初步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搞思想革命化。县、社领导干部首先走出办公室，带头下乡蹲点，帮助生产大队进行思想革命。各生产大队都以大寨为榜样，照鏡子，找差距，并且开展了比革命精神、比依靠貧农下中农、比干部参加劳动、比自力更生、比对国家贡献的“五比”活动。开展“五比”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过程。經過反复检查比較，有些基层干部說：“这几年思想睡了觉，前进方向不明确了，农村要建成啥样子，眼里缺样板，心里沒譜譜。有了大寨，心里有了灯，身上有了劲。”被称为孟县的“大寨”——白藏大队的干部把学大寨的經驗归結为五句話：革了一場命（以階級斗爭为綱进行了一場思想革命）；扎了一条根（依靠貧农下中农，扎階級路綫之根）；死了一条心（死了搞自发資本主义之心，立了共同富裕之心）；取了一本經（学到了大寨真經）；戴了个望远鏡（有了国家观念，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些基层干部，缺乏革命精神，經過教育，学大寨仍然表現消极，甚至阻碍学大寨运动的开展，社員群众就憤起指責，以致不得不作必要的組織調整。这样，孟县学大寨的运动一浪高一浪，真正成了最广泛的群众性的行动，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內，全县五十五万亩耕地普遍进行了整修，近百分之四十的耕地基本上建成了大寨式农田，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两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今年全县的小麦产量比上年翻了一番。特別应当指出的是，孟县在治山治水、农田基本建設等方面的具体經驗，有不少新的創造和新的發展，有些工程的质量和艰巨程度还超过了大寨。

一带二是普及大寨經驗的好方法

一个口号，在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总是比較抽象的。但是，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



且見之于行动之后，它的内容就逐步地具体化起来、丰富起来了。学大寨、一带二的口号，正是这样的。经过两年半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学大寨、一带二运动，具体地确切地说，就是“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红”的比学赶帮超运动。这里所谓一带二，一就是点，二就是面。采取一带二的方法，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们的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工作方法。突破一点，就是要树立学大寨的标兵。推动全局，就是要用一带二的方法在面上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这样做，就能达到一片红的目的。孟县、曲沃、太谷等一批比较先进的县，都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你追我赶、落后超先进、先进更先进的跃进局面，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树标兵的问题上，过去，有的地方培养标兵，一味依靠外力，即使取得些成绩，也好像盆景一样，根本不能推广。学大寨运动以来，许多县、社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强调用大寨自力更生的精神培养标兵，强调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点面结合，共同发展。孟县县委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就在全县采取了梅花式的撒网布点的办法，分批分期培养学大寨的标兵。这种办法，他们叫做给后进队“搭梯子”。这一年，县委在五类不同地区选择了十二个生产大队，由县级领导干部亲自蹲点。各个公社的领导干部也搞了七十七个点。县委搞的十二个点都很成功，粮食增产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公社搞的点大多数也是成功的。从而使县、社领导干部取得了学大寨的第一手经验。第二年，作为标兵的生产大队就扩大到了一百零九个。今年，第三年，又扩大到一百四十九个。每个标兵队一般带周围的三至五个队，形成一个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样，就星罗棋布地把全县的五百三十一个大队都“网”起来了。曲沃、太谷等县大体上也是如此。

由一带二到以一个先进队为中心组成先进经验推广网，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先进经验推广网，不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是领导干部、劳动模范、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群众性组织。推广的先进经验的内容，包括政治工作、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三个方面，而以政治工作为主。在网的范围内，先进队经常派人到其他队传授经验，一般队、后进队也经常派人到先进队去学习。有的地方，在一个网之内或者在网与网之间，还联合起来种样板田，探索大面积高产经验。有些地方，网与网之间或者县与县之间也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学习和传播某一项先进经验。在一个生产大队或者一个生产队内部学习解放军的“一帮一、一对红”的经验，开展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的运动。这样，就使学大寨、一带二运动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学大寨、一带二运动中，如何解决点和面之间的矛盾呢？孟县县委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孟县的县、社干部，经常有二、三百人分头到全县所有的先进经验推广网，采取既蹲点又跑面的方法，具体组织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同时，县委还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



了流动检查组，在县委负责同志的亲自领导下，组织队与队、网与网、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相互检查。通过检查，及时发现問題、解决問題，及时传播好的經驗。

在点和面的矛盾中，包括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带二的方法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这里，“超”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落后敢于超过先进，正是反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綫的精神。落后敢于超过先进，对先进是个压力，是个推动力，推动它先进更先进。现在，由落后一跃而超过先进的例子是很多的。平定县立壁大队赵三虎同志领导的第一生产队，就是一个敢于超大寨的范例。赵三虎同志說得好：“学大寨，光跟着陈永贵同志的脚印走路，不是好学生。我們要敢于当探险家。”由于他們創造性地学大寨，一九六四年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一九六〇年的一百五十七斤提高到了六百三十斤。用了四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大寨十年的路程。不仅如此，一九六四年这个队的谷子的单位亩产量达到六百九十六斤，超过了大寨。今年，大寨就去向他們学习种谷子的經驗了。

敢不敢选择落后队作为标兵的培养对象？許多同志对这个問題的回答往往是否定的。但是，实践证明，只要工作得法，落后队不仅能够很快地培养成学大寨的标兵，而且一經由落后变成先进之后，对面上的影响就更大，說服力就更强。曲沃县高村公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九六二年前，高村是全县最落后、产量最低的一个公社。一九六二年公社先后选择了两个生产大队培养标兵，都失败了。这年冬天，县委书记来到这个公社蹲点，他和公社干部一起，选择了全公社最大最落后的鹿祁大队，要把这个大队培养成为外学大寨、内学本县楊談大队的标兵。蹲了一年点，果然蹲出了样子，落后队一年变成了先进队，震动了全公社。一九六四年，全公社的十个大队自愿組成了三个先进經驗推广网，内学鹿祁，外学楊談、大寨。这一年，全公社棉花单位亩产量由一九六一年的三十多斤上升到一百零五斤，小麦单位亩产量由一九六一年的八十多斤上升到二百六十一斤，一举脫掉了落后帽子，成为全省的先进公社。这一年鹿祁大队的粮食和棉花的单位亩产量也都超过了楊談大队。这又是一个学生胜过先生的例子。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紅的运动搞好了，就可以在大面积上較快地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一九六二年，曲沃县委提出了在三、五年内全县粮食单位亩产量赶上楊談一九六二年水平的口号。实践的結果，不是三、五年，而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楊談大队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全县近三十万亩小麦，单位亩产量三百二十斤，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三；全县十五个人民公社，有十四个公社单位亩产量在三百斤以上，产量最低的一个公社单位亩产量也达到了二百九十二斤；全县二百一十三个大队，单位亩产量不到二百斤的只有一个大队。这样，就相当平



衡地把楊談的先进生产水平变为全县的生产水平了。

当然，平衡只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先进、中间、落后的三种状态。曲沃全县一九六五年的小麦单位亩产量赶上了一九六四年的楊談，可是楊談一九六五年又增长到四百多斤了，有些生产大队还超过了楊談而达到五百斤以上。这就是說，在全县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先进、中间、落后的三种状态也和原来的不同了。这就要求我們，善于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开展学大寨、树标兵、一带二、一片紅的比学赶帮超运动，解决新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如此循环往复地由不平衡到相对的平衡，再到不平衡，就可以把农业生产不断地引向新的更高的水平。

結 束 語

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把大寨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提出来了。现在全国各地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声浪越来越高，真是一派大好形势。这种形势鞭策着山西人民，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展学大寨的运动，要更加注意学习兄弟省、市的先进經驗。否則，驕傲自滿，故步自封，就必然会掉队的。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指出，“我們所有机关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①这一点，我們从两年半的实践中体会得很深刻。那里机关革命化搞得越好，那里学大寨运动就开展得好。孟县县一級的工业、交通、財貿、文教、卫生等各系統各部門，正是由于他們自己学大寨学得好，机关革命化搞得越好，所以他們能够在县委統一领导下，扭成一股劲，通过自己的业务，为全县学大寨运动服务，而且都有所貢獻。过去，孟县許多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向国家要了投資，却没有搞好。一九六三年以来，学习了大寨精神，上下一股劲，坚持自力更生方針，沒有向国家要錢，反而搞好、搞快了。有些人认为，既然所有农村基层单位都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針，国家支援农业便无事可做了。这是不对的。孟县的經驗证明，工业、交通、財貿、文教、卫生等等部門，以大寨精神支援农业战线学大寨运动，真正从思想上、工作上都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不是无事可做，而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

大寨是稳产高产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活样板。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了自己的大寨，又有了多种多样普及大寨經驗的方法，这正是“山雨欲来风滿楼，万千大寨遍神州”。我們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开足馬力，走我們自己的路，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結果！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6 页。



毛泽东思想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

唐 敖 庆

我是在一个大学里搞理论化学的。在多年科学研究工作中，我逐步地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改造世界观、方法论的过程，也是一个提高业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我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不仅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锐利武器，也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锐利武器。

学习唯物辩证法，从唯心主义、 形而上学束缚中解放出来

物质结构的研究工作，面对的是微观世界，眼看不见，手摸不着，历来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活动较多的领域。在这里，理论研究一旦脱离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就会走到邪路上或死胡同里。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能够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指导科学研究工作，自觉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能加快工作进展的速度，少走或不走弯路，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运用的自觉程度愈高，成绩就愈大。这一点，我在十几年的科学研究实践中，体会得越来越深刻了。

过去，我是不注意学习哲学理论的，没有认真读过一本哲学著作。总认为哲学和自

然科学的关系不大。一九五一年，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后来又学习了《矛盾论》。由于是初读，又没有和自己在治学思想、治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印象不深。

一九五二年，国内开展了对美国量子化学家鲍林的“共振论”的批判。我也参加了这次批判活动。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正确的、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共振论”，为什么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促使我重新反复地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我才认清了“共振论”的唯心主义本质。这个理论，用主观的假设代替客观存在的事物，否定了分子结构的质的规定性。这个理论，由于它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是量子力学中的一种流行的方法，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科学，很严密，用起来也很“方便”，而实际上却是根本违背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是实用主义的。一九五二年，我写了一篇《肃清化学构造理论中的唯心主义》的论文，对鲍林的“共振论”——中介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做了分析。通过这次学习、批判活动，使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唯物辩证法的启蒙教育，认识到要解决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自己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只靠假想和虚构是不行的。并且开始认识到，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习唯物



辩证法是何等重要。同时也认识到，我自己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还有不少地方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我过去在研究工作中所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在处理理论和实验的关系上，轻视实验；科学研究题目都来自外国文献，不注意国内建设的需要；有时为了证明一个理论，就片面地、表面地分析个别的实验现象，而不懂得只有在丰富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才能总结成为理论；有时搞出一点有理论性的东西来，就认为大功告成，只热衷于推导出结论或论文的发表，而不注意理论的应用，使之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和发展；有时还主观地扩大个别理论的作用，把某一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化。由于存在着这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影响，所以过去虽然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没有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工作进展比较缓慢。从我学习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以后，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步子走得快了，成果也比较显著了。

具体分析，抓住关键， 解决科学难题

一九五四年，我进行分子内旋转的研究工作。分子内旋转是分子内部的一种运动形式。它和分子的结构以及它们的许多重要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橡胶的弹性、蛋白质的结构，都要在内旋转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例如，橡胶能够伸长、变形，就是由于分子内旋转作用的结果，内旋转自由程度越大的，它的伸长度也就越大，内旋转自由程度越小的则相反。

过去国外许多化学家都曾做过内旋转的研究工作，结果都不太理想。美国著名量子化学家皮泽曾提出一个方程式，这个方程式是根据一些简单分子的实验数据的经验提出的，并没有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会出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揭示出内旋转的规律性。因此，这个方程式只能适用于解释一类比较简单的分子内旋转，不是一个在较大范围内适用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公式。二十多年来，外国不少研究分子结构的科学家都企图解释这个问题。美国量子化学家鲍林也做过这项工作。他仅仅分析了八个数据，并且夸大了不起主要作用的旋转轴的作用，没有抓住在内旋转过程中由于运动和阻碍运动而产生的能量变化这个决定的因素，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是主观片面的。

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学习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矛盾论》的观点。首先，对分子内旋转这一特殊矛盾运动的过程，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又集中注意力去抓分子内旋转这种运动的主要矛盾，使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分子内旋转这种运动，是分子中的一个基团相对另一个基团围绕着一个轴（化学键）的有规律的转动。基团是带电的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作用。在内旋转的过程中，如果基团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相互作用的能量也就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而基团的这种矛盾运动，是由运动和阻碍运动的能量变化决定的。因此，了解内旋转过程中由于运动和阻碍运动而产生的能量变化的规律性，就成为了解内旋转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进一步找出了产生这种能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内



旋轉分子兩端的基團在不同位置時產生的不同相互制約作用所引起的。這樣，經過一年時間，終於第一次從理論上提出了一個可以計算許多複雜分子內旋轉運動的能量變化規律的公式，即“勢能函數公式”，用一個數量的關係，把分子內旋轉自由的程度表示出來，並且使物質的一些重要性質，可以從這種數量的關係中進一步推測出來。這項成果在一九五五年發表了。國際、國內有不少反映。這個公式被吸收到一些專著和教科書中去了。

後來，隨著紅外、微波等實驗技術的發展，有關內旋轉的實驗數據在國外文獻逐漸增多。我們為了使這項工作真正地具有十分豐富的實驗根據，再一次檢驗了這個理論，使這項函數公式更為準確，並且以這個公式分析預測了多方搜集到的八十多個分子內旋轉數據，理論結果和實驗值幾乎完全一致。接着我們又經過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改造和加工，使它更加簡明，更具有普遍指導意義。一九六二年，重新發表這項成果，再次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

在這項工作中，由於我們運用了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對具體事物進行了具體分析，並抓住了主要矛盾，所以能夠在分子內旋轉這個複雜的自然現象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确途徑，使內旋轉理論又得到了新的發展。

從革命需要出發選題， 到實踐中去檢驗和發展理論

一九五六年，我從我國的科學規劃中，看到在分子、催化等方面迫切需要開展理論研究，領導上也希望有人去搞，于是我決

定參加高分子物理化學的研究。對我來說，雖然不是改行，但從研究對象和任務來看，確實和我原來搞的物質結構學科不同。為了我國高分子工業和科學發展的需要，我決心暫時放下物質結構問題的研究，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這個很不熟悉的新領域。

六、七年來，我們主要用統計理論的方法來研究高分子物理化學中的一個部分——高分子動力學，對於高分子的四個基本反應類型——縮聚、加聚、交聯和裂解的動力學規律，都做了比較全面的探索，其中做了一些被認為是有較大實際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創造性工作。這對我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方向來說，是一次革命，是認真貫徹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逐步轉變為新型的社會主義的科學研究工作的一次革命。

在科學研究的選題上，我們注意了從我國生產的實際需要出發，同時把當前直接為生產服務的課題和將長遠發揮重大作用的基本理論研究課題恰當地安排好，使理論工作牢固地立足在三大革命實踐的基礎上。我們做的高分子縮聚反應動力學和高分子交聯理論的工作，注意了密切結合實際，注意了把實驗工作跟上去，努力做出自己的正確的實驗數據，逐步建設我們自己的實驗基地。現在，高分子動力學研究所用的數據，很多是我們自己做的。

在自然科學研究上，我們並不無原則地排斥外國數據，還是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科學成就。但是，為了取得科學問題上的主動權，一定要自己取得第一手的科學根據，再加上經過判斷認為正確的外國文獻上的數據，才能進行理論加工。理論的“原



料”——实验数据，不应该全靠外国供应。

在分子动力学的研究中，我们比较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不满足于理论的探索，而是把所得到的理论不断地回到实践中去应用，在实践中经受考验和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说的理论。”^① 经验证明，从一两次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必须使这种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验证，达到了预想的结果，这才算真正掌握了客观规律，取得了真正的自由。

我们把高分子凝胶化理论发展到固化理论，经过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反复过程。在分子动力学研究中，我们开始搞的是凝胶化理论（凝胶就是生产合成材料时出现的废品），研究工业生产高分子材料的凝胶点问题（凝胶点就是开始产生凝胶的条件），找出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凝胶，什么条件下不产生凝胶。接着，我们又把凝胶化理论拿到实践中去，进一步发现，凝胶点和高分子材料的合成配方有关，又找出了一个凝胶区域，知道在什么范围内产生凝胶，什么范围内不产生凝胶，从而使配方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预见性。后来，通过实验和下厂，又进一步发现，在某种配方下达到某一反应程度时凝胶量有多少，不凝胶的有多少。经过这样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多次的反复，使我们的认识产生了又一个飞跃，把原来的凝胶化理论，发展为高分子固化理论。

总的看来，这个阶段对高分子动力学统计理论的研究，由于研究方向正确，指导思想明确，注意了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研究成果比以前成熟。虽然，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进到高分子学科中最主要的理论领域——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但是，固化理论的研究，已经在通向解决结构和性能关系问题的道路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如果从理论上我们完全弄清楚了结构和性能的关系，那么，在分子的合成、改性上就能取得更大的自由。

勇于批判，敢于创新， 走自己的路

一九五八年前后，我的科学研究领域扩充了，工作也比过去做得深入、系统了。这时，在我面前摆着一个突出问题，即如何对待外国科学研究成就，敢不敢打破洋框框，闯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反动统治，科学上很落后。那时很多自然科学家有一种迷信欧美、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自卑心理。我也有过这种心理。我虽然在政治上较早地同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破除了迷信，但是，这不等于在科学上也破除了对美国的迷信。这个问题，我是在毛泽东同志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伟大号召之后，认识上才明确起来的。这里有一个精神状态问题。如果总认为外国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总觉得赶不上去，自己首先在思想上甘拜下风，那就不能超过别人。所以，我们对待外国的科学成就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9页。



不能迷信，而要一分为二，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力争主动，打破框框，敢于闯出自己的道路。只是盲目地跟着外国跑，是永远也赶不上国际水平的。这里也有一个战略战术问题。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坚信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在战术上则要刻苦踏实地下一番批判吸取和创造发明的硬功夫，不怕困难，不怕摔跤，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五九年，当我们研究高分子交联理论时，碰到了如何对待查尔斯贝交联理论的问题。交联，就是两个高分子由于某些外来因素（如光辐射等）的影响相互联结起来，使原来高分子的性质有所改变，它对改进高分子合成材料的性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查尔斯贝只是英国有名的辐射化学家。他在一九五四年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辐射交联理论的论文，提出了一个交联度和溶解性能关系的公式。后来，由于在实验中感到查尔斯贝理论用起来很别扭，对不少现象解释不了，促使我们重新审查了这个理论。我们发现这个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研究交联理论问题，违背了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我们对查尔斯贝在理论处理中反映出来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判，写了文章，发表了我们的理论成果。现在看来，我们对查尔斯贝理论的批判仍然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事物的矛盾很复杂，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不容易，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忽视了唯物辩证法的应用，都可能导致新的错误。

我们的文章发表后一年多，在实验中发现，缩聚反应后的凝胶和交联反应后的凝胶并无本质区别，但是我们曾经认为，这两种凝胶的凝胶点是不一样的。一追究，才发现当时我们在一个物理概念上搞混淆了：只看到高分子和小分子的共同性，忽略了它们各自的特殊性，把高分子的溶解和小分子的溶解看成一回事，把大块的凝胶整体看成一团一团的堆积，因而也就不可能发现高分子交联反应的本质。于是我们又重修整物理模型，严格进行理论处理，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得到了一个在当前被认为是严格的完整的结论，把高分子交联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现在看来，如果当初对查尔斯贝这个权威有迷信，不敢去碰；或者一碰之后，由于自己也犯了错误而不敢再碰，那么，新的理论成果也就不能产生了。正由于我们坚决相信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要做一个无所畏惧的彻底唯物主义者，才能既敢于纠正别人的错误，弥补其不足，又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工作推向更高的阶段。这件事也说明我在科学研究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还不够自觉，不够熟练，在部分问题上脱离了唯物辩证法，使工作走了弯路。这个错误也教育我今后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在科学研究中要细致、要严谨。

，世界是无限的，客观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永远不会完结。我们科学工作者，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探索，也就永远不会有什麼所谓止境。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就会永不满足，不断前进，主动地去寻求客观世界的未知真理，在理论化学的研究中，开创自己的道路。



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一九六三年，我们学校的物质结构讨论班开学后，我的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这个班的工作上来了。这个班要在二年内使学员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在业务上打下扎实的基础，开展科学研究。这个班的正式学员绝大多数是副教授和讲师，有些同志已经指导研究生了。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打好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我们首先用一年左右时间，学习了对研究对称性事物很有效的数学工具——群论；学习了和分子结构有关的原子结构、核结构的基本理论；学习了研究物质结构的红外光谱、磁共振等现代实验方法。到一九六四年，我们才进入科学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比较自觉地注意学习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取得了成就。

首先是选题。是选我们大家熟悉的老题目，还是选国家最迫切需要却是我们不熟悉的题目？是各做各的，还是集中组织起来做？根据全国科学规划的要求，我们决定集中力量搞配位场理论问题的研究。配位场理论是分子结构的三大理论之一，在国际上近十多年才发展起来，成为现代无机化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我国对配位场理论的研究相当薄弱，但它对我国当前研究受激光发射的原理，解释络合物化学、元素有机化学的结构与性能的内在关系和催化作用的机理，都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个领域，我与大家一样都是陌生的。而且，国外已经有人做过不少工作，要赶上去不容易。有的同志对于攀登这个新的科学高峰流露出一些畏难情绪，认

为很难再做出什么成绩了。针对这种思想，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增长了大家的志气。有些同志说：我们要为我国科学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就要有雄心壮志搞“热门”，不应贪图个人名利而去搞“冷门”，追求发表一两篇文章。这样的认识就对头了。至于熟悉不熟悉，我想，我不应该以自己熟悉什么为标准来领导大家搞什么，只要国家需要，就要敢闯，敢于革命，敢于创新，绝不能让几本厚厚的外国专著吓住，绝不能走轻松熟悉的老路。同时，熟悉和不熟悉也是相对的。只要敢于实践，闯出来了，就由不熟悉转化为熟悉了。如果尽挑熟悉轻松的工作做，怎能使干部练出过硬本领呢！

根据这个认识，我们下了决心，集中组织了力量，展开了一场攻坚战。

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在研究配位场理论时，各项工作往往是孤立地进行，不能从它们互相之间的影响和联系去观察和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一直没有搞清楚分子结构和原子结构、核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做法和他们的根本不同。我们在掌握了配位场理论的最新成就后，接着就集中力量从研究物质结构的几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分子结构和原子结构、核结构之间的关系入手。经过努力，终于克服了困难，在较短的时间里，不仅搞清楚了原子结构和配位场的弱场理论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计算方法大大简化，而且也搞清楚了配位场中弱场理论和强场理论的关系，对低对称的计算方法也达到了标准



化。这三項成果，都是对配位場理論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場攻坚战中，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及时地不断地給了我們前进的力量。一九六四年，我們开始研究强場理論这一項工作时，也曾走了一段弯路。开始究竟怎么搞，大家心里沒有底。經過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当时大家认为比較滿意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計算，但結果表明，这个方案有錯誤。原因是：我們把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群”当作了根据，所以实际計算的結果和原来預想的不一致。大家都有点难过，觉得几个月的工作白做了。后来我們又組織大家学习了《实践論》，受到很大鼓舞，进一步認識到正确的認識往往不是經過一次实践就能得到的，工作中的計劃、方案，在实践过程中需要修改、补充，甚至根本推翻的情况也是有的。經過大家的总结，得到了正确的認識，于是重整旗鼓，否定了一个实际不存在的“群”，重新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克服了原来方案的主观片面性，进一步发展了配位場理論的强場理論的概念，提出了混合組态的配位場理論，对配位場理論提供了新的內容。

这样，我們只川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做到了对配位場理論，从知之甚少到比較透彻地掌握，从落在国际水平后面到赶上并超过它，为今后开展配位場理論的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場攻坚战，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必須以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具体說来，要注意以下几个問題：第一，选题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密切

結合实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服务；第二，树立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創新，敢于攻坚，不怕挫折的革命学风，把彻底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結合起来；第三，在組織上，集中一大批經過严格基本訓練的兵力，有准备地打歼灭战；第四，科学研究成果必須回到实践中去，进一步普及和提高；第五，貫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展开自由討論，充分發揮集体智慧。

我們这次攻坚战，由于基本上做到了以上几点，所以不仅做出了較高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培养和鍛炼了干部。原来信心不足的同志，有了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勇气，原来不大敢动手摸这类大难题的同志，在这次攻坚战中被引上了前綫，也有了信心。

* * *

回顾我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得到改造和成长的这段路程，深深地体会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事的极端重要性。

从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讀到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算起，近二十年来，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全部著作，反复閱讀了《实践論》、《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三篇整风报告等著名著作。現在尽管工作比較忙，每周我都抽出一定时间，坚持学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我的政治立場、思想修养、学术思想、学风和治学方法，都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是我在政治上和业务上能够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我一定要繼續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領会运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在科学上做更多的工作。



統筹方法試点工作散記

华 罗 庚

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党所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在动员着每一个人，数学工作者当然不能置身事外，也不应当墨守成规，束缚在老框框、洋框框中而怡然自得。那末，数学工作者怎样才能运用数学这门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

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哪儿都有数，哪儿也少不掉形。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日用之繁，都少不了数学。理论上，这是不错。但对若干搞数学的人来说，他们在真正寻找用场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宇宙之大的数学，天文学家搞了；粒子之微的数学，物理学家搞了；火箭之速的数学，力学家比我们掌握得好；日用之繁的数学，说来惭愧，算不熟，算不快，而且不愿算，不屑于算。怎么办？

真个是“大道如青天，独我不得出”。看来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同志一句简单的话，照亮了我们的思想深处。他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①对！我们啃一啃实际，把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弄出一个名堂来。

从何着手？饭是一口一口吃的。在广大数学工作者创造、探索和尝试其他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一些人先试点搞统筹方法的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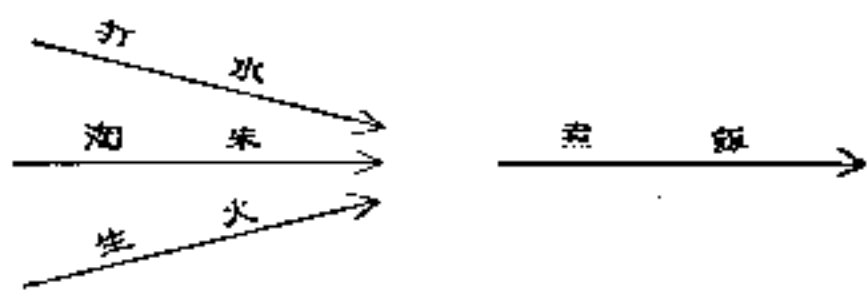
广。从去年起，我们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在土木建筑、机械维修和试制、冶金、化工、交通、铁道、科学研究等不少项目上进行了试点。

啃了实际之后，形势大变，理论联系实际不再是停止在口头上的空论了，而是开始找到了数学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道路。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日用之繁，固然各有专家，但数学工作者也有用武之地，能成为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能起些数学工作者所能起的特殊作用。

* * *

现在所搞的是统筹方法之一，就是在环节较多的、配合关系较复杂的工业体系（或基本建设、科学研究）中寻找主要矛盾线的方法。为了读者方便，我们还是用些篇幅来描述一下这个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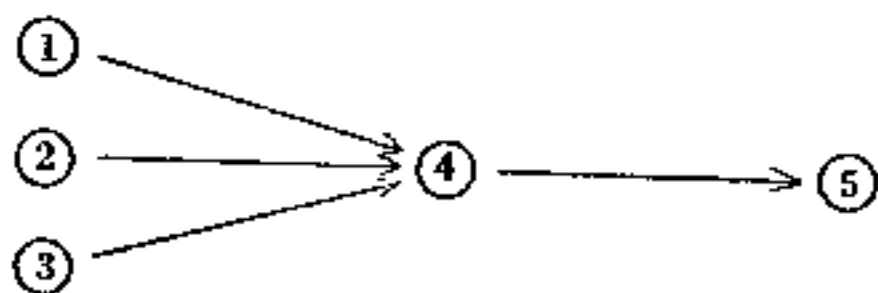
每一个任务用一支箭(→)来表示。各个任务有先有后，例如：任务煮饭就必须在任务打水、淘米、生火之后，按次序排成箭头相关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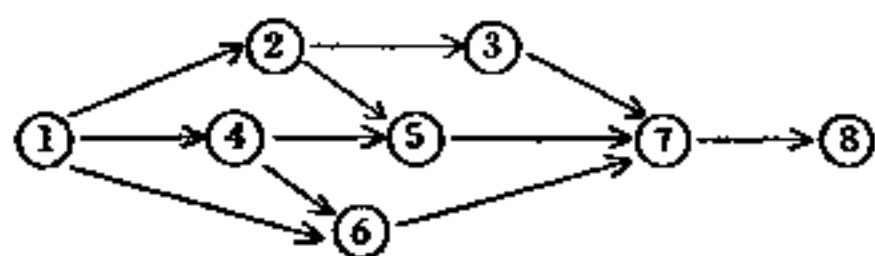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页。



这个图说明，必须打上水，淘了米，生上火，才能开始煮饭。在箭头箭尾上标上号码，其中①→④表明打水，②→④表明淘米，③→④表明生火，而④→⑤表明煮饭，就得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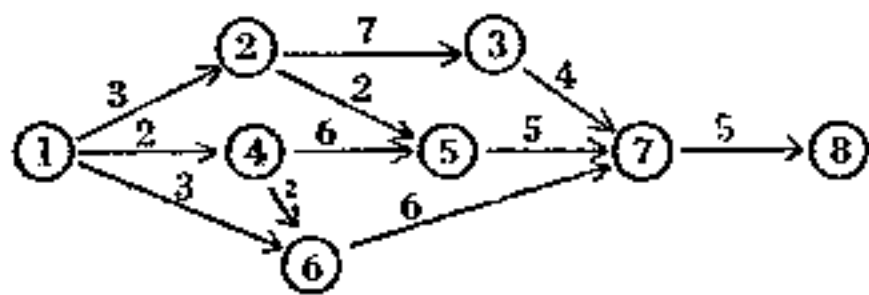


在任务众多的工程中，也可以这样画出相互关系的箭头图来。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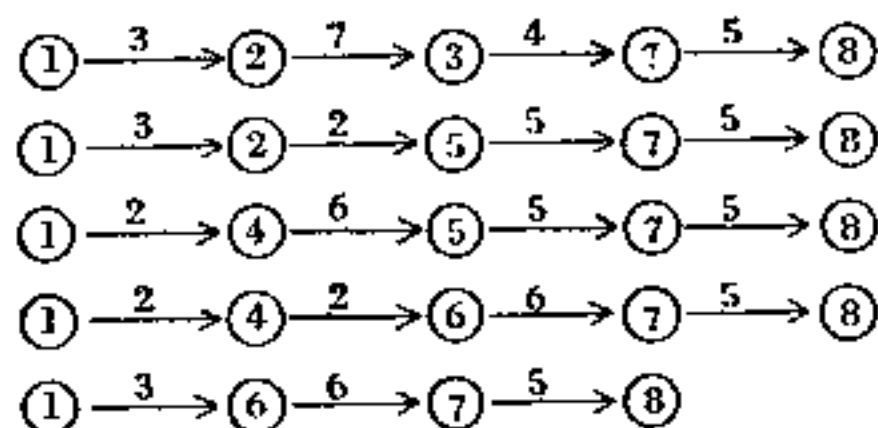
图中共有十一项任务，各项任务是互相联系着的。图中表示：①→②的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②→③和②→⑤两项任务；在①→④的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④→⑤和④→⑥两项任务；在①→⑥和④→⑥两项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⑥→⑦的任务；如此等等，直到把最后一项任务⑦→⑧完成了，全部工程才算完成。

把每个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写在箭杆上，例如任务①→②需要三天，我们就写成①³→②。这样，每支箭杆上都写上天数，箭头图就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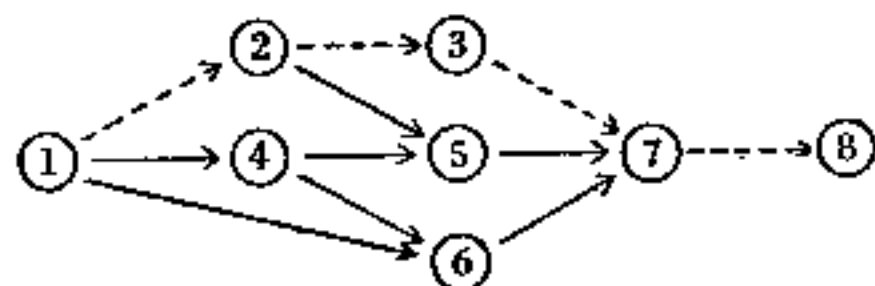


那末，全部工程要多少天才能完成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起始点①到终点⑧，顺着

箭头走共有五条线路：



把每条线路的天数加起来，它们依次为19天、15天、18天、15天、14天。第一条线路需要的天数最多，要19天才能完成。这就是说，不论其他各线路能缩短多少天，如果这条线路上不能缩短天数，那末，全部工程还必需19天才能完成。我们就把这一条线称为主要矛盾线，在实际操作中一般用红色标出来，而现在用虚线标出来。



统筹方法的原理，我们就介绍这些。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

1. 明确地看出了主要矛盾线在整个工程中的地位。在主要矛盾线上延缓一天，整个工程就必然延缓一天，提前一天也就使整个工程提前一天完工。领导上掌握了这个图，就便于抓住主要矛盾，统筹兼顾。

2.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加班加点，有时候，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加班加点，但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却坐待其他任务的完成，这就窝了工。掌握了箭头图，这个缺点就可以避免了。不仅如此，在非主要矛盾线上，还可以抽调一定的人力物力支援主要矛盾线，这样就合理地使用了人力物力。



3. 当然客观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由于主要矛盾线上工人同志的主观努力，或由于技术革命加快了进度，又如非主要矛盾线上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难以预见的困难，这样就会出现主要矛盾线转化的情况，使原来的非主要矛盾线变成主要矛盾线。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步修改箭头图，就会预见到这种转化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及早采取措施，避免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

4. 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重点明确了，力量容易用在刀刃上。主要矛盾线上耗时最多的项目，是我们应当最先搞技术革命的所在。实际上，这也是重点科学研究项目产生的来源。

5. 更重要的是把这一方法用在计划工作上，在开始作计划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那好处就更多了。例如，某一工程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力争高速度，那我们就可以设计出一个在保证最快的条件下人力最省的方案。又如，如果要求工效最高，那我们就可以设计出这样一个方案：使人力安排得最恰当，发挥的效力最高，而所用的时间又最短。

6. 采用统筹方法，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赶工，平衡地进行生产，因而也有利于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7. 技术总结也可以使用箭头图。有了图，在以后类似的工程中参考它，就会逐步加快速度。

总之，运用统筹方法，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我们运用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探索工作，虽然还仅仅是

开始，虽然现在还是“一个方法”，“若干试点”，“时间不长”，但由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支持，在我所了解到的十几个试点上，效果是很明显的，令人鼓舞的。

动人的事例很多。

例如，某中学的建设工程，采用了统筹方法，开始时把工期缩短为122天，经过深入分析之后，又改进为103天，再结合技术革新的措施，现在已改进为86天了。

某耐火材料厂停工维修某机件的时间，由于采用了统筹方法，由原来的48小时缩短为24小时，在实际执行时，由于工人的努力及进一步合理安排，仅仅用了17小时。少停工一天，就可为国家多生产万元左右耐火材料。

例子举不胜举。由于采用统筹方法，节约时间20%到30%的不在少数，甚至有节约50%的。

老实说，我搞了半生数学，这次参加了统筹方法的试点，看到数学这样有用，看到数学可能广泛地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苗头，在想到将来数学工作者可能创造、发掘、移植更多方法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时候，在想到统筹方法的应用从“点”推广到“面”，从下面的厂扩展到上面的公司或部门的时候，真是兴奋异常。可惜我现在还不能把所见所闻与所感系统地表达出来。但燕乎燕乎，在它飞来时候预兆着春满人间，嘉禾遍地。

* * *

在这次工作中，最根本的收获是深深体会到理论必须结合实际。

这一个原则上说来十分简单的统筹方法，一经和实际工作结合就显示出作用，成为



数学理論工作者与生产工作者之間的桥梁。

在搞統筹方法試点的几个月过程中，使我的認識有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一阶段刚入手的时候，对統筹方法的認識是純理性的，并且加上一些臆測的东西。但看了現場并且和实际工作者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方法变活了，有生气了。例如，把工作任务的项目“分細”，原則是极简单的，看来是十分抽象的，但一到具体之中，內容就丰富起来了。挖一条隧道，单向挖掘，就是一项工作任务；为了加快进度，从两头开挖，就是把一项任务分作了两项任务，工程进度可以快一倍。在基本建設工程中，挖地基、安模板、澆灌混凝土本来是三个連貫工序，但把每一个分而为二，交叉起来，即在挖好一部分地基时就开始安模板，在安好一部分模板时就开始澆灌混凝土，可以縮短工期。某鋼厂的基建工程就是这样一分为二，交叉作业，把原来需要三十天的工程縮短为只需要十一天。这时，大家不仅愿意和我談談統筹方法，也愿意和我談談各种各样的数学問題了。这样，使我感觉到数学理論是生气勃勃、大有用处的。

数学的特点是抽象。科学的抽象应用的范围是广泛的，但如果不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去，就会成为“空架子”。我們搞数学的人，口头上常說数学大有用处，但是过去却找不到什么用場。苦哉！通过这次鍛炼，真正看到了数学抽象的作用。看来似乎风馬牛不相及的一些項目，如炼焦、造桥、印书、装配汽車、修建大楼、抗生素提取等等，都用得上同一套数学方法。它們的操作过程都可以表达成为箭头图，可以同样地分析出主要矛盾

綫，可以同样地利用“平行”、“交叉”等技术来安排人力，縮短工期。

搞統筹方法的試点也使我認識到，理論結合实际对教学工作的好处。

在教学改革中，領導上提出教学內容要少而精，但一刀子从哪儿砍下去，哪些可以砍掉，哪些砍不得，心中无数。理論上看到不少該砍掉的东西，但在动手砍的时候，就有所顾虑，誠恐一斧之下，有用的部分也砍掉了。这种可能是有的，因为我們当时沒有和生产实际相結合，因此我們的傾向是把形式上漂亮的理論留下来，而把有用的形式上不好看、不好讲的部分砍掉了。例如，解放前我教微积分，就是略去最有用的“数值积分”，而讲了許多求原函数的“巧”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一句话，缺少实践。

这次搞統筹方法时，同志們給我們提了不少数学問題，使我們有可能根据实际需要肯定数学中一些常用的部分。深信在范围逐步扩大，工作逐步深入，参加者逐步增多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从数学的各部門中，挑选出最关键的、最常用的、最有用的东西。这样做就会把教学改革提高一步。

教学工作应当同生产实际密切結合。生产实际的需要，应当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对我个人來說，“戎馬半生”都是在理論中兜圈子，矯枉必須过正，就更需要在实际中多泡一泡，在实际工作中，在科学实践中，踏实地学一学唯物辯证法。

* * *

贯彻理論結合实际的原則，还必须正确地認識提高和普及的关系問題。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文艺工作的时候說



过：“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①。数学工作也是这样。

数学工作者在解答数学问题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一种是，有人来问，我就事论事，给他答案，而不涉及所用到的方法的来龙去脉；另一种是，不但给答数，而且连方法也尽可能地教会人家。使用前一种做法，其结果是下次有同样性质的问题他还得向我请教；而使用后一种做法，则是一次会了，下次不来。如果再来，问题发生质变了，难度更大了。哪一种做法好？我们应当采取后一种做法，把自己会的东西无保留地交出来，范围愈大愈好。虽然我们不再专有了，但更多人能搞，就容易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民服务，也容易提高了。令人高兴的是，这样做了之后，前来找我们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多到了应接不暇了。

就我个人来说，以往是重提高而轻普及的，以为提高难，普及易。但在接触实际之后，觉得提高要，普及也要；同时发现，提高难，普及也不容易。我在提高工作中固然失败过千百次，碰得头青鼻肿过，走过了一些不平坦的道路；但在尝试一下普及工作的时候，发现了：明明是自己懂了的熟了的的东西，就硬是写不通俗；自以为通俗了，对群众一讲，群众依然不懂，易稿十来次是平常的事。不懂固然使作者下不了台，而懂的人多了，能提意见的人也多了，一有错误人共见之了。如果没有正确的观点，就会感觉到这是既麻烦又易于丢脸的事。但实质上，这是好上加好的事：意见多了，改进工作的机

会多了，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也多了，吸收营养的机会也多了。

当然我不是说，提高工作该放松，或不值得搞。提高还是很重要的工作。我的意思是要正确地认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②

* * *

在统筹方法的试点工作中，还使我深深地受到了群众的教育，看到了群众路线的伟大意义，同时也看到了工人群众和出身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贡献出一切力量的积极性。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和群众在一起就感觉到有一股子劲推着我前进，感觉到劳动人民是最聪明的。他们结合某些工程的特点，在运用统筹方法的时候，有了许多创造。例如，创用了时间座标，劳力座标，双端“虚工”，单标号系统，圈中加注，不另算时差等等。不仅如此，对连续生产，多目标生产，人力调配，也都开始摸索出些门道来了。

群众路线真是宝！最熟悉工作情况的是亲自参加劳动的人。流线图交给了群众，群众经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修改和改进的意见。当调度员、计划员接触到这个方法之后，结合业务画出箭头图的时候，往往就立竿见影地缩短了工时；当这个箭头图交到工

^{①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4页。



段长(或小組长)手里共同研究的时候,由于主要矛盾所在明确了,大家根据自己所負責的工段献計献策,第二次又縮短了工时;把流綫图交到工人手里,大家明确了在整个工程中自己所处的地位,在执行中干劲发挥了,又第三次縮短了工时。这样每深入一层,就突进一步。有一个例子是:有一項工程,原来計划是39天完成,經過画箭头图就改为30天,工段长們一討論改为26天,实际做起来只用了25天稍多一点,还是由于厂外单位沒有在統筹之列,耽誤了些時間,如果全“統筹”进去,他們估計20天左右也就够了。真是,理論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試点工作还仅仅做了很短的时期,但已使我对統筹方法的認識完全一新了。“空架子”不再空了,而有了八九十来种內容。即以我所写的《統筹方法平話及补充》一书而論,出版之前一改再改,改了不下十几次。結果我实际上已几乎不再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是集中群众智慧的执笔人了。书出版还没有几天,在一个交流会上,我又看到出現了不少书上所沒有的东西。科学到了群众手里,变成归林的鳥、得水的魚了。

統筹方法的运用,在工人和干部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和良好的反映。这些反映說明了工人同志們和实际工作同志們多么欢迎数学理論工作者下楼出院啊!哪怕只是搞出一些很小的成績,他們也用最大的热情来鼓励我們。

* * *

老实說:我是一个在思想上还没有过硬的人,还存在着不少资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

在这次工作中幸不掉队,完全是靠了党組織和同志們的具体帮助。

敞開談吧,头一次到現場去搞試点工作,从北京出发的时候,我还是大胆的,满怀信心的。一路上我还記得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視敌人,战术上重視敌人。但到了現場,好大的規模,好复杂的系統,并且这也不懂,那也不了解,連一些起碼的工程知識(如橫道图)都沒有真正接触过。这一下可把我吓慌了,出現了“叶公好龙”的現象,胆怯起来了。幸亏当地党組織及时地对我們做了思想工作,一方面使我們深入現場,了解情况,听听新人新事;另一方面又給我們鼓励、打气。当我看到同志們都在忘我劳动的时候,我这个“我字当头”的考虑也就由濃而淡,由淡漸消了。到現在为止,自我检查一下,离“无我”还远得很,但吃一塹长一智,在和同志們一起战斗的时候,耳濡目染,漸漸可以有些“忘我”了。

这一工作也折服了我的虛驕浮囂之气。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长时期来,我总錯誤地把虛心了解为外表上的謙虛,因而总是在外表的謙虛上用功夫,結果搞成不伦不类,流于形式,謙虛成了虛伪,而內在的本质的自高自大却原封未动,保留在心灵深处。在这次工作中,接触到不少工人和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从他們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同时也开始認識到,以往的所謂业务上过得硬,也不是并无問題的。那只能说,在我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在学生和初学者面前显得硬些而已;在千变万化的实际工作面前,业务上的漏洞就都暴露出来了。人家



提的問題，偏生不是你所專長的問題。例如，我沒有很好地學過數理統計、概率論這些學科，但偏偏碰到了不少與統計有關的問題，這也使我認識到，食而不化地看些書本是經不住實際考驗的。當然我可以用“不對口徑，非我所長”來一推了事，但看到大家為祖國建設忘我勞動的時候，我能忍心不想一想嗎？一想就發現了業務上種種不過硬處，使我認識到，不但我在“紅”的方面不過硬，在“專”的方面離祖國的實際要求也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更認識到紅專結合的過硬才是真過硬，才能符合黨的需要、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另一方面，我的認識還大大落后於客觀現實。在搞這個試點工作的時候，心裡總有些不踏實，誠恐人家議論，這是不“夠味兒”的數學，這是“膚淺”的東西。這實質上是在“以舊我之心度新人之腹”，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片面看法。不久前，我參加了若干數學工作者在一起的座談會，感覺到在黨的教育下，數學工作者也面貌一新了。很多人都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綫中去，大家談出了不少親身體會，體會的深度使我開了眼界，學到了東西，認識到“味兒”是有階級性的。純學院式的“味兒”，資產階級玩物喪志的“味兒”，正在退出歷史舞台；而健康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味兒”，正在發出馥郁芬芳。

此外，在試點工作中，還扭轉了我從舊社會帶來的一個錯誤看法。在舊社會，“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輕。每當跨進一個新領域的時候，就會遭到一些排擠，甚至遭到莫明其妙的打擊。但今天我們的新社會情況完全不同了，勞動人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並不因為我

們搞數學的人問津工業工作而不高興，相反地高舉雙手熱誠歡迎，並不因為我們對具體業務的無知而嘲笑我們，相反地耐心教我們、幫我們。這使我認識到，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大家的奮鬥目標一致，會愈干愈團結。

有一位老太太對我們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數學工作者說了一句很有益的話：“你們可能是最後一代演舊京劇的演員”。我們現在可以回答這位老人的關心了：“我們立志做第一代新京劇的演員”！向京劇演員學習，在數學工作的舞台上革命！

總之，我深刻認識到黨在科學領域中所起的領導作用。偉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當然還遠遠沒有學好，但已經開始有些體會了，嘗到些甜頭了，有些自覺學習的願望了，心甘情願像小學生般地學習了。由於覺悟低，以往走了些彎路，窩了工。好在我年紀還不算太大，願意急起直追，努力趕上先進同志們的步伐，和同志們團結一致，互學互幫，沖上前去，沖到革命的浪潮中去，學數學、教數學、用數學、鑽研數學，都是為了革命。

古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不！我要改一下：“甫聞道，即行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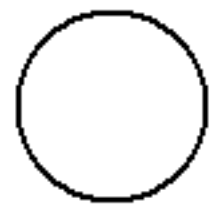
工作還沒有多大成績，體會也不深刻。我現在的心情，有點像一個初到海濱的娃娃，拾得了一個貝殼，立即連跳帶跑地奔向媽媽，給媽媽去看。

更正 本刊第10期第35頁左欄第8—9行“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事實”，應為“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历史事實”。



一所为农民服务的医院

· 安 宣 红 ·



在吉林省洮安县瓦房这个偏僻的农村小集镇里，有一所小医院，看起来“土里土气”，若不是挂牌子，外地来的人，谁也看不出这是个治病的地方。可是，这个“土里土气”的小医院，却充满着革命朝气，出色地完成着自己所担负的医疗、预防任务，并帮助附近七个公社的医疗机构处理疑难病症，受到这些公社的农民群众的欢迎。这所医院的同志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排除万难，艰苦创业，打破陈规，上门治病，忠心耿耿地为广大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当地农民都说：“这医院真是给咱们开的！”这就是瓦房农村中心医院。

自己动手，勤俭建院

这所医院名叫瓦房医院，住的却是土房。有人说：“太简陋了，咋不修个砖瓦的？”可是，瓦房医院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一九六一年，上级决定把医院由集镇中心挪到东南角，加以扩建。这里是一片荒草场，只有原配马站用过的九间年久失修的破马棚和三间将要倒塌的小土房。附近草深没膝，蚊蝇麇集，一到雨季，积水成沼，是一片车马难行的烂泥塘。建院前，全院人员都

想：“这回迁院，准是国家投资，要修个像样的医院了。”于是，房屋的结构、数量、布局和医疗设备，成了他们议论的中心。他们越谈头脑越热，拟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有三十五名人员的编制，建造三十五间砖瓦结构的房舍，购置万能手术台、X光机、无影灯、发电设备、小型暖气等等。不料，这个计划没有被批准。医院几个领导干部想：“又叫迁院，又叫扩建，提计划又不批准，难道能用这个破烂摊子做医院？”越想越糊涂，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时，县委指示他们认真地学一学毛主席的《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文章。他们组织全院同志反复地学习了这篇文章，对于建一个啥样医院，怎样建医院的问题，在全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识到：“修洋房，就得伸手向国家要钱。我们应当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于是，一场紧张的建院劳动，从一九六一年秋季开始了。

建院开始时，全院的医护、行政人员，都挤在三间土房里。这里既是挂号室，又是办公室。没有门诊室，就先在马棚里隔出一间小房，一面劳动，一面开诊。

在建院中，大家都有股热劲，干的挺猛。转业军人、共产党员李树新大夫，现身说



法，介绍八路军医务人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家听了以后，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老八路医务人员的优良传统，决不能遇难而退。大家都争着和泥、托坯、抬土、打墙、扒旧房木、填烂泥塘、起马圈粪。调剂员宋国栋争着抢重活干，每天早来晚走，经常比别人多挑三十多担土。人们称他为“宋大力”。医士马万祥本来不会做木工活，看到木工不足，主动去当助手，边干边学。不久，一些简单的木工活就能独立操作了。房子上梁，他当总指挥，在修建中起了骨干作用。人们称他为“马木匠”。团员申铁志，身板虽弱，却有个“不服输”的精神。诊室里要修两道火墙，他主动承担了这个问题。起初垒了三次，倒了三次。有的人说：“这个活连瓦匠都干不了，撂下算了！”他并没有泄气，经过多次琢磨，到底把火墙修成了。同时，还学会了砌炉子、搭炕、糊棚、上玻璃等活计。在建院中，他成了多面手，大家都叫他心灵手巧的“申瓦匠”。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十四间新房盖起来了，但是，内部还没修好。为了适应门诊的需要，必须突击抢修。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干起活来格外艰苦。铺地没有砖，就从冻得非常结实的旧房基里，一块一块地挖砖头。有的同志把手磨破了，有的同志抬砖把肩压肿了。经过七天苦干，一共挖出砖头七千多块，铺了十四间砖地。门诊室、办公室、挂号室、手术室、处置室和病房，相继竣工。

劳动获得了成果，劳动锻炼了人。大家都把亲手修建的医院，看成是自己的家，想方设法替它加砖添瓦，对医院一草一木都格

外珍惜。

缺乏医疗用具，他们也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尽量自己动手解决。原来医院没有手术台，用县医院送给的一张妇科检查床来代替。这张检查床的高度和长度都不够，就垫上八块砖头、接上一张桌子来使用。但是，这样做起手术来还感到不方便，马树行和魏赞巍两位同志就决心亲自动手做一架手术台。做个啥样的？一时又想不好。有一天，他们去理发，看到理发室的转椅能自动起落，受到启发，并参考从沈阳借来的一张万能手术台图纸，终于做成一架半自动木制简易手术台，一直用到现在。他们还用木板制成了简易的“靠背架”，用旧药瓶改制了酒精灯、吊瓶等许多医疗器械，解决了手术上的急需。医院里的泥抹小修，日用器具的制作、修理，都是全体同志亲自动手，从不外雇工人。八年来，医护人员的罩衣，病房的被褥，都由他们自己拆洗制作，给国家节省开支八百多元。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院的精神，一直保持下来。

同贫农下中农结合，改造思想

瓦房医院有八名青年医生，其中有四名大学生，四名中专毕业生。他们刚来到这里时，大都不安心工作。他们想：“这地方镇不像镇，医院不像医院，能搞出啥名堂！十几年功夫白下了。”

沈阳医学院毕业生魏赞巍，在毕业分配时，一心想留在沈阳市。他想：在大城市，大医院，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开刀攻胸，将来也能成个知名的外科医生。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被分配到吉林省的洮安县瓦房中心



医院来了。他看到这所医院的房屋、医疗设备出乎意料的简陋，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到这里工作，自己的青春、理想、前途，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整天愁眉苦脸，坐卧不安，甚至不辞而别，跑回沈阳。后来经过他哥哥严肃的批评，才又回到瓦房中心医院。他的同学李贵山的表现，也同他差不多。

医院党支部书记孟广礼，把他们的事，看在眼里，挂在心上。他想：这些青年同志，都是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尽管他们有缺点，还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怎样帮助他们改造呢？毛主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①对！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叫他们到农村中去锻炼。于是，孟广礼同志经常带领他们到群众中去，给贫农下中农治病，吃住在群众家里，有空就和贫农下中农在一起谈心，一起劳动，让他们熟悉群众，向群众学习，转变思想感情。

一九六三年春的一天早晨，长山大队贫农郭有亮的女人，产后胎盘残留，大流血，病势危急，生产队套车来到医院接大夫。孟广礼同志带领魏赞巍、张发（护士）出诊。他们刚上车，车就飞快地跑起来。起初，魏赞巍嫌车太快，怕跌下来，两手紧紧抓住车箱板。半路上，前面跑来个骑马的，老远就大声喊叫：“快快！人不行了！”车到后，产妇已不省人事，必须先补液抗休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魏赞巍心情紧张，注射时老是扎不上静脉，急得汗流满面。张发接过注射器，一针就刺入静脉管。在剥离产妇的残留胎盘时，魏赞巍由于心慌手怯，怎么也剥离不

净。后来，在孟广礼同志的指导下，才做好这道手术，使病人转危为安。产妇的婆婆紧紧拉住魏赞巍的手，流着感激的热泪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魏赞巍也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对孟广礼同志说：“孟书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作一个人民医生的真实意义了。”邻居们听说把要死的人救活了，都纷纷赶来，有病的看病，没病的也要检查身体，把他们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十分亲热。

事后，魏赞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到长山大队出诊，受教育最大。在路上总嫌车快，怕自己跌下来，一再要求放慢车速，这是从自己的安危着想；相反，赶车的人则不住催马加鞭，唯恐不快，这是从病人安危出发。两种心情，一则利己，一则利人，截然不同。过去总认为自己在大学钻了五年，理论够用，技术过硬。但是，实际上连治这种常见疾病，还弄得手足无措。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自己自私和无能。原先自己不了解农民，不关心农民，一年来，亲眼看到贫农下中农具有勤劳、朴实、热爱集体的高贵品质，才深深感到，做一个医生，应该关心农民的疾苦，解除农民的病痛，这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职责。

在农村经受锻炼以后，青年医生们对农民对自己都有了新的看法。他们说：“农村真是个广阔的天地，在这里确实大有作为。”他们对毛主席著作感到亲切了，利用早晨、晚上和医疗空隙时间，认真学习。魏赞巍说：“原来也读过毛主席的文章，却和思想对不上号。这回学习，感受不同了，觉得毛主席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的话，句句打动人心，像对我說的一样。”一九六三年以来，他們反复学习了《紀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社会各階級的分析》、《矛盾論》、《实践論》等許多文章。毛主席的书使魏贊巍变了，也使医院的其他青年医生变了。

一天傍晚，李貴山大夫早已买好电影票，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看电影。不料有利大队第二生产队来人請医生，說一位妇女难产，病势危急。这时值班大夫不在。他想：这个偏僻地方看場电影很不容易。現在出診是值班大夫和助产士的事，同我关系不大。还是去看电影吧。但是又一想：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負責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而我对危重病人置之不理，这怎么能算对人民热忱和負責呢？于是，他毅然背起“产包”，立即赶到患者家中。經過搶救，嬰兒生下来，产妇脫了險。但是，嬰兒窒息了，要搶救又沒有氧气。他想来想去，只有与嬰兒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才能救活嬰兒。当他看到初生嬰兒很脏，有些犹豫了。刹那间，毛主席在《紀念白求恩》这篇文章中所讲的伟大思想，又在他的脑海浮现。他馬上伏下身去，与嬰兒唇吻相接，帮助嬰兒呼吸，足有半个小时，汗水湿透了衣衫，嬰兒得救了。随着嬰兒的啼哭声，患者全家人流下感激的热泪說：“感謝你救了母子俩的命。”李貴山說：“应当感謝党和毛主席，是毛主席教导我这样做的。”

青年医生在医疗实践中，增强了“急病人之急，痛病人之痛”的思想感情。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长山大队轉业軍人

邢有才的爱人，腹内剧烈絞痛。邢有才怕瓦房医院治不好，要送县医院去治。当时，医生馬万祥正在那里巡回医疗，經過他再三說服动员，才把病人送到瓦房医院。全院医生反复会診，确診为“宫外孕”。当时，病人的輸卵管已經破裂，严重内出血，几次休克，必須立即动手术。但是，邢有才說：“我住过陸軍医院，那里的厕所都比你們医院强，要做手术，你們必須担保。”于是，在医院里，对于究竟是轉院治疗，还是就地动手术，展开了一场爭論。有的人說：“做手术难保不出問題，誰也担保不起，叫她走算了。”有的人說：“过去做第一例闌尾炎，由于技术低，設备差，弄得病人直叫喚，招来群众的不滿，要把医院牌子摘下来。現在的設备条件不比那时强多少，做这样的手术，危險很大，應該馬上轉院治疗。”但是，多数人不同意送走。他們說：“要送走，病人中途非死亡不可。就地搶救有好的可能，不能見死不救。”終于統一了思想，并且說服了邢有才。結果，手术进行得很順利，病人救活了。邢有才在事实面前，感到非常慚愧和不安。他說：“要不是你們有这种大胆負責的精神，我的爱人就救不活了。”

通过这例手术，他們檢查了过去把可能就地搶救的重患者轉院治疗的思想。他們說：“把可能就地搶救的危重患者轉院治疗，看起来是对病人‘負責’，实际上是从医院声誉和医生个人得失出发，对病人不負責任，对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担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別人打算。”他們說：“能不能做較难的手术，技术設备固然很重要，但只要从关



心病人的安危出发，严格尊重科学，較难的手术也可能做好。”

医护人员提高了思想認識以后，就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想方設法創造条件，搶救危重患者。手术室不严密，就尽最大努力严格消毒；沒有手术台，就用木制的来代用；沒有照明設備，就用集束手电筒或油灯照明。就在这样設備簡陋的条件下，他們現在已經能做疝气、闌尾炎、剖腹产、宫外孕、卵巢囊肿、腸吻合、胃修补、脾摘除等較为复杂的手术。到目前为止，共做了二百四十七例，从沒发生过感染化膿等事故，搶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

瓦房医院的同志們，在工作中深刻認識到，农村医院是为农民办的，应当事事方便农民，有利生产，为农民創造便利就医的条件。

当地农民到医院看病，困难很多，特別是在春耕、夏鋤、秋收三大农忙季节，遇有較重病人，人抬車送，影响生产。也往往因为時間紧，农活忙，路程远，花費大，病人应治而得不到治疗，使輕病轉为重病。

根据这种情况，一九六〇年，他們把医院化整为零，派六名大夫，在共和、白塔子、长鳴三个大队設了医疗站。这样，群众到站上看病就比去医院方便了。到一九六三年，为了进一步便利群众，又采取了划片包干、送医药上門的办法。从一九六三年初到一九六四年末，通过这种办法，治疗患者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次，占同期門診量的百分之五十。老中医张国鼎，下去巡回医疗，不分昼夜，不論寒暑，常年坚持不懈。仅一九六三年，就治病达三千一百零五人次。这种

做法，深受群众欢迎。他們說：“以前病人找医生，現在医生找病人，坐在家里就把病看了，真是自古也沒有的事啊！”

一九六四年春，正是抗旱播种大忙季节，长山大队流行小儿麻疹。楊哲大夫一直在那里搶救了半个月。他有时昼夜守在病儿身旁，精心护理，有时一夜連跑几个屯子，巡回治疗。群众看他日夜奔忙，吃不好，睡不安，就劝他休息，又特意为他准备了一匹馬。群众的关怀，使他搶救病儿更加热心了。一天夜里，在巡診途中，由于疲劳过度，在馬身上打起瞌睡，跌了下来，把手摔伤了，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經過他的努力，使一百零八名病儿（其中并发肺炎的二十六名）无一人死亡，很快恢复了健康。大队的干部說：“若不是楊大夫守在这儿，說不定有多少孩子搭了命，生产也上不去。如果都上医院治，这半个月，全大队就得出大車七十五台（次），花費一百五十多个劳动日。在这抗旱播种的紧要关头，要有多少地种不上。現在不但送完了粪，抗旱播种还一点沒耽悞，社員的生产劲头可大啦！”

在总结这段工作时，瓦房医院的同志們认为：医生住在患者家，守在病人身边，既是大夫又是护士，随时掌握病情，便于对症下药，提高治愈率，使病人早日恢复健康，既減輕患者負担，又有利于集体生产。同时，还进一步密切了医生和群众的关系。从这以后，他們又在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的道路上，向前跨进了一步。在巡回医疗中，普遍試行了“家庭病床”制度，对能够在家医疗的重病人，由包片医生包下来，治到底。到目前为止，共建立了三百六十六人次的家庭



病床。社員們滿意地說：“以前接个大夫都不易，这回把医院搬到家来了！”

通过这一段工作，全院医护人员和群众的感情越来越深，人人都把方便群众、支援生产，作为自己工作的方向。

互助大队社員李海凤患腸坏死症，来院做腸切除手术，需要大量补血。生产队用三辆大車，把全队四十多名劳动力，都拉来驗血。結果与患者血型相同的只有六人，使生产队耽误了一天生产。这件事触动了化驗員霍淑梅。她想：“毛主席教导我們要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而我，坐在医院，打电话，找队长，調人驗血，使許多社員往返徒劳，耽误生产，不是对群众不利嗎！”从此，她每逢出去搶救危重患者，就带上化驗器械，需要輸血时，就地化驗血型，就地輸血。来院危重病人需要輸血，她就到患者所在生产队，鉴定血型，組織具有同血型的人来院輸血。荣华大队社員徐秀英，产后大流血，送到医院治疗，需要立即輸血搶救。她就和大夫一起，冒着七、八級大风，走出二十多里，到当地做了血型鉴定，群众很受感动。

瓦房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和社員群众长期相处的日子里，深深地認識到必須改善农村的卫生条件，才能保证社員的健康。为此，他們专门派三名大夫先到怀德大队試点。下去的大夫，一面治病，一面宣传卫生知識，有空就帮助群众搞环境卫生。社員說：“大夫这么忙，还帮助咱們搞卫生，咱們哪能不动手。”于是，利用农闲和劳动空隙時間，自己动手搞卫生的人越来越多了。卫生条件改善后，这个大队几年来沒有发生过传染病。結合搞卫生，每年都积攒了大量糞肥。

社員說：“一搞卫生，人不鬧灾，牲畜不得病，积肥多，打粮多，真是地增产、人增寿啊！”

从怀德大队的試点中，医院的同志們認識到，只有調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改变农村卫生面貌。于是，他們在其他大队，也发动群众，改善了卫生条件。他們还培养了保健員七十四名，做到了队队有保健員。同时，又为各生产队培訓了三十二名接生員，建立起四处接生站，普遍推行了新法接生。几年来，从沒有因为发生产褥热和婴儿破伤风，而造成母嬰死亡的。

为了方便群众、服务生产，他們还不断地改进了門診工作。

原来瓦房医院門診的时间，同城市医院一样。农忙季节，农民起得早，看病的人也来得早。但是，患者来了，医护人员还没有上班，群众很有意見。后来，他們根据各个季节不同情况，和群众就診規律，采取了随到随診的办法。星期日、节假日照常应診，农忙季节，提前上班，使輕患者和护送重患者的人员，看完病回去，还能参加生产。社員說：“过去看一次病，悞一天工。现在是既看了病，又不耽误工。”他們发现群众不习惯按钟点吃药，便把吃西药時間，改为“早晨、晌午、貼晌、晚上、半夜、鸡叫”等农民慣用的語言。群众說：“这医院真是給咱們开的，事事都想得这么周到！”

瓦房医院为农民服务、为生产服务这条路越走越寬了。但是，他們觉得，現在的工作同群众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他們一再表示，要更加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总结經驗，克服缺点，不断前进，把医院工作做得更好，使广大农民群众更称心如意。



诗词二十六首

胡乔木

六州歌头 [二首] 一九六五年新年

江山万里，一派好风光。天日朗，人心畅，奋图强。比和帮，大野争驰骋。空依傍，开兴旺，催能匠，添奇象，巧梳妆。刮目相看，古国呈新样，赤帜威扬。羨参天大树，傲骨斗冰霜。桀犬徒狂，吠何伤！莫非非想，全无恙；知风浪，辨康庄。侵袭抗，兵民壮；病虫防，斗争长。文武勤劳尚，披荆莽，事农桑。险同上，甘相让，苦先尝。身在茅庐，举世烽烟望，血热中肠。欲闻鸡起舞，整我战时装，共扫强梁。

其二

寒山远望，春暖越重洋。春潮莽，连天壤，震遐荒。战歌昂，凌厉山河壮。干戈掌，方针讲，人民仰，同仇广，阵容强。触目惊心，败叶纷纷降，兔



死狐伤。直冰崩瓦解，何计逞猖狂？两大分赃，梦徒香。纵添兵将，夸大棒，囂尘上，陷泥塘。紛說項，宜忍让，舌如簧，愿难偿。大字东风旺，无遮挡，任飞揚。爭解放，坚方向，銳鋒鋌。何世人間，虎豹容来往？众志金湯。教紅旗遍地，万国换新装，日月重光。

梅花引 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

夸强大，称王霸，可知今日誰天下？血腥旗，臭污泥，豺狼当道蒙着破羊皮。滔天罪恶何胜計，强盜堂皇說仁义。早穷途，笑狂奴，犹抱神牌当作护身符。一叶落，催蕭索。天馬行空竞寥廓。酌琼浆，舞霞裳，东风如意百鳥唱春光。春光先照英雄汉，捷报紛馳花烂漫。挽长弓，射蒼龙，倒海排山指日定雌雄。



領袖語，牢記取，百年大計爭基础。背行囊，带干粮，眉飞色舞队队下乡忙。当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众靠。万重山，不为难，不插紅旗定是不回还。社藏鼠，欺弊替，不爱貧农爱地主。話連篇，表三千，偷梁換柱黑网結奸緣。人間自有青霜劍，慧眼何愁形善变？起群雄，灭阴风，还我河山长作主人翁。

江城子 [二首] 贈边防战士

少年心愿在天边。别家园，度重关，南北东西多少好河山！为保金甌顛不破，鞋踏烂，不辞难。远征才觉道途欢。北风寒，有何干，雪地冰天为我



驻朱颜。背上枪枝登哨所，千丈壁，起炊烟。

其 二

练兵塞上好风光。号声忙，踏严霜，猎猎军旗天际看飞扬。待到刺刀拼过了，挥汗水，对朝阳。墙头大字写琳琅。报爹娘，放心肠，多少英姿年少事戎行。大海航行歌四起，营地乐，胜家乡。

小 重 山 赠海岛战士

万顷狂涛拍岸腾。良宵谁伴我？满天星。海风撼树欲相惊。劳梦想，铁汉岂虚名？入伍记丁宁：田园铺锦绣，仗干城。江山望断睡无声。千百岛，炯炯有双睛。

定 风 波 〔二首〕 祝捷

一、我东海渔民民兵配合海军航空兵部队活捉美制蒋机驾驶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种得滄波万顷田，生涯都在捕鱼船。风浪常经如坦道，非傲；海防还欲共先鞭。意气终教身手现，群燕，水天双奏凯歌还。七亿能劳又能武，千古，谁曾见此铁江山！

二、我空军和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多次击落美蒋入侵飞机

赤县于今有领空，蓝天一望羨乘风。银翼翩翩来又去，天女，仙梭织锦任西东。飞盗谁夸能漏网？休想；铜墙铁壁九霄中。花样翻新方得意，涂地；健儿竟报立奇功。



念奴娇 [四首] 重读雷锋日记

飞来何处，凤凰舞腾作一团烈焰！墮地当年阶级苦，小小孤儿尝遍。大地身翻，亲人仇报，我亦开眉眼。千言万语，握枪才是关键。君试共我高翔，人间尽看，何往非前线？四海尚多奴隶血，小我何堪迷恋？身是螺钉，心怀天下，有限成无限。高山松柏，岁寒常忆肝胆。

其二

山歌一曲，万人传党的恩情胜母。字字珍珠和泪裹，唱出雷锋肺腑。得有今朝，多亏先烈，我敢辞艰苦！为群舍己，傻瓜甘愿为伍。长记群众中来，群众中去，领袖殷勤语。一朵花开春不算，要看百花齐吐。友爱春风，热情夏日，对敌威于虎。名传“解放”，格高光耀千古。

其三

分明昨夜，老人家万种慈祥亲爱。醒后追寻何处是？日月文章永在。最忆良言，全心为党，驕躁悬双戒。不干滴水，只缘身献滄海。誰令抱被遮泥，潜名寄款，风气千秋改？真理一归群众手，多少奇姿壮采！鼠目光微，蝇头利重，少见徒多怪。红旗浩荡，共奔忘我时代。

其四

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时代洪流翻巨浪，舒卷英雄如意。昔恨蛟潜，今欣龙跃，海底奇峰起。几多学者，语言无此滋味。颜色涂绘由人，



如君紅透，羞杀营营輩。花落結为千粒子，一代紅巾爭继。勤洗灰尘，多經风雨，立定上游志。力爭不懈，青春长傲天地。

采桑子 [四首] 反“愁”

前人文藻，多言愁恨。其中一部分反映了旧社会的压迫，是可以理解或者值得同情的；另一部分却不值得同情，很多还是空虚的，虚伪的，甚至反动的。后者固然毒害青年，需要扫荡，前者也不能让读者沉浸其中，妨碍革命乐观主义力量的发展。因择其习见语痛辟之。

愁来道是天来大。試看长天，一碧无边，那見愁云一縷烟？ 欺人妄語
愁如海。万頃波翻，万馬蹄欢，大好风光总万般。

其 二

誰将愁比东流水？无限波瀾，載得风帆，踊跃奔騰直向前。 登天蜀道
何須怨？不上高山，突兀颠連，怎見人間足壮观？



其 三

相思未了今生愿。万里烽烟，怒发冲冠，岂可纏綿效縛蚕？ 孤芳絕代
伤幽谷。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

其 四

花开何用愁花謝？白发三千，何让春妍？老馬知途好着鞭。 生离死别
寻常見。羨甚神仙，万古团圆？不尽生机贊逝川。



生查子 [四首] 家书

家书岂万金，四海皆昆仲。养育亦多情，形影常来梦。 屈指渐成人，
文武须双重。何事最关心：是否勤劳动？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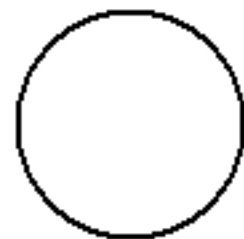
斗争如海洋，早晚云霞涌。流水片时停，毒菌争传种。 青春只一回，
转眼能抛送。百炼化为钢，只有投群众。

其三

牡丹富贵王，弹指凋尘土。岂是少扶持？不耐风和雨。 如此嫩和娇，
何足名花数？稻麦不争芳，粒粒酬辛苦。

其四

纵观天地间，陵谷多奇趣。东海有长鲸，常与波涛伍。 顺水好行船，
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



七律 [四首] 七一抒情

如此江山如此人，	千年不遇我逢辰。
挥将日月长明笔，	写就雷霆不朽文。
指顾崎岖成坦道，	笑谈荆棘等浮云。
旌旗猎猎春风暖，	万目环球看大軍。



其二

滚滚江流万里长，
源头尽望千堆雪，
激浪冲天春汛怒，
层巒叠嶂今安在？

几分几合到汪洋。
中道常迴九曲腸。
奔雷动地早潮狂。
一入滄溟喜浩茫。

其三

歷經春夏共秋冬，
勤逐炎凉看黃鳥，
寒虫向壁寻殘夢，
天外莫愁迷道路，

四季风光任不同。
独欺冰雪挺蒼松。
勇士乘风薄太空。
早驅彩笔作长虹。

其四

六洲环顾滿疮痍，
肝胆誓分兄弟难，
自由合洒血成碧，
休向英雄夸核弹，

豕突狼奔猎者誰？
头顱不向寇仇低。
胜利从来竿作旗。
欣荣試看比基尼。

七

律

西藏自治区成立

百万农奴站起来，
弥陀空許西天愿，
此日金珠歌隴亩^①，
人民城郭朝朝异，

千斤枷鎖化尘埃。
大道今从东土开。
他年雪岭起楼台。
立馬高原聘壮怀。

① 金珠，藏語解放。



红旗

駁苏共新领导的所謂“联合行动”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王杰同志日記选

1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十二期 目录 ★

駁苏共新领导的所謂“联合行动”…… 人民日报編輯部 (1) 红旗杂志編輯部

- 国际无产阶级需要在原則基础上的联合…… (1)
- 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联合的共同基础…… (4)
- 不能同顛倒敌我关系的人联合行动…… (6)
- 苏共新领导在越南問題上同美国联合行动…… (9)
- 所謂“联合行动”是推行分裂主义的手段…… (12)
- 所謂“联合行动”是欺騙苏联人民的口号…… (14)
- 坚持反对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16)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王杰同志日記选…… (18)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

——讀王杰同志的日記…… 关 鋒 (29)

工农兵业余創作队伍在成长…… 荀 常 (34)

农民欢迎革命小戏…… 文文宣 (35)

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 邵友勋 (37)

大庆通信

——从职工家屬鬧革命的一些平凡事說起…… 孙維世 (41)

☆ 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

红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 “联合行动”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国际无产阶级需要在原则基础上的联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分裂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一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伟大旗帜。我们认为，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国际无产阶级只有把自身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才能够战胜敌人。

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教育和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者，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联合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为实现无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的联合。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一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在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兴起的条件下，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促进了西方各国的工人运动同东方被压迫



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斗争。这是国际革命力量更加广泛的联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国际阶级关系和力量对比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口号。这个统一战线，以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为核心，以国际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为基础。这个统一战线，要紧密地团结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也要团结一切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政治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全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这样，就把一切有利于世界革命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争取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世界革命所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坚持国际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坚持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联合。我们坚持不渝地贯彻执行这样的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革命的联合，是在原则基础上的联合。为了实现这样的联合，必须毫不含糊地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斗争中，马克思教导我们，“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恩格斯在论述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原则斗争才能达到真正团结的时候说过，“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①。他还指出，“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糊糊涂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地宣布，“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③。

列宁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站到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堕落成为垄断资本的走狗，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成为社会帝国主义者。

列宁指出，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会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而且是为了实现统一所不可缺少的。他说，“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

^①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4页。

^②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13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62页。



就不可能順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統一。目前正在进行斗争的人决不会破坏統一。統一已經沒有了，它已經被破坏了，被全面地破坏了”，“公开的直接的斗争是恢复統一的一个必要条件”^①。

中国共产党正是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出发，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联合，为了巩固和扩大反美統一战綫，同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

我們为什么要在一九五六年发表关于无产階級专政历史經驗的两篇文章呢？为什么在制定一九五七年宣言的时候，要坚持一系列革命原則，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备忘录呢？为什么要在一九六〇年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呢？为什么要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信中，系統地批判赫魯曉夫的一系列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观点呢？为什么在制定一九六〇年声明的时候，要坚持重申一系列革命原則，并且向所有兄弟党散发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备忘录呢？为什么要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全面地闡明我們对于当代世界革命一系列根本問題的观点呢？为什么要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評論，公开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呢？为什么要发表一系列批評苏美英三国条約的文件和文章，揭露赫魯曉夫集团联合美帝国主义、反对世界人民的背叛行为呢？为什么要在中苏两党多次的会談和来往信件中警告赫魯曉夫集团悬崖勒馬呢？所有这一切，正是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捍卫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力量的团结。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了一系列的坚决斗争，加速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使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創始人走上了穷途末路，爬进了自己挖掘的坟墓。

赫魯曉夫下台，苏共新领导上台，已經一年了。苏共新领导同赫魯曉夫比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他們是不是改变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呢？事实告訴我們，苏共新领导实行的还是赫魯曉夫的老路綫，只是采取了比赫魯曉夫更加狡猾、更加虛伪的两面手法。

苏共新领导在許多讲话、文件和文章中，大肆鼓吹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行动”。他們整天把漂亮的言詞挂在嘴边，什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联合反帝”，“联合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等等。所有这一切，尽是假話。苏共新领导的行为，恰恰同他們的

^① 《給阿·亞·雅庫波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頁。



这些言词相反。在今年九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一面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一面空喊“团结反帝”。这就将他们那种假团结、真反华的丑恶面目暴露出来了。

正像最富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把自己化装成爱好和平的天使一样，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也竭力把自己化装成十分爱好团结的样子。苏共新领导所谓的“联合行动”，不过是一个骗局。

现在，我们就来对苏共新领导关于“联合行动”的种种谎言，一个一个地加以驳斥，并且用他们一年来在国际国内所干的坏事，把这个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破坏了联合的共同基础

苏共新领导鼓吹“联合行动”的一个论据是，所有共产党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

本来，各国共产党是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共同的纲领”的，这就是各国共产党共同制定的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则。可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彻底背叛了各国共产党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彻底破坏了各国共产党联合的共同基础。

苏共新领导忠诚地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他们没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变成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不折不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他们当面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他们一再断然声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总路线，“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①。

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鼓吹“和平共处”“是今天革新世界社会的最重要的条件”^②，鼓吹只要通过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③，鼓吹“和平过渡”的“机会增长了许多倍”^④，来否定和反对一切反帝革命斗争。

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坚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实行“全民国家”和“全民党”。他们并且说，“同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全民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发展中合

① 勃列日涅夫 1964 年 10 月 19 日在欢迎苏联宇航员大会上的讲话。

② 波德戈尔内：《伟大的十月》，1964 年 11 月号《社会主义古巴》。

③④ 《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



乎规律的、对一切国家都是共同的阶段”^①。“我们党向全民党的转变”，“就是远在国外也具有重大意义”^②。

苏共新领导还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公然宣扬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谬论。他们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或者那些国家，没有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也可以实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③。他们无耻地阉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说什么“列宁没有把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过渡同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权，实际上也就是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④。按照苏共新领导的这种说法，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完全可以取消。苏共新领导鼓吹这种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反动的理论，不但是给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提供思想武器，而且是企图使那些处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国家和人民，模糊当前的斗争目标，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苏共新领导坚持和发展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路线的分歧，存在着大是大非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纲领”呢？还有什么联合的共同基础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之间，就根本不是像苏共新领导说的那样，什么“联合起来的东西比分开的东西力量大得多”，而是在当代一切根本问题上针锋相对，有互相分开的东西，没有联合起来的东西，有对立的東西，没有共同的东西。

在根本路线分歧的情况下实行联合，要么是我们要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跟着他们搞修正主义，要么是他们放弃修正主义，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二者必居其一。在这样尖锐的问题上，如果我们采取模棱两可的、模模糊糊的立场，是不能允许的，完全错误的。

难道指望我们跟着苏共新领导实行修正主义纲领下的联合吗？那岂不是要我们同他们一道去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扑灭各国人民革命，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吗？不用说，我们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难道指望我们眼看着苏共新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力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一直保持沉默，不予以批评、揭露和反对吗？那岂不

① 1964年第12期《苏维埃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文章。

② 1964年第18期苏联《共产党人》文章。

③ 《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

④ 1964年第17期苏联《共产党人》文章。



也是要我們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充當他們反對各國人民革命的同盟者，成為帝國主義的幫凶嗎？不消說，這也是我們絕對不能做的。

如果蘇共新領導真正要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實行聯合，那麼，他們就必須改變修正主義路線，老老實實地承認錯誤。他們就必須公開地、鄭重地向全世界共產黨人和全世界人民承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和分裂主義是錯誤的，公開承認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所確定的修正主義路線和綱領是錯誤的，公開保證今後決不再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錯誤。難道他們會這樣干嗎？

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對立，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對立，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對立，是反對帝國主義同投降帝國主義兩條路線的對立。這是水火不相容的。

列寧說：“統一，這是偉大的事業和偉大的口號！但是，工人事業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同反對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統一。”^①

不能同顛倒敵我關係的人聯合行動

蘇共新領導說，即使存在着理論和路線上的分歧，也可以撇在一邊，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實際鬥爭中“聯合行動”，“團結對敵”。

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理論和路線上的分歧，最尖銳的問題，恰恰是怎樣對待敵我關係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還是聯合帝國主義，首先是反對美帝國主義還是聯合美帝國主義的問題。這種分歧，直接決定着國際階級鬥爭中最重大的實際行動，怎麼能夠撇在一邊，搞無原則的、不分敵我的團結呢？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反動性，集中表現在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上。赫魯曉夫集團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把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當做自己最親密的朋友，把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包括蘇聯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當做自己最主要的敵人。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赫魯曉夫暴露了叛徒的嘴臉。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進行了最尖銳的鬥爭。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遭到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唾棄。

蘇共新領導在這個問題上怎麼樣呢？他們是不是改變了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呢？他們是不是把顛倒了的敵我關係改正過來了呢？他們是不是從同美帝國主義聯合的力量，變成

^① 《統一》。《列寧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6頁。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了呢？

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没有。

请看：

第一，苏共新领导一上台，就大肆吹捧约翰逊是“明智派”、“温和派”。他们继续鼓吹苏美两国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两个大国，“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合作天地”，“还有很多尚未利用的潜力”^①。甚至当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疯狂扩大侵略战争以后，他们仍然一股劲儿地强调要“发展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有时候他们也不能不讲苏美关系有“冻结”的趋向，但是，他们却暗中加紧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搞幕后交易。

第二，赫鲁晓夫联美反华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签订苏美英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苏共新领导不但继承了这笔遗产，而且正在这个条约的基础上，同美国积极酝酿所谓“防止核扩散”以及其他“裁军”的新交易，企图保持苏美两个核霸王在世界上的军事垄断地位，来反对中国和所有独立自主的国家。

第三，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作为反对世界人民革命的工具。赫鲁晓夫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把联合国作为苏美两大国主宰世界的交易所。苏共新领导继续着这个反动政策。他们重新提出了赫鲁晓夫的关于建立联合国常设部队的建议。他们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在刚果(利)“停火”、“实现全国和解”的决议，又投票赞成在多米尼加“停火”的决议。世界上那里的人民起来进行反美武装斗争，那里的反美武装斗争取得胜利，那里美帝国主义遭到失败，陷入困境，他们就赶忙跑出来帮忙。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打击、削弱和分化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力量，挽救、加强和扩大美帝国主义的阵地。他们充当了美帝国主义企图扑灭革命烈火的消防队。

今年四月七日，约翰逊为了破坏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加紧经济渗透，在提出“无条件讨论”越南问题的同时，鼓吹所谓国际开发东南亚计划，并且希望苏联参加。美国把建立“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一个途径。苏共新领导响应约翰逊的号召，竟然派出代表，十月间在曼谷同美国、日本以及蒋介石匪帮、南朝鲜、“马来西亚”等傀儡集团的代表坐在一起开会，积极参与筹建“亚洲开发银行”。苏共新领导就是这样热心地同美帝国主义搞联合行动。

第四，苏共新领导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经营的“三尼公司”的旧业。他们进一步联合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印度反动派，反对中国。他们在夏斯特里访问苏联期间，一口气就答应

^① 葛罗米柯 1964 年 12 月 7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給印度九亿美元的援助，比赫魯曉夫九年之中給印度的貸款總額還多。他們加緊執行對印度的軍事援助計劃，同美國攜手幫助印度擴張軍備，讓印度反動派用蘇式武器來反對中國和其他鄰國。

最近，在印度武裝侵略巴基斯坦和中印邊境問題上，蘇共新領導的聯美聯印反華和支持侵略者的丑惡面目來了一次大暴露。蘇美在聯合國內外，一唱一和，齊聲反華。一九六五年九月，塔斯社關於印巴武裝衝突的聲明，含沙射影地攻擊中國，《真理報》在中印邊境問題上更是公開地聯印反華。人們不禁回想起，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就是用塔斯社關於中印邊境問題的一個聲明開始公開反華的。但是，那時的赫魯曉夫比之現在的蘇共新領導，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赫魯曉夫那一小塊偽裝中立的遮羞布，蘇共新領導也干脆不要了。難怪美帝國主義拍手稱快，歡呼出現了美蘇合作的“新紀元”。

蘇共新領導迷惑人的地方，在於他們有時對美帝國主義要小罵一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是出於修正主義者本身的需要，也是適應美帝國主義者的需要。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需要裝起一副反美的模樣，才能有效地幫助美帝國主義，欺騙群眾，破壞革命。否則，他們就失去了欺騙的作用，反而對美帝國主義不利。小罵大幫忙，蘇共新領導就是這樣為美帝國主義效勞的。

有人問，為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革命人民可以團結民族主義國家的上層人士，爭取同他們在反帝鬥爭中聯合行動，甚至在反美鬥爭中還要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而同蘇共新領導却不能聯合行動呢？

這是因為，在當代，反對還是聯合美帝國主義，是鑒別一切政治勢力能不能包括在反美統一戰綫之內的標志。

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除了那些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外，許多民族主義國家的上層人士有不同程度的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要求。我們應當在反帝鬥爭中同他們合作。

在同美國有着尖銳矛盾的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里，壟斷資產階級中，一部分人追隨美帝國主義，但也有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有反美的要求。世界人民在反美鬥爭中，可以同那些具有反美要求的人，在某些問題上採取某種程度的聯合行動。

問題恰恰在於，蘇共新領導根本不反對美帝國主義，而且同美帝國主義結成聯盟，要同美帝國主義聯合主宰世界。這樣，他們就把自己置於同反美統一戰綫敵對的地位。如果蘇共新領導真正反對美帝國主義，如果他們真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實際行動，我們是願意同他們聯合行動的。但是，現在蘇共新領導所謂反對美帝國主義，是口頭上的，不是真實的。老實告



訴他們，只要他們的苏美合作反对世界革命的路綫不改变，他們同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結成的联盟一天不取消，我們就絕不能同他們搞什么“联合行动”。我們絕不能充当他們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秘密外交的玩具，不能給他們帮助美帝国主义镇压各国人民革命的行动打掩护。

苏共新领导在越南問題上同美国联合行动

苏共新领导喋喋不休地說，在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紧张时刻，共产党人之間的分歧即使极其严重，也应该在越南問題上“联合行动”。

既然苏共新领导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基础，既然他們顛倒了敌我关系，坚持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綫，那么，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不是在越南問題上还可以同他們联合行动呢？

本来，在美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越南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采取一致的立場，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問題在于，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是同他們的修正主义綱領和路綫分不开的，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采取的原則立場背道而馳的。

在赫魯曉夫当政的时候，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公开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反对和破坏越南人民的反美革命斗争。他們用“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①的謬論，来恐吓和威胁正在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人民，公然拒絕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当越南人民和老撾人民反美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他們在印度支那問題上采取“脫身政策”。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們提出苏联政府要辞去日内瓦會議两主席之一的职务。不久以后，当美帝国主义制造北部湾事件的时候，赫魯曉夫竟然制造謠言，誣蔑这个事件是中国挑起的。

越南局势的发展，完全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的愿望相反。越南人民的反美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美国侵略者遭到很大的困难。苏共新领导看到，要原封不动地搬用赫魯曉夫的那种“脫身政策”已經不行了。于是，他們改而采取了插手政策。

插手政策和脫身政策，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产物，也都是适应美帝国主义需要的产物。

美帝国主义迫切需要扑灭越南人民革命的烈火。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者如若贯彻实行他們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綫，也迫切需要扑灭越南人民革命的烈火。过去赫魯曉夫采取“脫

^① 赫魯曉夫 1960 年 7 月 8 日在維也納答記者問。



身政策”，是同肯尼迪密切配合的。现在苏共新领导采取插手政策，又是同约翰逊相互默契，密切合作的。

请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六五年一月，美帝国主义要求苏联政府施加自己的影响，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接受两项条件：第一，停止支持越南南方，首先停止供应火炮；第二，停止对越南南方城市的袭击。苏共新领导对于美帝国主义这种妄图迫使越南人民无条件投降的无理要求，完全遵旨行事，正式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了转达。

美国侵略者急于从越南寻找出路，苏共新领导就积极地为他们奔走。一九六五年二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在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他强调要帮助美国“从越南找到一个出路”。当时，遭到中国领导人的严正驳斥。我们表示，希望他们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不要拿越南问题去同美国作买卖。柯西金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声称苏共新领导“不会拿这个问题去同别人作买卖”。但是，苏共新领导很快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约翰逊需要制造“无条件讨论”的骗局，苏共新领导就提出了“无条件谈判”的主张。今年二月十六日，也就是柯西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向越南和中国正式建议，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没有先决条件的新的国际会议，实际上主张“无条件谈判”越南问题。二月二十三日，苏共新领导不顾越南政府反对这个建议的立场，也不等待中国方面的答复，通过苏联驻法大使，就召开上述国际会议的问题同法国总统进行了讨论。

约翰逊的“无条件讨论”骗局，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严正拒绝。苏共新领导又在公开场合闪烁其辞地表示，只要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就可以举行谈判。他们为了实现这个主张，在国际上进行了积极的活动。苏共新领导在给一些兄弟党的通知中，明明白白地说，他们主张同美国谈判，条件是美国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他们并且表示，要寻找通过谈判的道路解决越南问题的途径和手段。不久以后，约翰逊果然玩弄了“暂停轰炸”的把戏。

“无条件谈判”和“停止轰炸、举行谈判”两个骗局碰了壁之后，苏共新领导同帝国主义的走狗印度反动派和铁托集团又在越南问题上合伙当掮客。他们对于解决越南问题的途径，只提要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只抽象地说什么执行日内瓦协议，而不提实行这个协议的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全部撤走它的侵略军队。苏共新领导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外交活动。说来说去，他们就是要帮助美国骗出一个“和谈”来，以便无限期地谈下去，让美国无限期地在南越赖下去。

苏共新领导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竟然血腥镇压越南、中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留苏学生的反美援越游行示威。



引人注目的是，今年四月間，苏共新领导把赫魯曉夫从冷宫里放出来，让他对西方記者发表談話，鼓吹“和平共处”，攻击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说什么“麻烦都是从像越南这样的小事情上开始，而以一場灾难結束”^①。这不是偶然的。这证明他們也跟赫魯曉夫一样，生怕越南問題这个所謂“小麻烦”，会破坏他們的苏美合作的美梦。

苏共新领导干的，还是赫魯曉夫的那一套，就是要把越南問題納入苏美合作的軌道。他們这样紧密地同美帝国主义者联合行动，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不能同他們搞在一起，去搞什么“联合行动”。

剥开皮来看，苏共新领导之所以要在越南問題上大叫大嚷什么“联合行动”，不过是因为这个口号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錯觉，似乎热中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苏共新领导，还可能同大家“联合反美”，以便他們混入反美陣綫内部，来推行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插手政策。

只要看一看苏共新领导是怎样玩弄“援助”越南的花招，就可以更加明白他們的插手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我們从来认为，援助兄弟的越南人民，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义不容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处在反美斗争最前綫的越南人民，完全有理由和权利要求和接受社会主义各国的援助。我們中国給了越南人民以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們多次說过，如果苏联真心要援助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那么，这种援助越多越好，越适用越好。可是，苏共新领导怎么样呢？他們对越南提供的援助，無論数量和质量都同苏联的国力很不相称。他們援助一些东西，是別有用心的，是企图欺騙国内外人民，企图控制越南局势，企图在越南問題上取得发言权，企图拿越南問題同美帝国主义做交易。

美帝国主义对苏共新领导的这一手，是心領神会的。美帝国主义者很懂得，苏共新领导插手越南問題，对自己是有利的。他們不仅不反对苏共新领导对越南提供“援助”，而且欢迎苏共新领导这样做。美国当局明白表示，在越南問題上，有苏联参与比沒有好。美国报刊說：“在美軍还呆在南越的时候，最終可能找到一种安排，使得苏联軍队能够驻扎在北越”，“苏联更直接的軍事卷入的絕妙好处，将是建立起美苏在这一地区的直接交易的关系”^②。事实上，苏共新领导通过各种途徑，把他們对越南的所謂“援助”透露給美国人。在这个問題上，他們也是同美帝国主义搞联合行动的。

苏共新领导还利用“援助”越南的題目，頻繁地制造“中国阻撓苏联援越軍事物資的运输”

① 1965年4月6日英国《每日快报》。

② 1965年4月12日美国《新領袖》文章。



的謊言，大肆反华。事实的真相是，对于苏联提供的軍事物資，凡是越南同志同意的，我們都是按照協議，尽最大的可能，迅速地轉运給越南。他們的这种造謠誣蔑，更加证明他們为了联美反华，是不择手段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透过現象看本质。我們細心地观察了一年来苏共新领导在越南問題上的所作所为，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苏共新领导在越南問題上叫嚷“联合行动”这么起劲，他們千方百計地要举行苏越中三国最高級會議，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国际會議，无非是为了在全世界招搖撞騙，为了把兄弟国家套在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馬車上，为了把越南問題作为苏美交易的一个重要籌碼，为了孤立和打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

事情很清楚，在越南問題上，如果我們同实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路綫的苏共新领导联合行动，那岂不是帮助他們欺騙世界人民嗎？那岂不是帮助他們把越南問題納入苏美合作的軌道嗎？那岂不是同他們一起出卖越南人民的革命事业嗎？那岂不是同他們一道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嗎？那岂不是要同他們一道去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嗎？当然，这是絕對办不到的。

所謂“联合行动”是推行分裂主义的手段

苏共新领导叫喊“联合行动”，是在伪善的言詞下，掩盖和推行他們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苏共新领导說，他們在爭取团結一致，改善兄弟党关系方面，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驟”。讓我們来看一看，他們究竟采取了一些什么步驟。

遺臭万年的莫斯科三月會議，就是苏共新领导在“联合行动”的口号下举行的。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实际上已經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苏共新领导不顾一切地召开三月會議，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驟。在这次會議以后，苏共新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来繼續貫徹三月會議的分裂主义的路綫。

苏共新领导在全党全民中进行狂热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他們在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中，普遍地組織反华报告，肆意攻击和誣蔑中国。有些反华报告，是当着中国同志的面进行的。他們頻繁地派出专人到世界各国进行反华活动，到处散布各种各样的反华謊言。他們在国际組織和国际活动中，不择手段，推行反华陰謀。

苏共新领导繼續坚持赫魯曉夫的反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他們勾結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支持日共叛徒志賀之流的罪恶活动遭到了严重的失敗，但是并不死心，仍然对日本共产党进行反革命破坏和顛覆活动。他們繼續攻击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新西兰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它们进行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

苏共新领导对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继续采取施加压力和破坏、颠覆的手法，并且更加阴险地采取拉拢、收买、欺骗和挑拨离间的花招。他们把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他们孤立和集中打击的主要对象。

苏共新领导在国际群众组织里，在“联合行动”的口号下，继续推行不反美、不支持革命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分裂反帝团结的活动。他们重演赫鲁晓夫的故技，用卑劣的手段，幕后操纵，公开捣乱，以至演出拍桌子、跺脚等等丑剧。

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联合行动”的名义下，妄想恢复他们的“老子党”的地位，继续挥舞他们的指挥棒，驱使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按照他们的意志，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其实，他们的那种威势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苏共新领导同他们的追随者纠合在一起，只不过是建筑在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各有各的打算。苏共新领导的指挥棒，是越来越不灵了。

过去的事实表明，如果那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接受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那一套，那个国家的革命事业就会遭到损失和破坏，那个国家的共产党就会受到腐蚀，就会堕落，以至蜕化变质，那个国家、那个党就得随人俯仰，日子很不好过。相反，凡是坚决抵制和反对苏共领导那一套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日子就好过得多。现在也还是这样。

苏共新领导搞“联合行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停止公开论战。他们想堵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巴，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揭露和批判他们，以便他们任意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这怎么行呢？目前的这场大论战，以最鲜明最突出的形式表明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什么已经腐朽，什么已经衰亡，什么是今后发展和胜利的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被驳得体无完肤，已经变成世界革命这块田地里的肥料。真理越辩越明，革命觉悟越辩越高，革命干劲越辩越大。我们一定要把这场论战进行到底，一定要把大是大非彻底弄清。否则，对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对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是极为不利的。

苏共新领导搞“联合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停止所谓“派别活动”。他们想要扼杀那些正在为重建和新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想要制止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这些新生革命力量的支持。

在许多国家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集团决裂，重建和新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这是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必然结果，这是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在国际阶级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的情况下，革命力量重新组合的必然结果。

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接受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指挥棒，只许自己的党员做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喜欢的或者能够容忍的事情，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最害怕的事情一概不能做。否则，便要被打击，被处分，被开除。这样，只能迫使这些党内的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决裂，只能导致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革命有理，反对帝国主义有理，反对修正主义有理。抛弃陈旧腐朽的修正主义集团，另建革命的政党，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世界上凡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的一切力量，我们都坚决地支持他们。加强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才是我们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所谓“联合行动”是欺骗苏联人民的口号

苏共新领导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有着“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他们鼓吹“联合行动”的一种理由。

这是一种障眼法。苏共新领导步赫鲁晓夫的后尘，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名义下，进一步使苏联向资本主义蜕化。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全民国家”的口号下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使苏维埃国家蜕化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统治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在“全民党”的口号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政党。

苏共新领导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装出似乎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的样子，这只是为了敷衍广大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的不满。他们不但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而且同赫鲁晓夫一样，把斯大林领导时期说成是什么“个人迷信时期”。他们发表了无数的文章、著作和文艺作品，继续从各方面丑化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

苏共新领导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上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和发展新的剥削制度，培植和扶持新的资产阶级，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步伐。

在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所作的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标志着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跨了一大步。

苏共新领导把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试验，用党的决议和政府法令的形式肯定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他们实行的所谓工业管理的“新体制”，核心是通过所谓“加强经济刺激”，贯彻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把追逐利润作为企业生产的基本动力。他们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的名义下，取消了原先由国家按



计划给企业规定的一系列重要指标，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代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们赋予企业经理以雇佣和解雇工人的权力，规定工人工资水平和奖金的权力，任意支配大量资金的权力，使企业经理实际上成为企业的主人，可以为所欲为地欺压工人，侵吞工人的劳动果实。这实际上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所有制代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步一步地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企业变成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并不是什么“新创造”，而只是抄袭和发展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老“经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管理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围，它是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苏共新领导打着改革管理制度的幌子，从根本上破坏了全民所有制。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就是这样做的。苏共新领导理亏心虚，叫嚷什么谁谈苏联经济的“资产阶级蜕化”，谁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谁就是“敌人”^①。铁托集团也正是这样说的。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

苏共新领导在农村中也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扩大私有经济，扩大自留地，扩大私养牲畜，扩大自由市场，鼓励自由买卖。他们运用各种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来鼓励和扶植新的富农经济的发展，全面地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给苏联农业造成一次惊人的大破坏。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吹嘘他们制订了“急剧提高农业生产的有科学根据的纲领”^②。可是一年来，苏联的农业还是搞得一团糟，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现在把责任统统推到了下台的赫鲁晓夫身上。其实，这正是他们变本加厉地推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事实证明，苏共新领导取代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王朝的人事更迭，像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换马一样。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但是，苏共领导集团这个班子，还是赫鲁晓夫原来的那个班子，组织上基本没有变，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政策上都还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那一套。

列宁曾经指出，“机会主义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③。只要产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仍然存在，只要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仍然存在，那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必然存在。

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

① 柯西金 1965 年 9 月 27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1965 年 3 月 28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社论。

③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224 页。



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政策。他们同赫鲁晓夫一样，同占苏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苏联人民处在敌对地位，遭到苏联人民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苏共新领导现在叫嚷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目的无非是要掩盖他们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不要我们去揭露他们，并且煽动苏联人民反对中国。

在我们看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集团，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有责任进行揭露和斗争，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立场。只有坚决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才符合伟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对于苏联人民的真正的支持。

如果我们不对苏共新领导的修正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揭露和斗争，抛弃了原则立场去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那就正好合乎苏共新领导的心意，帮助他们欺骗苏联人民。那样做，就不是支持而是妨碍苏联人民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果实的斗争，不是支持而是妨碍苏联人民反对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经常对兄弟党的同志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发生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的情况，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样应当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应当援助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根据同样的立场，我们认为，坚决地揭露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同他们划清界限，坚持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当履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坚持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世界革命人民正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着激烈的搏斗。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在国际阶级斗争日益深入的情况下，正在经历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腐朽势力正在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政治力量正在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

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力量。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前进，是当前形势的主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定逐步走向死亡，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腐朽势力都改变不了的。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不打不倒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是不斗不垮的。它们在没有被推翻和没有被消灭以前，总是要倾其全部力量互相配合，变换各种手法，来对革命力量进行反扑。这样，在革命运动发展和深入的同时，就会形成一股反革命逆流。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出现曲折和反复。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能不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在反美斗争紧张关头，美帝国主义更加需要利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因此，反对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趋于激化。

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人们的认识总是参差不齐的。特别是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激化的时候，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列宁说过，在异常剧烈的变化中，人们“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是不能够在这个高峰上长久地支持下去的，不免要停顿一下，不免要回转身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极其丰富的教训，使无比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坚决、更自觉、更自信、更坚定地再向前进”^①。目前出现的情形正是这样。

随着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尖锐化、深刻化，在革命队伍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新的分化，总会有一些人从革命队伍里掉队出去。与此同时，亿万革命人民将不断地涌进革命队伍里来。

面对着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放弃原则，模糊原则，而必须旗帜鲜明，坚持革命原则，坚持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才能够巩固和扩大革命力量的团结。

现在，摆在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前的任务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同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清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迎接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的高潮。

归根到底，在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和干部是要革命的，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正在逐步觉醒起来，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行列。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定会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起来。

全世界的共产党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终究是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终究是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的。正如列宁对老修正主义者所说过的那样，从世界范围看来，无产阶级迟早会统一起来，并且必然会获得胜利，“但是，只有反对你们，这种胜利才能到来而且一定能到来，才能实现而且一定能实现；这种胜利也就是对于你们的胜利”^②。

只要苏共新领导还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承认和改正错误，不真正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上来，那么，要指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放弃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绝对办不到的。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概括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世界革命人民一定要乘胜追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①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页。

^②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9页。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王杰同志日记选

编者按：《解放军报》于一九六五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月十日，在《一心为革命》的标题下，连续发表了解放军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同志的日记摘抄，本刊选录了其中的一部分。

王杰同志是山东金乡县人，一九四二年生，一九六一年八月入伍，一九六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伍以来，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今年七月，王杰同志去江苏邳县张楼人民公社帮助民兵训练，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为了掩护在场的民兵群众和人民武装干部，他临危不惧，英勇牺牲。王杰同志光荣牺牲后，他所在的部队的党委会，根据他生前的要求，审查了他的历史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解放军报》在发表王杰同志的日记摘抄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指出：

“他的日记，是一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记录；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生动的记录；是一个很好的活的学习材料。”

“英雄的行为绝不是偶然的。英雄的行为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从这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杰同志正是由于勤奋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随时随地吸取革命的营养，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才能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判断一个人，不仅看他怎样说的，更重要的是看他怎样做的，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真理。王杰同志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在于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学习毛泽东思想，做到学用结合，言行一致，在日常工作中，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要关头，都能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针。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

学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們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沒有不經過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这是毛主席對我們的教导。对于思想上不清洁的东西，必須經常打扫。思想上有了不清洁的东西要想自动去掉，而不去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的道理一样。

我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担负着保卫社会主义，建設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要完成祖国人民交給我們的这一光荣任务，就必须不断的改造思想，提高觉悟。

要改造思想，我今后就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通过学习就可以懂得党的政策路綫，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明确前进的方向，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要学习好，必須联系实际，經常用革命道理对照检查自己，好的发揚，坏的坚决改。

(二) 經常注意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注意在訓練、生产与各項政治运动中锻炼自己，特別要注意到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去锻炼。不論干什么工作，执行什么任务都认真的按照上級的要求去做。要經常学习先进人物的榜样，学习他們崇高的思想，坚强的斗志和严格的組織紀律性，向董存瑞、黄继光、丘少云、安业民、雷鋒等英雄学习，把他們的模范事迹当做一面鏡子，不断的对照检查自己。

(三) 經常进行批評与自我批評。批評

与自我批評是改造思想的有力武器，要学会运用这一武器，虚心接受別人的批評，严格的进行自我批評，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天天洗脸，天天打扫思想上的灰尘，不管是小毛病大缺点都应该认真对待，坚决克服。

改造思想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是我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不懈的进行改造，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識，做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

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

今晚我参加了在营召开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經驗座談会。会上每个同志都談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共同的經驗是：学习不要貪多，貪快，要学一点做一点，边学边做边改，要有恒心去做。学习要結合当前任务，結合个人存在的問題，学习不要脱离领导，脱离群众。以上的經驗是宝贵的，我坚决贯彻到自己的学习中，理論联系实际，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做到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須讲究实际效果。学习多少篇文章，多少时间，只是反映学习情况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作为衡量学习效果的标准。学习效果的大小，要看我们是否能够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运用来改造思想，指导工作，分析和处理现实問題。毛主席說过：“对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們能够运用毛主席的立場、



观点、方法，说明和解决现实问题愈多，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效果愈明显，我们的学习收效就愈大。反之，尽管读书千百篇，笔记数万言，却偏偏不接触思想，不联系工作，不去运用，那就谈不上什么学习收效。学习的整个过程，学习的一切东西，都要从效果出发，着眼于领会和运用，必须切实在“用”字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学用一致，身体力行。

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自觉的思想，那是肯定学不好的。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我们只有觉悟到毛主席著作对于我们革命者像“阳光”、“空气”、“粮食”一样需要，才有可能把毛主席著作学好、用好。只有自觉，才能有决心，有毅力，才能出干劲，出时间，才能真正解决工作和学习的矛盾，才能达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目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从长期坚持着眼，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老，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的决心和毅力，把学习长期坚持下去。

学习毛主席著作还要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原则。只要是干革命做工作，总会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老的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哪里有工作哪里有斗争，哪里就会有问题可以带着学。绝不是没有问题可带，倒有带不完的问题。但是又必须重点突出，抓住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学习。只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把劲使在节骨眼上，一次学习，解决一个问题，学一点，用一点，

才能学得深，领会精，运用的好，扎扎实实的搞好工作。

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说，没有进过学校门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干工作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又回想三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更深刻。干就是学习，不会的，你只要参加去干就能学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三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学到了在学校永远学不到的东西：思想的提高，阶级觉悟的提高，军事技术的提高，艰苦朴素等作风的养成，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学习必须到实际中去，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学好。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

火车离开了轨道就寸步难行，革命战士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晕头转向。

“鲜花没有太阳不能开放，庄稼没有雨水不能生长，革命战士没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就会迷失方向。”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九日

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像东方刚刚升起的太阳，它放出万丈光芒，赶走了黑暗，把被压迫的人们的心照得透亮。毛泽东思想，像直立在岸边的灯塔，它一刻不停地闪耀着红光，给航行的人指



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像一件最好的武器，人们掌握了它，就能够分清敌我，站稳立场。

* * *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他所做的都是一件件平凡的事情，但就是这些平凡的事情，铸成了他那高贵的革命品质，在那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动人的事迹。

以前我总认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前途，做不出什么名堂来，雷锋的英雄事迹启发了我，给了我力量。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是这些“平凡”的工作组成了伟大的事业，正是这无数做“平凡”工作的人，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只要像雷锋一样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同样会做出伟大的事业。今后我一定向雷锋学习，在保卫祖国的岗位上，当好普通一兵，做一个雷锋式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革命部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学校。我要把自己当做一块煤，投到斗争生活的熔炉里烧炼，使它发出时代的光和热……

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

我认为：

一个人只有拿自己的缺点与别人的优点相比，才能感到自己不足，才会进步。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估计过高，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强，那永远也不会进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
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

毛主席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我要照毛主席的话去做，每天睡觉前要回想一天的工作，哪些做的对，哪些做的不对，以后怎样去做，每周每月也要检查一次。这种制度一定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对工作才有利，才能把工作做好。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伟大的六三年过去啦。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干的工作还不如领导给我的荣誉多，工作有了成绩，自己在党的培养下有了进步，我觉得我就像一棵幼芽生长在肥沃的土壤中（革命队伍里），首先是有党的阳光雨露，其次是有同志们锄地施肥，才能这样迅速成长，如果离开了党和群众就一时也生存不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回顾一下，我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如个人的修养还不够，不像雷锋对同志那样——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工作上缺乏艰苦细致的作风，吃苦性差，缺乏苦练技术的干劲，在帮助后进同志上做的还不够，自己是单枪匹马而不管别人。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高山同志说的好，单枪匹马拼出来的英雄算什么英雄。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党的要



求的，想到这里心里就感到惭愧。

新的六四年开始啦，我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新的一年里，党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艰巨的任务，怎样才能不辜负党的希望呢？必须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像赛跑一样，从起点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跑下去，保持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提高觉悟，立雄心壮志，苦战一九六四年。

为了给党和人民干好工作，在今后的一年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发扬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挤时间，钻问题，带着问题学，学深学透，学一点用一点。一年来的学习，使我深深感到，要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没有别的窍门或捷径，唯一的只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永远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重读《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这两篇文章一下就把我的思想抓住了，以前却没有像这次学习这样深刻、新鲜，两篇文章是那样有吸引力，像磁铁吸铁一样。我被张思德、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贵品质感动得热泪盈眶。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怎样活着？这是人生根本的问题，过去我很少去想，当然也没有解决。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讲得一清二楚，方向非常明确：“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且说：“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

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思前想后，觉得活着就应该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才有意义。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对革命有益的事，就应当毫不退缩。革命工作不分贵贱，重要的是看你能否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因此我边学习边下决心，学习他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成长起一定的作用，可是主要的还是个人的改造和努力。人在生活中要受到各种环境、各种思想和各种生活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这对于人的成长有好影响也有坏影响。好影响需要一个人去接受去发扬，坏影响同样地需要人去改造，这就是说人的成长主要的是靠内因，而不是外因。一个人要很快地成长，必须靠本人自觉地锻炼。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在好的环境中能站得住，在坏的环境里更要站得住，能经得起考验才是好同志。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

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准备在斗争的过程中迎接万难，排除万难，不怕困难，经受住各种各样的风浪的考验，那怕是刮起十二级台风来，也要站稳脚跟，坚定不移的前进。

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怕牺牲就不能在革命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就无所谓革命的坚



定性。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无数革命志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川血的代价换来的。

许多同志在参加到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来的时候，就抱定了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决心，抱定了为着革命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生命的决心。枪林弹雨，监狱刑场，敌人的封锁，雪山挨冻，草地忍饥，都不能丝毫动摇革命者的坚定意志。只要真正需要，当牺牲的时候，革命者想到的不是害怕，而是努力以此来换得更大的胜利。刘胡兰慷慨就义，想到的是革命的秘密可以得到保全。向秀丽舍身赴火，想到的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可以得救。黄继光堵住敌人的枪口，想到的是后面的部队可以前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后来的人，一定能把革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

接受了新的任务前往××防洪，走的时间没有命令，现在是等待出发。东西都准备好啦，可是不走，我的心早就飞向受灾的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等待我们去抢救，可为什么不走呢？时间过的太慢啦，过一天像一年那么长，命令下来就要飞向受灾的地区。

我向领导表示了决心，下了保证：

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到那里就冲向那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怨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

下雪啦，今天八点到晚上七点降雪三至七毫米。路还没有修完就下雪，这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为了完成任务，下雪也要干，正像同志们唱的：“不怕北风吹，不怕雪花飘，起早晚睡把活干，个个情绪高。”同志们的衣服湿啦，手冻裂啦，可还照样工作。同志们懂得什么是光荣，条件越困难，越能把事情办好，这就是光荣。我们是给社会主义修桥铺路的，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不论多苦多累，都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一日

昨天晚上，领导宣布我代理副班长职务，可是能力不足啊！感到压力不小，自己又无领导能力，又无经验，有些畏缩。感到了困难，我就想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就找到了《关于重庆谈判》一文，在这一文中毛主席说：“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毛主席又说：“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又对照了自己，毛主席不正像对着自己说的吗？王杰呀，王杰！遇到困难就害怕了吗？就后退了吗？不，不能害怕，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大胆管理，坚持真理，耐心说服，以身作则，只要听党的话，遇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想工作一定会搞好的。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

今天，在连接装药时不小心叫瀝青燙坏了手，疼的厉害。可是更痛苦的是我影响了工作。手疼暂时工作不方便，只好叫别人帮助。但是我心里难过，说什么也不能叫别人代我上班。我要坚持工作，同志们不叫我上班，不叫我捏泥蛋，不叫我装药。可我能闲得住吗？我休息不下去，坚持着去干，不顺手，慢慢来，手疼咬咬牙，想想二万五千里长征，想想中印边境反击战，我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坚持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

一九六四年九月三日

通过毛主席著作学习，我懂得了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斗争才是真正的幸福。

* * *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白求恩“对技术精益求精”。这次考核虽然取得了满堂红的成绩，但是我对技术还不是精益求精。有的课题理论背得烂熟，但是实际就做不上来。实际能做上来的，再问上几个为什么，那就不知道啦。工兵专业看来容易，谁不会挖坑埋地雷，就是老百姓没文化一看也会做，何必我这个初中毕业生呢，真有点“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啦。这种思想以前是存在着的。可是现在呢？一些工兵专业你只要钻进去，就有很深的学问。现在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小材大用啦。文化水平太低了，还感到有些不够用呢！今后要想练出过硬本领，就必须像白求恩那样对待技术精益求精。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日

六五年的训练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年的工作是艰巨的，困难显然是不少的。首先今年我们是夜老虎训练，将有××的夜间作业。其次是普及先进经验。这对我更是一个难题。一个革命战士应该如何克服困难搞好训练呢？我学习了《愚公移山》，使我增强了信心。自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难道还不如老愚公吗？我一定要和愚公比高低，工作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同时，我又学习了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工作中只要坚持四个第一，坚持毛主席著作学习，用毛主席思想武装头脑，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千难万难有了毛主席思想就不难。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

今天的作业地点是在坦克教练场，地硬如石，一锹下去挖不下四两来，震的手生疼，一个雷要二十来分钟。算了吧，战时那能遇到这么坚硬地，还是到松上中去练吧。不行，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林副主席也指示我们，平时多练几手，战时才能消灭敌人。战争是复杂的，平时训练光在顺利的情况下，到战时遇到不利的情况能完成任务吗？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把困难想的充足些。现在练习正是好机会。练！勤学苦练，手上打了泡不在乎，汗湿了衣服也不管。经过一下午的练习，技术提高很快，一般在规定的时间内也能完成任务。虽然累，但是练到了杀敌的硬本领，累也是愉快的。

* * *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学习《为人民服务》，使我认识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可是自己也存在着。平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和认识：“我当兵是为人民来的，为了人民我就得把工作干好。平时领导交给的任务只要干好，只要完成就行，别人的进步对我无关，少管闲事为佳。”因为有这种思想，平时帮助同志就不够，也不能经常找别人谈心。

学习了《为人民服务》，使我认识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可是我呢？越想越不对。今后一定按毛主席的话去做，经常找同志谈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年发放解放鞋，老同志都是一双深口的，新同志都是浅口的。在施工来说是深口的优越性大些，进出工地作业不易碰伤。因为有这样的益处，新同志都想穿双深口的。小胡要换深口鞋，换不换呢？换了，我进行作业不易碰伤自己吗？不换，小胡作业强度大，那不更会碰伤吗？是自己吃苦呢，还是让别人吃苦呢？毛主席不是经常教导我们吗？“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于是就愉快的把鞋子换给了小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新战友就要来到了，我送给他们

点什么呢？想来想去想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同志，他们给新战友的礼物是毛主席著作和针线包。只有思想上进步，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这样我就到街上买了十九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送给了亲爱的新战友。

* * *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毛主席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深印入脑海里。今年我们参加国防施工，开始器材浪费较多，油料、炸药等也浪费不少，浪费的原因主要是过于“大方”，用东西不在乎，缺乏节约的观念。

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使我认识到节约的重要，一滴油、一个螺丝钉、一寸导火索、一两炸药都是国家的财产，都是人民的财产。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就需要勤俭节约。勤俭节约是要经常的，像人洗脸一样。今年施工时间长，在施工中一定节约一滴油、一寸导火索、一两炸药，能节约一点是一点，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多节约一点。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我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节约”一节，受到了深刻的



教育。为了实现六亿人民的远大理想，我们革命的后代，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接好艰苦奋斗的班，当好红色接班人。

一个革命战士不仅要站在连队看到全国，而且要看全世界，看到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还过着贫困的生活。现在物质生活好啦，也不能忘记过去吃树皮、嚼草根、披麻袋的年代，好日子必须当穷日子过。

对于自己来说，能否接好艰苦朴素的班，把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接过来传下去，继承和发扬，也是能否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的问题。个人的生活看起来点点滴滴，但是反映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通过学习，认识提高了，慢慢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每月的津贴只花一元左右。在工作中我也注意到节约，今年施工担任了爆破手，整天与导火索接触，每天切取导火索时，都剩几十厘米不能用，丢掉怪可惜，我就积攒起来，过一个时期就用胶布接起来，这样又为国家节约了三十多米导火索。但是自己做的还很不够，一些小的地方还没注意到，我一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政治上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用低标准要求自己，自觉的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把艰苦奋斗的作风接过来传下去。

* * *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

深夜一点我站完了岗，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翻身起来，拿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我一口

气把它读完，读完之后我认识到：“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虽然全国解放了，六亿勤劳的人民正在建设着自己美好的家园，但是还必须看到，国际形势还很紧张，美国头子肯尼迪还在准备打“一切”战争，印度反动派还在挑衅，不时侵犯我国领土、领空，在东南沿海，美蒋特务还不断的窜犯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到我国东南沿海、山东半岛、我国内地进行侦察活动，最近美蒋特务在香港进入邮包时安放烈性炸药杀害我国同胞。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敌人没有睡觉，而在磨刀，还想卷土重来。

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正在演出反华大合唱，我是一个手握枪杆的革命战士，丝毫不能麻痹，我一定百倍提高警惕，树立长期为部队服务的思想，努力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一切新阴谋。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这个逻辑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



可能的。可是現在世界上竟出現了这样的人，与帝国主义搞協議，搞合作，违背馬列主义，背叛了革命。帝国主义者和現代修正主义者，不管你们玩什么花招，你们的花招騙不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只不过是你们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在人民面前。世界人民认清了你們的丑态，也使人民提高了警惕，来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

修正主义歪曲和篡改馬列主义，說什么現在不需要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說艾森豪威尔也热爱和平，“也像我們一样为和平而操心”，提出什么无战争、无武器、无军队的論点。可是我們坚决反对他这一点，这点也是同我們的根本分歧。

从世界每个国家的发展来看，不論哪一个国家要想走向社会主义，不經過斗争，不革命，不反对帝国主义就是空想。从我国的建設成就来看，經過了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和其他反动派，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才使人民走上了幸福的道路。

現代修正主义者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我們要坚决的和他们斗争，认清形势，站稳立場，坚持真理。真理一定会胜利，虽然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必胜。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我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分清了敌我。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开门見山的說：“誰是我們的敌人？

誰是我們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問題。”过去地主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人民，騎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那是因为“印把子”沒有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那是因为沒有团结好真正的朋友，攻击我們真正的敌人。現在我們掌握了“印把子”，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不再受剥削和压迫，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可是少数的敌人总是不断的捣乱，妄想复辟重坐天下，但是觉悟的人民是不会放松斗争立場的。可也有同志思想上警惕性不高，手中虽然拿着枪，思想上的枪已經放下，敌我不分，阶级立場站不稳。我們說，手里拿着的枪生了锈，可以很容易的擦亮，思想上的枪生了锈，是不容易擦亮的。我們不能对敌人存有任何幻想，我們不能认为“跳蚤頂不起被子来”，“泥鳅翻不了大浪”。敌人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如果我們敌我不分，阶级觉悟不高，就会上敌人的当，就会吃大亏，就会給国家造成損失。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

近来美帝国主义到处挑起战火，实行了它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公然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用军舰、飞机轰炸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村庄和勤劳的越南人民。对于这种軍事挑衅，我国政府发表了声明：战火是帝国主义发起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权力。我們革命战士有责任支援被侵略的越南人民。我一定勤学苦练軍事技术，苦练二百米硬功夫，一旦祖国需要，我坚决响应祖国的召唤，开赴越南，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軍，支援越南人民。亲爱的祖



国，亲爱的党，我的热血在沸腾！支援越南人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就是上刀山入火海也永不变心。

帝国主义不论你怎样玩弄战火早晚要死亡的，毛主席说过：“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帝国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美国必败，越南民主共和国必胜。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后，使我懂得了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毛主席说的“完全”、“彻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工作。世界上现在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还在受苦受难。一个革命战士要有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雄心壮志，不能只想到个人的一点利益，而不去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一个革命战士是完全为了解放人民、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这个“完全”、“彻底”也就是说服役是没有年限的，革命需要就干一辈子。革命是永远不会满期的。我愿干一辈子革命，永远也不放下枪。

* * *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听了共青团“九大”文件的传达报告后，

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浪一样，总是不能平静。我们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一代是关怀备至，寄予极大的期望，我一定当好革命接班人，把革命的重担挑起来。

毛主席说过：“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前辈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年青一代的身上，这就是说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重担由我们去挑，也就是说，革命的接班人由我们去担当。当好革命的接班人，就是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是实现革命化的根本保证。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像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那样，天天读，天天学，天天用，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指针，这样就会经得起任何风浪，真正接好革命的班。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

六日坐车到××，在车站等车，我看到未来的一代正在党的教导下健康地成长。在雷锋思想的影响下，孩子们的共产主义品德也在一天天地提高，戴着红领巾的儿童自动来车站服务，擦洗地板，扶老携幼。新中国儿童多么有觉悟啊，多么爱劳动啊！这说明革命的后代，在前辈的革命思想熏陶下，正在健康地成长，他们能够接下老一代的担子。可是帝国主义说什么：中国一代二代不出修正主义，三代四代会出修正主义。这是胡说！看看新中国的下一代吧，他们是能担起重担的，他们是会建设和保卫祖国的。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

——读王杰同志的日记

关 锋

王杰同志，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在面临生死抉择的紧急关头，都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行为。他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共产党人意识修养的榜样。他的激动人心的英雄行为，将永远鼓舞着和教育着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同志，在共产主义大路上奋勇前进。

革命的英雄行为是从哪儿来的？王杰同志的事迹和日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生动的回答：革命的英雄行为，是他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是他极端热情、极端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才能在自己的行动中表现出革命的英雄行为。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当前这个急风暴雨的世界革命的时代里，就只有努力学习用当代革命经验丰富了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把头脑武装起来，才能抵抗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才能粉碎阶级敌人的“和平演变”的阴谋，才能在任何狂风巨浪中站稳脚跟，屹立不拔。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其标志不是看他有多少书本上的哲学知识，而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看他用哪个阶级的世界观指导自己的行动，看他在实际上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观点和要求，解决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这个问题的。我们说，王杰同志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因为他时时、处处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分析问题、指导自己的行动；就是因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活着，而斗争，他真正懂得了并且实践了“革命就是我的理想，斗争才是真正的幸福”；就是因为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在必要的时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杰同志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他安心地、积极地做平凡的工作，他把平凡的工作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紧密联结在一起。王杰同志说：“要做一个‘万能螺丝钉’，党把我拧在那里，就在那里，永不生锈，闪闪发光。”这段话，不仅体现了一心为革命的精神，而且是正确地理解了严格的纪律性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王杰同志言行一致，说到就做到。他的确不愧为无产阶级



級革命队伍这个伟大集体中的一个万能的、閃閃发光的“螺絲釘”。

王杰同志为了革命的利益敢于挑重担子，不怕任何困难。他說：“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准备在斗争的过程中迎接万难，排除万难，……經受住各种各样的风浪的考驗，哪怕是刮起十二級台风来，也要站稳脚跟，坚定不移的前进。”王杰同志的行动证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王杰同志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参加防洪救灾时，想的是：“人民生命财产重要，个人安危不值得考虑。”他在日常生活中为战友們服务时，想的是：“我累一点没有什么，只要同志們能多休息一会，只要能減輕同志們一点負担，我就感到幸福。”这里沒有半点个人主义的影子。这样的幸福观是最高尚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幸福观。

王杰同志自觉地坚持和发揚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把艰苦朴素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联系了起来，同革命者的意識修养联系了起来。王杰同志对于发揚艰苦朴素作风的認識，是十分深刻的。他說：“一个人吃好穿好不算幸福，只有天下穷苦的人都过上美好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一个革命战士不仅要站在連队看到全国，而且要看到全世界，看到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还没有解放，还过着貧

困的生活。現在物质生活好啦，也不能忘記过去吃树皮、咽草根、披麻袋的年代，好日子必須当穷日子过”；如果忘記了这一些，貪图个人享受，就会“失掉革命的劲头”，“就会忘本”。因为有了这种深刻而高尚的思想，所以艰苦生活对于王杰同志是：苦在身上，甜在心上。这种深刻、高尚的思想，是能够抵抗任何“糖衣炮弹”的精神坦克。

王杰同志不但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厉行节约，而且随时准备着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向党、向祖国、向全世界发出了誓言：一旦需要，“我坚决响应祖国的召唤，开赴越南，狠狠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軍，支援越南人民。……为了受苦受难的人民就是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就是上刀山入火海也永不变心。”气壮山河！人民解放军的这种精神力量，是任何新式武器也攻不垮的。

在帮助民兵訓練时，王杰同志遇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王杰同志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生命掩护在場的十二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而光荣牺牲了。这种高尚的英雄行为，是王杰同志高贵的共产主义品质的集中表现，是王杰同志确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头脑的集中表现。因为他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才能够在生死关头作出



伟大而光荣的抉择。正如王杰同志所说：“平时不注意训练，战时就拉不出去”。不能设想，在刮起一阵小小旋风时就东摇西摆的人，能够在刮起十二级台风的时候站稳脚跟！不能设想，在平时不肯为了人民利益而流汗的人，能够在面临生死抉择的紧急关头为了人民利益而流血！

王杰同志的头脑里，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小事”大事之中，在平时和紧要关头，他确实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他自己的一切，献出了他的全部精力，献出了他的生命。他一心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死。这就充分证明了王杰同志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

王杰同志是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出身于中农家庭，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呢？这是毛泽东思想培育的结果，这是他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是他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结果。

王杰同志从入伍以来，就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种学习的自觉性，不仅是表现在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重要的是他为了革命而学习，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而学习。他认识到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就必须不断的改造思想”，“克

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家庭给予自己的不好的影响；就必须“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天天洗脸，天天打扫思想上的灰尘”。他经常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他诚心诚意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下定决心并且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

用毛泽东思想“对照检查自己”，“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这是真正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如果不肯“对照检查自己”，不肯身体力行，书是书，我是我，讲起革命道理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我”字当头，那就是极不老实的态度。一个不肯用革命理论“对照检查自己”、不肯身体力行的人，休想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因为，不联系自己的思想，不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肯身体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学不进去。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说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从王杰同志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的过程。他力求“领会精，运用的好”，“学一点，用一点”，“切实在‘用’字上下功夫”。而在“用”字上，他首先又是用于自己的思想，随时检查缺点、改正缺点。正因为他在学习过程中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当头”，所以才



能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通过学习既提高了思想意识、又提高了思想方法，才做到了时时、处处以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只有在思想意识上修养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才能真正学会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只有在某件事情上毫无个人主义的想头，才能对这件事情做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同个人主义是无缘的，“因为，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常为个人利益而自觉地抹煞、掩蔽和歪曲真理。”①

人们的思想总是一分为二的。王杰同志懂得了这个道理，就用这个道理分析自己的思想。客观上，人们的思想一分为二，这是一回事；而随时认清自己思想中的具体的一分为二，这是另一回事。不认识自己思想中的一分为二，那就是处于盲目状态，那就不能自觉地发扬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认清自己思想中的具体的一分为二，就是对于自己的精神状态和前进方向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觉悟，就能够头脑清醒，就能够不断进步。随时认清自己思想中的一分为二，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它却是人们思想意识修养中最重要的。王杰同志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是他高度觉悟的表现，是他真正懂得了一分为二的表现，又是他不断进步的原因。

王杰同志领会了毛主席所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精神实质，他在作出成绩、有了显著进步的时候，就更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思想，防止骄傲思想萌芽。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对革命者思想修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段话：

“一个人只有拿自己的缺点与别人的优点相比，才能感到自己不足，才会进步。”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估计过高，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强，那永远也不会进步。”

这是两种“比较学”：前一种拿自己的缺点与别人的优点相比；后一种拿自己的优点与别人的缺点相比。前一种，是真正的虚心，使人进步；后一种，是骄傲的表现，使人落后。前一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后一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实践锻炼是王杰同志成长的基础。但这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他才能够勇于实践、勇于斗争，能够自觉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随时在实践中汲取智慧。

革命前辈的英雄行为，同辈模范人物的事迹，对于王杰同志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

①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版，第53页。



用。王杰同志总是把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作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行动的榜样。但是，这同样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他才能对这些感性的事实有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感受。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从王杰同志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个真理的具体表现：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迅速地正确理解了革命的英雄行为；也正因为能够理解，所以他就能够更深刻地感觉它，从而深深地引发了学习革命英雄行为的激情。

总之，毛泽东思想挂了帅，就能够随时、随地汲取革命思想的营养。

王杰同志是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思想，是哺育王杰同志的乳汁。

毛泽东思想，是王杰同志的革命英雄行为的思想来源。

“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这是我們革命者的格言，这是时代的真理。在我們的时代里，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彻底的革命者。每一个愿意革命的人，不论家庭出身怎样，只要诚恳地坚持不懈地这样去做，都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

共产主义战士。

在我們国家里，工农兵正在十分热情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是我国政治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大动力，又是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的伟大学校。

像雷锋、王杰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正在军队中、工人中和农民中，大量涌现。这是我們祖国的希望；这是避免出现修正主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王杰同志说：

“后来的人，一定能把革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革命的前辈，放心吧，我们会沿着你们的路走到底的！”

这也是我国用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青年一代的声音！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想用反动的武装力量打垮我们，妄想在我国搞“和平演变”。

好吧！就让这班老爷们试一试吧！

历史命运注定了：

共产主义一定在全世界胜利！

等待这一小撮妄图阻挠历史车轮的螳螂们的，是埋葬他们的坟墓！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5页。



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在成长

荀 常

工农兵群众拿起笔杆子来，进行文艺创作，反映自己的生活 and 斗争，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劳动人民在旧时代虽然也用文艺的方法表现自己，但那时他们没有掌握文化，他们创造了“口头文学”。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文化上也翻了身的工农兵群众，就有可能广泛地亲手来创造自己的文学。

近几年来，许多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基层干部，纷纷拿起笔来，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生动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刻内容，塑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英雄人物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豪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要依靠千百万群众的英勇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同样，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也要有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积极参加，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单靠少数专业作者是不够的。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着客观世界，引起

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引起自己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对于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崭新而又深广的精神世界，亲身参加斗争的工农兵群众自己了解得最多，感受得最深。他们拿起笔来写作，能够最深刻、最真实、最迅速地将它反映出来。

适应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专业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使自己同工农兵相结合，同时要培养一支来自工农兵群众，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的业余文艺创作队伍，这是建设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根本问题。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在很长时期内，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工农兵群众中的业余文艺队伍将越来越壮大，这是必然的趋势。专业作者应当热情地帮助业余作者，同他们密切合作，互相学习。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和形成的一支业余创作队伍，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既能拿锄头，又能拿笔杆；既能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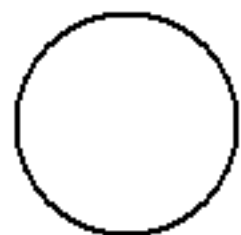


机器，又能搞创作；拿起枪来是守卫祖国疆土的战士，拿起笔来是文艺战线上的红色尖兵。这些业余作者始终不离开劳动的、战斗的岗位，始终是群众中的普通一员，这就使他們能够强烈地反映群众的感情、愿望和要求。这样的人，在创作上必然会对陈旧的、腐朽的、不健康的東西有抗拒力，能够敏锐地反映新鮮的、刚健的、有生命力的事物，

表现出生龙活虎、奋发昂扬的革命精神。党和人民要求他們永远保持革命者的本色，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永远为革命而劳动，为革命而写作。在反映伟大社会主义时代的创作实践中，学习、创造和积累新的艺术方法和艺术经验。经过不断的学习和锻炼，他們将会在文艺创作上作出出色的贡献。

农民欢迎革命小戏

· 文 文 宣 ·



最近，在全国许多地区涌现出一批深受农民喜爱的革命小戏。农民說：革命的戏剧是“长志气、长干劲的戏”，是“擦亮眼睛、提高觉悟的戏”。

革命小戏特别适于上山下乡演出。小戏在編、排、演上可以做到快，能及时反映农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小戏的道具、布景、乐器轻便，舞台可以灵活簡易。小戏需要的演員不多，一个较大或中型的剧团可以“化整为零”，組成几个小分队，同时到许多村庄去演出。演小戏还可以大大降低演出成本，使农民看戏少花钱。此外，小戏还便于传授給农村业余剧团

演出和便于培养业余演員。

正因为革命小戏具有这些优点，它被誉为戏剧中的“輕騎兵”。对于这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有力武器，应该积极提倡，大力支持，严肃对待，使戏剧更好地发挥为基层群众服务的作用。

小戏能不能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当然能够。写得出写不出思想深刻的作品，不在于形式的大小，而在于能否掌握时代的脉搏，揭示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小戏比起大戏来固然容量較小，但是它可以从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抓住最突出的事物，把主要矛盾典型化，同



样能够反映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同样可以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只从形式的大小，来判断作品的思想深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小戏粗糙，缺乏感染力”，“只是配合任务的宣传品，不是艺术品”。这些看法不对。任何艺术都是宣传品，这是常识。小戏能够成为及时配合革命任务的宣传品，同时又可以成为富于艺术性的宣传品。它可以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生动活泼的戏剧语言。小戏更要求艺术的精炼。只要人们掌握了群众的斗争生活，而且认真对待，精心创作，完全可以写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革命小戏来。当然也有些小戏可能写得粗糙而缺乏感染力，但是这并不是因为它小。不掌握群众的斗争生活，不在艺术上下千锤百炼的功夫，大戏也可能写得粗糙而缺乏感染力。

“小戏不能登大雅之堂”。这要看所指的“大雅之堂”是什么。封建阶级有他们的“大雅之堂”，那就是宫廷、堂会。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大雅之堂”，那就是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艺坛”、“沙龙”。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大雅之堂”在哪里？是在工农兵群众中间。哪里有工农兵群众，哪里便是我们革命文艺的“大雅之堂”。如果我们的戏剧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和批准，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最好的评价。革命的戏剧工作者，应当为革

命小戏得到群众的喜爱而感到光荣，感到高兴。

当然，我们决不是说农民只爱看小戏，不爱看大戏。好的大戏也应当努力用比较简便的方式送到农村去。但是小戏毕竟更便于下乡。为了及时地广泛地满足农民文化上的需要，把小戏送到农村去是当务之急。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新文化。把革命的戏剧迅速地送到农村，满足广大群众对革命文艺的需要，是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事情。要做好这件事情，就要了解农村，熟悉农民，体会农民群众渴求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心情，有为五亿农民服务的革命态度和阶级感情。这是个立足点问题。

演小戏可以给戏剧工作者创造更多地深入工农兵、向群众学习的机会，有利于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有利于给作者和演员们提供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提高创作和表演的艺术水平。所以，在广大农村演出小戏，不只有利于戏剧的普及，也有利于戏剧的提高。

我们戏剧工作者应该学习和吸取各个地区下乡演出小戏的经验，学习他们思想上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决心，艺术上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态度。为了使革命小戏迅速打开局面，要迅速推广一批优秀的小戏剧目，把更多更好的革命小戏送到农村去。



充足理由律

在形式邏輯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問題，广泛地持續地进行了討論。在討論中，不少同志不同意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共規律的”这个論点。他們所持的一个重要論据是：形式邏輯的充足理由律，要求在推理中的前提內容必須正确。这些同志实际上认为，形式邏輯研究思維形式，也研究具体的思維內容。他們說：“充足理由律要求之一，就是理由应当真实”；“人們要真正掌握这一条規律，就需要联系思維內容”。

充足理由律的意义和作用究竟是怎样的，这里說一說我个人的意見，和同志們作一些探討。

二千多年前，形式邏輯科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所闡明的邏輯科学的基本內容，还未把充足理由律提出来，作为邏輯研究的一个部分。往后，形式邏輯科学的内容有了一些发展，如斯多葛学派着重研究了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的理論，也

沒有提出充足理由律。首次明确地提出和闡明充足理由律的是德国人萊布尼茲（1646—1716年）。这还是近代的事情。

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在欧洲，資本主义处在上升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程。由于机器工业、水利、枪炮制造和航海等的需要，天文学和力学得到迅速发展。人們越来越多地把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数学方法的应用，推动了力学。在这个时期，萊布尼茲和牛頓发明了微积分学，并把它运用于力学，力学获得了很大发展。运用数学方法所得到的显著的成效，引起人們的注意，人們开始把数学方法运用于思維領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萊布尼茲提出和建立了一个使用符号語言的邏輯体系。在哲学上，提出和闡明了“单子論”。

萊布尼茲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創造物”都是由“单子”組成的，单子是世界上一切創造物的組成的基本单位。每个单子都是不同



的，没有两个单子是完全相似的。单子是变化的，单子的现在状况是历史的继续，同时又孕育着未来的进程。单子的变化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单子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多种联系，对单子的变化也发生作用。

但是，从唯心主义出发，莱布尼兹却又认为：单子，也就是知觉。这种知觉，也可以叫做灵魂。

列宁对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指出：莱布尼兹是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的思想。单子论中包含有“特种的辩证法，而且是非常深刻的辩证法，尽管有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①。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莱布尼兹的辩证法思想也只是停止在有限的水平上。同那时许多哲学家一样，莱布尼兹醉心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绝对完满的哲学体系，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形而上学、走向神学。

从单子论出发，莱布尼兹认为，单子与单子之间的联系，是“和谐”的、“适应”的、一环联结一环的。那么，单子和单子之间是凭什么联结起来的呢？莱布尼兹认为，这就是充足理由。他说：在两个不同的单子中，“每一个中间都有使它适应于另一个的理由，因此就某个方面说是能动的，从另一个观点看来则是被动的。说它能动，是由于我们清楚地知道其中有一种成分，可以说明另一个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说它被动，是由于其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因在另一个我们清楚地知道的成分中”^②。也就是说，单子与单子之间的这种联结，由充足理由律起作用。依靠这种联结，形成一系列的单子图式，建立了所谓单子

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括了宇宙万物。

单子是怎样形成的呢？最终的单子又是什么呢？

莱布尼兹赤裸裸地宣告：“只有上帝是原始的統一或最初的单純实体，一切创造出来的或派生的单子都是它的产物，可以说是凭借神性的一刹那的連續閃耀而产生的”^③。莱布尼兹说：不但最初的单子和最终的单子是上帝的创造物，从最初到最终的这一系列的中介，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在一系列的单子的末端，是万物的充足理由——上帝。

不用说，莱布尼兹把充足理由说成是上帝，是十分荒谬的。

莱布尼兹论述单子论的时候，哲学和逻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里单就逻辑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莱布尼兹是把充足理由律作为一个推理的原则，并认为是人们进行推理所应当遵守的。他说：我们的推理建立在两大原则即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的基础上。他说：矛盾律的作用在于，“判定包含矛盾者为假，与假的相对立或相矛盾者为真”^④，也就是说，排除思维的自相矛盾。充足理由律的作用则是这样：“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⑤

莱布尼兹对于充足理由律的论述，大体可以归纳如下三点：

第一，充足理由是作为事物之间或思维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431页。

^{②③④⑤}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1、300、297页。



之間相互联系的一个环节；

第二，在推理中，充足理由律对于前提的内容是正确还是錯誤并无确定的要求；

第三，在推理中，必須要有前提或理由，而理由是否正确，充足理由律是不可能加以判定的。

可見，从莱布尼茲对充足理由律的叙述中，也很难得出这样的結論：充足理由律要求推理的前提内容必須正确——如很多同志所說的。

黑格尔对于形式邏輯是倾向于否定的。他主张形式邏輯应当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具有内容的活生生的“邏輯学”即辯证法。但是，他对于充足理由律的看法却是中肯的。他指出：充足理由律“無論就理論言或就实践言，均不能予人以确定的滿足。其所以这样，即由于这里所謂根据（充足理由——引者）还没有真实确定的内容”^①。照黑格尔看来，所謂充足理由，无非是：“任何一个理由只要这理由和与它相联属的直接存在的关系，被认作自身关系，或被认作肯定，都可叫做根据。”^②黑格尔举例說：一个偷东西的人，也可以找出充足理由，来为自己的偷窃行为做辯护。

黑格尔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談充足理由律的。但是，我們从他对莱布尼茲提出的充足理由律所作的說明中，可以看出，在推理中，充足理由律的作用就在于：从邏輯上把前提与前提、前提与結論联系起来，結論是合乎邏輯地从前提中推出来的。前提的内容，不論是正确的还是錯誤的，都可以作为結論的充足理由。因此，充足理由律在推理中并不一定要求前提内容的正确。

邏輯史上，除黑格尔外，也还有人认为充足理由律的作用在于思維間的联結。一九〇三年我国翻譯出版的日本人十时弥著的《論理学綱要》一书，在闡明充足理由律时写道：“凡思考或为肯定，为否定，必不可不有十分理由存乎共同，是謂充足原理。”^③一九一四年，张子和著的《新論理学》一书，也认为充足理由律的原理，“实即思考关联結合之一原理也。”^④

因此，认为充足理由律要求推理的前提内容必須正确，充足理由律能“管得到”推理中前提内容的正确；认为在推理中即使是前后一貫地推出結論，而結論内容不正确，这个推理就是不符合充足理由律，也就不符合形式邏輯；认为充足理由律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会混淆形式邏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重大区别，混淆形式邏輯与其他各門科学知識的重大区别。

形式邏輯这門科学，主要是从形式結構及其規律这一方面研究思維的。它在研究思維形式結構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撇开了具体思維的内容，而抽象出一般的思維形式，形成思維形式的种种类型及其規律。形式邏輯科学本身根本不包括关于推理的各个前提的具体内容，根本不研究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前提内容是否正确，因为这是由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由其他各門科学来研究的，归根結蒂，是由实践来决定的。

对于充足理由律的作用作不恰当的夸大，实际上否定了充足理由律的真正意义和

①② 《小邏輯》，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270、273 頁。

③ 《論理学綱要》，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5 頁。

④ 《新論理学》，商务印书館 1914 年版，第 10 頁。



作用，不利于对充足理由律的研究。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观点；恰恰相反，是一种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观点，实质上是以充足理由律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如果只是規定充足理由律要求推理中前提内容正确，而并不解决前提内容怎样才能正确，怎样才算正确等問題，那么，規定充足理由律的这种要求，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在邏輯史上不但对于充足理由律的作用有分歧的看法，而且，对于充足理由律是否是形式邏輯所研究的，也有不同的意見。有些邏輯教科书是把充足理由律列入形式邏輯的范围之內的。但有些邏輯教科书，并未把充足理由律写到里面，这种情形，外国有，中国也有。

我們认为，充足理由律可以成为形式邏輯对象的一部分。它在形式邏輯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体相当于其他規律。充足理由律比之同一律等規律，是有不同的。但这种不同，不能說成充足理由律和同一律等性质根本不同。我們可以看到，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它們从不同角度論述了思維确定性的原則；而充足理由律則論述了思維过程应当具有連貫性、論证性。也就是說，充足理由律在于要求判断应当有根据，在推理中前提与前提、前提与結論之間应当具有邏輯联系，前提是推出結論的理由。这显然是正确思維所不可或缺的。充足理由律的这种作用，也表现在邏輯证明中。邏輯证明，論題必然地邏輯地是由論据推出来的，而这个論据的要求，也可以理解为充足理由律的要求。充足理由律之所以有意义，所以成为形式邏

輯研究的一个内容，原因就在这里。

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个具体推理中，推理形式同推理内容是密切結合着的。

例如：

因为生产資料私有制是要消灭的，
資本主义是生产資料私有制，
所以，資本主义是要消灭的。

这一推理形式当然是符合于充足理由律的，其内容在我們看来也是正确的。

我們不妨举另一个推理的例子：
因为生产資料私有制是永恒的，
資本主义是生产資料私有制，
所以，資本主义是永恒的。

在資產階級看来，这个推理是合乎充足理由律的，内容是千真万确的。

在我們看来，这个推理形式是正确的，是合乎充足理由律的，因为結論是从理由（或前提）中邏輯地推出来的；但是，这个推理的内容显然是荒謬的。

为什么在一个推理中，内容是錯誤的，而形式可以是正确的呢？这是因为，思維的形式和内容是統一的，又是有矛盾的，在内容正确的推理中，其思維形式是正确的；但錯誤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具有正确的思維形式。否认这一点，那就是形而上学。

在现实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不但无产階級运用充足理由律来論证自己的思想，資產階級也同样运用充足理由律来論证自己的思想。这也就是因为，充足理由律只要求人們在思維过程中具有連貫性、論证性，并不要求具体思維内容的正确；也就是說，充足理由律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它可以为无产階級服务，也可以为資產階級服务。



大 庆 通 信

——从职工家属鬧革命的一些平凡事說起

孙 維 世

亲爱的同志，我們不是經常談論着大庆嗎？大庆是英雄輩出的地方。关于大庆英雄的故事你大概已經听到很多了。你当然听到过全国聞名的老英雄王铁人和他的战友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的故事，还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张洪池等数不尽的风流人物的傳說。現在我要告訴你的是大庆家屬鬧革命的事情。

一九六一年，参加会战的工人的家屬，陸續来到大庆。那正是我們祖国同三年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时候。在这茫茫荒原上，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在这里修建起集中的大城市么？那要花国家多少資金，需要多么长的时间，还需要多少劳动力来为这一整套城市管理服务。嫌这些家屬麻煩，让她们回去么？办工业就有工人，有工人就有家屬。

在这大荒原上能不能打破过去办企业的老框框，能不能按毛主席思想闖出一条新路来？

大庆会战工委根据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发动职工和家屬大搞农业。經過群众广泛地討論，又进行了忆苦思甜的階級教育运动，大

庆领导和职工一起拉犁开荒，一起挖土盖房，在这大荒原上响起了南泥湾的歌声。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在石油工人的家屬中，有五名垦荒队员，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向荒无人烟的地方出发了。其中一个就是年近五十的薛桂芳。

薛桂芳是大庆油田著名标兵薛国邦的姐姐。她平时不爱說話，干起活来可麻利得很，年轻人也赶不上她。受到表揚时她总說：“这有啥，咱是受苦人，从小就劳动惯了。”誰有病痛，她半夜三更跑去請医生，替病人熬药煮粥。誰生了孩子，她就去帮产妇洗衣裳，洗嬰兒的尿片子，还要送米、修炉子、买东西……干这些事她是又热心又細心。平时劳动了一天从地里回来，她就到各家去串門，了解队员的思想情况。誰有心事向她訴說的时候，她靜靜地、全神貫注地听着，然后一桩一桩地帮你解决问题。話虽不多，可別提多贴心了。正因为她和大家这样贴心，大家都管她叫薛媽媽。

薛媽媽等五人出发时，随身携带五把铁鍬和一些簡單川具。她们在风雪交加的荒原上搭帳篷，开荒地，展开一場与天斗与地斗的荒原夺粮斗争。

五名垦荒队员的事迹很快地在工人家屬



中传开了。跟着就来了二十三个家属，替垦荒队增添了声势。但是过了不久，有些人却在艰苦生活面前动摇了，她们借口家里有事，身体有病等等理由退回去了，最后只剩下十个家属。这时候，不爱说话的薛妈妈说话了：“会战刚开始那阵子，石油工人是天当被子地当床呀，再大的困难不也顶住了？咱们领导还住牛棚哩，咱们这点困难又算个啥？越困难越要革命哪！”

薛桂芳的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她们说：“对，咱们是石油工人的家属，要向石油工人学习。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咱们要同困难斗，看谁斗得过谁！”

薛桂芳带着家属们在风沙中用铁锹一锹一锹地刨地，三天功夫就刨了五亩地。她们看见职工和领导同志都曾用人拉犁，她们也学着用人拉犁。她们把每根绳子都拉得紧紧的，拉到地头时，有的累得跪倒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了。这时衣裳都湿透了的薛桂芳还笑嘻嘻地去拉那根最长的绳子，坐在地下的姐妹一齐站了起来，拥上前去抢薛妈妈手中的绳子……。

一个大雨倾盆的夜里，狂风把帐篷吹得歪斜了，雨水从四面八方流进了帐篷。薛妈妈忙把自己的雨衣给体弱的小李披上，小李坚决不要，她说：“你那么大年纪了，怎么给我雨衣？”

薛桂芳说：“快披上，我身子骨比你好。”油灯灭了，火柴也湿透了，眼前是一片漆黑。小李抓着薛妈妈的手说：“我一想起薛妈妈说的越困难越要革命，心里就特别有劲。”薛桂芳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教的。”

帐篷外风声呼啸，冰凉的雨水湿透了她

们的衣裳。在黑暗中，她们似乎看得见相互关切的目光，心中感到特别亮堂……

家属垦荒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事迹传遍了整个大油田，这消息给人极大的鼓舞。这个生产队是战区许多生产队中的一个，经过艰苦奋斗她们在农业上获得了大丰收。家属在劳动生产中逐渐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中央领导同志到大庆来视察工作，看到这里的一片兴旺气象，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指示，大庆工委根据这一指示，在广大职工同家属中掀起了一场矿区建设方针的学习运动。大庆油田的矿区究竟应该怎样建设？是建设集中的城市还是建设分散的工人村？职工和家属经过反复多次的讨论，一致认识了：咱们不能按老一套和洋框框办事，咱们不搞集中城市，不盖高楼大厦。咱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咱们在生产上一定要高标准，可是在生活上永远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讨论中，工人和家属热心地提出学当地老百姓土打墙的办法盖“干打垒”，按油田分布情况建立分散的工人村。这样既合乎总路线的精神，又便于工作和生活。薛桂芳在这个问题上也积极响应。

一九六四年春天，大庆油田到处插满了红旗。一队队妇女热火朝天地往地里送肥、撒肥。她们的歌声惊动了荒原上的云雀，怎么出动了这么多人马？荒原上将要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

在一排排木架上，妇女们正学着打土墙，木架下面的妇女，和泥的和泥，送土的送土。年轻的女木工在师傅指导下锯着木头，女玻璃工学着安窗户……她们正在忙着建设自己



的工人村。

家屬組織起來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參加工人村的建設，不僅鍛煉了幹部，而且培養了接班人。

隨着形勢的發展，許多家屬生產隊的隊伍擴大了，補充進來了許多年輕的家屬，她們大多是中小學程度的知識青年。薛桂芳生產隊的隊員郭彩英就是其中的一個。

郭彩英是高中畢業生，她丈夫是采油工，還是個五好紅旗手，她來大慶找工作，沒想到丈夫把她送到農業上來勞動。剛來工人村那天，郭彩英心中萬分不樂意，采油工把組織上獎給自己的一部《毛澤東選集》送給了妻子，郭彩英接過了書，卻抹着眼淚說：“我到大慶來，不是為種地來的。”

“那你是為啥呀？”采油工笑着問。

“干這些活兒，還用得着高中畢業嗎？”

“高中畢業的知識分子下鄉勞動的不多的是嗎？”

“要下鄉勞動我就不到這兒來了。”

“那為什麼，不都是一樣勞動么？”

“那是知識青年下鄉，可我是和家屬們在一起。”小郭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咳！你自己是個家屬，你怎么看不起家屬？”采油工溫和地說。

“我要當工人，不當家屬，我就是不當家屬！”郭彩英着急了。

“不要看不起家屬，大慶油田的家屬可是好樣的，你得好好向她們學習。”采油工嚴肅地說。

郭彩英到地里干了兩天活，就躺下了，薛媽媽去看她時，她正躺在床上生氣。薛媽

媽喊了她一聲，她理也不理，卻把身子朝里翻了過去。薛媽媽望着她，沉思了一下，輕輕地問她：“身上疼不疼？”

她眼圈一紅，差點兒掉下淚來，說：“渾身上下又酸又疼，連腿都抬不起來了。”

薛媽媽笑着說：“乍一干活兒都是這樣，熬過這一關就好了。”

薛媽媽坐在炕沿，一邊給她輕輕地揉着腿，一邊和她談天。談到過去用人拉犁開荒的情形，談到工人村發展的遠景，談到即將建設的學校、食堂、托兒所、書店……談到這里將是新型的礦區，又是新型的農村，談到工人作工，家屬務農，談到人人都勞動，人人都革命……這些事情都是薛桂芳從領導那兒聽講的，她談起來這樣親切，好像是母親給女兒讲故事一樣，郭彩英聽了心中暖烘烘的，她從小沒有父母，現在坐在炕頭的好像就是她的母親。是呵，這是引導她走向新生活的革命的母親。後來在一個憶苦會上，她聽到薛媽媽談起自己的身世，更加深了她對薛桂芳的感情。

薛桂芳出身貧苦，父親是個長工，拚死拚活給地主干活還是吃不上穿不上。薛桂芳從小連鞋子都沒穿過，十冬臘月給地主放牛，凍得受不了時就把腳伸到牛糞里取暖。有一次餓慌了去偷吃狗食，被地主打昏在地上，母親抱着她只是哭，連話也不敢說一句。薛桂芳的婆家也是窮人，丈夫連興在玉門油礦當鉗工。那時玉門油礦工人的生活真比牛馬都不如，有一次連興師傅因工負傷，資本家不給醫治，把他開除了。薛桂芳談到連興師傅滿身是血被工友抬回家的情形時，過去辛酸的生活在她眼前浮現出來。那時她正在月子



里，她抱起生下不到一周的儿子在风雪中奔走。她跑到厂里哀求资本家发发慈悲，不要开除她的丈夫，如果孩子他爹被开除了，她们一家都没法活命了。资本家不但不理她，还叫人把她从厂里拖出去。薛桂芳谈到她怎样抱着婴儿被他们推倒在雪地上时，她的眼泪涌了上来。坐在她身边的小女儿哭了起来，她喊道：“好妈妈，不要说了，我永远不忘过去的苦，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会场里一片啜泣声，郭彩英心中燃烧起仇恨的怒火，热泪也不住地淌着。这时薛桂芳对大家说：“过去给地主资本家干活，一条人命真不如牛马值钱，今天咱们作了主人，咱劳动就是革命，咱不好好劳动能行吗？”

忆苦会的那天晚上，很多人很晚没有睡着。郭彩英好像亲身经历了—场自己父母所受的苦难，更是辗转不能成眠。

夜已深了，郭彩英轻轻地披衣起来，点上油灯，翻开了丈夫送给她的《毛泽东选集》。她读着《为人民服务》那篇文章，思索着自己这年轻的一生。陕北，这是她的故乡，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父母就在地主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死去了。她好像看见陕北烟熏火烤的土窑里，张思德正在那里烧着炭。火光映红了张思德的脸，照亮了他那双年轻有神的眼睛。张思德跟着毛主席，经历了多少次艰苦的战斗，在烽火连天的长征途中，他战斗得多么英勇！到了陕北，为了人民的需要，他到安塞的深山里烧炭，献出了自己青春的生命……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活得有意义？郭彩英正想得入神的时候，一只手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这是薛妈妈，她每晚都要起来给年轻的同志查铺盖被——郭彩英回身

看着薛桂芳，从薛妈妈那不高的个子和温柔的笑容中，好像蕴藏着一种力量，那是永远不能忘记的阶级仇恨，那是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那是真正理解我们劳动的意义，理解我们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为什么薛妈妈永远不知疲劳？为什么她那样热爱劳动？为什么她那样关心集体？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的回答，一个新的世界在郭彩英心中渐渐展开了。

郭彩英渐渐摸熟了地里的活儿，当然这是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的。开始锄草时，那把锄头怎么也不听使唤。她那块地刚锄到一半时，别人早已到了地头。她正着急，老队员从对面锄了过来接她这块地。薛妈妈也过来教她怎样用锄头才不费劲，当她们一块走向地头时，薛妈妈拉起她的手看了看，就替她挑泡、包扎。郭彩英从前以为和这些人在一起劳动委屈了自己，现在她感到要向这些家属们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现在每当在地头休息时郭彩英就给大家读报纸，晚上学习时，她就选一段毛主席语录读给大家听。她感到家属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比她体会得深，因为她们早就开始学了，在没有上工人村前，丈夫帮妻子学、孩子给母亲念的情形就很普遍，她们还有艰苦的生活经历，她们能联系自己的思想来学，而且学一点就想办法用一点，她们学是为了用，所以学得活用得也活。

郭彩英的丈夫每次来工人村就下地和家属们一起劳动。他从小是个放牛娃，后来当过长工，庄稼活并不外行。锄第二遍草时，他有意无意地和家属们展开了竞赛。家属们也不示弱，这一场活儿干得可真带劲。在一望



无际的大田里，火热的太阳照得他们汗水淋漓，他们挥动着锄头，走过的地方，杂草都被除尽，黑油油的土地上，苗儿茁壮地生长着，人们心中充满了喜悦。

采油工侧身看了看他的妻子，彩英脸儿晒得黑黑的，那把不听使唤的锄头在她手里已经驯服了。她抿着嘴，很自信地干着活儿。

一阵凉风吹来，多变的荒原上嘩啦啦地下起一场骤雨，队长吹哨要大家休息，人们还照样低着头锄草，雨淋在人们身上，打在人们脸上，谁也没管它。阵雨过去了，天空出现一道彩虹。到了收工时，人们就向地头走去。这时采油工挑了一担开水，甩着大步走了过来，他放下担子喊：“谁要喝水就来呀！”

郭彩英和妇女们笑着拥上前去。采油工站在一边看着郭彩英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听见妇女们嚷着说：

“郭彩英，唱一个！郭彩英，唱一个！”

郭彩英放开她那银铃般的嗓子唱了起来：“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彩……”这歌声这样嘹亮，带着浓厚的故乡风味。采油工望着郭彩英和这群快乐的妇女，望着那微微含笑的薛桂芳，他情不自禁地笑了。

郭彩英在这里上了劳动大学，成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被评为五好家属，后来当选为生产队的队长。

这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妇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在这个队上，一人有事大家帮，哪有困难抢着上，人们拿自己的钱来帮助家里困难的同志，拿自己的雨衣雨布盖公家的粮食，半夜三更在雨中抢运化肥……这些，都已经成为自觉的行动。她们还常常有计划地到工地为职工拆洗缝补衣被，帮职工挖泥浆

池，擦机器零件，她们还维修公路，几百里的公路，都让她们和其他生产队的家属一段一段地分段包干了。她们既搞农业，又搞工业，干这些活时，她们心里多么敞亮，再艰苦的工作也不觉得累，再严寒的天气也不觉得冷。

当家属们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明确了生活的目的，知道了为什么活着的时候，她们所发挥出的力量，简直达到了使人想像不到的程度。

家属们去工人村参加建设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职工支持自己的妻子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舞她们去进行工人村的建设。但是几千年来轻视妇女的习惯势力，并不是一下就能扫光的。在有的职工身上，这种习惯势力还在作祟。木工王立海和他妻子辛玉兰的矛盾，就反映了这个情况。

辛玉兰今年二十五岁，有一个孩子。她在薛妈妈的不断帮助下，热情地报名参加工人村的建设，木工王立海却不太同意，这问题还没有落实。上工人村的前两天，薛妈妈发现辛玉兰下地时眼圈红红的，好像哭过一样。问她为什么，她摇摇头，什么话也不说。薛妈妈心里明白，准是她男人又扯后腿了。歇晌时薛妈妈找了辛玉兰，跟她说呀说的，终于把她说笑了，她认真地告诉薛妈妈：“你放心，谁也拉不住我要革命的心，我跟着你走是跟定了。”“不是跟我走，是咱们都跟着毛主席走！”薛妈妈补充了一句。

动身去工人村那天，薛妈妈不放心，一早赶到辛玉兰家里，还没进门，就听见辛玉兰的男人气冲冲地说：“我就是不许你去，你去了孩子谁管？”



“工人村不是要办临时托儿所么？”

“临时托儿所还能把孩子给带好？”

“那人家薛妈妈的孩子不也一样带去么？”

“那是她的事，我就这一个儿子，你不能去，好好在家给我保重点。”

“我的重点是革命。”

“什么？”

“革命！”

“革命，革命，你就知道出去是革命，在家待着，把这个家管好，让我安安心心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不是革命啦？”

“那多一个人建设，不就多一份力量？”

“那你去了，这个家就不管啦？”

“管呵！星期天我就回来支援你，再说我参加了集体劳动，家里收入不也可以多些。”

“算了吧，你赚的那点，还不够孩子买药的呢！我这个五级工养得活你。”

“我不要人家养活，我们妇女要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薛妈妈说……”

“薛妈妈，薛妈妈，我看你……”

“她那么大年纪了还响应党的号召，我年轻轻的在家待着像话吗，我就要跟她学，跟定了。”

“我就是不许你去。”

“我就是要去。”

他们的声音越说越响，小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薛桂芳在门外喊了一声：“玉兰！”里面不作声了，薛桂芳推门进去。屋子里乱糟糟的，孩子蹲在炕上啼哭。王立海背着身子坐在凳子上，明明知道薛桂芳进了屋也不回过身来，却掏出纸烟吸着。

“玉兰，你准备好了没？”薛桂芳打破了这沉闷空气亲切地问道。

辛玉兰没有回答，却忍不住啜泣起来。

“你要有困难，就在家呆几天，下一批再去吧。”薛妈妈说。

辛玉兰停止了哭泣，她抬起头擦了擦眼泪，用手拢了拢散乱的头发，坚定地說：“我没困难，我跟你们一块上工人村去。”

“你要去把孩子给我留下！”王立海喝道。

辛玉兰没有回答，抱起孩子就往外走。

“把孩子给我放下！孩子要有个头痛脑热，你交代得了吗？”

辛玉兰头也不回地走了。

“你去了可永远别回这个家！”王立海狠狠地把门一推，“啪”的一声，震得薛桂芳惊了一下。薛桂芳在门旁站了好一会儿，对王立海說：“王师傅，别生气，有话慢慢說。”

“你管我生气不生气。没人来搅和，我的家还成不了这个样子。”王师傅又把什么东西往桌上一摔。

薛桂芳沉思了一下，稳稳地說道：“王师傅，你们职工到大庆来倒是为了个啥？”

“你管我为了个啥……你一定要问，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来革命，是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懂吗？”

“懂，我懂。可只兴你们职工闹革命，就不兴我们家闹革命啦？”薛桂芳语调虽然温和，但是很有力量。王立海没说话，低着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薛桂芳又沉思了一下，关切地說：“建设工人村这是党对咱们的关怀呀！再说你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大伙都会照顾，你就放心吧。王师傅，你过去同我们连兴一样，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你胳膊上的伤疤不是资本家给留下的吗？可不能忘记过去的疼呀！”

……王立海半晌说不出话来，在薛桂芳



入情入理的劝导下，他终于认可了。

辛玉兰上了工人村，被大家选为生产队的保育员。每天天还不亮，她就到临时托儿所的土房去生炉子、扫地、烤被子……当钟声一响，母亲们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时，托儿所已经暖暖和和干干净净的了。这破土房是临时性的，将来托儿所要盖新房子，可是她还是费尽了心思来拾掇它。糊好了窗户，还贴上一个剪纸的大红花。墙上的漏洞都用泥糊上了。她每天把孩子换下的尿片子洗净叠好，交给来接孩子的母亲，母亲们感动地对她说：“小辛呀！把孩子交给你真比我自己带还放心！”

有一次，薛妈妈陪油田领导同志到基地检查工作，走进了这个临时托儿所。屋子里暖暖和和的，辛玉兰正坐在一群欢笑的孩子当中，她怀里抱着一个，腿上坐着一个，背上还有一个孩子搂着她的脖子。屋角里，还有一个小男孩正在啼哭。

“这里有你的孩子么？”领导同志看着她怀抱中的小孩问她。

“有，”辛玉兰一边逗着怀抱中的孩子一边指着那个啼哭的孩子说：“屋角那个就是我的。”

领导同志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朴实的妇女，走到屋角，抱起那个啼哭的孩子问她：“你为什么不管他呢？”

“让他哭哭怕啥？别的小孩可不能哭，孩子的妈妈都上地了，看好一个孩子就是解放一个妈妈呀！”

领导同志握着辛玉兰的手说：“你想得很好，可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亏待，这是你们的孩子，同时也是国家的孩子呀。”

“亏待不了他，首长，这不就在我的鼻子跟前吗。”辛玉兰笑着把领导送出门去。

当领导离开托儿所的时候，薛妈妈回身轻声对辛玉兰说：“首长说得对，可得把你的孩子也看好。要不孩子他爹就解放不了啦！”

辛玉兰又笑了：“你还来逗我，人家老王的思想不已经解放了吗？”

说真的，辛玉兰和王立海的矛盾确实已经解决了。

辛玉兰的工作很出色，经常受到表扬，被评为战区五好家属。家属生产队把喜报送到职工队部，王立海在大会上听到表扬自己妻子的时候，脸上止不住一阵阵泛红。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辛玉兰向王立海提出挑战，要和他比思想、比工作、比干劲，还要落实到五好上。在众人的掌声和欢笑声中，王立海也到台上去应战。王立海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年终也被评为五好红旗手。

在大庆油田，丈夫帮妻子，妻子帮丈夫，夫妻一对红的故事有的是。大庆职工的革命化促进了家属的革命化，而家属的革命化反过来又促进和加深了职工的革命化。

亲爱的同志，这些战斗在平凡岗位上的妇女，这些怀着自我牺牲精神、把劳动看成革命的人，你可以从她们身旁走过而不去注意她们。你可知道，在她们中间，有着多少激动人心的故事啊！诗人应该歌唱她们，音乐家应该为她们谱曲，文学家应该呕尽心血把她们写成小说，因为同大庆职工一样，在大庆家属中，也有多少体现我们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啊！

在大庆家属中何止一个薛桂芳，许多生产队都有她们自己的阶级根子好，苦大仇深，能用阶级教育培养年青一代的薛桂芳。这几



年来，许许多多的薛桂芳和她们的接班人已经成长和正在成长。大庆家属的精神面貌有了深刻的变化。她们不仅在建设一个新型的矿区，而且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一列开往首都北京的火车奔驰着。车上坐着以薛桂芳为首的七名大庆家属代表，她们接受大庆领导的委托，去首都汇报工作。还有一个小型的家属报捷队，准备用文艺的形式向北京汇报大庆家属闹革命的事情。

家属们在火车上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带队的领导鼓励大家说：“不要紧张，你们自己讲自己，自己演自己嘛！”

在一个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里，薛桂芳带着她的姐妹走上了首都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她抬眼望去，一层层地坐满了人，视线不断引伸开去，就像人群的海洋，无边无际。高不可攀的圆屋顶上，耀眼的明灯宛如满天繁星，数也数不过来。

这时，人群安静下来，听着全国妇联领导人亲切而响亮的声音：“……大庆职工家属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前进，她们为我们全国职工家属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薛桂芳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前方，她的脸显得庄严而又沉着。在这万人大会场上，她想起了过去那牛马不如的生活，她想起了地主残忍的鞭打和资本家冷酷的驱逐……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那有她薛桂芳？这把骨头早就化成灰啦……。这时忽然听见大会主席宣布“钻井家属生产队指导员薛桂芳讲话”。薛桂芳的心紧了一下，好像停止了跳动。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她站了起来，想往前走，可是两只脚好像钉在台板上一样，怎么用力也挪不开步

子。在这春雷般的掌声中，在那短暂的时刻，她想到党对自己的教育和培养，她想到毛主席，内心止不住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了您，我什么也不怕！”这时她的心豁然开朗，两条腿松弛而有力地迈开步子，走上了祖国人民创造的雄伟讲坛。在这个讲坛上，她向到会的人汇报了自己过去的的生活，汇报了大庆油田矿区的建设。最后，她用发自内心的声音讲道：“年青人哪，不管干啥都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干什么活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都是革命，都是为人民，为大家！”

大庆家属上了北京后，油田上更沸腾起来了。原来从工业战线上调来帮助建设工人村的职工，统统戴上大红花，被家属敲锣打鼓地送回工业前线了。

农业完全由家属自己搞了，工人赞扬地说：“家属顶起了半边天！”

家属不仅搞农业，还参加油毡纸厂、红砖厂、预制厂、汽车修理厂、总机厂、仪表厂的工业劳动。

现在工人村的食堂、托儿所、缝补组、理发、澡堂、作坊、邮政、储蓄、书店、商店、粮站……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家属。半工半读学校里的老师有家属，荒原上扬鞭策马放牧牛羊的是家属，赶马车的也是家属。还出现了女扶犁手，十来个家属一齐挥舞着鞭子赶着牛犁地，把老乡都看呆了，他们赞扬地伸出大拇指。妇女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家属自己盖了“干打垒”，自己上了大梁，还担任了维修房子的任务。农业研究站上，家属在进行农业科学的研究，田野里一片丰收景象，妇女正驾驶着联合收割机在收割。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训练班里，几百个家属正在



紧张地学习。为了更好地建设油田，大庆家属在向机械化进军了。

无论是搞工业、农业、服务行业的家属，全都是评工记分，按劳分配，不拿国家的薪金。家属中的干部也没有例外。家属生产的产品归全民所有，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她们不仅解决了一部分家属们的口粮，而且还支援了职工，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她们说：“现在想的是集体，干的是革命，爱的是劳动，要的是勤俭，赶的是大寨。”

工人村也由家属自己管理了。家属思想革命了，她们了解妇女的特点，工作又细致深入，所以自己管理自己就管理得特别出色。大庆家属已经是一支革命化、战斗化、有劳动技能的妇女劳动大军了。她们说：“月亮离开太阳就不能发光，家属闹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就要迷失方向。”家属从实践中体会到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

你看，在这大荒原上按油井的分布，盖起了一座座的工人村。那一排排整齐的“干打垒”，黄色的墙，蓝色的门窗，在耀眼的阳光下多么美！你要能到她们家里去看看多有意思，每个家里都收拾的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还有五好红旗手、五好家属的奖状。孩子上托儿所，大些的上小学或半工半读中学。人人生活在组织之中，人人生活在制度之中，人人劳动，人人学习。每天早上工人村里敲钟的时候，小学生们背着书包提着粪筐先从屋里跑出来。那些幼儿园的孩子听见钟声也知道嚷着去托儿所。母亲们扛着锄头把孩子送上托儿所，她们就一队队走向田间。你要问孩子们：“你爸爸妈妈呢？”

“劳动去了。”他们会这样回答你。

“劳动”这两个字是庄严的、自豪的。从孩子们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感觉到它的意义了。小学校的学生参加积肥、捉虫、拣豆子，有时还跟妈妈去修公路。那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有时扛着锄头走向田间，有时举着红旗走向工厂。你听他们的歌声：

“地下出原油，地上种粮菜
半工半读办呀办起来
我们是石油工人的好后代
为了革命上呀上学来

劳动又学习，巧呀巧安排
半农半读出呀出人材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
永远要当革命派呀革命派……”

这歌声唤起你对未来坚定的信念。孩子们从小就逐渐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他们的父亲是新型的工人，母亲是新型的农民，都是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生长的地方是新型的城市，又是新型的农村。孩子们走得更近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一张黑红黑红的可爱的脸儿，闪烁着青春和智慧的眼睛。孩子们的歌声越来越响亮，和远处母亲们的歌声相呼应，你听了心里能不激动么？我们后一代永远是劳动者，是革命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想搞垮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一代没有办法，就妄想着我们子孙后代的和平演变。他们的梦幻永远不能实现！看哪！大庆家属和石油工人的儿女们正在革命化的大道上前进。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她们，毛泽东思想哺育着她们，她们正高唱胜利之歌向前迈进！

1965年10月于大庆



红旗

卫生工作向农村大进军的序幕

美国人民斗争的风暴

理论工作繁荣的道路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13

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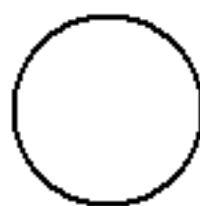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十三期 ★

目 录



卫生工作向农村大进军的序幕

——关于农村巡回医疗队工作的几个问题 钱信忠 (1)

美国人民斗争的风暴 郭济洲 (10)

理论工作繁荣的道路 肖 述 (12)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14)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庆油田开发工作 閔 豫 (23)

到生产中进行农业科学实验 刘更另 江朝余 (29)

半工半读育新人 上海市杨浦棉纺织印染厂
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 (34)

谈谈生物的发展 童第周 (41)

19

☆ 十二月六日出版 ☆



卫生工作向农村大进军的序幕

——关于农村巡回医疗队工作的几个问题

钱 信 忠

目前，在我国广大土地上，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黑龙江畔到五指山麓，都可以找到巡回医疗队的足迹。

今春以来，广大医药卫生人员热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组织了数以千计的巡回医疗队，深入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这是卫生工作向农村大进军的序幕，也是医药卫生人员思想革命化的良好开端。

医药卫生人员下农村，鼓舞了群众，也改造了自己

解放以来，全国曾经组织过一些医疗队，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配合当时的革命和建设任务，进行巡回医疗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而这一次巡回医疗队下乡，不仅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技术质量之高，工作之深入，大大超过过去，更主要的是，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下，明确了医药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农村，为五亿农民服务，医药卫生人员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在

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他们是带着这种新的认识到农村去的。

巡回医疗队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关怀下，在短短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的防病治病工作，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

很多医疗队的队员勤俭节约，因陋就简，在农村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发挥了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了各种诊疗工作，施行了许多手术，取得了优良的成绩。他们为了抢救病人，废寝忘食，日夜奋战，甚至献出自己的鲜血。有的医疗队员，不怕山深林密，道路艰险，坚持把医药送到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有的医疗队员，在狂风暴雨之夜，冒着危险，横渡江河，抢救难产临危的母子。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好又省地治愈了农村中许多常见疾病，使许多危重病人摆脱了死亡，许多盲人重见了光明。

医疗队在防治疾病的同时，积极开展粪便管理和饮水卫生工作，普及卫生知识，并且为农村培训了大批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开



始帮助生产大队训练半农半医的医务人员。

广大农民对医疗队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医疗队所到之处，群众奔走相告：“毛主席派来了好医生！”他们说：“这样的医生在旧社会请也请不来，现在自动把医药送到门上，送到田边炕头，这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一些多年的盲人重见了光明时，一些濒于死亡的病人重新获得了生命后，激动得流着热泪，喊“毛主席万岁”。广大农民从医疗队的工作中深深感受到党和毛主席对他们的关怀，鼓舞了他们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热情。医疗队的活动，使党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

医疗队的队员们在巡回医疗中，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阶级观点增强了。他们经过同农民群众密切接触，为农民服务，学习贫农下中农坚定的阶级立场和优良的思想品质，思想感情也开始产生变化。急病人之急，痛病人之痛，一切为了病人的好作风开始形成了。他们深深感到：“下乡三个月，胜读十年书。”他们形容到农村后自己的变化是：“饭越吃越香，心越来越热，路越走越宽。”

这次巡回医疗队下乡，通过巡回医疗，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农村卫生建设，使卫生工作一步步在农村扎根。巡回医疗队，既是保护农民健康的医疗队，又是党

的政策和卫生知识的宣传队，又是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工作队。事实证明，组织广大医药卫生人员为五亿农民服务，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革命化的必由之路，是医药卫生队伍思想革命化的必由之路。因此，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而应当是一种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

突出政治，坚持政治第一，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巡回医疗队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政治，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才能始终保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昂扬的革命斗志，始终坚持面向工农兵的方向，为广大农民服务。

突出政治，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为了实现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的历史任务，为了使卫生工作适应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必须始终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在卫生战线上掀起深入地经常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在同疾病和自然作斗争中，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医疗队的成员，有医生、护士和行政工作人员，有青年人和老专家，他们的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思想状况也不完全相同。医疗队突出了政治，技术工作就有了正确的方向，就可以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因



素，使每个医疗队变成一个团结的战斗的集体，即使在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也能做出优异的成绩。

巡回医疗队怎样突出政治呢？

突出政治，首先要真正懂得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战略意义。采取这项革命性的措施，使卫生工作为五亿农民服务，是促进当前农业生产新高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条件之一。从长远来看，采取这项革命措施，又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医疗队员只有认清了这个道理，才能懂得自己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革命，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联系起来，使自己方向明确，目光远大，干劲充沛，全心全意为广大农民服务。

突出政治，必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就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巡回医疗队的每个队员，重视政治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脑子里要有五亿农民，勤勤恳恳地为农民服务，通过在农村的医疗实践，同农民逐步建立起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把为贫农下中农服务、为广大农民服务，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光荣。每个医疗队员，要以雷锋、王杰为榜样，学习他们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一心一

意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突出政治，还要自觉地投身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在斗争的实践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巡回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做好医药卫生工作，但同时也要自觉地关心和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医疗队要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围绕中心任务来进行工作。如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结合医疗工作，发动群众；在冬春大搞农田水利时，要深入生产第一线，保护劳动大军的健康，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处理问题。要通过医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密切联系群众，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突出政治，最根本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同时，还要认真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对于大多数医疗队员来说，到农村去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工作上、生活上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农村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会对自己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此，必须随时带着问题，请教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寻方向，汲取力量，才能做好工作。特别要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抓住自己思想中的主要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和改造。



巡回医疗队在农村中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也面临着促进自己革命化的大好形势。医疗队应该充分运用这个大好形势，把政治思想工作做深做细，使医疗队员在农村受到比较深刻的阶级教育和比较严格的政治锻炼。从许多医疗队实践的体会看来，深入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是很重要的。

怎样对待农民？是虚心向他们学习，真心为他们服务，还是高高在上，看不起农民，把治病当作对农民的恩赐？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半年多来，许多医疗队员下乡以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了初步的转变。这就是：他们从眼里看不到农民，到心目中处处有了农民；从觉得农民肮脏，粗里粗气，到觉得农民可敬可爱，比知识分子还“干净”；从同农民格格不入，到相处融洽，建立起真切的感情。特别是，亲眼看到农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以及整年累月、起早摸黑地劳动，努力生产，对国家贡献很大。而反顾自己，贡献不大，生活比农民好得多，还斤斤计较名利地位。比较起来，自己远远不如农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向农民学习呢？许多人还从实践中觉悟到，过去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考虑农民的需要，体贴农民的困难，这是不对的。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为农民治了身上的病，农民也为我们治了思想上的病。”“心目中有了贫农下中农，脑子里就想到要改造自己。”

怎样正确地为人民服务？巡回医疗队到农村去，是一切从农民的需要出发，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呢？还是带着个人主义的打算，对工作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呢？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该看到，多数医疗队员是抱着正确的态度下乡去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带着不同的个人主义的动机去的。例如，有的人认为自己只是做个样子，没有切切实实做好工作的打算；有的人是想搜集些研究资料，没有很好考虑为人民服务；有的人认为下去几个月就算完成任务了，缺乏在为农民服务中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在农村进行巡回医疗，有科学实验的内容，也有思想革命的内容，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自觉的思想革命，才能逐步清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逐步明确为谁服务、如何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如果对自己缺乏严格的要求，不放弃个人主义的打算，工作上马马虎虎，就不能算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也谈不到通过医疗实践，改造自己的思想。黑龙江某医院有位外科主任，开始下乡时，抱着做做手术、显显自己技术的想法。下乡后，他看到农民最需要的是解决常见的普通疾病的治疗，经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改变了原来的想法，除了认真治疗外科普通病外，还向浴室的修脚工人学了治“鸡眼”，向五官科医生学了治耳病、眼病和牙病。许多病人被他治好了，称赞他是“没有架子的好医生”。这就说明，只



有端正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做到正确地为农民服务。

怎样对待成绩和赞扬？巡回医疗队在农村的活动中，常常受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在群众的表扬面前，要以一分为二的方法，冷静分析自己的工作，从成绩中看到不足，戒骄戒躁，努力改进工作。许多医疗队如实地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群众。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为农民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就得到了如此热烈的赞扬，这一方面说明自己在党的领导下有了一些进步，另一方面也正说明过去为农民服务得太少了。他们把群众的赞扬当成对自己的鞭策，主动地找贫农下中农开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对成绩和赞扬的正确态度。

几个月来的实践证明，要使医疗队成为一支革命化、战斗化的队伍，必须组织有关的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参加医疗队，一道下农村。每个医疗队都要配备较强的作政治思想工作的骨干，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第一线，并且发动人人做思想工作，把业务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使医疗队员既能出色地完成防治疾病和卫生建设的任务，又能很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在医疗队中，要打破老一套的“机关习气”，树立革命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学习解放军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精神，发扬民主团结，同甘共苦，阶级友爱的风气；要关心队员生活和困难，在

不脱离当地群众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根据队员健康、年龄的不同情况，在生活、劳动等问题上，适当地加以照顾。

正确处理工作中的几个关系， 更好地发挥巡回医疗队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巡回医疗队的作用，医疗队员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确处理医药卫生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普通疾病与疑难疾病，一专与多能，提高医疗质量与节省医疗费用，预防与治疗等关系问题。

医药卫生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对广大农民来说，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①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实质上就是一个卫生工作的大普及运动。医疗队的一切工作，都要根据实际可能，首先解决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普及和提高不能截然分开。在普及的基础上，跟着就要提高。这种提高，不能盲目地搬用城市的一套，更不能无批判地沿用外国的办法。而要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而提高，根据我国医药卫生工作的民族特点和革命传统，创造出自己的一套社会主义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3页。



卫生工作的方法。

防治普通疾病要和防治疑难疾病相结合。寄生虫病、传染病、地方病等普通疾病，对人民健康和劳动力的危害是最大的，防治起来一般也是比较有办法的。因此，医疗队应当与当地基层卫生人员在一起，集中力量加以防治，尽快地为多数人解除疾病痛苦，促进生产。认为这些病是常见的普通的病，认为防治这些病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因而加以忽视，是完全不正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农村中也有不少疑难疾病。有一些病人，本来是患的常见病，由于没有及时治疗，也发展成了疑难疾病。防治这些疑难疾病，同样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对这些病，医疗队也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地加以治疗和研究。

一专要与多能相结合。为了适应广大农民的实际需要，医疗队员应该通过实践，尽可能使自己成为多面手，能够防治农村各种常见病、掌握中西医各种常用治疗方法。这样做，在医疗队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活动又必须适当分散的情况下，更是十分必要的。但同时，也要不断积累和总结本门专科的实践经验，并且可以根据条件，组织一些专科的防治队、手术队，以提高治疗和预防工作的水平，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医药卫生工作既要质量高，又要费用省。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医疗队应该大大发扬“一厘钱精神”，发扬勤俭节约的良好作

风，努力做到少花钱，治好病，不花钱，也治病。日前有些农民之所以小病不治，拖成大病，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正如有些同志所说，是不是精打细算地为农民看病，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立场问题。由于重视了这个问题，很多医疗队千方百计节省医疗费用。有的经常用针灸、推拿、拔火罐等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方法给农民治病，有的用药时反复斟酌，每张处方只要几分或一角几分钱。抚顺市安家公社有个贫农两眼患白内障，一九六一年到城市医院治疗，用了一百多元，治好了左眼，这次医疗队下乡，他只用了几元钱，治好了右眼。同样的手术，两次费用相差十几倍之多。过去许多医务人员认为，离开现代化的手术室和完善的设备，做手术是不可想像的事。现在，医疗队因陋就简，突破框框，将草屋、土房改造成手术室，用砖坯、门板搭成手术床，用煤油灯、手电筒代替无影灯，用蒸笼、饭锅代替高压消毒器，同样成功地施行了各种大小手术，做到了过去认为做不到的事。这样，不仅大大方便了群众，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而且培养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锻炼了物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医疗工作的过硬本领。当然，精打细算，降低费用，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合理用药，降低医疗质量。相反，是要又省又好，好中求省。这种



节省，是建筑在诊断细致、用药准确的基础之上的节省，需要医生在诊疗的实践中付出更多的创造性的劳动，做到用药合理，治疗彻底。这也是医药卫生工作中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预防和治疗应该结合起来，从治疗入手，不断加强预防工作。当前广大农民对医疗队最迫切的要求是为他们治病，如果只防不治，空谈预防，群众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我们只进行治疗，对大部分可能预防的疾病，不注意积极开展预防工作，这也不是对人民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提倡，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加强预防观点，做一些预防工作；从事卫生防疫工作的人员，根据群众的需要，也做一些治疗工作。只治不防，或者只防不治，都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都不符合人民的愿望。

巡回医疗队的任务是使医药卫生 工作在农村扎根

为了逐步解决广大农村的医药卫生问题，医疗队必须在农村播种和扎根，努力做到医疗队走到那里，医药卫生工作就在那里生根、开花。

为此，医疗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认真地有步骤地实现以下任务：

第一，要全心全意、勤勤恳恳地为农民防治疾病。那些疾病发病较多，影响生产、

影响人民健康严重，就以防治那些疾病为重点，带动对其他疾病的防治，力争尽快地帮助当地人民解除疾病的威胁。同时，通过大量的防治工作的实践，总结群众防病治病的经验，研究适合农村条件的简便有效的防治方法，逐步拟订出一套农村医药卫生常规，以普遍提高防治农村常见病的医疗技术质量。

医疗队每到一地，要调查当地生产生活和疾病情况，了解群众的需要，并随时征求群众的意见。防病治病和卫生建设中的每一项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充分同群众商量，首先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

医疗队的组织与活动方式，必须考虑到给群众带来更大的方便。走乡串户，巡回医疗，适合农村居住分散的特点，是一种受农民欢迎的活动方式。但是，为了进行某些手术和处理某些疑难病症，也需要集中一定医疗力量，设立比较固定的医疗点，有计划地开展一些主要疾病的专科性的防治工作，做到治好一片，预防一片，巩固一片，为群众比较彻底地解除这些疾病的危害。在一些边远的、交通不便的村庄，也要设立医疗点，定期前去诊疗病人，便利群众及时就医。

现在，对于农村各种常见病的发生和发展的特点以及治疗和预防的最有效方法，对于怎样在农村有效地进行除四害、讲卫生、预防疾病的工作，对于药品、器材怎样做到既



經濟，又簡便，效果又好等問題，我們还缺乏系統的調查研究和系統的總結經驗，知道得很少。这是目前医药卫生技术不能很好适应广大农民需要，难以在农村扎根的重要原因。医疗队應該把解决上述問題列为自己的任务，根据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加以研究，因地制宜地逐步求得解决。

第二，認真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員，逐步做到使生产队都有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員，生产大队都有半农半医的医生和不脱离生产的接生員，公社都有几名质量較好的医生。

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半农半医的医药卫生人員，是当前农村的迫切需要。根据农村集体經濟的特点，培养这种医务人员，也是可能的。这项工作，应当有一个规划，并且要經過試办，總結經驗，逐步推广。

培訓农村医药卫生人員，一定要重視质量，保证质量，使之成为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結合的新型卫生工作者，既有为群众服务的决心，又能掌握一定的防治疾病的本領。要达到这个要求，需要通過医疗实践，边学边做，又教又带。經過一个阶段集中学习后，要带着他們参加巡回医疗，巩固所学知識，并要組織定期复訓和进修提高。为农村培訓医药卫生人員，應該实行中西医結合，中医的各种簡易有效的治疗方法，像針灸、推拿、土方土法等，都應該成为他們的

基本技术。

培养农村医药卫生人員，既要从农村条件出发，发揚革命战争时期短期培养卫生人員的革命传统，尽可能縮短学制，精减課程內容，又要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对防治多种多样疾病的要求，慎重地研究当前和长远的需要，作出妥善的安排，不可急于求成。

第三，整頓和加强农村卫生組織。医疗队应在党委統一领导下，协助当地組織，結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遵循毛主席“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員，組成巩固的統一战綫，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指示，遵循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方針，对农村卫生組織从政治、組織、技术三方面进行整頓和建設。

医疗队应当把农村基层卫生人員作为自己联系群众的桥梁，很好地团结他們，虚心向他們学习，在和他們共同工作中，采取带、讲、做的办法，并可开办短期訓練班和讲座，帮助他們提高思想認識和医疗技术。医疗隊員和基层卫生人員，都要发揚自己的优点，克服各自的缺点，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医疗队在深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要帮助当地組織，有区别地安排和訓練基层卫生人員。农村基层卫生組織应力求精簡，并且要建立起一套方便群众的工作制度。

組織有經驗的医生、护士到农村去做



“种子”，在农村扎根，是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各地已经有不少医药卫生人员和医药院校毕业生，在农村安家落户，立志红在农村，专在农村。像辽宁省哈尔套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立志一辈子为农民服务，在医疗工作上做出了显著成绩。上海市严桥公社医院的医生倪丽娟，在农村工作七年，积极为农民服务。还有许多医务人员祖国的边远地区，为保护兄弟民族人民的健康，为保卫国防进行艰苦的工作。随着农村卫生工作的加强，必须组织更多的抱有这种革命志向的人，到农村中去扎根。

第四，积极开展预防工作，改善农村卫生面貌。结合农业生产，以粪便管理、改良饮水为重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是预防疾病的带根本性的措施。这方面的工作，要根据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总结群众的经验，适应群众的习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才能获得最大的效果。例如，河北遵化、山东日照、四川绵竹等地将人畜粪便由集体统一管理起来，由专人积肥造肥，进行堆肥发酵等处理，就能够达到增加肥量、提高肥效、杀灭细菌和虫卵的目的。又如河北、浙江、四川、广东、上海郊区等地，因地制宜，采取搞简易自来水、打井、水井装置机械提水工具等多种办法，使群众吃上了清洁的水。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医疗队学习和推广。

第五，大力普及卫生知识。巡回医疗队应在调查了解当地常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被治好的病人的真人真事，宣传这些病的发生原因和预防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总结群众经验，提出预防疾病的措施和爱国卫生运动的要求。同时，还要向农民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意义，普及节育的知识。在宣传中，要尽量运用广播、戏曲、幻灯、电影、讲故事、歌曲以至洋片等等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

* * *

随着卫生工作把重点放到农村，对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城市卫生工作革命化了，才能腾出更大力量，服务于农村。而面向农村，组织医疗队下农村，也给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带来了推动力量。医疗队在农村初步形成的一些好的思想作风，如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等，应该带回城市来，加以发扬，推动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使城市和农村的卫生工作，互相促进。

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农村卫生事业，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革命意义。我们相信，只要敢于不断革命，善于总结经验，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完全可以在不很长的时期内，改变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大大加强农村卫生事业的建设。



美国人民斗争的风暴

郭 济 洲

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风暴正在美国兴起。这场猛烈的风暴，显示了美国人民开始新的觉醒。

随着约翰逊政府侵越战争的步步“升级”，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强烈，其规模之大和持续之久，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①约翰逊政府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了补充兵力的不足，它在全国大举征兵，把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赶往南越战场充当炮灰，给数以万计的美国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在政治上，法西斯化的统治，使美国人民特别是进步力量受到残暴的镇压。在经济上，由于军费的急剧增加，美国人民的负担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侵朝战争期间的最高额。目前，平均每个美国人所担负的苛捐杂税高达个人收入

的百分之三十二，而美国垄断集团却大发横财，据估计，它们从军火工业中取得的利润，比美国一般工业利润还要高出百分之七十以上。

美帝国主义是教育美国人民起而斗争的最好的反面教员。现在，美国全国已有四十多个州、近百个城市的各阶层的数十万人民投入反战斗争，形成了一股不可抑止的洪流。他们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明确指出“美国是侵略者”，坚决要求“美军必须从南越撤走”。美国黑人争取民主自由、争取基本权利、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也日益紧密地同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结合起来，成千上万的美国黑人已经站到反对侵越战争运动的前列。

美国人民的这场英勇斗争，是对越南人

^①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91页。



民和全世界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是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沉重打击。这场风暴，极大地震动了美国的统治阶级，他们惊呼：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对他们“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

美帝国主义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与世界人民为敌，坚决与美国人民为敌，把一条又一条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使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重重矛盾之中。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些矛盾日益尖锐化的表现。

一九一八年，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曾经说道：“美国革命无产者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①美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必将通过自己的斗争，完成列宁所指出的这一特别重要的使命。

美国人民当前所进行的反战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也无情地嘲笑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投降主义路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越南问题上千方百计地企图实现帝国主义的所谓“无条件谈判”，帮助美国侵略者无限期地在南越赖下去；而美国人民却振臂高呼：“不准干涉

越南！”“约翰逊从亚洲滚出去！”“争取越南革命胜利——反对谈判！”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鼓吹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重大意义”，迫不及待地要求同美国进行“全面的”“有成效的”合作；而美国人民却坚决表示：在越南问题上“拒绝同美国政府合作”！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大叫大嚷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古老的地球上”，硬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而美国人民却郑重宣布：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反革命的堡垒”，要求“把这个万恶的压迫者赶出星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大肆宣传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否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美国人民却严正指出：“整个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剥削制度，正是越南战争的基础”！

美国人民的斗争，有力地驳斥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谬论，证明了美国人民同美国垄断资本的矛盾是绝对不可调和的。当前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空前高涨，正是反映了美国阶级斗争的正在深入发展。

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在给福斯特同志的一封信中曾经指出：“黑夜是有尽头的。”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页。



美国反动势力现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①目前美国人民反战斗争

风暴的猛烈兴起，不正是这样一种变化的征兆吗？

^① 《红旗》杂志1959年第3期，第1页。

理 論 工 作 繁 荣 的 道 路

肖 述

近几年来，我国各个战线上的工作人员，包括基层工作人员和工农兵群众，在报刊上发表了許多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谈政治思想工作，有的谈部队生活，有的谈工农业生产，有的谈科学技术，有的谈文化教育，有的谈打乒乓球，等等。虽然谈的问题不同，但是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都在努力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把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起来。

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①上述文章的作者，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这个方向做的，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理论说明了一些实际问题。

这些文章的作者，抓住自己工作中的矛盾，分析这些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运用理论总结经验，从个别事物中揭示出一般规律。在这些文章的朴素生动的语言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的生机，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

这些文章，是在群众性地学习毛泽东思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17页。



想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是在我国各个战线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些文章是理论被群众掌握之后变成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的表现。我们相信，只要遵循这个方向做去，将会更多地产生这样的文章，并且将会产生出水平更高的文章，产生出系统地说明问题、总结经验的专门著述。这样，就会使许多实际工作者同时也成为理论工作者，使理论工作更加繁荣。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又将会起更为巨大的作用。

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在实践中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是边干边学的。他们的工作中，经常向毛泽东著作请教。为了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读毛泽东著作；为了找寻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也读毛泽东著作。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为了找武器，是用这个武器来战斗。正因为这样，他们就能逐渐地认识和掌握自己工作的规律性，就能逐渐地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

学习有两个方面：读书和使用。书是记录和传播人类知识的工具。干革命和搞建设，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毛泽东同志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

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因此读书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像毛泽东同志经常号召我们做的那样，尽可能挤出时间，多读些书。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更需要认真阅读。当然，决不可因为重视读书而忽视使用。毛泽东同志还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②因此，应该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

理论不应当停留在书本上，理论必须从书斋和课堂中解放出来，同世界上各方面的实际生活相接触。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的作用，才能使理论得到发展。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的实际生活中，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实际生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潮，这是理论工作繁荣的道路。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1页。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4页。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说过：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

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①。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②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③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

① 《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思想的。

我們說要重視历史，重視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紙堆上，向古人焚香頂礼，跟着他們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賬。

沒有超階級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統治階級，都是根据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来解释历史的。他們的階級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調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們不可能認識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紙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們去宣揚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統治階級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沒有这样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來說，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說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們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

种千百年来习惯輿論的压力下，也觉得沒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階級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們尽情地歌頌着，历史变成了他們庙堂里的贊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經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誰也不敢說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謂社会“主宰”，投以藐視的日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們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有一种意見，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階級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階級观点而沒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錯誤。

問題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階級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須要用一种“历史主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頁。

② 《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頁。



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

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争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②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抱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

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①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

^① 《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史上統治階級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們从来不否定統治階級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們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們都应该承认。我們承认清代末年光緒皇帝和其他維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們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給他們做歌功頌德的文章。我們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們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們始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車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領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滄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領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們去热烈歌頌的伟大英雄。我們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們知道，他們也同一切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剝削者，他們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剝削，而且是从統治者当前的利益

出发的。因此，我們在評述他們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對他們压迫和剝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闡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評价他們的进步方面；對他們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們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以无原則地去夸大他們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贊美他們的文治武功，甚至為他們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飾和辯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問題，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們去认真研究，就是他們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們去认真研究。問題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盜袁世凱》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階級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階級社会的历史是階級斗争的历史，要了解階級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階級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們，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面。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問題上的爭論，反映了在这个問題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問



題；要解决这个問題，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階級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階級的階級观点就不能正确認識封建社会的統治階級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階級的階級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認識封建社会的农民階級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們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狹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們大家所常說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們不贊成用无产階級的面貌来改鑄他們，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階級对农民領導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階級。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鋤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現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頃、屋宇千間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們的斗争綱領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調和的階級对立和不可調和的階級斗争呢？我們怎么可以設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輾轉沟壑、在死亡綫上掙扎的农奴，当他們被迫起来同剝削、压迫他們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們每个人所想的却是

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爺們？存在决定意識。每个階級所处的經濟地位决定着他們自己的思想意識。农民，作为一个階級來說，它所处的被剝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們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剝削地位的地主階級，則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統治階級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們的斗争綱領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領導成員向封建主义轉化，或者革命領導权被地主階級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統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緣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綱領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們“均貧富”、“等貴賤”，“有田同耕”、“有飯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謂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見，认为近几年来，人們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聳听。

我們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統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



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話，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臣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嗎？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

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嗎？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謂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① 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

^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它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它们的阶级利益，它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①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

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综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予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 ability。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②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

① 《〈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②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終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① 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

一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們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① 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 大庆油田开发工作

閔 豫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有充分的石油。要找石油，首先遇到的是我国有没有丰富的石油矿藏的问题。过去，帝国主义分子大造谎言，说什么中国石油资源贫乏，出路只有依赖从外国进口。

最早鼓吹这种论调的是美帝国主义。远在一九一四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派地质学家来中国考察石油时，就断定“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岩石类型与生成时代都没有储存有开采价值的石油的可能”^①。一九四一年，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的经理罗基斯说：“中国大部分地区几无石油蕴藏的可能”^②。按照他们这种说法，中国永远只能依靠“洋油”过日子，中国只能作为帝国主义倾销石油产品的市场。

事实证明，这种所谓“中国贫油论”，是毫无根据的。

解放十几年来，我国地质工作人员，经过不断努力，找到了大量石油储藏，开发了油田。这就有力地证明，在我国陆相地层较多的地质条件下，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我

们的国家决不是“贫油的国家”。

大庆油田和我国其他油田的开发，为我国石油工业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大庆油田的开发工作，几年来，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解决了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弄清了油田地质情况，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油田开发设计方案，开发了油田，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对我国的石油封锁。

—

石油埋藏在地下，看不见也摸不着，浅则几百米，深则几千米。油田的面积，小的一、二平方公里，大的几十、几百至上千平方公里。可是，用什么方法从一个几万至几十万平方公里的盆地内把油田找出来呢？这

① F·G·Clapp, 《石油科学》第1卷, 1938年版, 第139页。

② W·S·S·Rodgers, 《美国工业发展史》中《石油工业》一章, 1941年版, 第339页。



是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所要求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地质工作者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每个盆地中石油的分布都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关键的问题是用什么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它。

在石油勘探上，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就不是从全面调查入手，去选择最有利的地区，而是一上手就根据个别的少量的资料，局限在一两个局部地点去钻井。如果不注意整个面的研究，对这些局部地点所作的判断就往往会不正确，把勘探主力部署在不是最有利的地点，会影响到勘探的效果。

我国地质工作者反复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明确了在油田勘探工作中必须对全盆地作周密的系统的调查，必须大抓第一手资料，从全局出发辩证地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在大庆地区，我们用各种勘探方法，在全盆地范围内展开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每一种方法所得到的资料，只是反映了地下情况的某一个侧面、某一方面的特性。如果仅仅凭一两种方法取得的资料，贸然作出判断，就往往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甚至会作出错误的结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片面地看问题，是不能作好工作的。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各种勘探方法，把所取得的各方面的资料，包括相互矛盾的资料，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找出各种现象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作出

科学的论断。

经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就判明了最有利的地区，确定了主攻的方向，部署了钻探力量，较快地发现了大庆油田。

毛泽东同志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①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科学论断。

在发现大庆油田后，我们在全盆地各个有利地区，进一步开展了全面的详细勘探工作。花了几年的时间，在全盆地内全部完成了地震连片测量工作。利用这些连片地震和全盆地内各个构造带上钻的探井资料，研究了全盆地自老到新各个地质时期的地质构造发展过程，做出了地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构造图*和目前的构造图，做出了各个储油层的砂岩体分布图，并进行了对全盆地生油条件以及生油层分布的研究。这样，对全盆地石油地质条件、全盆地油田分布的基本规律，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当然，在石油勘探工作中，对地下油田分布的判断，往往会与实际不相符合，尤其是在一个新地区，有时会差得很大，钻不到油的情况是经常碰到的。但是，怎样对待这种情况呢？用形而上学观点和方法，就会认为钻探油田遭到失败或取得成功是靠碰运气。有这种观点的人，在选择每个地点之前，总是盲目乐观，而不仔细分析有利条件

* “构造图”是表示地层构造情况的图。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8页。



和不利条件；一旦在这个地点钻了一两口井没有发现油层，就轻率地认为这个地区没有希望，而不去认真总结经验，就往往转移到新地区去。当然，有时也可能侥幸地碰到油田，但是总的说来，用这种方法找油田，时间较长，效果较差。

大庆的地质工作者，对待每个地区的勘探工作、每一步钻探井部署的实践，都是作为整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反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所制定的探井计划，是根据已掌握的资料加以全面分析后得出的判断和推理。钻探计划执行的过程，既是检验前一阶段所取得的认识的过程，又是一个认识新的情况的过程。在每个地区钻井之前，还必须根据已有资料全面地客观地进行分析。在钻探过程中，即使在开始的一、二口钻井内没有发现油层，也不应当立刻断定这一地区没有油田，而应当加以认真的分析，弄清原因。这样做，即使真的没有油田，也能够为下一步找油田增加认识。

实践证明，石油勘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查研究、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不断反复过程，是从地表到地下、从局部到全局、从现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二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要按照油层的本来面貌去认识油层，首先必须有全面的、真实的、准确的资料。但是，具备了这些资料，还必须进行精心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找出油层变化的规律来。

按照过去用的方法，只是把油层分组分段进行研究，而不是分层进行研究，这样只能得出油层分组分段的各种参数（厚度、孔隙度、渗透率）的平均数。用这种方法得到的认识，并不符合油层的实际情况。因为每一段中还包括着几层油层，每层油层的性质差别很大，如果把性质好坏不同的油层放在一起加以平均，其平均数既不代表好的油层，也不代表差的油层。如果仅仅用分组分段大平均的研究方法，满足于平均参数，就看不出分层的特点，而只能得到笼统的表面性的认识。这样做，既不能找出各个油层的特点，也不能找出所有油层的共同点。

油层在地下，本来就是一层一层地存在着，要搞清油层的本来面貌，就必须分层去研究油层。可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国外油田开发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先例。国外的一些地质学家认为，地下情况是不可能详细搞清楚的。例如，美国地质学家勒·乌·里诺在《石油勘探地下地质》一书中，对地层的对比工作列举了很多方面的困难。如：地层不连续，构造复杂，地层厚度、岩性和古生物有横向变化，岩性及时间、地层命名混乱，资料有错误等等。按照他的观点，几乎对任何一个油田都不能进行分层对比。

我们自己也没有搞过油田分层对比的方法，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也要做，而且要力求做好。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油层的客观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分层对比的方法是可以找到的。油田和任何事物一样，只有认识了各个部分、方面、侧面，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整体。分层研究油层的重要性正是在这里。不认识每个油层的情况，就不能更进一步揭示出全部油层的情况。

大庆油田油层层次多，每个油层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每层又不是孤立的，它和周围的层次又有联系。开始研究时，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把各个油层当作孤立的东西，以为只要找出特殊的标志来，就可以解决分层对比问题了。后来，特殊标志是找到了，但层次并不多，仍然无法解决分层对比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研究事物的时候，应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①油层的研究，也应根据这个道理来进行。油层之间是有联系的。不了解油层之间的内在联系，就不能真正了解各个油层本身的特点，因而也就无法进行分层对比和分层研究。根据这种认识，我们又重新把当时取出来的岩心一段一段仔细地观察。经过反复研究，不断用大量钻井的资料来比较，终于发现了油层之间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由下而上，地层每一小段都是由粗至细，形成了很多这样的组合，也就是找到了油层沉积剖面上的旋回性*。这种旋回性是在整个油田范围内油层的共同规律，在每口井内部都存在着同样的旋回性。我们根据油田油层沉积的具体条件，把沉积

学上应用于大段地层中的旋回性的一般原理，具体应用到油层剖面中每一小段油层间去，研究其变化规律，从而得出了分单层对比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标准层对比大段，用旋回所形成的砂岩组对比小段，在每个旋回组合中间根据各种不同岩层的组合情况对比各单层。这样，我们就突破了分层对比的技术关。不仅可以分段研究，而且可以更进一步做到分单层研究油层。

经过分层对比，认识了每个油层的情况，进而再研究所有油层的相互关系，以求得对总的情况的认识。经过这样的分析研究，我们得到的对各个油层的认识是深入的、具体的，而且是在分层研究了特殊性的基础上综合起来得到的总的情况的认识，与原来对油层笼统的、表面的认识，就大不相同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即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互相联结的。我们对油层的认识，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取得了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便可以再从一般到个别，即用所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开发每个油层的实践。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这个前人未解决的难题，创造了一套新的油层研究方法，把油田地质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

由于我们了解了油层分布的详细情况，这就为开发油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同质的矛盾，只有

* “旋回性”是指地层剖面中的这样一种特性：自粗粒渐变至细粒，又变为粗粒，再变为细粒。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①不同的油层，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开发。制定油田开发方案和开发程序是一项设计工作，必须从油层具体情况出发。

在制定油田开发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不钻井，了解不了油层情况；井钻得少，密度不够，对油层还是了解不清；井钻得越多，具体情况也就了解得越清楚，但是，井打完了，也就用不着开发设计方案了。这个矛盾，在国外，很多油田的开发设计工作，都没有能够解决。

国外很多的油田，只有分组分段的油层平均参数，不可能按分层变化去研究开发方案问题。所以，国外很多油田的开发设计工作，只能按照大体了解的情况去作设计、去布井。布井时，也只能用少数几口探井的资料作根据，把本来不均匀的变化大的油层的具体情况，用平均参数，用均匀油层的主观假定来代替，并且一次就定死开发方案。正因为这样，不少油田的开发设计方案与实际开发结果，有比较大的出入，有的甚至根本行不通。

大庆油田的地质工作者，碰到这个问题，没有退却，并不因为国外专家办不到而向困难低头。我们不能主观地根据油层是均质的假定去设计。油层如何变化，我们就应该如何去设计，一定要作到从油层具体情况出发。

在着手进行油田的开发工作时，我们遵循着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在油田中开辟了生产试验区。

经过生产试验，认清了油层有几种类型，研究了各种不同油层的井网和开采方式，从而为整个油田的开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由于这种生产试验是直接

进行的科学实验，它不同于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科学实验，所以，经过这种生产性试验，就可以把我们的重要经验，运用到大规模的、复杂的生产实践中去。我们在生产试验区所获得的认识，一般地说，对于整个的油田具有普遍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生产试验区的试验，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油田其他地区的生产上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在生产试验区以外的新地区，油层情况与生产试验区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们根据生产试验区的经验，针对油田的具体特点，采用了一套新的油田开发程序。这套新的开发程序的特点是：根据最稳定可靠的油层，钻一批基础井网，钻完之后，不投入生产，对全部油层的详细变化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根据油层实际情况，确定符合其他油层的开发井网。等第二批井全部钻完后，仍然不投入生产，再应用钻井取得的新资料，对油层情况反复进行对比研究，修改原来确定的井网不符合实际的地方，作出正式开发的具体实施方案——射孔*方案。然后，才把全部油井、注水井按照射孔方案进行射孔投产。采用“设计，实践，研究修改设计，再实践，再研究修改设计”这一套新的分步骤的开发程序，可以作到针对油层具体情况来制定设计方案，使我们的设计方案尽量符合于油层情况。而且即使犯错误，也可以及时改正。这个过程，也就是不断实践、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这种开发程序，是以

- “射孔”：油井建成后，在投产之前，要用射孔仪器在井内针对油层的部分，把钢管和固结的水泥一起射孔，石油才能流入井内。这是油井投产前施工的最后项工作。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指导的。

我们这套开发油田的程序，根本不同于形而上学观点与方法支配下的那些国外油田的开发程序。那种程序，只是根据少数的探井资料就一次作出方案，作了就定死，一次施工完毕。这个办法，从认识论上来说，实质上是把认识当作一次完成的形而上学，它在生产上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 * *

总起来说，我们大庆油田的地质工作，在短短几年间，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是由于坚持了学习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把高度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把敢闯敢创、敢于突破框框的独创精神同善于学习、谦虚谨慎、反复试验的老实态度结合起来，把小规模探索性生产试验与大规模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把勘探和开发的每项工作都看作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来正确处理主观认识同客观规律之间的一系列的矛盾。大庆油田地质工作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通过大庆油田地质工作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怎样严重地障碍了石油地质科学和油田勘探、开发工作。我们大庆油田地质工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唯物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胜利。

形而上学外国有，中国也有；别人有，我们也有。我们过去从外国学来一些有用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条条和框框，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在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形而上学的危害性，把我们的思想从

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只有继续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才能不断防止和战胜形而上学。

我们科学技术工作人员，在政治上要革命化，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思想方法上也要革命化，一定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列宁说过：“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作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也就是说应当作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①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提高思想觉悟，从立场、观点、方法上来改造自己。如果我们在石油地质工作的每一步实践中，都能更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法，我们的工作面貌就能日益改观。少一分形而上学就少一分失败；多一分唯物辩证法就多一分胜利。

我们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还不深，运用得还不够好，过去工作中也曾走过些弯路。我们觉得，大庆油田的地质工作，像大庆油田的其他工作一样，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并且要不断努力克服缺点。我们决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决心更加努力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我们的思想，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奋勇前进！

^①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4页。



到生产中进行农业科学实验

刘更另 江朝余

从一九六〇年春天开始，我們同有关单位共同在湖南省祁阳县建立农村基点，研究防治鸭屎泥田水稻“坐秋”的問題。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个問題。这个問題是怎样解决的呢？作为农业科学技术人員，我們得到了一些什么启发呢？

一、农业科学研究要为农业生产服务

过去，有不少农业科学技术人員进行科学研究，多是抄襲外国的作法。他們把絕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查閱文献，观测分析样品，繪制图表，編写論文报告上。有的甚至连研究的題目也是从外国书本里抄来的。外国研究什么，自己也研究什么，做出来的結果，也要与外国文献对照一下，与外国人的研究結果符合的就成立，不符合的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习惯了这种作法，并且认为这就是赶上国际科学水平的途徑。我們这些青年也曾受到过这些影响。

例如，解放后不久，有的人就很想把外国的一种耕作制度搬到中国来，不问条件和效果如何，生搬硬套，认为这就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方向。記得我們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推广这种耕作制度，就遭

到了农场工人和周围群众的批評和反对。抱着满腔热情，想为人民做一点工作，可是一出校門就碰了这个釘子，心中很难过。請教一位老师，他說：“搞科学研究，就是要挨罵的。历史上許多大科学家都挨过罵，这并不奇怪，頂住！”这些话当时听了很順耳。但是，后来越想越不对头，农业科学技术人員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对人民的批評“頂住”不理呢？怎么能把旧社会統治階級对科学家的虐待和今天劳动人民的批評混为一談呢？想来想去，对我們的作法产生了怀疑。但是，自己又跳不出旧框框的束縛，成天仍然只是和瓶瓶罐罐打交道，在小块实验地上忙来忙去，滿脑子幻想。結果道路越走越窄，問題越搞越玄，离生产实际越来越远，自己越弄越糊涂。時間长了，总拿不出有用的成果。每当领导上号召农业科学技术人員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解决农业生产中关键性的技术問題的时候，思想上就有斗争，觉得老是这样下去实在不行。

领导上了解了我們的心情，及时地向我們指出，要使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必須首先确立农业科学要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方針。农业科学要发展，就必须和农业生产实践相結合。农业科学技



术人员要到农村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不要有个人打算，不要怕艰苦。这时，我们又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必须与工农结合的道理，讨论了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才抛弃了不少个人打算，下定了不怕艰苦、不怕困难的决心：到农村去，到实际中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搞研究去！

一九六〇年春，湖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农业厅、农业科学院等单位与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同志共同组织力量，到祁阳县文富市人民公社官山坪大队建立农业科学研究基点，研究改良南方低产水稻田。当时，恰好赶上寒潮袭击，群众防寒护秧急如星火。我们也积极地投入了群众护秧斗争。三更半夜，与群众一道施肥盖草，熏烟点火，挖沟排水，观测泥温水温变化。十多天的护秧斗争，给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在劳动中积极主动，找最艰苦的活干，不怕脏、不怕累。有些社员对我们说：“你们这些戴眼镜、穿皮鞋的人，还真没有架子，做事真卖力气！”听了这些话，我们心里很高兴，知道这样做对了。大家情绪很高，与群众关系更加密切了。许多贫农下中农，把心里话讲给我们听，把当地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告诉我们。他们对改良低产田的实验研究寄予莫大的希望。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我们了解了当地生产的特点，发现了大量的鸭屎泥田冬干后，水稻发生“坐秋”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谓“坐秋”，是指水稻插秧后，稻苗老不返青，黄叶枯尖，稻根变黑，生长停滞，

产量锐减，农民把这种现象叫作“坐秋”。这种现象在南方比较普遍，仅祁阳一县就有半数以上的稻田受到它的威胁。这种危害很严重，一旦发生，不仅一般技术措施无法补救，水稻严重减产，每亩一般只能收一两百斤，而且连续两三年得不到好收成。当地农民说：“一年干冬，三年落空。”这个问题是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不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低产田改良无从谈起。我们如果不抓住生产上这些尖锐的问题进行研究，就无法体现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因此，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选定了防治水稻“坐秋”作为研究课题。

改良鸭屎泥田，防止水稻“坐秋”，这是一个过硬的题目。当选定了这个课题，着手进行工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什么“‘坐秋’是地土出，没有法子治”，“天生的矮子长不高，天生的土质改不好”。我们工作组内也有人打起退堂鼓来，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坐秋’”。但是我们大多数同志，看到群众的期望迫切，看到大面积的“坐秋”田，稻苗奄奄一息，黄叶枯尖像火燎过一样，眼看社员一年的辛勤劳动，将成泡影，都十分焦急。我们想：我们是搞农业科学研究的，对这样严重危害农业生产的问题不闻不问，怎么谈得上为人民服务？为了增产粮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当研究解决水稻“坐秋”问题。领导上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和计划，并且说：搞科学研究，要有眼睛朝下和百折不回的精神，要深入群众，不懂就问，失败了再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解决了水稻“坐秋”问题，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官



山坪大队一九六〇年稻谷平均亩产三百五十斤，一九六四年提高到六百八十斤。

二、总结群众生产经验， 认识自然规律

在农村里研究科学，能不能搞出名堂来？我们原来对这是有怀疑的。我们有形而上学观点，把生产和科学对立起来，把经验与理论对立起来，认为“农村只能搞生产，不能出科学”，“群众经验永远是经验的东西，不能上升为科学理论”。我们虽然学习过毛主席的《实践论》，从字面上承认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但是在思想上对生产实践能不能出科学，农民经验有没有科学价值的问题，总是放心不下，半信半疑。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才逐渐认识到广大农村是农业科学活动的主要阵地，总结农民群众生产经验是推动农业科学发展的基础，原来的疑虑一一消除了。

我们选定了防治水稻“坐秋”这个研究课题以后，是如何着手研究的呢？最初，只从书本上学，找文献，查资料。但是，书本上各种解释和推测不少，实际办法不多。有的说“坐秋”是土壤缺硫，有的说是缺硅，有的说是“土壤腐殖质不够，不能形成良好的团粒结构”，有的说是“长期泡水形成的亚铁毒害”等等。我们把书本上说的办法都进行了试验，结果使我们失望了。

怎么办？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向群众请教，从总结农民群众经验入手，广泛开展调查，同农民一道讨论研究。我们先在官山坪作调查，然后把调查范围逐步扩大到祁阳全县，以及祁东、衡阳、邵东等县。经过

这些调查和参加劳动的直接感受，我们获得了许多的感性知识。例如，关于水稻“坐秋”发生的规律问题，群众告诉我们：同一地形部位，鸭屎泥“坐秋”，黄夹泥不“坐秋”；同是鸭屎泥，冬干的“坐秋”，冬泡的不“坐秋”；同是冬干鸭屎泥，插早稻“坐秋”重，插迟稻“坐秋”轻；同是插迟稻，气温泥温低时插的秧“坐秋”重，气温升高后插的秧“坐秋”轻；带有冷浸的田“坐秋”重，不带冷浸的田“坐秋”轻。根据这些现象，我们了解到水稻“坐秋”与环境条件、农业技术措施有密切关系。

但是，用什么技术措施防止“坐秋”呢？官山坪老贫农周培祥告诉我们，他曾用少量的鸡鸭粪塞秧兜，效果很好。祁阳县山区老农徐贤秀告诉我们，把陈砖土磨成粉施到“坐秋”田里效果好。祁东县老农告诉我们，用牛骨粉沾秧根效果好。此外还有用火土灰、煤灰、糠壳灰等点兜减轻水稻“坐秋”的经验。我们根据农民的这些经验进行科学实验，证实了这些办法都有减轻水稻“坐秋”的作用，其中牛骨粉防治“坐秋”的效果特别突出。我们分析出，这是磷素的作用。一九六一年我们用过磷酸钙进行试验，一试验就灵，获得了突出的增产效果。每亩施用四十至五十斤过磷酸钙，可以增产稻谷一百至一百五十斤。接着，先后又在十四个大队，做了一百五十七次试验，都获得了同样的增产效果。

从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的经验中，我们才认识到水稻“坐秋”是由土壤缺磷所引起的。如果没有群众经验的启示，我们不可能认识水稻“坐秋”是由土壤缺磷引起的。如果不深入总结提高群众的经验，单靠重复群



众点鸡鸭粪、磨陈砖土、沾牛骨粉的办法，不仅这些原料缺乏，不能大面积推广应用，而且由于不知其所以然，就不便于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从而继续提高。由于我们认识了水稻“坐秋”是由于土壤中磷素供应不足所引起的，我们就提出了施磷肥增产的措施，同时还探索出这些低产田磷素供应不足的原因，找出土壤中磷素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为进一步提高生产开辟了途径。

根据化验分析，“坐秋”田土壤中磷素含量并不少，其磷素供应不足的原因是鸭屎泥干燥过程中，有效磷被固结起来，不能被植物吸收利用。因此，如何把被固结的磷素活化出来，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

根据分析试验，农民蓄水泡冬，就可以增加土壤有效磷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农民采用多犁、多耙、打碎泥团的办法，就缩短了浸泡时间，加速磷素活化。农民压山青、施猪粪的经验，也都有融化泥团、活化磷素和防止磷素固结的作用。例如，用猪粪液融化泥团的效果，比泡水化泥的效果要高百分之三十；用绿肥茎叶与难溶的磷酸钙共沤，可以提高有效磷一倍左右。由于这些经验的启发和许多试验的结果，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土壤中磷素运动变化的规律，即土壤存在着磷肥有效化和无效化的过程，也就是反固结和固结的过程。泡水、提高泥温、施猪粪、压山青、多犁多耙，可以促使土壤中无效态磷素向有效态磷素转化，这就是反固结的过程；土壤干燥，泥温降低，有机物减少，可以使有效态磷素向无效态转化，这就是固结的过程。

通过总结群众经验，对鸭屎泥田土壤内

部的变化，有了许多规律性的认识，我们研究防治水稻“坐秋”的技术措施时，就主动得多了。为了活化土壤中的磷素，增加土壤的有机物，除增施猪粪、采集山青外，我们想到种植绿肥。但是，要种绿肥就得开沟排水，把冬水田改成冬干田，这同当地蓄水泡冬的经验有矛盾。这些田一冬干，土壤中的磷素就要被固结。土壤中缺磷，不仅绿肥长不起来，第二年种水稻还要“坐秋”减产。我们认识了这个特点，采取以小肥养大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即在种绿肥的时候先施少量磷肥，使绿肥长起来，再通过绿肥根系分泌物和腐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有机酸，来活化土壤中被固结的磷素。事实证明，这个办法是正确的，绿肥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一九六四年官山坪大队绿肥种植面积占稻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新的耕作制度推行了，土壤培肥了。在连续种植绿肥三四年的田里，有效磷很多，不施磷肥水稻产量也比较高。所以种植绿肥是改造鸭屎泥田水稻“坐秋”的根本措施。

怎样运用泥温升高土壤中磷素活化的规律，来保证秧苗良好生长呢？农民的经验是，在冬干鸭屎泥田里，设法种一季迟稻，在泥温升高后再插秧，并在有冷浸水的田里设法弄开冷浸水。这些措施，对于保证秧苗的生长，都是有作用的。但是，正当七、八月，在泥温上升土壤中磷素大量活化的时候，一季稻不需要磷肥了，磷肥被白白浪费。我们根据这个线索，研究发展双季稻。在早稻生长期，泥温很低，土壤中磷素活化不多，早稻的生长要靠绿肥分解出来的磷肥，而晚稻的生长则靠土壤中释放的磷肥。事实证明，



这个双季稻綠肥制，在这个地区是一种經濟合理的耕作制度，它能充分利用土壤的潜在能力。因此，經過試驗和示范，官山坪大队双季稻的面积不断扩大，一九六五年发展到占稻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許多鴨屎泥低产田上的双季稻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一千斤以上。

三、推广研究成果， 发展农业科学

研究有了結果，下步怎样走？按过去的办法，写出論文报告，往上面一交就完事。关于研究結果的运用，則完全推到农业行政部門和技术推广部門，錯誤地认为研究人員搞示范推广，是得不偿失。领导上一再向我們指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搞样板田的目的是为了带面，只有把研究成果在群众中加以推广，才能全面地檢驗研究成果的准确程度，才能吸取群众的經驗和意見来丰富研究成果。我們在实践中也逐步地認識到，推广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群众中、在更大的范围内繼續进行科学研究和鉴定工作。只有在群众生产实践中檢驗、修正、充实、提高，科学研究成果才能达到更完善的地步。同时也只有把科学研究成果迅速传播和推广出去，做到試驗、示范和推广密切結合，才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解除鴨屎泥田水稻“坐秋”的危害，使农业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由于我們重視了把研究成果回到大面积的生产实践中去，这几年在祁阳县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推广科学研究成果的工作。一九六三年全县組織了五万亩磷肥試驗田，一

九六四年組織了七万亩磷肥示范样板田。在綠肥示范試驗中，在六个区十二个公社，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样板田，先后直接掌握了磷肥試驗点二百八十七个，綠肥試驗点八十七个，低产田改良基点十五个。通过多点試驗和示范推广的結果证明，采用施磷肥种綠肥的措施，对改良鴨屎泥低产田防止水稻“坐秋”是有效的，在这个地区发展双季稻是有利的，同时在低壟田、深脚鴨屎泥田，实现“晚稻超早稻”也是可能的。通过示范推广的結果也证明，不仅在鴨屎泥田施用磷肥有显著效果，而且在其他土质粘重、冷浸瘠薄的十几种土壤上施用磷肥，也都有良好的效果。这就丰富了我們掌握的因土施用磷肥的經驗。在磷肥施用方法上，也由不完善到比較完善，从沾秧根的方法发展到施面肥、点兜、水漚等多种方法，便于因时因地使用。在綠肥方面，还总结出了抗旱保苗，以及在低产田上种植綠肥的栽培技术。

从一九六〇年到現在，在湖南省各級党委的领导下，由于在总结群众經驗的基础上，找到了防治鴨屎泥田水稻“坐秋”的有效办法，祁阳县已經改造了十八万亩低产田，增产百分之三十。湖南省在衡阳、零陵、邵阳、湘潭各专区条件相同的地区，大力推广了祁阳县的經驗，增产也很显著。

五年来研究防治鴨屎泥田水稻“坐秋”的实践，使我們深深地体会到：我們农业科学技术人員，一定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綫，总结农民群众經驗，抓住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問題，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发展农业科学，促进农业生产。



半 工 半 讀 育 新 人

上海市楊浦棉紡織印染厂
半工半讀中等技术学校

一九六一年秋，我們楊浦棉紡織印染厂創辦了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实行半工半讀的三年制工业中学。去年，又在工业中学的基础上，发展为七年一贯制的半工半讀中等技术学校。现在，全校从一年級到四年級共有十个班級，四百四十九名学生。前两屆学生二百四十六人，已經初中毕业，除七十二人升入四年級外，大部分留厂劳动，少数支援外厂。

四年来，我們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針，坚持办学，坚持半工半讀，坚持群众路綫，坚持教育革命，在实践中摸索經驗，使学校逐步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四年坚持办学的过程，是一个經過思想斗争和不断实践提高認識的过程

建校初期，有些教师对这所又劳动、又学习的学校是有怀疑的。他們說，这种学校“不正规”，是“临时措施”，“寿命不会长的”。他們觉得被分配到这种学校工作是“低人一

等”，有抵触情緒。他們还认为学生反正将来当工人，学习可以馬馬虎虎。在一个时期內，教学工作照搬旧的一套，脫离了三大革命运动。

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开始时，有些車間干部也不欢迎，认为学生年紀小，爱淘气，生产上不頂事。他們有三怕：一怕添麻煩，二怕出事故，三怕出疵品废品。因此，学校只好安排学生去伙房剥豆、洗菜。以后，进了車間，当学生能够頂崗位生产了，有些車間干部又产生片面使用观点，工人缺勤較多时，就要学生停課去頂缺。

以上这些看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問題：一、工厂办学是不是方向？二、高小毕业生能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三、学生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学习？教师对半工半讀的抵触情緒，实质上是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反映；車間干部的錯誤看法，則是受旧学徒制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企业必須担負培养新人的任务認識不



足。归根到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还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的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厂党委认真进行了研究，肯定工厂办学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问题在于如何加强思想教育，統一認識。我們三次組織全厂干部、教师学习党的教育方針，学习陆定一同志《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一文，反复強調学校正規不正规的标志，在于是否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針，在于培养出来的人是否合乎革命接班人的要求。同时指出，社会主义企业必須既生产物的产品，又要把培养革命接班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任务。

通过一系列学习和討論，大家的思想認識有所提高，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学习了《关于赫魯曉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訓》一文以后，广大干部和教师又进一步明确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关系我們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以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加强了办学信心。

依靠老工人，对学生进行 階級教育和劳动教育

第一屆学生是在当年全日制学校招生足額后，通过征求志愿的办法录取进来的。他們当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入学考試总成

績不滿六十分。他們頑皮，不遵守紀律。这些孩子虽然絕大部分是工人子弟，但他們生在新社会，沒有尝过旧社会的苦，体会不到新社会的甜。为了把他們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我們着重对他們进行了階級教育和劳动教育。

第一，充分依靠老工人的力量，以工人階級的思想品质感染学生，帮助他們在劳动中炼思想、炼作风。

我們号召全厂工人，不仅要把生产本領教給学生，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則，把工人階級的思想品质传給学生。同时，慎重选择觉悟高、技术好的老工人担任师傅或教練員。他們怀着深厚的階級感情，从思想上、生产上、生活上全面地关怀学生，把培养下一代作为自己的政治任务。有一个学生在織布間跟老工人魏录竹学加油工的技术。他认为干这行沒出息，一心想当錯工，生产上沒精打采。劳动时，他嫌油壺的嘴太长太細了，加起油来又慢又不方便，就拿起剪刀把一尺多长的壺嘴剪短了一截。魏师傅看見了，就指着断了嘴的油壺說：“这样做，你是方便了，但是壺嘴大了，出油快，容易沾污机上的产品，又浪費了机油，我們工人階級可不能专为自己打算呀！”同时，还耐心地把自己在旧社会学艺三年还没学到加油技术的經過讲給他听，教育他要給工人階級爭气。童工出身的工人陆金星，在接受了教練員的任务以后，



从各方面关怀她所带领的四十八个学生。发现学生有骄傲自满情绪，就安排学生到五好工人车上去劳动，找差距；学生劳动态度不好，就以自己做童工时的痛苦经历来教育学生，提高他们的劳动热情；学生忽视产品质量，就以自己一丝不苟的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学生；学生病了，就主动带学生去看病。在老工人身教言教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工人阶级的思想品质逐步在学生身上扎下了根子。

第二，进行生动具体的阶级教育，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老工人诉苦大会，看了本厂工人演出的反映包身工悲惨遭遇的沪剧《血泪仇》，要求学生写心得体会，并发动学生回去请家长讲家史。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他们说：过去在电影、小说里看到工人受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总以为是个别的，现在才知道旧社会里到处都是“血泪仇”，我们厂许多老工人就有“血泪仇”，有些人自己家里也有“血泪仇”。这个问题初步解决以后，许多学生对现在有没有阶级斗争，自己是否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然认识模糊。有的认为：“我们工人子女是没有资产阶级思想的。”针对这种看法，我们组织学生参加一个大会，在这个会上，揭露了四个青年工人遭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的事实，学生们听了大吃一惊，初

步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他们联系自己所见所闻，揭露和批判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并且认识到，工人子弟如果不加强锻炼，也可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第三，把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政治课的战斗作用。

例如，在政治课上讲解“剩余价值”时，怕学生不容易懂，先请老工人以自己的经历揭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然后再由教员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这样，不仅帮助学生弄清楚了剩余价值的含义，而且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阶级仇恨，把政治课上活了。在援越抗美的形势下，我们选教了毛主席有关反对帝国主义的著作，号召学生把援越抗美的热情投入到全厂生产高潮中去，学生纷纷提出，多纺纱，多织布，以实际行动来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

根据高小毕业生的年龄特点，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

我们的培训要求是在三年内使学生懂得纺织生产过程以及主要机械的结构和原理，掌握挡车工、保养工的操作技术，能够顶班顶岗位生产。在确定各阶段的劳动要求时，还随着学生年龄、体力的增长，逐步增加劳动时间，提高要求。第一年每周劳动六小时，分两个半天进行，做生产性的辅助劳动，培养



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熟悉生产情况，不提产量质量要求。第二年每周劳动二天，每天六小时，专做早班，开始专工种劳动，要求保证质量，不定产量（实际上，一般都已达到三顶一的水平）。第三年每周劳动三天，每天八小时，做早、中班，不做夜班，生产上要求保质保量，做到独立操作。从实践情况来看，上述要求是切合实际的。三年级学生在生产上已达到二顶一的水平。根据统计，他们每人全年实际劳动一百五十天，产值达一万二千元。

各车间生产特点不同，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学生从事专业劳动的组织形式，也不能千篇一律。我们的做法，一种是把学生集中起来，划定工区，固定车台劳动；一种是把学生分散在各个工段，跟老师傅劳动。

学生在生产劳动中，既培养了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又学到了生产本领，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车间干部称赞学生说：“高小毕业生虽然年纪小，体力弱，爱淘气，但是手脚灵活，动作敏捷，学习操作技术又快又好。我们对这些学生是第一年讨厌，第二年欢迎，第三年不肯放了。”

进行教学改革，贯彻执行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开设政治、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外，还结合

专业工种的需要，增设生产技术课。三年教学总时数为二千三百四十课时。教学与劳动的时间为二与一之比。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学生学好必要的基础课程。其他知识则通过专题讲座等形式加以补充。

在教学内容方面，采用初中教材，但进行适当增删和调整。如语文教材，为适应学生在车间担任记录员、通讯员的工作需要，补充了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文，删去古典文。数学课增加了生产上需要的习题、例题和珠算。生产技术课程，也根据学生专业工种和本厂生产实际来安排，急需的知识提前学习。如一年级学生从事辅助劳动，需要了解生产过程的概况，就把生产过程的基本知识，放在一年级讲授。由于学用紧密结合，学生就学得主动活泼，听得懂，学得会，记得牢，用得上。

在教学方法方面，主要抓了两个“结合”，即教师讲解和工人讲解结合，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结合。

教师讲解和工人讲解结合，有利于把书本知识教活。例如物理课讲电学，先由电工车间老工人讲本厂供电系统知识，再由教师讲理论，使学生学到比较完整的知识。

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结合，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例如，生产技术课是学生感到最难学的一门课，我们利用厂休日到车间去上课，让学生听听、看看、摸摸、拆拆、装装，



就容易懂，記得住。过去讲筒子車上的“防迭装置”（防止紗綫重迭的一个装置），讲来讲去，画了許多图形，学生还是不懂，考試时死記硬背，大部分学生都背錯了。現場上課时，老工人把“装置”拆开来，让学生看清机件内部結構和运动原理，学生自己也学着拆装，不到二十分钟就懂了。回到教室，教师再从理論上分析歸納，学生說：“再也不会忘記了。”以后，学生在生产中发现了問題也能活学活用了。如有一个学生在鋼絲車間劳动，发现棉卷不匀，她联系学过的知識，找到了这是由于“隔距”不准，立刻报告老师傅，及时調整。

实行半工半教，促进教师革命化

我校教师一般文化程度較高，年齡較輕，絕大部分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办校初期，对学校沒有感情，教学工作脫离生产、脫离劳动、脫离实际的情况比較严重。针对这种情况，厂党委向学校指出，办好半工半讀学校的關鍵在于教师革命化。根据厂党委的指示，我們具体抓三項措施，一抓大学毛主席著作；二抓劳动，实行半工半教；三抓深入車間，按学科进行調查研究，拜老工人为师，走群众路綫。經過学习和实践，教师对劳动、劳动人民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对半工半讀制度和党的教育方針的認識有了提高。

教师在劳动实践中发现了許多教学脫离

实际的事例。例如，一位制图教师原来以为画六角形是自己的“拿手好戏”，一次在木模間劳动时，在一块长方形的木材上却画不出一个符合規格的六角形来，老师傅一来，三画两画就画成了。这件事，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認識到自己所掌握的只是死知識，教給学生也派不了用場，从而促进了改革教学的自觉性。

教师和学生一起劳动，也促进了教学相长，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如一位教师原来教課时不耐心，学生多問几句就要发火，責怪学生“怎么連这个也不懂”。她到鋼絲車間劳动，老师傅指定一个学生做她的小先生。她对几个棉条筒搬移的位置經常弄不清楚，那个学生总是一次又一次热情、认真、仔細地告訴她。这时，她想到了自己上課时經常讲的一句話——“怎么連这个也不懂”，感到十分內愧，对学生說：“我是你的先生，也是你的学生。”課堂教学中的民主作风开始发揚起来了。

在劳动中，教师都基本上做到“四定”：定工种，定崗位，定時間，定师傅。不少教师学会了一种生产技术，增强了体力，开始养成劳动习惯。

加强組織領導，建立必要的制度

我們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半工半讀領導小組，由厂长、党委宣传部长、校长和各部門有关負責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



人代表等十五人組成。在厂长主持下，每年定期召开會議三、四次，討論研究和解决学校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如确定学校規模、学制年限、发展規劃、培养目标、工作計劃、師資調配等問題。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經常領導，規定校长参加厂务會議，定期汇报学校工作，厂領導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調整学校和車間的关系，处理教学和劳动之間的矛盾。

我們在車間也建立了党、政、工、团、教師和有关部門代表組成的領導半工半讀的小組，选定師傅，制訂培訓計劃，管理学生的劳动、技術培訓和思想教育。車間設专职教練員，負責教練基本功、測定技术和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建立了下列制度：一、基本功訓練制度。車間划出十六台車床作为教練車。学生在第二学期先上教練車练习基本功，由教練員教授基本操作法，达到規定要求后，再跟班参加专业劳动。基本功訓練一般为一个月(实际为二周)。二、技術測定制度。教練員根据各工种技術培訓要求，每月測定一次，及时发现操作技術上的优缺点，防止手法走样，鼓励学习技术的积极性。此外，学生每周相互測定一次，相互督促和检查。三、学校、車間联系制度。学校指定专人参加每月一次的車間領導小組會議，研究学生的劳动、思想等情况；班主任和教練員經常联系，一般每周一至二次，及时了解情况，便于配合进行教育。

半工半讀教育制度能够培养出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劳动者

学生經過三年的劳动和学习，德、智、体諸方面都获得了較好的发展。他們的思想觉悟提高得比較快，在适齡学生中，有三分之一先后参加了共青团。他們在劳动中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服从統一調配。他們熟悉工厂制度，习惯工厂生活，具有一定的生产本領，在正常情况下，一般都能够頂班、頂崗位生产，在單項操作上，有的甚至超过老工人水平。最近全厂評选出青年积极分子五十人，其中就有学生十二人。学生邓有芬本来是学习北厂“头粗”擋車的，已能頂班生产。由于工作需要，又把她調到南厂粗紗单程操作。南厂的車型与北厂不同，机械性能也不一样，棉条筒高，接头难，落紗次数多，原来的操作法不能适应。但她沒有被困难吓倒，运用学过的生产技术知識，根据車台排列情况，把巡回路綫从原来的“凹”字形改为“8”字形。她在生产上的钻研精神，受到老工人的普遍贊揚。学生曹招弟，分配在筒子車間擋車，开始，在接头时，总是找不准管紗头的位置，速度較慢。她記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客观規律，联想到找管紗头也一定有規律可寻，就到前道工序的拈綫机旁去仔細观察，終于发现机上“鋼領板”升降总是在同一水平綫上，每批二百五十只管紗，只要找到其中一个头的位



置，其他的管紗头，就都在同一位置。她掌握了这个规律，干活速度大大加快，班产量达到了全市紡織行业的先进水平，被评为青年积极分子，目前正在总结和推广她的操作法。

在文化科学知识方面，主要学科都达到了初中毕业程度。最近区教科对我校学生的知识质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认为：学生在语文写作方面，思想健康，感情强烈，思路开阔，取材真实，词汇比较丰富，条理比较清楚，超过了一般全日制初中学生的水平；在数学方面，掌握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的范围和计算能力的熟练程度，一般不如全日制初中学生，但对几何知识和代数应用题的理解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强。

由于学生经常参加劳动，促进了他们身体健康发育，增强了体质。根据一个班的统计，学生体重平均九十八点三斤，超过中学生测定标准二斤多；身长平均一五六点七六厘米，略高于中学生测定标准。经过检查，没有慢性病，近视眼新发病例也很少。

现在，这些毕业生分布在全厂各个车间。一年来，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已担任了各车间、工段的计划员、质量员、劳动员、材料员、安全员和宣传员。干部、工人都夸他们，说他们是车间里的“小秀才”，生产上的“小老虎”。

所有这些，都是对半工半读教育质量的

鉴定。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新型劳动者的萌芽。

* * *

实践证明，工厂办学校，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办学初期还是认识不足的。广大工人特别是老工人是一支强大的阶级力量，这个力量发动起来以后，就出现了在党委领导下，工人、干部、教师三结合的全厂办学的生动局面。工厂办学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去年，党中央提出试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后，使我们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使我们从实践中取得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了。干部、教师进一步懂得了试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是关系到挖掉产生修正主义根子、消除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项革命事业。

我们的路是走对了。但是，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如试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深远意义还没有为全厂群众所真正认识；工厂办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教学改革还没有深入开展；特别是试办七年一贯制的中等技术学校，又有许多新的领域还没有被认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今后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和改进。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学校办好，在试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的革命事业中作出新的成绩。



談 談 生 物 的 发 展

童 第 周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在人类的認識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則的两种見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見解，一种是辯证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①在生物学中，关于生物发展的見解，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說的那样。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认为，生物是不变的，各种生物从它們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們一代一代地产生同它們一样的生物，永久不曾变化。变化只是数量上的增减，不是质量上的变异。所以各种生物各有各的祖先，彼此沒有亲緣的关系。特創論对生物的見解就是这样。它在生物学的历史中，占了很长时间的統治地位。辯证法的宇宙观认为，生物是在不断变化(变异)的，不断发展(进化)的。各种生物都来自简单的原始生物，有它們的共同祖先和譜系，所以有远近不同的亲緣关系。这便是生物学中的进化論。自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以后，这种見解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現在，我們来談談生物发展的具体情况、一般規律和促使发展的动力。因为这个問題

的牽涉面广，資料多，見解复杂，所以我們只能简单地談一个大概情况。

生物界的基本情况—— 多样性和統一性

生物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生物学家估計，在地球上我們已經知道的大約有四十多万种植物，一百多万种动物。此外还有許多种微生物。至于个体的数量，单就微生物來說，恐怕用天文数字也算不清。

这些不能数計的生物，分布于地球上的每一角落。它們有不同的形态結構和不同的生活习性。它們的大小十分悬殊。一个“病毒”直徑的长度大約是几十个到几百个毫微米（一个毫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毫米）。細菌的大小一般是数个微米。大的动物如鯨魚的体长可以达到35米。乔木的高度还可以超过这一数字。

病毒不能独立生活，必須寄生在細菌体内或其他生物的細胞内，离开寄主就沒有生命現象。微生物的营养物质是靠膜选择吸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8頁。



的，并能分泌各种酶，将大的营养物质加以分解，再吸入体内。植物利用阳光、空气和水，自己制造养料。动物依靠植物为生，自己不制造食物，劫夺植物制成的养料，经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成分。

繁殖方法，以动物为例，有的是分裂，把身体一分为二，所以繁殖很快，如大肠杆菌 18—20 分钟，可以分裂一次。有的卵生，按季节产卵，如鲤鱼产卵量可达四五十万，鲑鱼可达一千万。有的胎生，如高等动物的哺乳类，一胎一个或数个，所以生产量很低，但成活率高。

生物虽然是多种多样，但它们也有相同的地方。构成生物的结构基础是细胞，细胞既是结构单位，同时也是机能单位。各种生物，细胞本身的结构基本相同，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通过分裂，产生新细胞。

在机能方面，生物都有感应性，能接受外来的刺激，进行反应。都有新陈代谢作用，能改造外来的物质，成为自身的物质，并能分解这些物质，释放能量，作各种活动。

一切生物都有繁殖能力，产生它们的后代，使它们的种类能继续存在下去。在世代繁殖的过程中，它们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特性，同时也产生各种变化，这是它们的遗传性和变异性。

总的来说，地球上数不清的生物，虽然在生命的表现上，有千差万别的多样性，但是它们的基本性质是相同的，这是它们的统一性。

从结构看生物的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

结构是生物形态的基础。了解了结构，

就可以知道各种生物的基本性质。

上面已经说过，细胞是生物结构的基本单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小的也是最简单的生物是病毒（当然将来也可能发现比它更小的生物），它们都没有细胞结构。主要的成分是核蛋白质。蛋白质一般包在外部，内部是“核酸”。结晶的病毒和普通的化学药品一样，看不出生物特性；进入寄主后，显出繁殖、反应等生命现象来。所以病毒似乎是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物质，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简单的生物。

细菌比病毒大几十倍到几百倍，除少数寄生的外，绝大部分都能独立生活。它们的结构比病毒复杂得多，已有细胞的雏形，但与典型的细胞相比，没有那么完整，特别是细胞核和细胞质的分化，不像典型细胞那样清楚。

比细菌形体更大、细胞结构更完整的有单细胞生物。它们不仅有明确的细胞核和细胞质，内部结构并有不同程度的分工。例如，单细胞藻类有叶绿素，和高等植物相似，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养料。在单细胞动物中，例如纤毛虫，有细胞质形成口和肛门等结构，并有成自纤维、类似神经的感应系统。

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是多细胞生物，它们的身体由多数细胞构成。细胞多了，体型也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各细胞之间有所分工。不同细胞组成不同功能的集团或器官。分工愈细，器官的结构也更完整。这样便形成各类生物在结构上有简单复杂程度的不同。例如在植物中，藻类的身体是一片叶状体；苔藓植物略有茎、叶之分；蕨类植物有根、茎、叶，并有传导的管系；种子植物更复杂了，除有上述的结构之外，更有产生种子的复杂结构。



多細胞动物分为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两大部。前者的结构比后者简单。但无脊椎动物之间也有结构上的差异。低等无脊椎动物，例如海绵、水螅等，身体由两层细胞构成，外层为起保护和感觉作用的体壁，内层为消化腔。其他各类无脊椎动物，除内外两层外，还有中层，造成复杂程度不同的各种心血管、排泄、生殖等器官系统。

脊椎动物的器官系统比无脊椎动物发达多了。例如，无脊椎动物，支持和保护内脏的是体外的壳或膜，由一层死的物质构成，称为外骨骼。脊椎动物的骨骼生在体内，称为内骨骼，是活的，能生长。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由神经节和神经索构成，比较简单和分散。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已高度“特化”，集中在背部，形成脑和脊髓，并有骨骼保护。无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一般是敞开的，除血管外还有血腔。脊椎动物的血液循环是封闭的，整个在血管内进行。而且血红蛋白也不像一般的无脊椎动物分散在血浆内，它集中在血球中，形成红血球。

在脊椎动物中，各种器官系统的结构，从简单到复杂，也有系统性的变化。以心脏为例，鱼类有两个心腔，两栖类有三个心腔（两个心耳，一个心室），爬行类和两栖类一样，但腔的分隔比较完整，心室已分成不完全的两部分。这三类动物的血液，在循环过程中，清的和浊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混合。鸟类和兽类的心脏，都有四个完整的腔（两个心耳，两个心室），进来和出去的清、浊血液完全分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总之，生物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分类学家根据这些差别，把它们分成不同种类。

如果我们按结构异同的程度，把各个种类排列起来，可以看到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系统。这说明，它们是来自同一系统，但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果我们把脊椎动物的四肢作一比较，更可以证明这一点。脊椎动物的四肢形态和功能各有不同。有的适于爬行（两栖类和爬行类），有的适于飞翔（鸟类和蝙蝠），有的适于行走和奔跑（狗和马等）。但它们的骨骼结构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上膊是一条长骨，下膊是两条长骨，掌内是许多小骨，末端五指有各节指骨。它们的变化主要是掌骨和指骨。或合并，或消失，或展长，或缩短，造成现有各种类型，在解剖上都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有的在胚胎发育时期，还可以见到它们的出现和变化过程。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特创论所无法解释的。

从以上简单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生物来自同一谱系。它们的形态结构的差别，是不断变化的结果。由变化得到发展，使生物从简单进到复杂，从低等进到高等。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类生物，是它们经过悠久的演变、到目前为止的一幕。

从地层中的遗骸看生物的发展—— 旧的灭亡，新的产生

生物生活在地球上，地层中应当留有它们的遗骸。事实确是这样，在不同地层中，埋藏着不同时期的古生物的化石。所以，标志着地球发展历史的不同时代的各个地层和其中埋藏着的各种古生物化石，是生物发展的最忠实的记录。

地球的年龄，一般估计至少有 40—50 亿



年。前半段有些人称为地球的“前地质时期”或“天文时期”，后半段在地质学里一般称为“地质时期”。地质学家把“地质时期”进一步划分为以下五个大时代：

新生代 大约七千万年以前开始

中生代 大约二亿三千万年以前开始

古生代 大约五亿七千万年以前开始

元古代 大约十八亿年以前开始

太古代 大约二十八亿年以前开始

比较一下我们所发现的各时代的生物化石，可以见到两种有意义的基本现象：一、各种生物并不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有的早，有的迟，早的简单，迟的复杂。二、各种生物出现后，往往在一个时期繁盛，以后逐渐衰退或灭亡。我们可用动物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在太古代末期，海水中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到了元古代（约在十亿年以前），动物从单细胞类型发展为多细胞类型，海洋成了低等无脊椎动物的世界。最主要的门类是“原生动物”、“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但因体型小，年代久，保存不易，所以化石不多。

在古生代地层中，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化石。在古生代的初期，已有很多的无脊椎动物，“三叶虫”是当时海洋里的主人。再后一时期，离现在约四亿年以前，出现了“甲冑鱼类”，它是最早的脊椎动物。三叶虫在这时期已经衰退了。古生代的中期是鱼类的极盛时期，它们是当时的优势动物。在同一时期，距现在约三亿年以前，脊椎动物开始登陆，出现了原始的两栖动物。古生代晚期是两栖类的极盛时期，同时出现了“爬行类”。

中生代的地球是爬行类的恐龙世界。从

距现在一亿五千万年到七千万年的一段时间内，它们称霸世界。中生代中期，离现在约一亿五千万年前，出现鸟类和哺乳类，它们都是从爬行类进化来的。

新生代是出现现代类型生物的时期。恐龙已随中生代的过去而绝迹，哺乳类和鸟类起而代之。离现在约一百万年前，古代猿类中的一支向人类方向发展，出现了人猿，从这时代起，地球的历史逐渐进入到人类时代。

植物的演化也具有上面所说的两种基本现象。

低等植物可能是地球上最初出现的生物。到元古代时，特别是元古代晚期，藻类植物分布广泛，在地层中保存有很好的化石。

古生代中期，大约离现在四亿年以前，最原始的陆生植物——裸蕨植物开始出现。再后，出现原始的真蕨类和原始的石松类。离现在三亿年以前，蕨类植物大量繁殖，世界上不少煤矿都是古生代晚期形成的。与此同时，最早的裸子植物也开始发育。

中生代时，以前的种子蕨类演化为两类，即“铁苏类”和“拟苏类”。这时，铁苏类异常繁茂，所以有“铁苏时代”之称。其他的裸子植物，例如银杏类和松柏类等也是中生代植物群的重要成员。

从“白垩纪”晚期开始，在新生代时期，过去一度昌盛的蕨类退居次要的地位，最高等的被子植物跃升到主要地位，它能适存于不同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数目很多，占全球现生植物一半以上。

以上是动物和植物在地球上发展的概况。各时期所出现的动植物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们都有它们的先祖和演变的过程。总



之，地球的历史告诉我们，生物有它们共同的祖先，代代相传，经变化逐渐发展，发展的趋向是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在发展的过程中，旧的灭亡，新的产生，经过亿万年漫长的历史，形成现在地球上生物界形形色色的景象。

发展的进程——继承性和不可逆性

生物既然有共同的祖先，经变化由低等发展到高等，何以经过漫长的亿万年历史以后，现代的生物还有和多少亿年以前的低等生物相似的种类呢？原因很多。可能是各种生物变化的频率有所不同，有的高，有的低。变化的幅度也有区别，有的大，有的小。变化的性质也有不同，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因此发展的进度有快有慢。但无论如何，都向着对生存有利的方向发展，一般是向着复杂的方向发展。所以现代低等生物的种类要比过去同类型的为复杂，也就是比过去同类型的为高等。

变化要有物质基础。新的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发展的过程要经过积累，新性状的积累愈多，与旧性状的区别也愈大。旧性状的消灭是逐渐消失的，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绝迹。所以在新的种类内，往往可以有旧种类特性的遗迹。人的祖先是吃植物的，盲肠长，对消化有利。在进化过程中，人类逐渐改变他的生活习性，植物不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了，盲肠也失去它的消化作用，但我们身上，盲肠虽然缩小了，还是留有它的遗迹。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脊椎动物的祖先是在水中生活的，用鳃呼吸。登

陆后它们改用肺呼吸，没有鳃。但在它们的胚胎发育过程中，都出现了鳃裂。人类也不例外。所以有一种学说认为，进化的过程要在胚胎发育中重演。

这些现象说明先祖的特性，可以残留在后裔的身上。在它未完全消灭以前，我们还可以找到它的痕迹。但是发展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一切变化都要有物质基础，在新的物质基础上所产生的东西与在旧的物质基础上所产生的东西是不会一样的。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没有见到生物回到原始类型的事迹。虽然生物因生活关系，可以回到它祖先所生活的环境中去。如哺乳动物的鲸鱼，祖先是生活在海里的鱼类，它重新回到海里去。但是它不是鱼，还是哺乳动物，因它的结构虽然有所改变，并没有因此变为和它祖先鱼类同一的类型。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已衰退的爬行动物，如果能重新发展，且能变为庞然大物，决不会和中生代的恐龙相同，而是新的类型。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得一结论，生物的发展有继承性和不可逆性。历史的事迹可以残留，历史的进程不会重演。

发展的动力——内部矛盾是主因， 外界因素是条件

生物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有大量的具体事实，所以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了。但对变化和发展的机制和动力，还有基本不同的看法。

拉马克的学说认为，生物的变化或发展是由于器官的用与不用，常用则继续发展，不用则逐渐退化。如长颈鹿的长颈，是它们



在森林中代代伸颈吃树叶的结果。这就是“用进废退”学说。

达尔文学说认为，生物繁殖很快，而且在不断地变异，为了争取食物和空间，须进行斗争。由于有利变异能在斗争中发生积极作用，结果是不适合的被淘汰而遭到灭亡，适合的被保留而得到了发展。这是达尔文进化学说中“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基本概念。

遗传学家的观点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学说有所修正和补充。许多遗传学家将达尔文学说中的“自然选择”和“基因”学说结合起来，来解释生物的进化现象。他们认为遗传有它的物质基础。生物细胞核内的“染色体”是有关遗传的主要物质。组成染色体的基因是遗传作用的单位。基因可以按照物理化学规律，由各种条件的影响引起突变。基因也可以经过杂交重新组合。由基因的突变或重新组合所引起的生物变异，可以传给后代，再经自然选择，决定生物进化或发展的方向。不由基因突变或重新组合所引起的变异，不能遗传给后代，这种变异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

另有遗传学者认为，新陈代谢是遗传的基础。新陈代谢类型如果因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就会改变遗传性。他们强调生物体和生活条件的统一，生活条件引起生物的定向变异，因此导致生物的发展。

上述各种学说中存在着一个基本性的问题，即“获得性”能不能遗传。获得性是指生物个体在它的生命过程中受到的变异，也就是一般所谓“后天的变化”。拉马克学说、达尔文学说、生物体和生活条件统一学说，都认

为获得性能遗传。当然在拉马克和达尔文时代遗传学还没有建立，他们这方面的论证，在科学上的依据是不够充足的。主张基因学说的人，认为获得性不能遗传。因为身体某部分的变化，不能直接影响生物生殖细胞内的遗传物质，所以只能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消失。

遗传性状的产生，应当是物质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性状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物质基础的提出是唯物的，科学的。但遗传的物质基础究竟是什么？主张基因学说的人，如上面所说的，认为主要是生殖细胞内的染色体和基因。染色体和基因对遗传的具体作用，有很多证据，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遗传的物质是不是仅仅限于细胞核内，核周围的细胞质是不是只能受核的控制，还是也有它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我觉得物质的存在，都会有相互的作用，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虽然细胞质对遗传的作用，现在还没有很多证据，究竟如何，还要看将来科学实验的结果。

我们现在暂且不讨论获得性能不能遗传和遗传物质基础是什么。虽然它们牵连到遗传变异的机制，是一个基本问题，但对生物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导致变异的动力，也就是变异发生的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①生物的变化正是这样。生物体内的矛盾，便是生物变化的动力。有很多事实告诉我们，生物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内的物质，不是彼此孤立，各不相关，而是互有作用，互相联系，互有影响的。从细胞来说，细胞核内的染色体能影响个体的发育。染色体有缺陷时，发育就会停止，或不正常。染色体上的基因能促使细胞质产生各种特性。这可以说是细胞核对细胞质的作用。在细胞核内，物质之间也同样有相互的关系。以基因来说，有调节基因、结构基因和操纵基因等分别，它们也不是彼此孤立，而是有相互的作用和联系。核周围的细胞质对核也有显著的影响。它能消减染色体的物质，促进或抑制基因的活动，影响细胞核的变化。

以上所谈的是细胞内物质相互的关系。细胞与细胞之间，器官与器官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也存在相互的作用。如一种细胞可以受另一种细胞的影响，变更它的性质。一种器官或一个系统可以抑制或促进另一种器官或系统的功能。

生物体内各物质体系之间的相互促进、抑制或调节等现象实质上就是矛盾的表现，如果矛盾的发展过于尖锐或达到了某一高度，就有可能影响物质的基本结构，例如分子结构等，使它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导致个体的变异。特别是有关遗传的物质结构，它的变化是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变异的。这就是说，遗传物质可以由于各种原因发生突变。

以上所谈的是生物个体内部的矛盾，这是基本的。但生物不能离开它们的环境而生存，所以它们与周围环境条件，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过这些外界条件所起的作用，要通过内因才能表现出来。如促进或抑制某种作用，使矛盾发生变化，有利于某一方面的发展。两性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个

体雌雄性的分化是一个矛盾。雌性方面胜利时，便发育为雌性。雄性方面胜利时，便发育为雄性。外界的条件可以影响这一矛盾的发展。例如蛙类，当两性的分化还没有决定的时候，提高温度能加强雄的一面，抑制雌的一面，使个体成为雄性；反之，如降低温度，则加强雌的一面，抑制雄的一面，成为雌性。这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所以在同一环境条件下的生物，例如同一片土地上的植物，同一滴水中的微生物，由于内因的不同，它们的生长和它们的变化也不一样。有人重视外因的作用，忽视内因的重要性，这是不辩证的。

总之，生物的发展首先由于生物的变异，变异的动力主要是生物内部的矛盾，旧矛盾解决，新矛盾产生，生物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运动着和不断地发展着。

结 语

从地球上生物出现的时期到现在，已有亿万多年的历史了。比较从地层中发掘出来的生物遗骸和现在地球上存在的类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是在不断地变化和不断地发展。这有力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关于自然界是在不断地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一部生物学史，是意识形态斗争过程的历史。以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指导，生物学工作的进展就受到阻碍；以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为指导，生物学工作就会得到迅速发展。为了加速生物学的发展，使生物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紅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到第十三期总目录

(題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总頁碼)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
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 (6·271)
刘少奇主席为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的
題辞..... (4·16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 (9·415)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二十周年林彪 (10·475)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贺龙 (8·363)
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
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罗瑞卿 (5·227)
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經驗
.....人民日报编辑部 (5·24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
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
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 (1·3)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 (1·6)
社論: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創造我們的
新世界..... (11·523)

評莫斯科三月会议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3·115)
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进行到底
——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总路线的建議》发表两周年
.....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7·319)
駁苏共新领导的所謂
“联合行动”人民日报编辑部
紅旗杂志编辑部 (12·567)
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
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彭真 (6·273)
社論: 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纪念列宁誕生九十五周年 (4·170)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論战》
一书的介紹..... (3·126)
《赫鲁晓夫言論》第三集出版者說明..... (2·66)
《赫鲁晓夫言論》第五集出版者說明..... (4·180)

評苏共领导从三月一日起在
莫斯科召开的会议日共《赤旗报》(4·184)
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纪念列宁誕生九十五周年
.....越南《学习》杂志 (5·252)

学习毛泽东思想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王杰同志日記选 (12·584)
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
——讀王杰同志的日記关锋 (12·595)

理論工作繁荣的道路肖述 (13·630)

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
.....施东问 (7·347)
怎样看待敌人的反对章竟 (2·69)
每事問路方 (3·130)
在技术革新中学习运用唯物
辩证法程朝有 (10·503)
“一分为二”与抓活思想潘有国 (1·27)
找差距还是找“共同点”?韩忻亮 (1·29)
我們工人坚决反对“阶级合作”論
.....繆龙江 (1·32)

自然科学和唯物辩证法

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日本〕坂田昌一 (6·289)
《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注释.....庆承瑞 柳树滋 (6·302)

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看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的破产.....朱洪元 (9·435)
在不断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高崇寿 (9·439)
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分子结构
理論研究的一些看法徐光宪 (9·442)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龔育之 (9·445)



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的理论
 武器艾思奇 (9·450)
 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改进科学
 研究方法于光远 (9·452)
 毛泽东思想是研究自然科学的
 锐利武器唐敖庆 (11·537)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大庆油田
 开发工作阎 豫 (13·641)
 统筹方法试点工作散记华罗庚 (11·544)
 天体是不断发展的戴文赛 (10·509)
 谈谈生物的发展章第周 (13·659)
 试论科学实验龔育之 (1·35)

哲学·历史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矛盾
 恐惧症毛况生 (8·396)
 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变成了
 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李 哲 (9·456)
 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
 和作用邵友助 (12·603)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戚木禹 (13·632)

经 济

五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南针
 ——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发表十周年陶 铸 (8·378)
 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
 ——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
 初步总结陶鲁笏 (11·526)
 自力更生是法宝陈永贵 (1·22)
 到生产中进行农业科学实验
刘更另 江朝余 (13·647)
 一件新事物
 ——四川省推行“三定一顶”
 劳动制度的经验杨 超 (2·79)
 大石塔农村的变革徐 稚 (9·469)

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
 价格和利润王学文 (6·310)

教育·卫生·体育

江苏省农业中学创办七周年陈 光 (4·202)
 半工半读育新人
上海市楊浦棉紡織印染厂
 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 (13·652)

卫生工作向农村大进军的序幕
 ——关于农村巡回医疗队工作的
 几个问题錢信忠 (13·619)
 一所为农民服务的医院安宜红 (11·551)
 从第二十八届世界比赛看我国
 乒乓球队的成长柴高棠 (7·327)
 敢于胜利,才能胜利林慧卿 郑敏之 (7·339)
梁丽珍 李赫男
 一比三庄则栋 (7·342)
 听一听想一想徐寅生 (7·343)
 一张决赛名单容国团 孙梅英 (7·345)
 教练工作杂记傅其芳 (8·404)

文学·艺术

词十六首胡乔木 (1·48)
 诗词二十六首胡乔木 (11·557)
 诗词十首郭沫若 (8·393)
 某公三哭(散曲)赵朴初 (2·110)
 援越抗美诗两选 (4·214)

红灯记(京剧现代戏剧本)
翁偶虹 阿 甲改编 (2·88)
 《红灯记》的两处修改 (3·163)

革命歌曲选 (3·145)
 《革命歌曲选》的几处修改 (7·359)

飞夺泸定桥楊成武 (9·462)
 大庆通信
 ——从职工家属闹革命的一些
 平凡事说起孙维世 (12·607)

工农兵业余创作队伍在成长荀 常 (12·600)
 农民欢迎革命小戏文文宣 (12·601)
 回忆武装宣传队的一次演出刘一雁 (10·517)
 重看影片《攻克柏林》黄 镛 (5·264)

国 际

列宁对东方革命风暴的预见 (2·55)
 越南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
 必败本刊评论员 (2·63)
 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本刊评论员 (4·176)
 美国人民斗争的风暴郭济洲 (13·628)

殖民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非洲
 史话楊 真 (3·132)



红旗增刊

HONGQI ZENGKAN

一九六五年 第 1 号



红旗

增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五年第一号 目录 ★

农民粉碎农村魔鬼

——关于西爪哇农民和农民运动情况调查结果的简要报告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 迪·努·艾地 (2)

序言 (2)

一、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农民的重要性 (4)

二、西爪哇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农民和
 渔民的剥削形式 (9)

 (一) 农村阶级的划分 (9)

 (二) 对农民和渔民的各种剥削形式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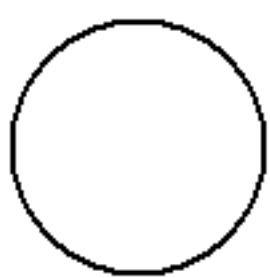
 (三) 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 (19)

三、农村魔鬼的政权和农民反对他们的斗争 (21)

四、农民在经济方面反对农村魔鬼的斗争 (27)

五、农民和渔民粉碎“农村七魔”的组织程度和斗争 (29)

 (一) 关于农村分类的重要性 (29)





(二) 关于农民干部和渔民干部问题	(30)
(三) 西瓜哇农民和渔民的斗争经验	(31)
(四) 准备、开展和巩固斗争	(33)
六、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农村的革命政治宣传	(35)
农村的政治觉悟正在普及和提高	(35)
反动派阻挠农民提高政治觉悟的手段	(38)
农村的革命政治宣传	(40)
七、农民从“全都错了”变得“全都对了”	(41)
八、在农民和渔民中进行革命的文化和道德工作	(44)
九、反对假合作社，把合作社变成农民和渔民	
手中的武器	(48)
(一) 展玉县波容·比宗区格芒乡合作社	(48)
(二) 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米砂牙·米纳	
海洋渔业合作社	(49)
(三) 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人民食盐合作社 ...	(50)
(1) 青黄不接时期的粮仓和抓会	(50)
(2) 茂物县芝芒奇斯区苏卡玛茹乡的互济会(抓会或信贷) ...	(50)
(3) 茂物县芝芒奇斯区苏卡丹尼乡的互助会	(50)
(4) 消费合作社	(51)
附录一：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的阶级划分	(52)
附录二：牙律县瓦纳拉查区德卡尔沙里乡雇农、贫农、	
中农和富农的收支	(53)

☆ 一月二十八日出版 ☆



农民粉碎农村魔鬼

——关于西爪哇农民和农民运动情况调查结果报告的简要报告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 迪·努·艾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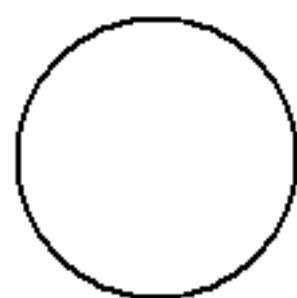
序 言

我是在西爪哇山区的一个地方写这本小册子的。当我写作时，我的对面是巍峨的邦朗戈山，左面望见克特山，右面是沙拉格山。这个清静和凉爽的地方，对写小册子或从事需要清静环境的其他工作，确实很好。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至三月二十三日的七个星期内，我率领了一批由四十多个人组成的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下乡，他们每人由区和乡一级的农民领导人组成的工作组来协助进行工作。

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一般都是由具有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的干部组成的，其中有些同志在领导激烈和成功的农民斗争中是经受考验的。他们一般出身于雇农、贫农和中农家庭，一部分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有一人出身于富农家庭。他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出身于贫雇农家庭的，一般只受过小学教育，有的没有毕业，其余的是初中、高中或中等技术学校程度，有几个人是大学生。

被调查的乡是在以下各个区：兰查赫和巴塔赫朗（尖美士县）、芝宋贝德和瓦纳拉查（牙律）、加朗农卡尔（斗旺）、查第都朱赫（马查冷加）、芝本都伊和芝维都伊（万隆）、芝马拉加（双木丹）、波容·比宗（展玉）、沙卡兰登和纳卡拉格（苏加巫眉）、哈乌尔古力斯和甘当奥尔（南安由）、勒马哈邦（井里汶）、斯卡拉赫朗（苏邦）、冷加士冻鹿（加拉旺）、芝芒奇斯、芝约马斯和芝泽鲁格（茂物）、斯尔邦和勒哥格（文登）、瓦隆古农（勒巴克）和拉布



汉（班特克朗）。

在全西爪哇共有三百五十多个区。因此，不是对所有的区都进行了调查。但是，被调查的地区都经过选择，使调查的结果能够反映整个西爪哇农村、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因为它们包括各种农村，那里有土著地主、渔船主、农场、林场、前私领地、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反革命集团过去的基地和正在蓬勃开展的农民斗争，有的农村的农民刚开始起来并刚组织他们的团体（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要了解麻雀或兔子的情况，不需要把所有的麻雀或兔子都杀死和检查，杀死和检查几只就够了。要了解西爪哇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不需要调查所有的农村。

我在三月一日、二日和三日听了兰查赫、芝本都伊、芝维都伊、波容·比宗、芝泽鲁格和芝芒奇斯等区的调查工作组组长的初步汇报，并同他们进行深入的讨论。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下达过的有关调查工作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能够根据这些指示进行工作。但是，有些负责干部在实行“三同”的原则，即与雇农或贫农同劳动、同吃、同住方面不够坚决。同劳动就是从事他所借宿的农民所从事的任何劳动，同吃就是吃农民所吃的任何东西，同住就是住在农民家里并且像农民那样住法。“三同”必须是与雇农和贫农“三同”。为使材料完备起见，也要在中农家里“三同”。在讨论中，采取泛泛的“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调查的做法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还有的负责干部过分强调搜集有关土地和农民生活的数字，但不大注意农民的组生活、政治觉悟、道德和文化状况。我们已经把这些缺点立即通报整个西爪哇的全体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不要去仿效，如果犯同样的错误，就必须立即克服。

为了使组织农民的问题受到最大的注意（因为进行调查的目的不外是要加强农民运动），我已经发出指示，要把各乡和各区分分类。参加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农户占百分之七十五的乡叫做一类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叫做二类乡，占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的叫做三类乡，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下的叫做四类乡，完全没有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叫做五类乡。但是，根据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成员的比例而作出的分类，并不足以反映农民的政治力量。因此，对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道德情况和文化状况进行调查是很有必要的。

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我采取了直接个别谈话的方式，同全体调查工作负责干部讨论和开会。紧接着，三月二十四日，我就开始写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不外是提供一份简要的报告，来阐述为讨论调查工作负责干部的汇报而举行的谈话、座谈和会议中了解到的情况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不是要提供完整的报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它将成为厚厚的一本书，



这是农民运动干部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所不需要的。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干部改进他们在领导农民运动特别是西爪哇农民运动方面的工作。

我这次领导的西爪哇调查工作是在这样的口号下进行的：“通过调查来加强结合工作！”^①

一、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农民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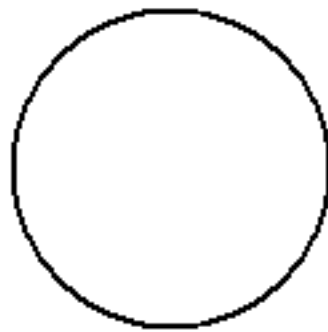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较早就已经把它的政治和组织活动同调查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十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一个共产党不进行调查，它是否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纯洁性，那是值得怀疑的。不进行调查意味着不了解情况，不实事求是。

从一九五一年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就努力把调查的方法用到党的工作中去。例如，我们曾经设法通过寄发必须由党的特定干部填写的“问答”和调查表格，来了解土地、农民和农民运动的问题。这些表格大部分都没有退回给寄发表格的党委会，只有一小部分退回来，并填上了乡、区或局的官方数字。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因为不是直接同具体事实接触，这就不可能反映出我们想要了解的问题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如果材料来源仅仅是来自局、区或乡，当然就不可能反映出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剥削方式的真实情况。这种方法确实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进行调查的方法，因此我们立即抛弃这种方法。

虽然如此，这种错误的调查方法也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某些干部带来了好的影响。他们开始面向农民，其中有些人开始改进他们在农民中间的工作。在直接同农民群众的接触中，他们关心并注意农民的这种思想感情，即农民实际上不同意当时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和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提出的“全部土地国有化”和“国家对全部土地保有所有权”的口号。印度尼西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是很强烈的，而“全部土地国有化”和“国家对全部土地保有所有权”被他们理解为企图剥夺已经为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为此，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前夕，党就土地和农民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做出了结论，在党的纲领中将党的土地政策表述如下：“外国地主或印度尼西亚地主所拥有的所有土地必须无代价地加以没收。把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首先是无地农民和贫农”。确定了这样的口号：“土地归农民”和“农民对土地保有私有权”。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九年）做过如下总结：党的干部“必须根据调查研究

^① 指同农民的结合。——译者注



的结果或以科学的方式进行工作，以便改进他们唤醒、动员和组织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实际工作”。自那个时期以来，党在农民中间的调查工作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即实行了“三同”的方法。党派了重要干部到农村去，用这种方法进行了许多调查工作。

根据对土地和农民运动问题的调查结果，党就越来越能够正确地分析和总结党在农民中间的工作。这对改进党在农民中间的工作很有帮助。其结果是，一九五三年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和印度尼西亚农民协会合并时，全体会员只不过四十万，现在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会员已增加到七百万以上。

我们已经很好地总结了农民或农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根据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时期的亲身经验，我们总结出我国农民或农村在革命中的四个重要作用，即：1、粮食的来源；2、革命士兵的来源；3、在城市遭到打击时后退的地方；4、发动进攻和重新夺回城市的基地。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之后取得的。因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个经验教训。

所有的集团都越来越体会到并承认农民在民族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目前农民问题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国内政治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任何重大的全国性问题，如果不同解决农民问题联系起来，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这不仅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信念，而且也是日益成为每个诚实和彻底的《政治宣言》派的信念。在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已经屡次强调农业和农场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础的重要性以及土地改革的重要性，而且《政治宣言》已经承认农民同工人一样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支柱。

虽然一方面农民的重要作用已经正式被承认，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同情农民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在城里还有相当多的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的爪牙令人作呕地诬蔑和责难农民。如果稻谷产量低于这些坏蛋臆想的估算，如果闹水灾或旱灾，如果农民不愿意从他们的耕地上无理地被驱逐出去、甚至敢于反对在枪杆子掩护下用拖拉机破坏耕地的做法，如果农民撤换坏乡长，等等，这些坏蛋就任意责难农民。他们把这一切都同共产党人联系起来。当然，共产党人应该感到高兴和自豪，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共产党人同农民已经是不可分割的了。除了感到高兴和自豪之外，我们必须证实：共产党人确实是同农民不可分割的，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必须维护农民，因为农民不可能在农村魔鬼的喉舌所诬蔑的一切问题上犯错误。

鉴于当前这种势不可挡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每个领导人和党员必须加深对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的了解。因此，必须在党的整个队伍中加强对土地、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的调查工作。

由于我们党的队伍中对调查工作的高度热情，当然有必要提醒一下：加强调查工作并



不是要把我们党降低为“调查学会”。不能一下子调动太多的干部进行调查工作，以致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日常工作无人照顾。而且，调查工作必须始终同进行调查时的斗争阶段联系起来。

调查工作必须在农民本身的活动、经验和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要作全面的和具体的准备。做好准备是完成调查工作、又不致太多影响党的日常工作的保证。

正如准备党的其他工作一样，在西爪哇进行调查当中也证明了，首先必须明确规定调查的目的、对象和组织调查的方式。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就不可能完成他们的工作。参加西爪哇调查工作的负责干部已经明确：调查的目的是了解西爪哇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情况，即他们必须搜集有关农村情况最新的材料。调查的对象是某一个区内的所有农村。为了达到调查的目的，具体的调查方针是很重要的，而且要根据这个方针把负责干部集训几天。在确定要调查哪些农村时，大地区委员会首先要根据各县自己的特点把这些地区分一分类，它们的特点是：有土著地主、渔船主、农场、林场、前私领地、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过去的基地、农民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和刚刚开始的地地区，等等。根据这些特点，大地区委员会选定典型的区作为调查对象地区。通过调查这些区，我们就获得了有关整个西爪哇农民和农民运动情况的全貌。

下一步工作是拟定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执行的调查日程表。从西爪哇的调查工作可以看出，从开始筹备到总结，全部时间需要七个星期，其中在农村进行实际调查的时间平均是一个月。这种日程表是必要的，它使被调查的地地区的各个党委会能够进行准备并将它同各自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选定了典型的各区之后，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是挑选和确定调查工作负责干部。西爪哇的调查工作，每一个区是由两个负责干部进行的，而每个人又得到由区和乡一级的农民领导人组成的工作组的协助。

根据西爪哇的经验，调查工作负责干部最好由以下几种人组成：（一）党的负责人；（二）革命群众团体（工人、农民、妇女、青年、文化）的负责人；（三）党的知识分子干部（科学家、党的理论工作者、大学生、教师和中学生）。以上大约各占规定的全体负责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女干部的参加十分有助于调查，特别是对同妇女问题和农民家属情况有关的调查的进行。在安排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到农村时也必须注意，该负责干部要适应他去调查的农村的气候、语言和居民的风俗习惯。

正如适用于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为了使调查工作能够成功，无论是大地区委员会对调查工作负责干部，或者是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对其助手（工作组），都必须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同



党的工作作风结合起来。每一个调查工作负责干部除必须直接进行调查之外，也是调查工作的领导人，他在他所调查的区的所有农村都有助手，而作为调查工作的领导人，他就必须实行最好的领导方法。

从西瓜哇调查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调查工作负责干部选择他呆在农村期间的住地问题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选择，调查就会完全失败。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如果住在富农家里，将得不到雇农和贫农的信任，住在地主家里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被选择的房东必须是雇农和贫农，其家人的情况要正常，例如，不是正在患水肿病。如果调查工作负责干部所在的那一家里的人情况不正常，他就不能从房东那里获得足够的材料和帮助。

有这样的经验：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一到雇农或贫农家里，就立即把他的全部生活费交给房东，请房东给他买大米，而不事先了解这一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如果房东每天已不吃大米饭，那么，这种做法就是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使自己脱离房东的第一步，因而违背了“三同”的原则。也有的调查工作负责干部由于不忍心看雇农和贫农的困苦，就给他住的那一家好几天生活费，以便使生活比平常稍为好一点。当然，这也不是正确的方法，因为这样做，不是使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去适应雇农和贫农，而是要房东一家去适应调查工作负责干部。采取这种“恩赐”态度，农民的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而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也会失败，因为他不仅违背了“三同”的原则，而且由于生活费已花光只好快点回家。应该是在把生活费交给房东之前，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设法事先了解房东每天吃的是什么，然后把购买房东平时吃的那种粮食所需的生活费交给房东。这是实行“三同”的第一个步骤。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实行“三同”不仅不加重他所住的那一家的农民的生活负担，而恰好相反，该农民感到得到帮助和受到鼓舞。

为了了解农村的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在一个乡里至少住一星期。要使房东能够交心，一般至少需要两天至四天的时间。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东选得对不对和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对待房东的态度对不对。态度谦虚和有礼貌是很重要的。如果想要贫雇农交心，千万不能对他们采取好为人师的态度。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采取共产党人的正确态度，把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当作他们的伟大老师。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同农民结合。

在实行“三同”当中，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因此，必须参加雇农和贫农所从事的任何劳动，虽然开始时他们不让参加，因为他们很尊敬党的干部，或者把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当作照理是不参加劳动的“客人”。西瓜哇的经验证明，如果我们坚持劳动，雇农和贫农将更进一步感到，我们同他们是一条心的。至于家务劳动有很多是可以做的，



从打扫屋里和院子到替农民的孩子洗澡和洗屁股。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修建有遮盖的公共厕所和公共澡堂，农民是很欢迎的。

在实行“三同”当中，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真正做到不要损害房东或其他农民的利益，不管是多么微小的利益。与此相反，他们必须设法帮助房东克服困难，也要帮助克服乡里农民的困难以及当地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困难。

关于住在贫雇农家里的問題，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不能老搬来搬去，如一个晚上住在烏章家里，另一个晚上又住在阿东家里，虽然他们都是雇农或贫农。这样搬来搬去，负责干部就无法真正体会贫农的各种痛苦，而且也不能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就使他们交心。

在实行“三同”当中，选择党的负责人的家作为住地是不正确的，即使他是雇农或贫农。党的负责人是农村中最进步的分子，因此，他不能代表农村居民的大多数。调查必须是以贫雇农群众的情况和他们的思想所反映的事实为依据。

在进行调查中，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了解贫雇农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同党的关系的看法，以及对本乡以外的各个问题的看法。

如果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亲眼看到贫雇农的情况并且亲自听到直接出自他们内心的想法，调查工作就会有好的结果。在对所有这一切做记录方面，西爪哇的调查工作有好的经验。例如：在贫雇农面前记录他们家庭的情况、劳动工具、土地面积、尤其是他们的思想，那是不合适的。这种记录办法太容易使他们想起地主、高利贷者、坏官吏或其他农村魔鬼通常用来对待他们的办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他们遭殃。正确的方法是普通谈话，聊天，看起来沒有一定的程序，沒有做记录。记录可以事后凭记忆做，贫雇农沒有必要知道这件事。

在搜集数字时，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必须把它的材料来源记下来。在这方面，我们首先不能依赖乡政府、乡长、林业局等的数字或表格。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这些表格或数字。这是需要的，负责人必须努力取得它，以便作为他自己在调查中所搜集到的材料的参考和对比材料。

负责干部在执行调查任务时，必将遇到各种困难：本身的困难、家庭的困难、农村人民的困难以及当地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困难。在寻找克服上述困难的出路时，负责干部必须依靠组织的集体力量和群众。

关于负责干部本身的困难，必须立即同当地的常委会和革命群众团体领导人一起讨论和解决。关于房东面对的困难，负责干部必须从农民本身的经验和情况出发，对困难的原因做必要的说明。根据经验，调查工作负责干部通常有雇农和贫农群众来访，被他们围住。当然必须很好地对待这件事。在这样的会见中，调查工作负责干部不能多讲话，但必须鼓励农民



通过普通谈话的形式发表他们的意见，要时刻防止采取正式一问一答的方式。

从西瓜哇的调查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行“三同”中，必须坚持“四不要”和“四要”。“四不要”就是：（一）不要住在农村剥削者的家里；（二）不要对农民采取好为人师的态度；（三）不要损害房东和农民的利益；（四）不要在农民面前做记录。“四要”是：（一）要完全实行“三同”；（二）要虚心、有礼貌并愿意向农民学习；（三）要懂当地的语言，并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四）要协助解决房东、农民和当地党的困难。

从以上的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使自己同农民结合的问题是革命决心的问题。如果还不愿意帮助农民搞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如果还不愿意吃农民所吃的东西，不习惯用又皱又脏的硬枕头（因里边装了椰子外壳的纤维或捣碎的玉米棒）、甚至可能完全不用枕头睡在农民破旧的席子上的话，我们的革命决心就还不大。是的，为了使自己同农民结合，共产党人要下定这样的决心：如果必要的话，必须愿意为农民的小孩洗屁股。实行“三同”可以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品德。

二、西瓜哇农村阶级的划分以及对农民 和渔民的剥削形式

来自所有已调查过的地区的关于调查结果的报告，提供了关于农村的阶级划分和剥削形式的丰富材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许久以前所作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农村的阶级划分以及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剥削形式的分析和结论，显然成了调查工作负责干部具体了解他所调查的农村的情况的强有力的武器。同时，这些负责干部执行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提出的“懂得马克思主义，了解情况”的学习和工作口号，他们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大大丰富了以上的分析，并揭示出西瓜哇农村各种各样的阶级情况和剥削形式。正如以上所述，调查的地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地区主要是水田农业地区，有些是林业地区、农场地区、沿海地区，有些是前不久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还横行霸道的地区，有些是肥沃地区，有些是荒蕪地区，有些是这些不同特点相结合的地区。但是，所有这些地区都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这个结论，即在印度尼西亚农村，同样也在西瓜哇农村，还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残余，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除了具有殖民地性质之外，还具有半封建的性质。

（一）农村阶级的划分

西瓜哇农村有地主、高利贷者、买青苗者、中间商人、官僚资本家和富农等剥削者。劳



动农民则分为雇农、贫农和中农。沿海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渔民，在那里渔船主或渔业主扮演着如同地主一样的剥削角色。渔民分为如下阶层：富裕渔民（同富农一样的剥削者）、中等渔民、贫苦渔民和渔工。沿海地区还有其他剥削者，如高利贷者、买青苗者、中间商人和官僚资本家。

此外，农村还有另外一些阶级和阶层，如属于农村知识分子的乡村教师、铁匠、手工业者和其他工匠、小商人、林业工人、农场工人或产业工人。农村各个阶级的轮廓可以从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的阶级划分看得出来（见第52页附录一）。

以下将着重分析农村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情况、特别是西瓜哇调查结果中所总结出来的它们的表现形式。

地主。地主在农村拥有的或控制的土地，有的是几公顷，有的是几十公顷，有的是几百公顷或几千公顷（例如勒马哈邦的苏丹地就达几千公顷）。但是，虽然有些地主的土地只有三、四公顷，但收入大得很，因为其土地十分肥沃，剥削十分厉害。他们除出租土地之外，还通过买青苗、接收典押品和放债受利的方式进行剥削。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牙律县瓦纳拉查区看到。在那里，一个名叫M的地主拥有三公顷水田，面积达五百“冬巴克”^①（相当于一“巴务”，等于零点七公顷）的每三个月产鱼两吨的水池（大池塘），和通过典押的方式取得的两公顷水田。这个地主也放高利贷，以利上加利的方式放债。

调查结果证明，土地相对少的地主同土地多的地主一样都是进行残酷的剥削，甚至有时正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少而更加残酷。

值得提一提的是：关于被调查的农村地主的土地面积的调查材料常常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些地主采取直接用他们的名义或用别人的名字顶替的办法，在其他地方还占有土地。

农民已经认识到地主残酷剥削的罪恶，但是农民会区别哪些是爱国的、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的、不是顽抗《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地主，哪些是积极反对农民运动和反对进步的国家政策（《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土地基本法令》、对抗“马来西亚”等等）的“恶地主”。

一般说来，西瓜哇农村的地主都是千方百计反对革命农民运动的恶地主。只有一小部分地主对革命的农民运动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且不反对政府的进步政策。恶地主则积极进行反对《政治宣言》的宣传，许多哈夷^②地主滥用宗教扩大他们的土地并加强对农民的剥削。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典押制度是忌讳的，因此，在茂物县芝芒奇斯区，有的地主就利用“存树租

① 一“冬巴克”约为十四平方米。——译者注

② 去过麦加朝圣的伊斯兰教徒。——译者注



借制度”的名义，采取典押果树的做法。

这些恶地主，通常是已被禁止活动的前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党员，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横行霸道时的积极支持者和一九六三年五月发生的反革命种族主义行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他們現在窩藏在实际上是“新式馬斯友美党”的“伊斯兰教师會議”里，并且寻找地方民政和軍政当局如乡长、区一級的地方軍区司令部、乡村建設軍官組織、民防組織、人民自卫团等等的保护。

恶地主强烈地反对《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实施。他們急急忙忙把多余的土地“贈送”給亲戚，以免受《土地基本法令》的影响。有些地主为了保住土地甚至形式上同老婆离婚，用这种办法来“分掉”他們的土地。在調查材料中，有許多材料证明，那些被“贈送”掉的土地依然为該地主所控制，地主依然获得从耕种那些土地的农民身上剝削来的一切产品。在許多地方，地主的舞弊行为都能被觉醒了农民揭发出来。例如瓦納拉查（牙律）农民揭发了地主H的罪行，这个地主使用一九五九年的印花“卖掉了”六十公頃的旱地。这一行为之所以能被揭发是由于在印花上署名的区长是一九六二年才上任的。西瓜哇农村的調查說明，地主只有在革命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才願意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

地主中有把他們的一部分活动轉到資本主义企业方面去的現象。例如在尖美士的兰查赫区，一名地主把他的一部分土地卖掉，以其所得作为商业資本。十年后，他在城里已拥有十一間店舖。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封建剝削。他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他采用分成制的办法出租土地，并且后来还利用一部分經商的盈利再去购买土地。还有些地主不願再出租土地，而是使用雇农的劳力。这一方面是为了逃避《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另一方面也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增加他們的物质利益，因为雇农工資的增加大大落后于稻谷价格的上涨。虽然他們的剝削因使用雇佣劳力而带有資本主义性质，但是他們对雇农的剝削还带有許多封建性。他們所雇佣的雇农可以說是不限时間地进行劳动，并且还进行若干强迫劳役，因而成为半奴隶或农奴。

对西瓜哇农村的調查研究說明，农村經濟仍然牢牢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势力。

富农。富农一般还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雇佣雇农劳力耕种其部分土地。但是由于农村經濟落后，富农的剝削也带有許多封建性。例如其所雇佣的雇农不是自由工人，而是多少仍然受农奴性束縛的工人。也有的富农將他們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給人耕种。

許多富农还放高利貸，买青苗及当中間商人。他們具有集中土地的强烈欲望，有的已經



发展为地主。

但是富农在农村所起的作用同地主不一样。富农不直接反对革命的农民运动，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农村的封建习俗和封建负担的问题上，能同农民运动联合。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富农一般能被中立。

中农。一般占有自耕地，其收入仅足维持一家生活。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中农有两种发展趋势。小部分中农，即上中农，除耕种土地外，还从事其他活动如经营商业和利用同地方官吏的关系而发展为富农。但大部分中农经济地位不稳，不断遭到破产的威胁。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经济条例对中农的打击很大，结果，中农所经营的商业一般都垮了。中农也会落入坏中间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里，因此不得不提心吊胆地生活。例如苏甲巫眉县沙卡兰登区的中农在旱季期间每天只吃一顿，以便节约他们的存粮而无需受雇于富农或地主。

由于革命的农民运动发展和农民采取行动的结果，在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同样也在西爪哇的农村，有些农民变为新中农。他们原来是雇农或贫农，由于斗争的结果，获得了耕地。例如，由于农民在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领导下进行要求批准农民耕种的原森林地为合法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沙卡兰登区的一位雇农U获得水田二百“冬巴克”，园地三百“冬巴克”。因此，U也从雇农上升为中农。

中农，无论是老中农或新中农，都非常需要在革命者领导下参加合作化运动，以便使他们的利益永远得到保障，使他们能永远战斗在革命的农民行列中。

贫农。贫农或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占有土地，但收成不足以维持生活。例如，沙卡兰登区芝达达普乡的贫农K只拥有一百“冬巴克”土地以及一把锄头、一把长刀、一把杈子和一把短刀等劳动工具。其收成仅够吃六个月，其余六个月需给人帮工。巴塔赫朗区巴勒达乡的贫农D按分成制耕种地主杜尔四百“巴达”的地^①。D有劳动工具锄头和镰刀各一把。每天吃木薯和玉米，很少吃上大米饭。

有些贫农无法筹款耕种自己的土地，就按照“出让制”把土地出让给中农、富农或地主。按照这种制度，这块土地便落入承让者的手里，就是说，在两三年内，他们完全不用向贫农缴租。两三年后，收成同有关贫农对分。可是，贫农经常缺少钱用，因此往往向掌握其土地的人借钱。最后，由于债台高筑，无法偿还，其出让的土地终于变为承让者所有。因此，出让制是一种土地典押制。

为了维持生活，贫农也给人帮工或从事各种副业。例如，勒巴克县瓦隆古农区的贫农A

① “巴达”为面积单位，一巴达约十四平方米。——译者注



拥有八块水田，他自耕五块，其余三块拿去抵押以获得资金来经营小买卖，为的是解决大米的不足。还有些人从事各种手工业，如做水果筐、绳索、蒸笼等等。还有许多人被迫离开农村到城市，到其他地区或岛屿去。他们希望在这些新地方能替地主或富农和其他剥削阶级以及替私人农场和国营农场干活，靠收割费、靠劳动工资生活。他们到城市当苦力、蹬三轮、当码头工人、卖冰水、卖草药等等，而年轻妇女因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有些经常被迫卖淫。他们新的工作地点也逃脱不了各种形式的剥削。当本乡收割季节到来时，许多人又回到家乡去。

雇农。雇农或农村无产阶级全无土地，完全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不是经常能找到帮人种地的活干，因此，他从事各种副业如捡卖柴火等等，特别在青黄不接时期。例如，尖美士县兰查赫区的雇农M没有土地，他仅有的劳动工具是一把锄头、一把长刀、一把镰刀和一把小刀。他的正业是帮人锄地，每天工资七十盾，得两顿饭吃。他的副业是用竹子编制筛子、蒸笼、罩子等等。通常雇农家庭在收割季节后三个月内每天只能吃上两顿米饭。在这之后，他们每天只吃一到两顿米饭，或者完全吃不上米饭，只吃玉米和木薯干。青黄不接时（其时间久暂决定于旱季时间的长短），雇农生活异常困难，三餐像鸡“扒啄”食物似的，找些水果、树叶等充饥，或者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因而他们的三餐是无保证的，有时吃得上饭，有时完全吃不上；找到什么能吃的就吃什么。雇农同贫农一样，经常离开农村到城市，到其他地方或岛屿去。例如许多住在万丹的雇农渡海到南苏门答腊的南榜去，有的每天从南安由到加拉旺，或者从新当劳勿到雅加达谋生，他们一点存粮也没有。收割季节时，许多人返回家乡，但是也有好些已经改行了。如南安山的东埃列丹沿海地区，许多雇农放弃种地，改行为渔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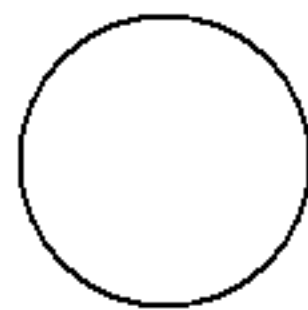
高利贷者。他们是以极高的利息放贷的有钱人。这种食利性借贷直接破坏农民的生产力，使农民负债累累，永无还清之日。

买青苗者。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利用农民亟需现款时，贱价预先购入农民还未成熟的庄稼，借此谋利。这样，他们就控制了农民的产品。

高利贷者和买青苗者的行为是直接破坏农民的生产力并加速农民破产过程的十分恶毒的剥削行为。

中间商人。他们是在收割季节收购农民的产品并向农民出售从城市运去的日用品的商人。在中间商人中间有“坏中间商人”，他借其垄断（专买者）地位，在商业经营中捞取互利。坏中间商人也采取买青苗和付定钱的办法控制和垄断农民（包括手工业者）的产品，并且以分期付款或赊卖的办法高价出售日用品给农民。

官僚资本家。农村官僚资本家利用公款并假借“国营商业公司”、“国营企业”和“国营农



場企业”等名义强迫农民把产品出售给城市官僚资本家的企业。他们同恶地主、坏中间商人和买青苗者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

农村土匪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农村为非作歹，保护剥削阶级首先是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利益。这一集团包括地主的恶管家、打手、恶棍等等。

手工业者和工匠在西瓜哇农村也有，例如：编织品、假面具、皮影人、雨伞、木屐等等的制造者，铁匠、木匠、缝衣匠等等。通常贫农和雇农也从事手工业或当工匠，以增加收入。

农村知识分子和艺人。农村知识分子首先包括小学教师。他们靠固定薪金生活，而在通货膨胀之下，其薪金之增加远远落后于物价的飞涨，因此，不少人为了增加收入也从事生产劳动、做小买卖等等。农村艺人的生活也不稳定。

有关农村阶级划分的描述说明农村劳动人民如何受到（1）恶地主、（2）高利贷者、（3）买青苗者、（4）官僚资本家、（5）坏中间商人、（6）农村土匪等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另外还有（7）坏官吏，即维护农村剥削阶级利益的乡吏，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剥削者。他们实际上是吮吸农民鲜血的农村七魔。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是恶地主兼高利贷者、买青苗者、官僚资本家及其他等，从而成了多面魔鬼。只有结束这些农村魔鬼的剥削和压迫，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否则，所谓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就是一句空话，更不用说要达到什么公正繁荣的社会了。

（二）对农民和渔民的各种剥削形式

调查结果加强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结论，即印度尼西亚有四个严重的封建主义特征：（1）地主对土地的垄断；（2）实物地租；（3）劳役地租；（4）扼杀农民的债务。西瓜哇调查中所接触到的事实说明，上述特点具有各种变形和综合形式。

1) 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尽管已经有了《土地基本法令》，但是农村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的过程，依然通过各种典押制度（普通典押、定期卖地等）、借贷、出让制、冒名顶替制等等不断发生。斗旺县加朗农卡尔区的地主D占有十一公顷的水田和杂粮地。其中一部分是夺自农民A和I，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务。

2) 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是地租。流行得最广的是各种形式的实物地租，如对分制、一四制、二一制、三二制等等。

对分制：收成基本上分为两份，一份归土地所有者，一份归佃户。可是在赋税、种子、摊派等方面有各种规定。有的规定土地所有者所得部分是净收入，即一切开支须由佃户负



担，有的也规定开支由双方共同负担（如巴塔赫朗区的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一四制：按照这一制度，佃户实质上只得收成的五分之一。这就是说，土地所有者得五分之三，佃户得五分之一，其余的五分之一归“包工”。“包工”是地主所信任的贫农或雇农，他们在田里从事非主要劳动，如修田埂、播种和除草。

二一制：收成分配如下：两份归佃户，一份归土地所有者。

三二制：收成分配如下：两份归土地所有者，三份归佃户。

有的地主把实物地租定为死租，例如一公顷地每年交租一“查恩”十二“格登”（一“查恩”等于一百“格登”，一“格登”谷约合五至六升米）。如因天灾、虫害等等而失收，则损失全部由佃户负责。

除实物地租形式外，还有劳役地租，即更具有农奴性质的地租形式。例如班特克朗县的巴尤秘鲁，有的农民种地主八块地。其中三块实行对分制，但是其余五块地的全部收成归地主所有。因此，农民在这五块土地上的劳动无非是采取劳役形式的额外地租。

还有货币地租。如在勒马哈邦区，一“巴务”（零点七公顷）土地，每年地租六万盾。

由于地租是地主的主要剥削来源，因此不论是在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范围以内或以外，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农民要求减租的斗争。可以说，在西瓜哇，所有按照《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签订的收成分配合同之所以能被贯彻执行，都是由于农民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结果。

3) 在经济一般走向下坡路和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对农民的剥削也更加厉害。而最为突出的是，利用通货膨胀、物价不稳，以及雇农、贫农和中农因生产上和消费上的需要而急需用钱等情况直接牟利的各种剥削形式。这些剥削形式是：

(1) **高利贷的贷款**每月利息达百分之几百，并且经常是利滚利。例如兰查赫区卡翁拉朗乡的高利贷者 H.S.，贷款一百盾，一个月后必须付还四百盾。巴塔赫朗区芝波哥乡有一名前马斯友美党员的地主兼高利贷者 H.A.，贷款一千盾，规定须在十一个星期内还清，每星期摊还本息一百五十盾。有的对农民和市场的小商贩贷款，十二小时收利息百分之四。瓦纳拉查区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借出一万盾，一个收割季节（六个月）内的利息是一担谷。如到期利息无力偿还，则利息算作本金（利滚利）。加朗农卡尔区某一个乡里有个高利贷者借出四千盾，言明须以实物（木薯）付还。收割季节后，高利贷者不要木薯，改要现款，其数额则大大超过原来的贷款。农民无力付还这笔债款，结果把自己的四十“巴达”土地和房子交给该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款实际上是扼杀农民的异常残酷的剥削。

(2) **买青卖青制**不仅包括农产品，也包括手工业产品以至雇农的劳力。在苏甲巫眉县沙



卡兰登区，一九六三年在收割前两个月，按买青苗的方式购买稻谷，每一百公斤是一千盾。到收割季节时，谷价则每一百公斤是二千盾。今年，买青苗者以每一百公斤谷三千盾的价格购买青苗，而在目前青黄不接时的谷价每一百公斤八千五百盾至一万盾。由于买青苗者在上一年就控制了产品，因此他就能把按每一百公斤一千盾买下的稻谷（一九六三年的青苗价）以青黄不接时期的价格（八千五百盾至一万盾）卖出，因而他所获的盈利是很大的。

买青苗的范围也包括玉米和水果，如桔子、红毛丹、香蕉等等，甚至也包括某一雇农的劳力。青黄不接时期，雇农没有工作做，生活困难。他按每日六十盾预领将来收割季节时干活的工资。而收割季节时每日工资则是一百五十盾。

(3) 中间商人所实行的预购制。定钱可用实物或现金支付。预购制的目的在于控制生产产品，无论是农产品如稻谷、椰子、棕櫚糖、玉米和其他杂粮，或者是手工业品如制革原料、席子以及其他编织品等等。例如，棕櫚糖中间商人以每包棕櫚糖（约一又四分之三公斤）七十盾至八十盾的价格预购，而市价则是每包一百二十五盾至一百三十盾。预购制通常也采取供应手工业者所需原料的形式。

(4) 各种典押。抵押土地一般是暗中进行的，如所谓“定期卖地”。果树和家禽等也常作抵押。例如芝芒奇斯区苏卡玛茹乡，果树以五百盾抵押出去，日后果树的收成由债主和债户对分。如果收成值二千盾，原主得一千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这么的摆脱了典押的束缚。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一束缚，他还得偿还五百盾的债务。有时果树的收成原主完全分不到，全部由承典人拿去。由于农民经常无法按时赎回押品，结果其抵押之土地或果树就变成这些承典人的财产，这些人通常是地主、高利贷者或中间商人。

(5) 坏中间商人任意抬高卖给农民的日用品价格。例如一块布值七百五十盾，卖给农民一千盾，并且必须在收割季节后四十天以一百公斤谷偿还，而该一百公斤谷价在青黄不接时期已是八千五百盾。

有关实质上反映各种债务形式的典押、买青卖青、预购制及其他剥削方式的调查材料说明，农民交付的利息，其差别是十分巨大的。不仅乡和区之间，甚至同一个乡，其利息也是不同的。这证明了农民如何受到承典人、买青苗者、高利贷者和中间商人等肆无忌惮的剥削。由于农民在购买力日益急剧下降，因此，一有需要（包括最起码的需要，更不用说遇到特殊的事情如割礼、红白事等等），农民就被迫匆忙地把仅有的财产典押出去，以取得贷款。农民的经济情况越紧张，食利者就越猖狂。

(6) 其他各种形式的债务。其中有用土地抵押的。如果债务无法按期偿还，土地就成为债权人的财产。



4) 由于买青苗制和预购制的施行以及农民无法偿还各项债务，结果造成对农村产品的垄断，因而大大压低了农民生产产品的销售价格。这种垄断活动，一般是由坏中间商人、以国营商业公司和国营农场企业“老板”名义进行活动的官僚资本家或者剥削者的冒牌“合作社”如“稻谷收购合作社”（人民通常称之为“稻谷掠夺者合作社”）和海洋渔业合作社干的。

这一来，从农民播种稻谷到收成，当他们打算出售产品并购买日常用品和再生产的用品（如农具、肥料等）时，他们都成了剥削对象。因此，农民的生产条件完全为地主、高利贷者、买青苗者、官僚资本家和中间商人所控制。

5) 在沿海地区，劳动渔民遭到渔船主或渔业主的封建性剥削，至今还没有稍为公平处理渔民产品的分配问题的法令。现行的法令十分复杂，渔业主有许多空子可钻。例如在东埃列丹区，如果一只渔船捕捞的鱼值一万盾，一名渔工则仅得二百八十九点二十盾，而且还未扣除船上的餐费。因而一名渔工的所得还不到全船收入的百分之三。

而渔船主或渔业主的所得部分虽然名义上约百分之十五，但实质上约占全部收获的百分之四十。因为各种扣除，如渔工分期摊还渔船主的债务（占百分之十，不管有关的渔工有没有欠债）以及五花八门的“储蓄金”和强迫储蓄（占百分之十二）等，实际上都进了渔船主的腰包。所谓“储蓄金”的扣除也意味着渔船主对渔工的束缚，因为渔船主只在他规定的时间内才交还（不是全部交还！）这些“储蓄金”，但一旦渔工做了任何不受渔船主所欢迎的事，那么渔工对这些“储蓄金”的权利就被宣布取消。

此外，渔民也受到买青苗者、高利贷者、官僚资本家和中间商人的剥削。鱼的拍卖完全受“合作社”控制，而“合作社”的成员只限于渔船主。渔船主也通过所谓“人民食盐合作社”垄断食盐的供应和买卖。“人民食盐合作社”进行各种罪恶活动，如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扼杀人民的食盐业，规定昂贵的盐价，等等。渔船主剥削的多面性是十分突出的，他们通过占有渔船和耕地，控制鱼和盐的买卖，控制“合作社”和放高利贷等办法来进行各种剥削。

6) 在林区和农场区，农民在那里的一部分土地上已耕种了许多年，他们经常面临被赶出耕地和被夺回耕地的威胁。他们中许多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以前就在那些土地上耕作。革命时期，他们保证了军队、民兵和难民等的粮食供应。以前，农场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印度尼西亚农村经济的形式。自从这些帝国主义企业大部分被接管后，官僚资本家代替了帝国主义。因为接管后帝国主义同我们农场的关系并没有中断，农场产品的传统市场依然被帝国主义所操纵，而控制着农产品的国营商业公司和国营农场企业是掌握在官僚资本家手中，他们依然依靠帝国主义市场。因此，反对官僚资本家的斗争也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



斗争。同时，在确定哪些人是农村官僚资本家时，我们必须更加谨慎。例如，林区的监工经常滥用其地位向农民敲榨勒索，农民要开种一公顷土地，得向监工缴纳为数达四千盾的“茶钱”。监工这种行为当然是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但是，仅仅这种行为，那是不足以给监工戴上“官僚资本家”的帽子的。如果监工或其他林区官员利用贪污的钱去开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如锯木厂），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场企业而占有了生产资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他就属于道地的官僚资本家。如果监工或林区官员把大量林区土地出租给农民，那他就可以称为官僚地主。

7) 除了上述的剥削形式之外，还有许多五花八门的额外剥削形式，如土产捐、无偿劳役、摊派、当乡长差役、农民家或乡长家办酒席时得给乡长送礼、农民宰牲口时给乡长送上好的肉（颈部的肉或里儿）、滥用“互助”名义对农民实行强迫劳动、给“民防”捐献、巡夜、参加人民自卫团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捐献或强迫劳役。“互助”这个字眼如果具有民主的内容本来是好的，但在还是半封建和专制的农村社会里，这个字眼极易被滥用来掩盖剥削和压迫。只有革命的农民运动才能反对这种滥用“互助”字眼的行为。

8) 被调查的西瓜哇某些地区也有外裔（华裔）居民，但在农民中却毫无种族主义情绪。一九六三年五月西瓜哇发生种族主义骚乱时，参与者是在城市流氓协助下的反革命的青年和大学生，农民则没有参加。种族主义情绪只存于剥削阶级当中，他们散布种族主义来转移农民对真正的敌人即农村魔鬼的注意力。而且显然，同外裔农民结合的工作很久以来已在顺利地进行了。许多外裔农民在农村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里起积极的作用，有些人还当了领导人。农民所面临的问题是剥削。在这方面，农民，包括如在文登区的华裔农民，觉得土著地主剥削之严重非但不下于反而时常更甚于一小撮外裔地主或中间商人。土著剥削者具有进行剥削的特殊手段，如封建习俗、滥用宗教、利用亲戚关系等等。

消灭区级地方的外裔零售商显然加强了高利贷者和中间商人（他们一般也由土著地主兼）的垄断地位，并且大大阻碍城乡贸易。去年种族主义分子破坏机动车辆，取消市场之间短程火车线路的政策以及不去妥善解决和处理运输工具的配件等活动，更加打乱了城乡之间物资的流通。运输困难使小商贩无法到城市去，结果给中间商人和官僚资本家造成更多的垄断市场的机会。

这就是调查材料提供的关于农民和渔民在封建和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下受苦受难的图景。这一图景充分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特别是右翼社会党的胡言乱语，说什么印度尼西亚的封建剥削似乎并不太厉害，因为“不存在”像印度、拉丁美洲、旧中国等那样拥有数千公顷土地的大地主。而实际上，地主占有的土地相对地少，这正是他们极力加紧剥削的一个因素。



調查材料展示的图景說明，印度尼西亚农民受到的剝削是极其严重的，而且是一层又一层的。这一图景再次更加肯定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立場，即印度尼西亚革命首先是农民革命，不把农民从許多世紀的剝削中解放出来，就談不上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更不用說革命第二阶段的胜利了。

(三) 农村人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經濟发展的趋势

根据調查的結果，也可以了解到农村各个階級和阶层的生活水平。从牙律县瓦納拉查区德卡尔沙里乡的雇农、貧农、中农和富农的收支表（見第 53 頁附录二），可以看出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概貌。

西瓜哇的雇农和貧农的生活水平很低，而且不断地下降。他們的住宅、家具和衣服很缺，而且很坏。雇农和貧农經常沒有衣服更換，因此他們挖苦說，农村富裕人家穿“禾里打”^①衣服，而他們穿的是“佐里打”^②，即“每次出門，老是那一套衣服”的意思；或者說，他們的衣服像“哇揚”^③戏裝，意思是說，早晚都是那一套，在家和外出都是那一套，也就是說，从不更換。他們的糧食也很缺，如果不是收割的季节，很少吃米飯，要是吃米飯，也是一天一頓，尤其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而对漁民來說，就是在西季风（大风）的季节。用漁民的話來說，就是“挂船槳，卖花裙”，意思是說，沒有工作做，只好卖衣裳。

中农的生活也日益困难，虽然他們一般拥有能够生产滿足他們对糧食的基本需要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在調查期間遇見的中农，虽然他們仍有存粮，但一天只吃一頓，以防止在收获前把存粮吃光而不得不把他們仅有的財物变卖或抵押。

相反的，地主和富农在任何季节都照样过着奢侈的生活。正是这些阶层，他們近几年来在农村中盖了許多新的樓房，他們拥有华丽的家具和奢侈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电唱机和“呀—哟—哟”歌曲^④的唱片，致使帝国主义“文化”开始把农村搞得乱糟糟。雇农和貧农同地主和富农之間的生活水平的悬殊加剧了农村剝削階級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

手工艺者和工匠的生活水平也下降，領固定薪金的学校教师也是如此，因为基本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一位教师的薪金有时比一个鋤地工人的工資还低，而教师却需要更高的生活标准。

① 即人造毛料。——譯者注

② 巽达語縮写。——譯者注

③ 爪哇的一种古典戏曲。——譯者注

④ 指黄色歌曲。——譯者注



农村大多数居民，即雇农、贫农、而且还有中农，以及农村手工艺者、知识分子、艺人等的生活水平的困苦和下降，清楚地证明：只要农村封建主义残余还没有消灭干净，就不可能有广阔和稳定的全国性市场，而这种市场是发展现代化民族工业的绝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这样，那些口头谈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而闭口不谈消灭封建主义残余的人是多么荒唐。

构成农村主要生产力的各个阶级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导致农业生产力的下降。除了由于缺乏粮食而引起贫雇农的劳动能力下降外，贫农和中农支付生产费用的能力也不断下降。这种情况直接危害到农业生产本身的过程。

农民被迫去找副业做，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副业甚至成为主要劳动。都市化（即农村居民流入城市）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城市未必能找到劳动场所，从而增加了城市中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人数。

调查结果证明，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的结果，而这种下降过程由于最近（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经济恐怖条例颁布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而日益加速。

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散布肤浅和反动的观点，如沙特里教授认为，农民不受通货膨胀的损害，因为他们不属于固定收入集团。与此相反，事实是：直接成为物价上涨的受害者的正是农民，特别是构成农村居民的大多数的雇农和贫农，因为他们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他们的大部分主要必需品。

农民和渔民无力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这迫使他们更加经常地借钱或卖青苗。在沒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借债和卖青苗已经是严重地被剥削；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现金借债或卖青苗而必须以很高的利息还债或在物价高得很厉害的时候以实物偿还，借债和卖青苗就更具有被压榨的性质。

通货膨胀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造成买青苗制度的盛行，以及坏中间商人通过独占性买卖的方式更紧地掐着生产者的脖子。

上述情况迫使贫农和一部分中农抵押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实际上往往为富农或地主所占有。这样一来，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加强了土地权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的过程。许多富农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发展成为地主。

由于上述因素，并且在通货膨胀以及《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执行陷于停滞的情况下，可以得出结论：农村封建主义残余的剥削不是减轻，而是更加重了。

资本主义因素也已经在农村各地成长起来，特别是在富农和地主中间。地主经常通过充当中间商人的活动，把封建剥削同资本主义剥削结合起来。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地主也力



图把雇佣劳动力的使用来代替分成制，这件事情遭到贫农和雇农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使他们的实际收入进一步下降。也有的地主把他们的活动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方面去。他们进行这些活动，其原因之一是想要逃避《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以及农民斗争。

为了克服贫困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农村的其他阶级也有转移到商品生产或交换方面去的趋势，如转移到手工业、小买卖等方面去。对于完全没有资本的雇农和贫农，富裕阶级给他们的活动提供资本，主要是通过预借、押地借债和其他资本主义剥削方式。

虽然这些资本主义因素不断自发地出现，但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阻挠的情况下，这种资本主义关系是不能够繁荣滋长和大大发展起来的。同时，已经把资本投在城市工商业方面去的地主，一般都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地主身份，因此他们有一只脚是资本主义，另一只脚是封建主义，他们悬荡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在富农中间存在着转向资本主义的趋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以封建主义方式占有土地的强烈趋势。甚至城市中的许多官僚资本家也购买土地，变成地主。这种趋势（即以封建方式占有土地）也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因为城市的新财主们把大量的钱财投在占有土地方面，使他们的钱财变成实际价值。这样一来，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封建官僚资本家**。

殖民地经济结构，即帝国主义经济和封建主义经济的混合物，是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的剥削仍然深入到农村，因为过去的帝国主义企业（主要是“五大洋行”）现在基本上已为官僚资本家所控制，而这些官僚资本家通过使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仍然依赖帝国主义市场的进出口贸易和金融制度来继续进行剥削。

正如在调查中所发现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滞现象，证明了解放印度尼西亚生产力的唯一方法是：在消灭帝国主义残余和封建主义残余的过程中，粉碎所有的农村魔鬼，以便能够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三、农村魔鬼的政权和农民反对他们的斗争

农村封建主义残余在政治方面表现在农村政权制度，这种制度将乡长置于独一无二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的费用全部由农村居民负担。由于这种农村政权制度，农村政权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长及其上级统治者所属的政治派别。

从荷兰和日本殖民主义时期直到现在，西瓜哇的乡政权制度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



与农村统治阶级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是相一致的。非根本性的小变化是发生了的。例如，如果过去殖民主义时期乡长只能由土地所有者选举，现在则由十八岁以上的全体男女成年居民选举；如果过去公开革命的人不可能成为乡长或其他乡吏，现在则有可能；如果过去妇女被禁止担任乡吏的职务，不久以前已经可以担任了，这是由于争取妇女解放的革命斗争的结果。

西爪哇乡政府成员通常包括：乡长、副乡长、一名或两名书记员、水利官、村长（或者是居民点的代表或负责人，人数按照村的数目而定）、乡村警察和伊斯兰教宗教官。

乡村公务员的人数按照乡村的面积和居民人数而定。例如：斗旺县卡朗农卡尔区比朗沙里乡有十九名乡村公务员，包括：乡长一名、书记员两名、村长十名、伊斯兰教宗教官一名、乡村警察五名。

乡村公务员从以下来源取得收入：

（甲）在井里汶、古宁岸、马查冷加、加拉旺、苏邦等县和东勃良安的一些地方，乡长所得的乡吏俸给地，大约是五至三十公顷，副乡长和书记员二点五至七公顷，其他乡吏一至二公顷。有的地方，除了乡吏俸给地之外，他们还从下面的“波罗哥罗”制度获得附加的收入，如：摊派，无偿劳动和其他征收，即作为乡长薪俸的税收抽成，各种证书费，占买卖额的百分之十的见证费，结婚、离婚和复婚证书费，村民宰杀牲口缴纳一部分肉（通常是最好的部分）以及其他等等。

（乙）在其他许多县，没有分给乡吏俸给地。乡村公务员从上述（甲）项中的“波罗哥罗”和其他征收获得收入。

例如，双木丹县芝马拉加区哈乌尔哥宁乡实行摊派，具体分配如下：

(1) 乡长得谷.....	2,000 公斤
(2) 书记员得谷.....	1,200 公斤
(3) 长者三人得谷.....	2,100 公斤
(4) 水利官得谷.....	700 公斤
(5) 乡村警察得谷.....	700 公斤
(6) 伊斯兰教宗教官得谷.....	350 公斤
	—————
	7,050 公斤

这些实际上是通过封建性剥削而获得的收入来源使乡政府官员同地主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政治上他们也经常直接维护恶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的政治利益。唯有通过强大



的农民运动才能实现乡政权的民主化，这首先必须是消灭乡政府官员所进行的封建剥削。迅速建立第三级自治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从一九六三年年中起，西爪哇各个乡村就成立了“民防”，其组成通常包括：每一个“居民委员会”有一个班（由五至十人组成）的“民防”部队，由班长领导；农村“民防”的指挥员是一名乡村警察；“民防”部队由农村青年（包括前“人民自卫团”成员）组成；“民防”的教官是“乡村建设军官组织”的成员（“乡村建设军官组织”的陆军士官）。“民防”的正式任务是处理有关治安方面的问题，但事实上如果在“民防”中没有进步力量，它就被用来监视和镇压农民运动。

例如，牙律县瓦纳拉查区德卡尔沙里乡的“民防”组成如下：顾问是乡长；指挥员是乡村警察；副指挥员是青年；负责宣传教育的是“民族阵线”；部队由二十四名前“人民自卫团”成员组成。

西爪哇农民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反对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方面，以及在一部分农村发动民主改革活动（如打倒反动乡长并代之以进步的或者比较进步的乡长）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乡长或其他乡村公务员参加到革命队伍里面来，这就使有关的乡政府发生有利于农民的变化。

从乡长及其他农村公务员所属的政治派别以及我们国内政权的实质来看，目前乡政府可以分为：

（甲）反动的乡政府。它完全成为地主、高利贷者、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农村魔鬼的工具。

（乙）具有两个方面（即拥护人民的一面和反对人民的一面）的乡政府。属于这个范畴的是拥有进步乡长的乡政府。尽管某一个乡政府中拥护人民的一面是多么强大，它还不能被称为“人民政府”，因为它仍受到其上级（区、县等级）政府的限制。乡政府也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具有两个方面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国家政权的限制。

目前的乡政府制度是半封建制度，按照这个制度，乡长成了农村中唯一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如此，但并不是所有的乡长都代表地主分子的利益的。他们的阶级成份有的是地主（在当乡长以前或以后），有的是富农，有的是中农；他们的政治态度，有的是右，有的是中间，有的是左。

农民对乡政府采取不同的态度，主要是取决于有关乡长的政治态度。农民很敏锐地注视着乡吏的一举一动，他们准确地知道谁是坏的，谁是比较好的，谁是好的。



由于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乡长和其他乡村公务员都是代表剥削分子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利益，因此，推动一部分乡吏进步，以便尽可能地帮助农民反对恶地主、高利贷者、官僚资本家和农民的其他敌人的斗争，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乡吏就必须加以撤换。

好的乡吏也能拥护和支持农民提出的乡政府民主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也愿意支持那些没有获得乡吏俸给地的或者其乡吏俸给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乡吏，向政府提出发给补贴金的要求。

反动的乡长不仅使乡政权成为帮助地主、高利贷者、官僚资本家及其他剥削分子和压迫者的工具，而且还通过这个政权直接压迫农民，使自己发财致富。因此，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民反对他们的敌人的《政治宣言》派的乡政府，这对农民是有很密切的利害关系的。

但是，要把反动分子从他在乡政府中的统治地位上推下来，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为数众多的农村魔鬼将会拼命地维持这种地位。农村魔鬼将运用他们的权势和动员他们的力量来影响其上级统治者，以维持反人民和反对《政治宣言》的反动乡长的地位。因此，农民要求撤换坏乡长的斗争必须考虑到：（甲）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否一致；（乙）领导的思想意志是否一致；（丙）上级统治者的态度如何。对于这些斗争，上级组织当然会好好地进行领导。

根据西瓜哇的经验，如果我们事前在政治上打倒反动乡长，例如：揭露他反对《政治宣言》、破坏《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欺骗人民、贪污等行径，那么，要求撤换坏乡长的斗争是能够取得成果的。

在各地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知道乡长的舞弊行为的农民，在农村会议上要求乡长对他的行为负责。如果在农村会议上农民团结一致，坚决地进行斗争，反动的乡长就会被迫对他的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负责，这样一来，他的舞弊行为就暴露在农民面前了。随后，会议就要求这个乡长停职，并且要求区长满足会议的这个正当要求。例如，苏甲武眉县沙卡兰登区的某一个乡和其他地方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如果上级统治者不接受人民提出的要求，没有停止乡长职务，那么，团结一致的人民就抵制乡长，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实现为止。在不举行乡村会议的情况下，农民就通过他们的组织（如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民族阵线等）提出停止坏乡长的职务的要求。这样的斗争有的已经成功，例如，在文登县勒哥格区的某一个乡，根据人民的要求，乡长被迫向区长“交还他的委任状”，因为事实证明他舞弊。除了注意上述条件外，领导必须注意不要使斗争无限期地拖下去。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根据西瓜哇农民的经验，必须采取这种方式撤换的只是



那些其罪行已經暴露在人民面前的乡长。对于那些不是太坏的乡长，要求他們在人民面前保证改好就够了。

在某些乡政府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各个乡里面，由于实际当权的是农村魔鬼，因此，在打倒农村反动政权方面，十分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倒恶地主，其方法是：（甲）揭露恶地主破坏《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执行；（乙）揭露他們贪污和欺騙人民的其他行为；（丙）揭露他們的不道德行为（通常这种事情多得很）；（丁）揭露那些仍然继续执行已被取締的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政策，以及过去与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有关系，或者与反革命的种族主义活动有关系的恶地主。

光是农民敢于反对恶地主这点就改变了公众对地主的看法。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的每一个胜利都将进一步打下地主的“威风”，并且逐渐使不反动的农村执政者脱离恶地主的影响。

反动分子竭力防止进步人士当选为乡长，其办法是：在一个由反人民的官員組成的委员会（由区长或在仍有郡长一职时由郡长任主席）主持下进行的候选人考試中，提出各种刁难問題，使进步的候选人落选。

由此可見，要爭取建立比較民主的乡政府，也就有必要爭取修改乡长选举条例，使得关于以“納沙貢”为核心的候选人考試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的組成的規定也列入这个条例。有必要提出要求應該圍繞着民主乡政权和苏加諾总统的“九篇訓詞”的問題来进行考試，而不是胡扯与乡政权和《政治宣言》毫无关系的、旨在使进步的候选人落选而故意提出的問題。

提出要求作上述修改，并不意味着放弃通过完全撤銷殖民主义法令即《土著地方行政法》和建立民主的三級自治区的方法来改变乡政府的組成这一原則性的要求。只要《土著地方行政法》沒有全部撤銷，这些要求还得提出来。必須通过群众团体提出要求，通过一級和二級政府，通过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来很好地进行要求撤銷《土著地方行政法》的斗争。同时，必須推动县长和市长們禁止在选举乡长时提名前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青年运动协会成員，以及前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約章”集团成員为候选人。

为了由雇农、貧农和中农組成的大多数乡村居民的利益，共产党人必須坚决斗争，爭取真正的《政治宣言》派人士担任乡长，使靠农民供养的乡政府不再像許多世紀以来直至今天那样成为压迫农民的工具。

在西爪哇調查期間所获得的經驗和搜集的材料证明，在选举乡长时，在确定他們提出的候选人的問題上，党内和革命团体內部的一致以及《政治宣言》派人士之間的一致，是很重要的。在确定候选人問題上不一致，就会导致农民和其他农村劳动人民的損失，譬如說，导致



《政治宣言》派的候选人因其选民群众的分散而遭到失败的后果。

在议会选举中，选民不是直接选举某一名候选人，乡长选举则不相同，选民是直接选举候选人。因此被提名的候选人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否最大限度地把选民动员起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要求每一个《政治宣言》派的候选人，不管他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都向选举他的农民作出关于他当选后将来采取哪些措施的保证，就像一位好乡长所应该做的那样。

农民根据他们的亲身经验是能够把好乡长和坏乡长区别开来的。好乡长是这样的人：（1）发扬农村民主，定期同各人民团体进行协商，讨论农村中的重大问题；（2）减轻“波罗哥罗”负担，如减轻或免除中农以下的摊派义务、强迫性的和非法的征收，相反的，增加地主和富农的负担；（3）贯彻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以农民的利益为重；（4）利用政权来为人民服务；（5）关心居民的生活困难，并努力去克服它们；（6）活跃以“纳沙贡”为核心的民族阵线；（7）注意使人民合作社办好，并协助农民提高生产；（8）开展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的活动。

坏乡长是这样的人：（1）限制民主，不愿意同各人民团体协商解决农村中的重大问题；（2）一向竭力加紧征收各种“波罗哥罗”，如摊派以及其他强迫性的和非法的征收；（3）不贯彻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帮助地主对付农民的斗争；（4）利用政权来加紧进行封建剥削，欺诈和贪污，如侵吞乡政府的现款、土产税等；（5）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困难；（6）听任民族阵线陷于停滞状态，并且反对“纳沙贡”原则；（7）败坏合作社的名声，以牟取私利；（8）听任人民文化受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摧残。

在《战时戒严令》实施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家，在《战时戒严令》被撤销后就力图通过控制农村，通过成立实际上是驾凌于乡政府之上的军事统治的所谓“乡村建设军官组织”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是使民政秩序“战时戒严化”的一种企图。

在许多农村，事实证明，“保安”人员越多，这个农村就越不安宁，因为“保安”人员显然维护各种坏的措施。许多农村的“乡村建设军官组织”恫吓农民不要反对地主，参与对农民加紧进行强迫性的和非法的征收，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使农民回忆起日本占领时期“警防团”的罪行，导致人民同武装部队的关系的疏远。在西爪哇成立控制乡政府的“乡村建设军官组织”，不仅没有法律根据，而且从现行的地方政府组成法令来看也是不必要的。在中央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之后更是这样。如果需要监督，那么，从上面（即由区政府和县政府）和从下面（即由供养乡政府的、有权选举并在发生违法乱纪行为时有权罢免乡长的人民）对乡政府进行监督就够了。



因此，在西爪哇被农民称为“乡村破坏军官组织”的“乡村建设军官组织”必须加以解散。要求解散“乡村建设军官组织”的斗争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甲）由各群众团体，特别是农民群众团体，提出群众性的要求。这个斗争必须同一般不喜欢被“战时戒严化”的民政秩序的乡村官吏和警察组织一道来进行；（乙）通过第二级和第一级地方议会并在“五位一体”的讲坛上提出要求；（丙）考虑到这个问题同全国性的反动政策有关系，因此也有必要在互助合作国会、最高咨询委员会等中央一级机关内进行活动。

西爪哇以外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必须注意这种“乡村建设军官组织”型的新《战时戒严令》，因为在西爪哇的这种试验一旦成功，那么，它的策划人就要使印度尼西亚所有的乡都“乡村建设军官组织”化，这对印度尼西亚的农民和民主的的确确是一场灾祸。

四、农民在经济方面反对农村魔鬼的斗争

虽然许多乡政权仍在坏官吏的手中，但是，革命农民运动的经验证明，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并且有了领导的农民力量，是有能力在政治或经济方面给予农村魔鬼以十分沉重的打击的。

调查结果所提供的许多有关农村经济情况的材料表明，西爪哇的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斗争对象。由于有了粉碎农村魔鬼的正确路线和领导，农民的精神十分振奋，目前农民的英勇气概日益昂扬。在西爪哇所有的县，农民进行了基本上是以“六好运动”（1、减租；2、减息；3、提高雇工费；4、增加农业生产；5、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6、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为中心的斗争。

单方面执行《土地基本法令》（即不缴租给那些抗拒《土地基本法令》的恶地主）的斗争开始发展，而且有条件在一九六四年的收获季节扩展这个斗争。此外，控诉和揭发在执行《土地基本法令》中所发生的舞弊行为的斗争已在进行。这表明农民的斗争已经提高，即从要求执行的阶段提高到揭发在执行中发生的舞弊行为的进攻阶段，如在万隆、斗旺、尖美士、牙律、加拉旺等地的一些县里所发生的那样。

单方面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斗争也开始扩展了。在今年的收获季节里，单方面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斗争的要求必须是，最低限度百分之六十归佃农，余数分为两半，政府和地主各得一半。这种斗争是可以进一步扩展的。

虽然《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并不是旨在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占有制度和封建剥削，但是，如果这两个法令在有利于农民的情况下坚决地加以贯彻执行，那就能够在经



济上给予地主以打击，并且给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把超过限额的土地分配给佃农是能够部分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的，而比较公平合理的农产品分配办法则会减轻地租剥削，这样，农民的生产力也就会提高。

迄今为止，有很大局限性的土地改革（根据《土地基本法令》，它并没有消灭封建残余，只不过是限制它）的贯彻执行也很不够。但是，即使这样，只要农民仍然是高利贷者、买青苗者和其他农村魔鬼的牺牲品，这种贯彻执行的一切较好的效果也就会立即化为乌有，因为佃农刚刚获得的耕地将会以这一种或那一种不公开的形式再落到地主、富农、放债者等的手里。

目前，由于粮食困难（其原因之一是久旱使缺粮情况更进一步恶化），借粮斗争或“波波戈”斗争（即向有余粮的地主和富农要求借稻谷、大米或其他粮食的斗争）扩展了。这些斗争的精神实质是要求权利而不是乞求，它们具有巨大的动员力量，冷加士冻鹿（加拉旺）、苏邦、万隆等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斗争的对象准确，就是说，地主和富农的余粮是通过过分的剥削而取得的，那么，这种斗争就会获得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并且会挫败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阴谋活动。实际上，农民所要求的无非是他们的权利，而他们要求借的只不过是地主通过对分制、买青苗、放债等方式榨取得来的农民劳动成果的极小一部分。

林场和农场地区的农民耕地必须加以保卫，必须反对官僚资本家和坏官吏赶走农民和收回他们的耕地的活动。此外，有必要注意的是，农民保卫他们在林场和农场地区的耕地的斗争必须同反对地主的斗争相平衡。因为一般地说，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同地主之间而不是同林业局或国营农场企业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中，农民的主要敌人不是农场或林场，而是地主。

要求减低游资贷款的利息也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高利贷者或游资放债者的十分苛刻的利息，再加上买青苗制度，严重地压榨着农民，使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各乡的经验证明，通过农民要求减息的斗争，是可以迫使游资放债者减低他们的利息的。同时，这种斗争还必须同互助活动和信贷（存款和贷款）合作社同时进行，以满足农民对现款的需要。

还有许多问题可以成为农民斗争的对象。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情况的科学的调查大大有助于揭露农村的实际情况。只有旨在为农民革命斗争服务，把斗争同科学结合起来，从而找到更加准确的斗争对象，这种科学的调查才有用处。这样，斗争就会迅速提高，并且具有创造性，而不光是经验主义，重复过去的经验，没有质的提高。

要使农民和渔民看清他们的敌人并了解到“对农民所做的一切坏事”都是来自农村魔鬼，



农民和渔民在经济方面反对农村魔鬼的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只要下定“为农民做一切好事”的决心，他们就会加强同农民的结合，并且同农民一道把粉碎农村魔鬼的攻势推向前进。只有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地维护农民的看法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日常利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农民的结合才能得到加强。

五、农民和渔民粉碎“农村七魔”的组织程度和斗争

(一) 关于农村分类的重要性

在西爪哇，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老早就已经组织起来。西爪哇人口总数约有一千八百七十三万九千，其中百分之七十或一千三百一十一万七千三百人是农民。成年农民估计有六百五十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人。在这个数目中，有组织的农民有一百八十一万零七百五十名，他们参加了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印度尼西亚民族农民协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农民协会、全印度尼西亚农民运动协会、农民协会等农民群众团体。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作为革命的农民群众团体，团结了一百二十五万零七百五十名农民或占成年农民的百分之十九。这样，西爪哇有组织的农民大部分已经加入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

西爪哇地区有二十三个县和市，三百四十七个区和三千七百五十六个农业乡。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支会分布在二千六百七十五个农业乡或约占全部农业乡的百分之七十。在西爪哇的三百四十七个农业区中，有三百二十一个区或约占百分之九十的区已经成立了分支，而在所有的第二级地区（县和市）都已经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分会。

到目前为止，西爪哇还有一千零八十个乡完全没有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其余的乡一般属于第四类，一部分属于第三类或第二类，一小部分乡属于第一类。从农民的组织程度来看，西爪哇省属于第四类，因为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里面的成年农民还不到百分之二十五。

在没有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乡，如果在这些乡已经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对农民的革命领导权仍然是有保证的。在许多没有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乡，都已经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人民青年团或其他革命群众团体。

作为革命农民团体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在各乡的成立，对在农村建立农民反封建统一战线及保证农民反对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的斗争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整个西爪哇的漁民为数不小，他們的組織程度一般不高。他們也成了遭受在沿海地区横行霸道的农村魔鬼的严重剝削的牺牲品。

农村分类的确定有很重大的意义，这就能够具体地确定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成員和組織的对象。这也会有助于推动各乡、区、县之間和省之間进行发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成員和組織的社会主义竞赛，从而成为使党的四年計划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計划获得成功的强大推动力。从整个西爪哇來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当前的任务是提高农民的組織程度，爭取从第四类提高到第三类。

（二）关于农民干部和漁民干部問題

在弄清楚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在农村所必須完成的組織任务之后，这个任务的实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問題，即干部的挑选、配备、教育、提拔和調动的問題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問題。

經驗证明，多种多样形式的并以“六好运动”为中心的农民斗争，必須由具有更勇敢、更机智、更警惕、更坚决、更埋头苦干的“五更”精神的农民干部和漁民干部来领导。尤其是在雇农和貧农所进行的斗争十分激烈的地方，那就更需要具备上述条件的领导。

党在西爪哇农民和漁民中間工作的干部，一般是具备农民和漁民革命运动干部的条件。他們以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在农村中领导农民的斗争和組織，使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現在成为西爪哇最大的群众团体。虽然如此，农民干部和漁民干部仍有急需克服的各种缺点。

調查工作負責人的报告证明，还有相当多的区和乡一級的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领导机构，其組成成員仍然部分地掌握在社会成份是富农的干部的手里。这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會員的組成（一般由雇农和貧农及一小部分中农組成）是不相适应的。富农是不被接受成为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會員的，地主就更不用說了。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领导的組成成員不純，导致某些地方的农民在“六好运动”，特别是在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方面的斗争陷于停滞状态。

有的富农之所以能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中占据领导地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最初在面对农民革命运动高潮的情况下，他們为了寻找保护而成了党员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會員。但是，由于他們的文化水平比雇农和貧农更高，因此他們在短時間內能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中占据领导地位，而且暂时取得了农民的信任。除此以外，也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洪炉中或者甚至是在这之前誕生的干部，他們



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綱領制定之前确实可算是較好的干部，一般都能以高度的反帝精神来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参加清剿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叛乱集团。但是，他們不是土地革命干部，因此必須尽快地分配他們担任其他任务。

在消除上述反常現象的时候，我們必須坚决遵循党关于常委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領導机构的階級路綫，但在贯彻执行中必須灵活。为此，必須推动那些富农出身的但未能同农民革命运动完全結合起来的党员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領導人，使他們願意被調到同土地問題沒有直接关系的体育、文化方面或其他方面去。

在这之后，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和党的領導，就必須掌握在决心贯彻“六好运动”、特别是贯彻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貧雇农出身的或在同貧雇农的利益結合方面完全經受住考驗的干部的手里。

为了能够及时地完成上述提拔和調动工作，那就必需对常委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領導干部（特别是区和乡一級）以及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加紧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西爪哇的經驗证明，要做到这点，就必須扩增农业地区的斗争速成班、人民訓練班、人民教育所和政治学校，而且給予农民干部和漁民干部很大的优先权去上县級和省級党校和农民干部学校。

此外，通过增办扫盲班、人民教育所、人民教育館和人民大学并在有可能的地方开办各种专业（如农业和漁业）訓練班来不断提高在农民和漁民中間工作的干部的普通知識，是很重要的。調查工作負責人的报告证明，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其文化程度已得到提高的干部，是维护党的政策和《政治宣言》的正确性的坚强和敏銳的战士。

干部生活条件过于困苦的問題是不可以任其迟迟不决的。上級常委会必須立即过問此事，并尽力帮助克服他們生活上的困难或減輕他們生活上的負担。必須坚决摒弃不聞不問的态度。此外，下級常委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必須提高自己的能力，通过互助方式开展各种生产性活动，使它們在克服本地区干部的生活困难方面能够自力更生。而上級常委会和干部必須以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路綫（即：物质帮助很有限，但精神帮助是无限的）作为方針，表现出高度的共产主义团結精神。

（三）西爪哇农民和漁民的斗争經驗

在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集团被消灭而且經過反对农村七魔的斗争鍛炼之后，西爪哇农民运动达到了高潮。但是，漁民运动則尚处在組織建設的阶段。从关于調查結果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农民和漁民反抗他們身受的种种剝削和不公平待遇的各种斗争形



式。斗争对象比比皆是，农民和渔民的反抗精神高涨。对西瓜哇农民斗争的前途和革命农会的发展来说，这是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

近来西瓜哇农民和渔民开展了以“六好运动”为中心的各种各样的斗争，来反对农村七魔。其中的一些经验如下。

农民无论在自己的耕地上或在法庭上都是始终如一地进行坚决的和英勇的斗争，来保卫原是林场地或农场的耕地。这些斗争获得林场和农业工人的支持；同时，这些斗争一般都能够获得良好的配合和领导。在这些斗争中，农民同时也反对了滥用绿化运动名义的行为，即实际上是让本应绿化的土地闲置，而将农民驱逐出他们的耕地——这些耕地已经成为水田、旱田和农村，同水利和防止水土流失的利益毫无关系。

在西瓜哇，已经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佃农约有五万一千七百五十名，其土地面积共约一万一千五百公顷（西瓜哇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统计数字），这一般是单方面行动的结果。西瓜哇地方政府关于《土地基本法令》执行情况的统计数字，其准确性是十分可疑的。根据该统计数字，已经登记的超过限额的土地共有五万七千公顷，其中二万一千一百八十二点零七九六公顷土地已经重新分配给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三名佃农，这表明已经登记的超过限额的土地有一半以上尚未重新分配。农民执行真正有利于农民的《土地基本法令》的斗争成果都是单方面行动的结果。通过单方面行动，许多地区发现地主隐瞒超过限额的土地的勾当。在开展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单方面行动的过程中，农民也就同时开展了保卫自己的耕地的斗争，因为在反对单方面行动中，地主随后也采取了赶走农民的措施。在贯彻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当中，无论在自己的田地上或在法庭上，农民始终对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

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农民在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范围内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已经在万隆、井里汶、南安由、加拉旺等地区开展起来。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约五万二千个收成分配合同，其中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个是成文的，其余的则是不成文的。其实，西瓜哇的收成分配合同应该有七十万个左右（这是根据土地所有者自己不耕种的土地面积约共三十五万公顷，而每名佃农平均租地半公顷的估计数计算的）。这一方面证明了《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执行遭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西瓜哇的农民运动已经是再也不能阻挡，它正在走向新的高潮。

提高雇农的雇工费的斗争已经比较普遍地进行，甚至在万隆县巴蒙贝克地区，当地的地主和富农要找雇农劳动力，就不得不同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联系，因为只有通过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提出请求，雇农才愿意替他们干活。这样，雇农劳动力的价格就得以提高一些。



废除抵押的斗争已在南安由等地区进行着，它们一般也是单方面进行。

在面临青黄不接的季节，除了农民自己彼此进行互助之外，借粮运动也已经在许多地方进行着。在这种斗争中，农民同那些具有良好愿望的乡吏进行了合作。

在某些农村，农民通过群众斗争成功地撤换了坏的乡吏。

在渔民中间，比较普遍的活动是抓会或者是为了解决各种需要（如伊斯兰教割礼、丧事等）的相互帮助。

从西瓜哇近来的各种斗争可以看出：农民已经敢于进行反对农村魔鬼的单方面行动。基于上述反对农村魔鬼斗争的经验，今后有必要发展以下的斗争：在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范围内，向那些还没有执行该法令的土地所有者提出实现六：二：二的要求；以贫雇农利益为重，扩展坚决执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行动；撤换坏官吏，并使乡政权《政治宣言》化；逮捕和消灭农村匪徒等等。

为了发展上述斗争，好的经验必须推广，不大正确的经验应引以为戒。

（四）准备、开展和巩固斗争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路线，以及通过轰轰烈烈的工作同埋头苦干的工作相结合，来实现“斗争虽小，但有成效”的要求，是组织各种斗争的准则。在这些路线的指导下，推动党委和革命群众团体好好地进行准备，特别是在选定有经验和有战斗力的斗争领导干部方面。每一个斗争都有必要成立斗争小组。可以从省一级直到乡一级，或者从县一级直到乡一级成立这些小组。斗争小组成员由党委委员和革命群众团体领导机构成员组成。在开展斗争中，有必要让没有经验的年轻干部参加，让他们当“学徒”，就是说，不分配他们担负重大责任，使他们能够学习斗争经验。

领导斗争活动的关键在于由区一级的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协助的区委会。其次，为了总结已经开展起来的斗争，有必要在若干先进的地区成立特别小组，以便分析和总结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胜利的和失败的斗争。这种总结是重要的，以便推广到其他地区。从西瓜哇的经验来看，可以作为农民斗争的榜样的地区有万隆、尖美士、苏邦等县。

经验证明，在斗争之前，只要对参加斗争的干部进行集训，向他们阐明要做到“四明确”，斗争就能够顺利地进行。“四明确”就是：（1）斗争对象明确；（2）斗争的依靠和力量明确；（3）开展斗争的方式明确；（4）开始和结束斗争的时机明确。为了向将要开展斗争的群众阐明“四明确”，那就需要举行宣传解释会议或讨论斗争要求的会议。在这些会上，应该回击对农民和渔民所进行的一切诬蔑，并且彻底揭露对农民和渔民运动所采取的虚伪态度。此外，



在斗争进行的过程中，也需要同正在进行斗争的群众开会，阐明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必须立即执行的新策略。在面临严重斗争的时候，那就必须事先同上一级党委会进行讨论。为了使斗争能够更加顺利地顺利进行，上级斗争小组和下级斗争小组有必要不断地取得联系。斗争的力量有赖于“工作场所小组”和“居民点小组”的组织工作以及在进行着斗争的群众中间进行深入宣传。为此，在开展斗争之前，有必要事先对同该斗争有关的各个问题进行短期的调查研究。必须关心和帮助直接领导斗争的干部（包括“工作场所小组”和“居民点小组”的组长），并向他们阐明政治局势，从而使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更加坚定。

在每一次斗争中，都必须防止由于遭到压力、恫吓、迫害或逮捕以及受到贿赂而产生的投降敌人的倾向，或者防止采取不计后果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应该帮助和鼓励参加斗争的干部更进一步地深入理解斗争组织工作的重要性的问题，严守纪律和坚决贯彻执行领导路线，但不得采取官僚主义的生硬的或缺乏主动性的态度。

经验证明，如果把群众斗争同谈判活动正确地配合起来，斗争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但这应当理解为群众斗争是主要的依靠。在谈判中，斗争的领导人必须做好准备，用各种事实和论据来打掉农村魔鬼的各种借口。必须防止光是领导人进行斗争。每一个斗争都必须真正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的力量。通过依靠雇农和贫农，或者渔工和贫苦渔民的力量——农村中斗争力量的基础，我们争取中农或中等渔民参加斗争，中立富农或富裕渔民，并且争取拥护《政治宣言》的官员，使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在斗争中团结起来，以孤立和反对农村魔鬼。万隆县的某些农村已有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斗争的经验，在那里，农民家庭的所有成员（直至他们的小孩）都能被动员起来参加斗争。任何一个斗争的核心力量在于与这个斗争有关群众的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在有关地区的其他部门中发动斗争，对扩大支援和加强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能够有条不紊地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和防止农村魔鬼的挑衅活动，掌握某一个斗争的开始和结束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给予正在领导斗争的干部以具体的指导，给他们树立榜样，而且鼓励他们，上级干部应该积极参加某一个斗争活动。要做到上述几点，应该在不忽视党的其他任务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开展领导干部到基层去的运动。

西瓜哇农民的经验表明，在巩固和发展上述斗争的成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从以下事实可以得到证明：不少地区的许多斗争获得了成功，但发展革命的农民群众团体和发展党的工作没有跟上去。斗争胜利就自满或者是斗争没有成果就心灰意淡，这种现象在某些干部中间还存在。因此，在开展斗争中必须尽可能地坚持“四个胜利”的方针，即政治方面的胜利、组织方面的胜利、思想方面的胜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胜利。轰轰烈烈的工作必须同埋头



策，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八月十七日演讲中所提到的革命政策。总之，西爪哇的农民已经有了政治觉悟，因而不会再有任何一种奴役制度将不被西爪哇农民所粉碎。已经有了政治觉悟的西爪哇农民正在起来同全印度尼西亚的农民一起共同进行斗争。

在革命运动尚未开展的农村，农民刚刚开始知道《政治宣言》的名词或者刚刚开始看到写着《政治宣言》字眼的木板。他们还不了解它的内容，而官吏们也不去介绍它的内容，更不用说介绍它的精神实质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把它的翅膀伸展到那里去的许多农村，《政治宣言》的内容和精神实质都介绍了。乡里的官员一般没有兴趣去执行《政治宣言》，不仅如此，如果《政治宣言》加以贯彻执行的话，他们反而感到不利。因此，假《政治宣言》派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猖獗活动。

关于《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也是如此。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尚未发展的农村，农民还不了解《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内容。城镇和乡村的官吏以及其他官员并不想办法了解这两项国家法令，许多人甚至没有这两份法令，其中具有善良愿望的则要求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领导送给他们这两个法令的材料。相反的，在已经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革命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农村，农民不仅了解这两项法令，而且已经在为争取实现这两项法令而斗争。农民甚至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只有实现彻底的土地纲领，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所提出的“土地归农民”，他们的贫困和落后状态才会消除。在这些农村中，农民根据自身的经验深信，《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实现，尤其是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本身的力量。他们深信，《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贯彻执行并不是县长、区长、乡长或其他官员的事情，因为如果取决于这些人，即使到了世界末日，这两项法令也不会实现的。它们的贯彻执行完全取决于农民本身和共产党人。在这些农村，农民已经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这两项法令，限制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减轻地主对他们的剥削。

如果说许多农村的农民对《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以及这两项法令在执行当中一般陷于停滞的话，那主要是因为农村官吏一般都感到这两项法令对他们不利。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农村中，革命的农民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尚未发展和巩固。

这两项法令公布后，农村地主的“威势”在农民面前开始下降。地主开始被他们的佃户看作是骗子，因为他们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隐瞒大片土地，而这一切都是农民所知道的。地主向来利用法令恫吓农民，而现在，正是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农民面前，成为国家法令条例的反对者。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拥有土地的城市“大官”和帮助地主为非作歹的农村官吏，他们



策，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八月十七日演讲中所提到的革命政策。总之，西爪哇的农民已经有了政治觉悟，因而不会再有任何一种奴役制度将不被西爪哇农民所粉碎。已经有了政治觉悟的西爪哇农民正在起来同全印度尼西亚的农民一起共同进行斗争。

在革命运动尚未开展的农村，农民刚刚开始知道《政治宣言》的名词或者刚刚开始看到写着《政治宣言》字眼的木板。他们还不了解它的内容，而官吏们也不去介绍它的内容，更不用说介绍它的精神实质了。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把它的翅膀伸展到那里去的许多农村，《政治宣言》的内容和精神实质都介绍了。乡里的官员一般没有兴趣去执行《政治宣言》，不仅如此，如果《政治宣言》加以贯彻执行的话，他们反而感到不利。因此，假《政治宣言》派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也猖獗活动。

关于《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也是如此。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尚未发展的农村，农民还不了解《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内容。城镇和乡村的官吏以及其他官员并不想办法了解这两项国家法令，许多人甚至没有这两份法令，其中具有善良愿望的则要求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领导送给他们这两个法令的材料。相反的，在已经建立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组织和革命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农村，农民不仅了解这两项法令，而且已经在为争取实现这两项法令而斗争。农民甚至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只有实现彻底的土地纲领，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纲领中所提出的“土地归农民”，他们的贫困和落后状态才会消除。在这些农村中，农民根据自身的经验深信，《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实现，尤其是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本身的力量。他们深信，《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的贯彻执行并不是县长、区长、乡长或其他官员的事情，因为如果取决于这些人，即使到了世界末日，这两项法令也不会实现的。它们的贯彻执行完全取决于农民本身和共产党人。在这些农村，农民已经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实现这两项法令，限制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减轻地主对他们的剥削。

如果说许多农村的农民对《土地基本法令》和《收成分配合同法令》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以及这两项法令在执行当中一般陷于停滞的话，那主要是因为农村官吏一般都感到这两项法令对他们不利。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农村中，革命的农民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尚未发展和巩固。

这两项法令公布后，农村地主的“威势”在农民面前开始下降。地主开始被他们的佃户看作是骗子，因为他们用卑鄙龌龊的手段隐瞒大片土地，而这一切都是农民所知道的。地主向来利用法令恫吓农民，而现在，正是他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农民面前，成为国家法令条例的反对者。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拥有土地的城市“大官”和帮助地主为非作歹的农村官吏，他们



的“威信”在农民中间也一落千丈了。

在农民眼中，他们不再是大官或老爷了，而是被称为“农村魔鬼”的骗子。

农民在起来反对地主的同时，也开始觉悟到要反对扮演帝国主义爪牙角色的官僚资本家或农村中的城市官僚资本家。

农民反对官僚资本家的斗争在有“国营农场企业”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地区，农民的斗争旨在反对披着“国营农场职业阶层联合会”或“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职业阶层中央组织”（别名“新型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外衣的官僚资本家把农民从前农场土地上驱逐出去的勾当。目前，这种以维护久已为农民所耕种的前森林地和农场土地以及为争取实现与间种制度有关问题的斗争，正在进行着。这种事情发生在牙律南部、万隆的本雅冷岸、展玉南部以及西瓜哇的其他地区。

反对滥用职权充当中间商人的乡长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坏乡长中，有的滥用职权通过假“合作社”垄断农产品，以便压低农民的产品价格，例如压到低于市场价格百分之五十以下的办法，剥夺农民在市场上售卖产品时超出乡长以“合作社”名义规定的价格的那一部分收入，以及实行买青苗制。

西瓜哇农民对消灭反革命分子一事的政治觉悟不仅更为普遍，而且更为提高。这可以从农民的下列活动中得到证实：过去农民积极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一齐战斗，积极参加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的被称为“人腿籬笆”^①的军事行动。今天，反革命分子通过被农民视为“新式马斯友美党”或“新式伊斯兰教国运动”的“伊斯兰教师会议”在进行活动，农民也以各种方式加以反对。而种族主义者的活动不仅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反而遭到农民的反。种族主义者烧毁卡车和公共汽车的活动，增加了本来就存在的运输困难，扰乱了货物的流通，其结果是农民蒙受极大的损失，如过去在万隆、茂物、展玉、牙律、苏加巫眉和若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形那样。

在农村，对粉碎“马来西亚”的认识日益深刻。这由以下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农民积极地同工人一道接管英国的企业，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动手克服吃饭问题的困难的必要性。尽管许多乡村的官员对农民施加压力，有些甚至禁止农民提出“粉碎马来西亚”的口号，禁止农民进行宣传活。借口说这一斗争将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能降低西瓜哇农民的政治觉悟水平。

许久以来，农村不断地以决议和请愿的方式提出了要求。这些决议和请愿书或者是农民

① “人腿籬笆”意指人民群众层层包围圈。——译者注



群众个人签署的，或者是集体签署的。其要求是有关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內閣，有关地方政权的“納沙貢”化、乡政府的民主化，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条例来代替“五月二十六日”条例，撤換坏乡吏，以佃农利益为重彻底实现《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等等。

由于农民提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的代表以及其他农村革命阶层的著名人士应参加乡政权，爭取乡政府民主化的斗争因而开始发展起来了。在一些农村，农民开始要求以民主方式举行农村协商會議，并且要求撤換坏乡长和洗刷其他坏官吏。另一方面，农民开始要求作为各“納沙貢”政党和个人合作的机构的民族陣綫組織积极活动，同样也要求各級“土地改革委员会”积极活动，并且要求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土地改革法庭”。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已經发展和有影响的农村，建立“納沙貢”的合作則比較容易。

农民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这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陣綫的保证。这是农民摆脱迄今束縛他們的封建剝削的保证。

与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的同时，在为爭取革命的解放的斗争中，农村妇女的觉悟也提高了。农村妇女同男子一道，为維護耕地和反对恶地主及其他农村魔鬼而斗争。斗争加强了农村妇女的这种信念，即爭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不能脱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

随着农民的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六好”运动也开展起来了，因而为粉碎种族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动派企图利用民族問題和不同肤色（种族主义）問題来分裂民族統一战綫的任何阴谋的条件，就更有保证了。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得到发展和巩固，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因而农村形势也由落后逐漸变为先进。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西瓜哇許多农村中的不良現象，如賭博、恶棍、迷信等等，也逐漸消逝了。

这一切已經动搖了并且最終将粉碎农村魔鬼的統治。有的农村魔鬼已开始不太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但是他們仍然繼續进行搗乱。只有不断地加以粉碎，他們才会永远消失。

反动派阻撓农民提高政治觉悟的手段

反动派为了阻撓农民提高政治觉悟，在农村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如限制民主自由，威胁农民领导人，破坏中央政府进步的決議，利用宗教和文化，直至造謠誹謗，假仁假义和采取恐怖行动。

为了阻撓农民提高政治觉悟，以便乡政权能够永远地完全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利益服



务，因此采取不定期和不民主的方式召开乡会议。召开乡会议时，不让“纳沙贡”政党的领导人和革命的农民组织的代表参加，因为害怕坏乡吏的“烂疮”被揭穿。而乡年会更多是带有传达指示的性质。对农民的建议，不仅不加接受，反而暴跳如雷和横蛮无礼地加以压制。因此，在西爪哇农村，乡会议须按期召开并且按民主方式进行的要求已越来越普遍。

农村的民族阵线组织有的还未建立起来，有的已经建立起来，但不让它活动，也有的不让“纳沙贡”代表参加。为了使民族阵线组织陷于停滞状态，一些乡吏奉“上级”指示成立了新的机构，如“伊斯兰教师会议”、“伊斯兰教徒福利会”及其他类似的机构。他们的这种行动已经开始遭到革命力量的反击。

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证明它是推动农村革命运动发展的政党，因此，反动派从中央、省、县、区直到乡都企图阻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发展。他们以此力图防止《政治宣言》派担任乡执政者，防止农村以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巩固。但是，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由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和继续不断地维护农民的利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益深入农民心里，《政治宣言》的攻势日益扩展到农村去。说实在的，在西爪哇农村，旧的社会基础正在动摇！

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的地位，不惜假借“地方军区司令部”和“乡村建设军官组织”的某些人和其他反动乡吏的手来威胁、迫害和逮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干部，甚至拉拢收买和造谣诬蔑他们。但是，事实证明这些手段并没有能够，而且也将永远不能够压制农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

反动派毫无顾忌地利用小礼拜堂和清真寺，把宗教当作工具，例如进行各种说教，宣传今天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是由于农民忘掉了传教而过多的参加政治活动。他们的这种说教，一方面旨在使农民对《政治宣言》、粉碎“马来西亚”等等采取消极态度，另一方面也旨在掩盖地主、帝国主义者、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农村魔鬼的剥削。这种剥削是极大多数农民贫困和落后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西爪哇的农民根据亲身经验已充分认识到上述宣传是“新式马斯友美党”或“新式伊斯兰教国运动”的活动。

农民非常尖锐地讽刺当前的各种不良现象。他们怀着愤怒的心情，通过艺术形式如“勒奥舞”^①、“吉农”诗歌朗诵、滑稽戏等等，描绘他们所看到的和亲身经受过的不合理的事情。“错误到处见，真理无处觅”，“法令斗不过亲戚，条例斗不过朋友，法律斗不过钱包”，“携粮一斤，谨慎小心；带粮一担，提心吊胆；运粮一吨，通行无阻”。这就是农民的一部分描述。

^① “勒奥舞”是爪哇的一种民间舞蹈。——译者注



对于“乡村建设军官组织”的一些反动士官，农民称之为“破坏者”。

所有这些言行，都说明农民和渔民在对待当前西爪哇农村盛行的不良的和不合理现象时所表现的革命政治觉悟性。

农村的革命政治宣传

由于长期统治农村的帝国主义、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加上近年来的官僚资本家所进行的压迫和剥削，结果，农民和渔民的文化非常落后。因此，在农民和渔民中间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必须采取埋头苦干和轰轰烈烈以及广泛而又深入的方式。党必须通过一切途径和方法，在农民和渔民中间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工作。

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农民的生活非常苦，但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举办扫盲班、政治学校、人民训练班和人民教育所的地方，农民还是坚持不懈地热情地参加学习。他们满腔热情地欢迎下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他们甚至争着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这些干部到他们家作客，虽然他们的生活很困难。在农村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时，挨户访问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在挨户访问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就能够跟农民和渔民谈论各种问题，并且进行深入的革命政治宣传。

“三同”运动的目的首先在于调查研究，但却具有重要的宣传和动员作用。在实行“三同”当中，雇农和贫农认识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的高贵品德，因而他们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提供各种情况和必要的帮助，其中有的情况可以用作宣传工作的生动材料。

通过在农村举行报告会和群众大会，农民和渔民的觉悟迅速提高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农民和渔民不仅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的农村，而且也开始了解本国的情况。他们甚至开始懂得若干国际问题，其中可以说明的是，万隆县、苏甲巫眉县、斗旺县及其他地区的农民发出书面声明，表示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侵略古巴的斗争，支持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斗争，支持安哥拉和越南南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在农村举办人民训练班和特定问题的座谈会，显然也是进行革命政治宣传的方法。通过这种座谈会，农民和农村中其他进步阶层会更深刻地确信农民所提出的革命要求的正确性。

觉悟了的工人，首先是交通运输工人和农场工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帮助在农村中扩大革命政治宣传是他们的责任。在农村休假的城市工人也进行了不少这项工作。为了提高农场、林场和工厂一带农民的政治觉悟，工人同农民和渔民的互相合作是重要的。这种合作形式如共同行动（提出共同要求的行动）、平行行动（根据各自利益提出目标相同但要求不同的行动）或配合行动（同一时间内提出目标不同的要求的行动）。



文化活动是在农村进行革命政治宣传的有力的斗争手段。在原来被伊斯兰教国运动匪帮和馬斯友美党所控制的农村，为了使农村《政治宣言》化，除了政治活动和組織活动之外，文化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农村进行革命政治宣传工作时，利用橫幅标語、海报、招貼画、漫画，在墙上、建筑物、大石头、大树上写字等等提出革命的政治口号，显然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也可以把这些口号写在紙上，用来貼在农村文艺活动所的墙上，或者是应农民的要求貼在他們房子的墙上。下乡去的革命中学生和大学生能够帮助进行这些工作。这些革命口号的意思和内容可以在演讲中、會議上、讲课中以及通过在工作地点的个别談話或挨戶訪問中加以解释和闡述。

开展农村墙报和散发革命报纸的工作虽然还不广泛，但是其效果是非常好的。在农村革命干部的政治宣传工作中，散发革命讀物显然具有重大的作用。

通过埋头苦干和轰轰烈烈的以及广泛而又深入的革命政治宣传工作，农民的政治觉悟将不断得到提高。随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农村魔鬼斗争的发展，农民和漁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随着在农民和漁民的斗争中新干部的产生，农村的革命政治宣传工作将会开展得更好。这样，原来是落后的、被反动派所蹂躪的农村，将逐渐变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团结巩固的革命的农村。不管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农村魔鬼采取什么行动，包括对农民造谣誣蔑和实行恐怖行动，来维护他們的全部势力和保持农村的落后状态的努力，都将是枉費心机。

七、农民从“全都錯了”变得“全都对了”

当农民还没有革命觉悟时，他們在农村处于“全都錯了”、“全都輸了”和“毫无权利”的地位。过去殖民地时期，与警察有过糾葛的农民，无需任何調查就被指为“犯法”，因为农民“不可能是处于对的一方”。不仅如此，农民的子孙也被视为犯法者的子孙，因为他們是与警察有过糾葛的人們的子孙。

农村魔鬼老是进行这样的說教，即农民的貧困和落后是命中注定的，是社会的一种必然性，正如他們所說的：“生活已經安排定了”。他們还說，貧困和落后是由于农民本身的懶惰和愚蠢。他們还說，正如天有昼夜之分，人也应有穷富之别，有人拥有土地，也就應該有其他人耕种其土地。

因此，当农村魔鬼眼看农民运动現在已經兴起时，他們十分恼火并且总是誣蔑农民。



他們說：“自从有了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以后，农民就变得傲慢无礼了”；“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是捣乱家伙”，“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专找麻烦”。对此，共产党人必須回答說，按照《政治宣言》，农民是革命的支柱或革命的主力，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则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敌人。如果农民对地主、高利貸者和其他农村魔鬼“傲慢无礼”，“捣乱”，“找麻烦”，难道这就錯了嗎？这并没有錯！这是非常正确！这甚至是个义务。按照《政治宣言》，帝国主义者和地主是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敌人，必須加以消灭。因此，仅仅对这些革命敌人傲慢无礼或找麻烦或捣乱，实际上是不够的。目前农民对农村魔鬼的态度，还是过于温和了。

他們說：“自从有了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农民把我們搞得都不安宁。”共产党人只能說，如果是这样，那农民是做对了。如果让这班敌人有时间可以像在过去殖民地时期那样安安静静、舒舒坦坦地生活下去，那印度尼西亚革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他們是必須加以粉碎的，而按照《經濟宣言》，他們是必須加以“剷除干淨”的。必須被剷除干淨的人們就不应该有安静地生活的可能，他們感到不安是很自然的。目前农民还是过于温和，还有很多的地主和高利貸者以及其他农村魔鬼仍然能够酣然入梦。

他們說：“农民只会提要求”。对此，共产党人必須回答說，調查結果证明，整个西爪哇农村农民自己建立的小学数量远远超过了地方政府所建立的小学。根据官方数字，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底止，在西爪哇，政府建立的小学二千二百三十五所，共七千一百六十間教室，而人民（当然主要是农民）建立的小学則达七千七百八十二所，共二万四千一百七十間教室。显然，农民具有高度的自力更生精神。这点也可以从农民的下列行动中首先得到证明，在加强全面对抗以粉碎新殖民主义的“馬来西亚”的計劃中，农民辛辛苦苦地亲自努力克服当前吃飯問題的困难。而且，农民提出要求又有什么不对呢？农民所要求的是他們本身的权利，是許多世紀以来不断被农村魔鬼所剥夺了的他們祖先的权利。因此，农民是对的，他們沒有錯。目前，农民在要求享有他們的这些权利方面，还是过于温和了。

他們說：“农民强占土地”并“侵占森林以致造成水灾”。对此，共产党人必須回答說，近来农民所耕种而被官僚資本家和其他农村魔鬼所大肆攻击的森林地是平地。而农民所耕种的旧的森林地的确有的是坡地，但这并非是由于他們新砍伐森林所造成的結果。

农民完全懂得水灾会危害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庄稼，因此，农民不可能故意做出任何足以引起水灾来危害自己的事。农民所耕种的森林地是荒地，地上的树木是日本法西斯統治者为了他們的軍事上和掠夺上的需要而下令砍伐的，或者是荷兰殖民軍队为了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游击队而下令砍伐的，或者是独立战争时期为了增产粮食而加以砍伐的，或者是在消灭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的武装反革命时，为了便于控制該集团的交通綫而



奉命加以砍伐的。还有些森林和农场的树木是由于森林官和农场主自己为了出售木材而下令砍伐的。某些林业部门官员和农场主叫人把森林和农场的树木砍去卖，而不去重新造林或重新耕种，把这些地置之不顾。

农民一直是愿意采取种多年生植物、粮食作物、建筑用林木和出口作物或者采取间作和林粮间作的办法来绿化本地区和在荒地重新造林的。这样，绿化本地区和在荒地重新造林的措施，可以同增产粮食的措施结合起来。因此，在森林和农场的荒地问题上，农民也是对的，他们没有错。农民在反对专事造谣诬蔑的人特别是患恐农病的林业部门官员方面，还是过于温和了。

他们说：“农民是国家的敌人，应该加以逮捕”。关于国家的敌人，上面已经说明，按照《政治宣言》，革命的敌人或是国家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农民不仅不是革命的敌人，反而是革命的支柱或主力。关于谁是国家的敌人并且应该加以逮捕，事实说明，地主已经反对《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隐瞒和虚报他们的土地面积，采取所谓“错分”和假“赠送”的办法。他们采取贴上假印花伪造证件的办法欺骗国家。官僚资本家也盗窃了国家的资财，毁坏生产资料。违犯国家法令应该加以逮捕的不是农民，而是不断进行恶毒宣传和颠覆活动来挖国家墙脚的恶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农村魔鬼以及“新式的马斯友美党”或“新式的伊斯兰教国运动”和“新式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党”。因此，在这方面，农民也是在对的一方，他们并没有错。到目前为止，农民在打击那些违犯国家进步的法令和反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农村魔鬼方面，还是过于温和了。

他们说：“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反对宗教，反对建国五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必须回答说，滥用宗教和建国五原则来分裂民族团结以便推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达到其他恶毒目的的，正是农村魔鬼。还有，纵火烧毁清真寺和虚报去麦加朝圣者名额的，不是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的会员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党员，而是农村魔鬼和自称信教和信奉真主的其他恶棍。假如到小礼拜堂和清真寺去听传教的农民日益减少，那是由于“伊斯兰教师会议”即“新式马斯友美党”或“新式伊斯兰教国运动”头子把这些地方当作他们的讲坛。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和农民也是对的，他们没有错。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和农民接受并且捍卫作为团结全民族的工具的建国五原则。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是正确的，这从它在西爪哇农村的组织日益扩大这点可以得到证明。而明目张胆反对或滥用建国五原则的恰恰是那些农村的大剥削者和前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集团的人物。农民在打击农村假《建国五原则》者和假《政治宣言》者方面，还是过于温和了。

他们说：“农民破坏稻谷收购合作社”。共产党人列举事实指出，在收购稻谷方面，发生



了强迫命令和滥用职权的行为。最近强迫收购稻谷的作法已被制止便是证据。事实是，稻谷收购合作社是西瓜哇反动官员由上面强迫组织起来的假合作社，这些人完全不代表农民的利益。这种合作社只是名义上叫“稻谷收购合作社”，而事实上是“稻谷掠夺者合作社”，西瓜哇的农民就是这样称呼这个组织的。农民有权利要求对使用国家资金收购稻谷的情况作交代。在“合作社”问题上，农民也是处在对的一方，他们完全没有错。到目前为止，一般说来，农民在打击那些进行稻谷收购的和假合作社中的骗子方面，还是过于温和了。

他们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专门歪曲事实，说什么《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的执行陷于停滞。”对这点是无需加以评论的，因为调查结果提供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官僚分子的办公桌上可以堆满关于《收成分配合同法令》和《土地基本法令》执行“顺利”的假报告，但事实驳斥了所有这一切。因此，谁假造事实是很明显的，这肯定不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是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不是农民。

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和一般革命运动进入农村，农民拥护革命政策的觉悟已日益提高。剥削阶级许多世纪以来向农民灌输的信念，说什么“愚蠢的人不可能变聪明”和“小人物不能成为大人物”等，已逐渐从农民的思想中剔除。和警察有过纠葛不再被视为自然是犯法的了。相反的，不少农民由于上法庭打官司而获得了远至本村以外的广泛同情。人们给他们送花环，为他们创作并朗诵赞美诗。调查结果指出，由于农民的觉悟，他们就能创造出许多好事和先进的事迹。农民和渔民有了革命的政治觉悟，农村中的为非作歹、荒淫无耻和道德败坏等现象就会逐渐遭到反对和揭露。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许多世纪以来被农村魔鬼置于“全都错了”的地位的农民和渔民，已变得“全都对了”。

农民观察政党和人物的立场的眼光越来越尖锐。他们能马上看出：谁是站在他们的前面领导他们的；谁是站在他们的背后或身旁指责和咒骂他们的；而谁又是站在他们的对面、端着刺刀反对他们的。

从雅加达、从万隆或从西瓜哇所有的农村，可以千方百计试图阻挠西瓜哇的农民运动。但是，对于政治上觉悟了的和具有统一的革命意志而觉醒了的农民，没有任何堤坝足以挡住农村的《政治宣言》攻势。

八、在农民和渔民中进行革命的文化 and 道德工作

西瓜哇农村的文化和道德生活，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制度相结合以及资本主义



入侵的影响。地主和上层富农盖新楼房（许多是阿飞型的）作住宅，他们买汽车或其他机动车，买现代化家具，其中包括半导体收音机和电唱机。新殖民主义文化以下列方式渗入农村：通过城市出版的许多娱乐性杂志；一些地主、上层富农、官僚资本家和坏官吏利用举行伊斯兰教割礼、婚礼或其他时机开放半导体收音机或电唱机或雇请乐队播送或演奏“呀—哟—哟”音乐以及印度和马来亚歌曲，以供来宾们娱乐。新殖民主义文化的主要拥护者，即官僚资本家、贪污分子和买办阶级一般住在城市，因此，农村还不熟习扭摆舞晚会以及诸如此类的跳舞晚会。

目前在农村社会中比较流行的道德败坏现象，如多妻制，经常娶新老婆，暗娼，赌博和酗酒等，一般是发生在地主、上层富农、坏官吏和其他农村魔鬼当中。贫雇农中间的卖淫现象是由于经济恶化的结果。陷入卖淫火坑的农妇到城市找市场，从而离开了农村社会。她们多数人之所以卖淫，除了经济困难的原因之外，还由于早嫁早休，成了早婚的牺牲品；她们成为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和其他农村魔鬼猎取的对象。

在西瓜哇的一些农村，一部分农民和渔民聚赌是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陋习。这种由剥削者老早就加以培植的陋习，是剥削者毒化农民的武器，以便农民永远受他们的束缚并借此可以控制农民的劳动力和产品。

封建主义残余在农村中占优势造成农妇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一般都非常简朴，受了鬼神迷信的影响。她们在继承权、婚姻和离婚方面是受歧视的对象，是早婚、一夫多妻制的牺牲品，是封建残余的文化和道德败坏的牺牲品。

儿童也跟着遭到不幸。贫雇农的儿子多数由于经济困难所迫而无法念完小学。农忙季节本应该得到幼儿园管教的儿童在农村里东跑西窜，完全没有人照顾。

革命的妇女群众组织，在提高农村妇女和儿童的地位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提高这些农村妇女和儿童的地位就意味着提高农村文化。

为了维护农民和渔民并发展人民艺术，在土地革命前后，农村中应该开展革命文化运动，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农民和渔民的觉醒，以表现反封建剥削的斗争。开展革命文化运动，打击目前农村中较有影响的低级娱乐的色情文化，这些工作应该由党和革命群众团体直接承担起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确使农村起了变化，首先是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但是，特别是在西瓜哇，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高潮中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受到了遏制，因为殖民军队以及西瓜哇的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短期内便重新控制了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军反革命势力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工具“绿色同盟”的衣钵，以至革命形



势的发展在许多农村中遭到了阻挠。

由于交通不便，西爪哇的发展有不平衡的现象。例如，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地区就比私领地区的芝亚森、巴馬努干或万丹更先进。南万丹则成为几乎被隔绝的地区。西爪哇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也拥有各种不同的民族。如井里汶往西到北部沿岸地区、南勃良安和西勃良安以及万丹地区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这些地区居住着巽达族和爪哇族。各民族杂居的大雅加达市及其周围的地区则给其邻近地区以独特的影响。同样，文登周围地区由于华裔农民和当地农民结合的发展结果也具有若干特点。

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渗入西爪哇农村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的思想因货币的影响而从“不讲究实际”变成“比较讲究实际”，虽然封建主义的残余还没有达到全部清除的地步。资本主义关系的渗入，以及殖民地时期革命运动的影响和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的影响，为新思想（包括妇女解放的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追求进步的愿望表现在青年农民要求学习的精神上，也表现在贫雇农出身的青年要求学习的精神上。目前贫雇农青年上学的机会还是非常有限。因此他们十分感激党和革命群众团体举办扫盲班、人民训练班、人民教育所等等。在中学念书的青年一般是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子弟，他们一方面对农村的思想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把新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带给农村。他们参与使农村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化同城市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化相结合的活动。经济上较好的西爪哇农村，对待科学和学习表现出进步的态度。农民自己盖房子做小学用，因为贫雇农希望在他们的经济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使他们的子女进步。科学在农村的影响虽然还不广泛和深入，可是已给农民带来了思想上的进步，其中的一个表现是迷信思想越来越淡薄了。但是，农村的地主和反动派由于利害关系，力图保存迷信思想，以利于他们剥削农民。例如，万隆县的一个地主使用了可笑的办法，雇了一名身材粗壮的管家当着农民面前咒骂他。地主一巴掌向管家打下去，管家装着发抖，昏倒地上，为的是使农民以为地主是有神力。但是这种“神力”的秘密很快就被揭穿了。在一次农民斗争中，该地主一方面遭到身材瘦小的雇农追击，另一方面退路又被农妇挡住，地主如落水狗似的吓得浑身发抖，夹着尾巴逃跑，从田埂滚进水田的泥淖中。农村的革命运动越向前发展，就会有越多的迷信被破除。

求神保佑办酒席的习俗也越来越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运动的影响。农村贫困加剧造成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浪潮，这首先发生在有周期性缺粮现象的地区。

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以便继续受人敬畏，于是便利用来自农民中的艺术，同时使它色情化。人民的艺术如木偶戏是人民十分喜爱的戏，但却被他们以“掷钱



买女伴唱的歌声”的办法給糟蹋了。結果，排挤了作为主要人物的导演者的地位而突出了令他們神魂顛倒的女伴唱的地位，尽管她的歌声并不怎样。他們也糟蹋“弄迎舞”、“达友舞”、“洞卜列舞”以及类似的舞蹈。^①反动派也力图使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打进农村。为此，西爪哇的反动派組織了所謂“普斯巴达雅”的文化团体，散布完全符合《文化宣言》方針的“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应该脱离政治”的思想，实际上是在维护封建—新殖民主义文化，反对革命文化的发展。

賭博、艺术色情化和假仁假义等道德败坏現象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同农村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者有联系的城市资产阶级影响的結果。

目前在农村中，一方面道德败坏的現象仍然存在，但另一方面，新的觉悟已經产生和发展，这是由于一九四五年八月革命以及农村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和其他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結果。农村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农民陣綫和其他革命群众組織的存在，已給农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带来新气象，并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习俗、迷信、文盲現象、封建和黄色的艺术及其他等等。

同样，賭博、卖淫以及由于农村魔鬼的挑撥离間政策所造成农民之間互相毆斗的現象，也逐漸消除了。西爪哇农村目前甚至出现了新道德現象，在那里，恶劣品质被形容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被形容是农村魔鬼。农民已經認識到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不仅垄断了最好的耕地，而且也垄断了所有形形色色的为非作歹、骯髒下流、荒唐淫乱、道德败坏和罪大恶极等事情，如多妻制、聚賭、卖淫、斗鸡、揮霍浪費、酗酒等等。这些勾当是完全同貧雇农格格不入的。假如过去农村魔鬼的所有这些为非作歹和骯髒下流的勾当能靠一次“朝圣”就能掩盖过去，現在烏黑的心腸和污秽的双手已經不可能再利用宗教来加以掩盖了。在西爪哇农村以及“綠色同盟”和伊斯兰教国运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軍一度橫行霸道的地区，已开始听到并流行着爱国的和革命的歌曲。农村的好些艺术活动已具有进步內容。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具有革命內容的那些艺术形式，如“勒奥舞”、武术、木偶戏、皮影戏(如具有革命內容的“阿斯特拉精嘎·朱达”这出戏)、絲竹乐、古典的和現代的舞蹈(如面具舞和农民舞)、話剧、滑稽戏等等，已經發揮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革命运动已經强大的地区，农民和漁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了。这就推动农民以新的态度来看待教育、风俗习惯、迷信和艺术。因此采取更自觉和更有步骤的态度来改善宣传鼓动工

^① “弄迎舞”、“达友舞”和“洞卜列舞”，都是印度尼西亚民間舞蹈。——譯者注



作、普通常識的教育工作和扫盲工作（其办法是通过增加供扫盲班毕业生用的印度尼西亚語和地方語讀物）以及革命的文艺活动，这对农村居民思想的革命化将是重要的帮助。

采取革命文艺活动同政治思想战綫上的工作相結合以及同农民和漁民的斗爭（首先是反对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的单方面行动）相結合的方法来加强革命文艺活动，将会改变农村的文化面貌。西瓜哇的經驗证明，在农村建立文艺活动所是有可能的，它們对革命文艺活动的推进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軟弱性，印度尼西亚还未达到如在日本那样出現大規模生产“商品艺术”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程度，因此农村基本上仍然在旧文化残余的統治下。一方面，农业国性质和交通落后阻碍了农村人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的軟弱无能也使他们沒有能力去扼杀农村的人民文化。除了从二十世紀初期就已經同农村发生接触的反殖民主义斗爭（“伊斯兰教联盟”和“人民同盟”等所进行的斗爭）的传统之外，西瓜哇根深蒂固的艺术传统因素也是一种使农村的人民文化有可能具有坚强抵抗力的因素。

总的說来，农村的形势为革命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去领导文化斗爭，并使这个斗爭成为农民和漁民在爭取政治民主化的斗爭、爭取耕地以至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的斗爭中的武器。共产党人目前要是善于以革命精神去发揚优秀的艺术传统，那将大大有助于加强农村中的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

九、反对假合作社，把合作社变成 农民和漁民手中的武器

从調查結果所获得的有关西瓜哇合作社发展的材料說明，劳动人民的合作社运动一般还不够发展；現有的合作社多数是被剝削阶级，如富农和中间商人，甚至是被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控制，在漁民地区，合作社則是被漁船主所控制。在剝削阶级手中的合作社是一种可恶的垄断工具，它被用来剝削中农、貧雇农和劳动漁民。

茲将剝削阶级所控制的农村合作社的若干例子列举如下：

（一） 展玉县波容·比宗区格芒乡合作社

这个乡的合作社是由上面，即奉上級官員的指示組織起来的，并且同时就提出了由富农和中间商人担任理事的名单。这个合作社和它的理事名单本应在合作社社員大会上加以通过。



但事实上并不如此，而是形式上在乡会议上加以通过，因为所有农村居民都被当作自动入社的社员。这种方法完全同合作社的原则相违背，首先同自愿入社的民主原则相违背。

这个合作社成为稻谷、玉米和棕榈糖三项产品的专买者，并且规定了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收购价格。如果农民不将上述产品卖给合作社，他就必须将出售该产品的收入中超过合作社定价的那一部分钱交给合作社。合作社可以成立由二十四人组成的监督小组来监督产品的交易。监督小组的成员包括恶棍及“民防”和“乡村建设军官组织”的成员。一旦发现农民不把产品卖给合作社，他就往往遭到监督员的殴打。控制这一合作社的富农和中间商人把那些以垄断手段收集来的农产品拿到本乡以外的市场出售，通常是卖给县城的中间商人，从中获取巨利。合作社则只分到一点点的利润，但连这一点也不容易得到证实，因为合作社不给居民有机会去检查，尽管他们被当作自动入社的社员。这个合作社除了垄断农产品的收购和出售之外，还以比农村零售商更高的价格出卖消费品给居民，而它的物品供应也是很不完全的。

(二) 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 米砂牙·米纳海洋渔业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是渔船主所控制的，他们是渔民的大剥削者。所有为渔船主工作的渔民都得自动扣下一部分收入作为合作社的储备金，而实际上成为社员的只是渔船主。渔工受到渔船主的严重剥削，而这种剥削是在合作社牌子下进行的。例如，规定大约百分之二十二捕获的鱼要在分期摊还欠渔船主的债务、自愿储蓄、义务储蓄等等名堂下交给合作社，而实际上这些征收的大部分则成为渔船主所有。从捕获的鱼中，扣掉百分之五的拍卖费，交给合作社百分之二十二，再扣除百分之十的一种带剥削性质的费用（即应当由渔船主负责的粮食和鱼网修补费），剩下的部分按规定渔船主约得百分之十八，舵公和测水员约得百分之十五，其余约百分之三十才归全船的十四名渔工。因此，渔船主所得实际上不是百分之十八，而是超过百分之四十。

除了通过渔船单位和合作社单位进行剥削之外，渔船主伙同中间商人也通过拍卖的办法来压低鱼价，这实际上是垄断了鱼的收购。

这个假合作社的一名管理员叫 R. R.，他既是渔船主，也是地主和盐业主。他拥有四只大鱼船，捕鱼设备齐全，估计值一百四十万盾；拥有一公顷半的盐场和五公顷的总督地。此外，他在布格尔、波赖斯和伊里尔等农村还出租多余的土地，并且还假借鱼类收购合作社的招牌拥有渔业商行。而且，他还是“人民食盐合作社”的一个理事。



(三) 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人民食盐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为盐业主所控制，盐业主担任它的理事，并且通过垄断居民生产的食盐的制度，来规定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食盐的收购价格。合作社也力图垄断咸鱼的生产，并且采取买青苗和接受典押盐场的办法对从事盐业的农民进行剥削，结果，盐场终于变为合作社所有。合作社对受雇于盐场的、工资很低的雇农，也进行剥削。

其他假合作社是在许多农村都有的“稻谷收购合作社”，其罪恶活动也已为人民所熟知。这种合作社受到官僚资本家的控制。

人民不喜欢这些假合作社，那是不足为奇的。这类合作社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有利于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把这类合作社叫做“封建官僚资本主义合作社”，那是更恰当。在南安由地区，人们用三个人物的头一个字母的合成词即“DDT”来称呼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结合。这些人物实际上是南安由的多面魔鬼。

除了剥削者的垄断工具假合作社之外，西瓜哇农村的劳动人民也创办了各种真正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其中可以举出如下一些：

(1) 青黄不接时期的粮仓和抓会

青黄不接时期的粮仓和抓会，可以说是信用合作社的萌芽。事实证明，在一些农村中办得满好。这种青黄不接时期粮仓和抓会首先能帮助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期反对高利贷者和克服困难。好的和失败的經驗都必须好好地加以研究，以便找出较好的信贷互助合作形式。

(2) 茂物县芝芒奇斯区苏卡瑪茹乡的互济会(抓会或信贷)

这个会的会员一百二十四人，每周各出蓄金十盾，每月开标一次，贷给需款五百至一千盾的会员，月利百分之五。借款的会员利用该款修盖房子。这种互济会也提供救济金给办丧事的会员。

(3) 茂物县芝芒奇斯区苏卡丹尼乡的互助会

成立于一九四八年，会员一百人，聚资四十盾，买了两头黄牛。目前这个互助会的财产已经有三头黄牛，七只羊，两头水牛，两把秤，四盏汽灯、三百个碟子和一间会议厅。这个会通过出售募集的大米买了两只羊。互助会会员得到的好处是可以借用水牛和黄牛耕地，赎羊，借用碟子、汽灯等用具和会议厅。



(4) 消費合作社

在一些农村中有消費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初期有些发展，但后来由于經濟情况恶劣和它的理事舞弊而都垮了。

当然，上面的一些描述还不能完全反映西爪哇农村的真正的合作社的情况。还有一些手工业合作社、牲畜合作社等等，这些合作社并不全是坏的，有的甚至实际上已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工具。不过所能得出的結論是：目前西爪哇的合作社一般还是假合作社，是剝削階級的壟断工具，还不是性质好的、为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合作社。

中农和貧农、中等漁民和貧苦漁民、雇农和漁工必須高举真正的合作社旗帜，来反对买青苗者、高利貸者、坏中間商人、恶地主、漁霸和农村官僚資本家爪牙的日益严重的剝削。此外，貧农和中农，貧苦漁民和中等漁民也必須高举真正的合作社旗帜，来提高他們的农业生产 and 漁业生产。

在西爪哇，除了老中农和各地区之間移民来的中农之外，由于爭取耕地斗争的結果，出現了一个独特情况，即出現了新中农，他們从耕种前农場土地和前森林地的斗争中获得了土地，并且从《土地基本法令》的执行中获得少量土地。他們都需要参加合作化运动，这不仅是为了团結他們反对剝削，也是为了阻止他們自发地发展为剝削階級或者由于丧失土地而再陷入不幸的境地。从政治和思想方面看，也需要吸收他們参加合作社，使他們始終跟着革命的农民运动前进。

假合作社的做法和奸詐无能的合作社理事的行徑，已經使农民和漁民大失所望，致使他們在某种程度上对合作社产生冷漠和譏諷的态度。因此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必須挺身而出，以恢复合作社的名声。我們必須喚起热爱真正的合作社的各阶层反对假合作社，建立劳动人民的合作社。

合作社中的剝削階級分子的恶劣的、營私舞弊的行为必須加以揭露。必須把他們驅逐出合作社，让真正拥护《政治宣言》的、忠誠老实、精明能干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人組成的領導来代替他們。在沒有合作社的农村，有必要主动建立各种必要的合作社。

必須爭取修改合作社条例中妨害发揚群众的自力更生精神的那些規定。

劳动人民中具有互助互利性质的互助合作組織必須加以发展。尽管这些組織沒有正式用“合作社”这个名称，但这些組織实质上完全符合合作社的精神。同时，必須反对那些濫用人民的互助合作传统和互助合作精神来为剝削階級利益服务的企图。

青黄不接粮仓、农村粮仓、种子仓、抓会等等信用合作社萌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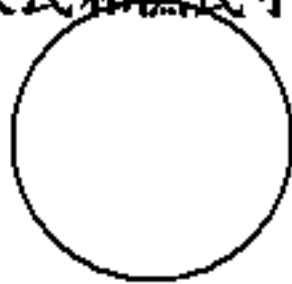


作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萌芽的互助组，也已经积累了若干应该加以发展的经验。农民的生产合作社（其社员是中农和贫农，如果可能的话也包括雇农）对提高农民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为使生产合作社能顺利发展，需要有能够提供劳动资金的信用合作社。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关于信用合作社的资金积累，除了来自劳动人民之外，也应该设法取自有钱的民主人士。

合作化运动不能离开革命的农民运动，最终解决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的问题将是合作化，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那就必须在革命干部中采取更加紧进行教育运动的措施，以便达到下列目的：

- (1) 澄清和统一干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关于劳动人民合作社的政治路线的认识；
- (2) 掌握关于对待现有的为剥削阶级所掌握的合作社以及根据政府条例建立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 (3) 掌握有关合作社的专门知识（如合作社条例、企业经济、会计等等）。

共产党人必须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来培养思想好的干部以及忠诚老实和精明能干的革命干部，以便在反对假合作社和把合作社变为农民和渔民手中的武器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附 录 一

南安由县甘当奥尔区东埃列丹乡的阶级划分

1、居民总数：

东埃列丹乡居民总数 4,249 人，其中成人 3,000 人，包括 1,653 名妇女和 1,347 名男子。

2、东埃列丹乡的性质：

东埃列丹乡位于爪哇北部海边，因此这个乡是渔民乡同时也是农业乡。居民中有地主兼渔船主。居民中半数是渔工。许多贫农耕种完毕后也当渔工下海捕鱼，以增加收入。

3、东埃列丹乡的阶级划分：

地主.....	3人
渔船主（其中两名兼地主）.....	11人
富农.....	13人
富裕渔民.....	15人
中农.....	64人
中等渔民.....	37人



貧农.....	300人	
貧苦漁民.....	250人	
雇农.....	100人	
漁工.....	1,500人	
宗教职业者（其中3名宗教教师，5名完全 靠其学生生活的长老）.....	8人	
商人（商店老板	14人	
大杂货店老板	50人	
小杂货店老板	40人）.....	104人
自由职业者或工匠（理发师	3人	
裁 縫	7人	
金 匠	4人）.....	14人
企业家（包括紡織、竹器手工业和漁业）.....	11人	
工人（企业工人	21人	
运输工人	15人	
漁业职员	20人）.....	56人
高利貸者.....	12人	
娼妓.....	14人	
其他（一般是家庭妇女）.....	488人	

—————
总計 3,000人

附 录 二

牙律县瓦納拉查区德卡尔沙里乡 雇农、貧农、中农和富农的收支

1、雇农 A，夫妻两人和两个小孩：

收割季节两个月和青黄不接时期四个月的收入：

36,000 盾



計:

帮人种地工資 (在收割季节两个月内), $2 \times 30 \times 100 \text{盾} = 6,000 \text{盾}$

打柴收入 (在青黄不接时期四个月内), $4 \times 30 \times 200 \text{盾} = 24,000 \text{盾}$

妻子帮人割稻收入 (在收割季节两个月内), $2 \times 30 \times 100 \text{盾} = 6,000 \text{盾}$

六个月 (一季节) 的支出: 67,050 盾

計:

大米每日 1.5 公斤, 每公斤 230 盾, $6 \times 30 \times 345 \text{盾} = 62,100 \text{盾}$

咸鱼和辣椒酱, $6 \times 30 \times 25 \text{盾} = 4,500 \text{盾}$

孩子上小学学费, $6 \times 75 \text{盾} = 450 \text{盾}$

一个季节内不敷: 31,050 盾

为了解决收支不敷, 这家雇农不得不将粮食安排如下: 每隔三天或两天吃一次大米饭, 其余的用玉米或其他粮食代替。

2、貧农 K, 夫妻两人和两个小孩:

一季节的收入: 42,500 盾

計:

40“冬巴克”自耕地收入, $2 \times 16,000 \text{盾} = 32,000 \text{盾}$

帮人种地工資 (两个月), $1.5 \times 30 \times 100 \text{盾} = 4,500 \text{盾}$

妻子帮人割稻两个月, $2 \times 30 \times 100 \text{盾} = 6,000 \text{盾}$

一个季节的开支: 92,400 盾

計:

大米每日 2 公斤, $6 \times 30 \times 460 \text{盾} = 82,800 \text{盾}$

咸鱼和辣椒酱, $6 \times 30 \times 50 \text{盾} = 9,000 \text{盾}$

孩子上小学学费, $6 \times 100 \text{盾} = 600 \text{盾}$

一个季节内不敷: 49,900 盾

由于不敷甚多, 这家貧农也无法每天吃大米饭, 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典押出去, 而一般土地总是落在承押者手里。

3、中农 S, 夫妻两人和两个孩:

一个季节的收入: 130,000 盾

計:

200“冬巴克”土地的收入, $8 \times 16,000 \text{盾} = 128,000 \text{盾}$



在水田养鱼得益:	2,000 盾
一个季节的开支:	107,100 盾
計:	
大米每日 2 公斤:	$6 \times 30 \times 460 \text{ 盾} = 82,800 \text{ 盾}$
咸鱼和蔬菜:	$6 \times 30 \times 100 \text{ 盾} = 18,000 \text{ 盾}$
种地开支:	$25 \times 180 \text{ 盾} = 4,500 \text{ 盾}$
孩子的学费:	$6 \times 200 \text{ 盾} = 1,200 \text{ 盾}$
其他开支:	$6 \times 100 \text{ 盾} = 600 \text{ 盾}$
中农一个季节内剩余:	22,900 盾

这笔剩余用来修盖房子和购制新衣。可是有四个或更多孩子的中农，肯定会入不敷出，必须向地主或高利贷者借贷。

4、富农 I，夫妻两人和四个孩子:

一个季节的收入:	541,000 盾
計:	
一公顷水田收入:	$20 \times 16,000 \text{ 盾} = 320,000 \text{ 盾}$
鱼塘产鱼收入每三月一次:	$2 \times 13,000 \text{ 盾} = 26,000 \text{ 盾}$
椰树和桔子树收入:	25,000 盾
在水田养鱼得益:	10,000 盾
放债一个季节获利:	$10 \times 16,000 \text{ 盾} = 160,000 \text{ 盾}$
一个季节的开支:	213,700 盾
計:	
大米每日 3 公斤:	$6 \times 30 \times 690 \text{ 盾} = 124,200 \text{ 盾}$
蔬菜、咸鱼、其他:	$6 \times 30 \times 200 \text{ 盾} = 36,000 \text{ 盾}$
种地开支:	$100 \times 180 \text{ 盾} = 18,000 \text{ 盾}$
孩子的学费:	$6 \times 4,000 \text{ 盾} = 24,000 \text{ 盾}$
管理池塘和椰树开支:	1,000 盾
其他开支:	10,500 盾
富农一个季节盈余:	327,300 盾

这笔盈余用来粉刷其住宅和更新家具，也用来对贫农和中农放债。



名詞解釋

〔民防〕(HANSIP)(見本文第 11 頁)

“民防”是根据所謂“区域战争学說”而建立起来的武装单位。它的成员是农村的农民青年，受地方民政官员领导，例如区一级由区长和区警察署领导，乡一级则由乡长领导。“民防”的任务是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共同维持农村的治安。在很多地方，“民防”被恶地主和其他农村魔鬼用来恫吓和压迫农民。

〔地方军区司令部〕(KORAMIL)(見本文第 11 頁)

地方军区司令部是《军事戒严令》撤销后在区一级建立的武装部队司令部，以贯彻执行所謂“区域战争学說”。西瓜哇各地都有这种机构。

〔“乡村建设军官组织”〕(PEMBINA)(見本文第 11 頁)

即派驻西瓜哇各乡的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成员。该组织是“地方军区司令部”的派出机构。

〔出让制〕(BAJUR)(見本文第 12 頁)

贫农把自己的土地耕作权在一定期限内，如两年至三年出让给中农或富农，但不收租，因为拥有土地的贫农负担不起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所需要的很大的费用。约定的期限到期后，土地所有者才有权收租。

〔收割费〕(BAWON)(見本文第 13 頁)

即作为工资发给割稻者的稻谷。收割费的数量取决于劳动力的数量与稻田面积或工作量的比例，各地不一样。有的地区，割稻者所得的收割费等于他所割的稻谷的四分之一，有的地区则五分之一、八分之一，有时甚至只有二十分之一。

〔定期卖地〕(DJUAL AKAD)(見本文第 14 頁)

根据讲好的条件卖地，例如：卖地时讲好在一定时间内把土地赎回。如到期无法赎回，这块土地就归买主所有。卖主有时可以再得到一点补款，但也有不少情况是卖主还要负责。因为卖主在卖地后，每当遇到生活困难就向买主借款、借大米或稻谷来解决。定期卖地实际上是土地抵押，土地的产品被当作利息。

〔包工〕(NGEPAK 或 NJEBLOK)(見本文第 15 頁)

即包耕，目的是使自己有权当割稻雇工或包揽其他工作。

〔颈部的肉〕(KEREDAN)(見本文第 18 頁)

指宰牲口时必须交给宗教官的牲口颈部的肉，这是“波罗哥罗”的一种税赋(额外税赋)。根据殖民主义者所继承的封建风俗规定，如果一个农民宰牲口，除了必须将脊部两边的肉交给乡长、小腿的肉交给村长和头部交给其他农村官员外，还得把颈部的肉交给宰牲口的伊斯兰教的宗教官。颈部的肉的宽度有所规定，即把牲口的耳朵贴在其颈部，在耳朵尖端地方割，耳朵尖端与宰割时的刀痕之间的距离，就是必须交给伊斯兰教的宗教官的颈部(周围)的肉的宽度，其宽度是有所不同的，这取决于牲口耳朵的长短及伊斯兰教的宗教官宰牲口时的刀痕，刀痕越靠近喉咙，这块肉就越大。

〔里几〕(LAMUSIR)(見本文第 18 頁)

里几是位于牲口脊骨左右两边的肉，这部分是上好肉。在许多地方，这部分肉是作为“波罗哥罗”上交。宰牲口的农民必须交出这部分的肉，一块交给乡长，另一块交给副乡长或乡村文书。

〔送礼〕(NGANTEURAN)(見本文第 18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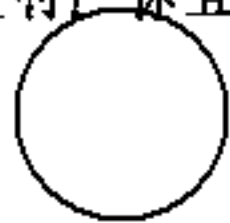
在农民举办婚礼、割礼等宴席前，农民请求乡长批准或通知乡长时，都要向乡长送食品。

〔当差役〕(TUGUR-TUNDAN)(見本文第 18 頁)

即守候在乡长家里，以便向村民传达命令和送急件给区长或别的乡。



上帝啊！你不知俺攀亲花力气，交友不便宜，狠心肠一双拖去阴间里。下本钱万万千，没捞到丝毫利。实指望有一天，有一天你争一口气。谁知道你啊你，灰溜溜跟着那个屁去矣。教我暗地心惊，想到了自己。 人生有情泪沾臆。难怪我狐悲兔死，痛彻心脾。而今而后真无计！收拾我的米格飞机，排练你的喇嘛猴戏，还可以合伙儿做一笔投机生意。你留下的破皮球，我将很命地打气。伟大的、真挚的朋友啊！你且安眠地下，看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呜呼噫嘻！



(三) 哭自己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作

〔哭途穷〕 孤好比白帝城里的刘先帝，哭老二，哭老三，如今轮到哭自己。上帝啊！俺费了多少心机，才爬上这把交椅，忍教我一舛斗翻进阴沟里。哎哟啊喂！辜负了成百吨黄金，一锦囊妙计。许多事儿还没来得及：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太太的妇联主席，姑爷的农业书记。实指望，卖一批，捞一批，算盘儿错不了千分之一。那料到，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真是从哪儿啊说起，从哪儿啊说起！说起也稀奇，接二连三出问题。四顾知心余一铁，谁知同命有三尼？一声霹靂惊天地，蘑菇云升起红戈壁。俺算是休矣啊休矣！泪眼儿望着取下像的宫墙，嘶声儿喊着新当家的老弟：咱们本是同根，何苦相煎太急？分明是招牌换记，硬说我寡人有疾，货色儿卖的还不是旧东西？俺这里尚存一息，心有灵犀。同志们啊！还望努力加餐，加餐努力。指挥棒儿全靠你、你、你，要到底，没有我的我的主义。

（原载《人民日报》1965年2月1日）

